

中国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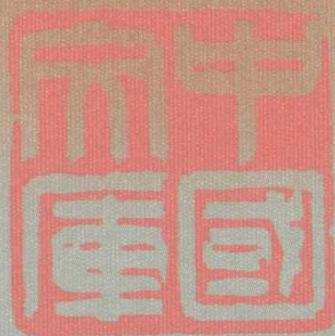
· 史学类 ·

周恩来年谱

(1898~1949)

(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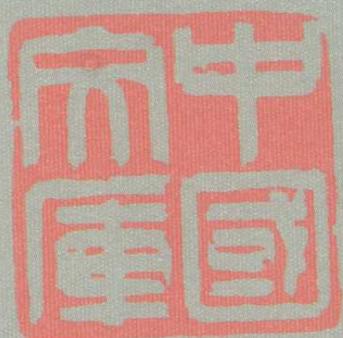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

国

文

库



中国文库
史学类

周恩来年谱

1898 ~ 1949

(上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恩来年谱. 1898 ~ 1949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9
(中国文库)
ISBN 978-7-5073-2402-0

I. 周… II. 中… III. 周恩来(1898 ~ 1976) — 年谱 —
1898 ~ 1949 IV. K82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3293 号

责任编辑：王春明

整体设计：翁 涌 李 梅

责任印制：董文权

周恩来年谱(1898 ~ 1949)

Zhou Enlai Nianpu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编：100017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7 年 9 月第 2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27.5

字数：670 千字 印数：1—4500

ISBN 978-7-5073-2402-0

定价：46.80 元(全二册)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邬书林 刘 畸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从军 李东生
杨牧之 宋木文 张小影 柳斌杰 徐惟诚 龚心瀚

主 任：聂震宁

副主任：刘伯根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之江 王 琦 王瑞书 边彦军 吕建华 刘玉山 刘国辉
刘健屏 李 岩 李保平 李 峰 杨 才 杨 耕 杨德炎
吴江江 吴希曾 吴尚之 吴 斌 何林夏 汪继祥 宋一夫
宋焕起 张伟民 张 琦 陈 鵬 胡守文 俞晓群 祝君波
贺圣遂 贺耀敏 栾世禄 黄书元 曹 铁 龚 莉 惠西平
程大利 焦国瑛 解 伟 薛炎文

“中国文库”第三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刘伯根

副主任：刘国辉 宋焕起

成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殿利 刘晓东 李红强 汪家明 林 阳
徐 俊 潘凯雄**

出版编务组：

**李红强 仵永成 蔡增裕 谢仲礼 乔先彪
仝冠军**

说 明

- 一、周恩来是本年谱谱主，书中叙述谱主的活动，一般均省略主语。
- 二、本年谱按年月日顺序记事，有些事采用纪事本末方式撰写。一条中包括不同月日多次活动的，开头用第一次的时间，其余各次的时间在行文中出现。
- 三、年谱中同一时间有多条内容的，在第一条开头写明时间，从第二条起用“△”号表示与第一条时间相同。
- 四、条文中力求标明每项活动的具体日期，有些日考订不清的写旬，旬考订不清的写月，依此类推。一般放在旬末（月末），有些放在旬中（月中），是编写者大体能断定其时间的。
- 五、凡谱主与他人联名发的函电文件，其名次一般均按原件顺序排列。谱主为首的，一般不出谱主姓名，只写明和某某、某某从事了何项活动。
- 六、本年谱适当反映了某些重要的背景材料，按时间顺序排列在文中。
- 七、对有两种不同说法的同一件事，除有些经研究能认定一种说法的以外，有的在采用倾向的说法同时，另一种说法在注内说明；有的时间确定不了的，则用括号注明另一种说法认为的时间。
- 八、本年谱对于文中涉及的有些人和事，作了简单的注释。

目 录

1898 年	1
1902 年	2
1903 年	3
1904 年	4
1905 年	5
1906 年	6
1907 年	7
1908 年	8
1910 年	9
1911 年	10
1912 年	11
1913 年	12
1914 年	13
1915 年	15
1916 年	18
1917 年	22
1918 年	25
1919 年	29

1920 年	38
1921 年	46
1922 年	54
1923 年	60
1924 年	65
1925 年	73
1926 年	89
1927 年	101
1928 年	135
1929 年	154
1930 年	180
1931 年	204
1932 年	220
1933 年	242
1934 年	262
1935 年	275
1936 年	303
1937 年	350
1938 年	406

1898年 誕 生

3月5日（农历二月十三日） 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城内的驸马巷。

幼名大鸾。

祖籍浙江绍兴。祖父周起魁曾任山阳县知事，在周恩来出世后不久病故，家境逐渐破落。父亲周贻能（后改名劭纲），为人忠厚老实，不善交际，长年在外省谋事，收入微薄，还经常失业。母亲万氏，系清河县知事万青选的女儿，性格开朗，处事精明，全力主持家务。

不满半岁时，过继给病重的叔父周贻淦。不久，嗣父去世，由嗣母陈氏抚育。陈氏出身于贫寒的书香门第，性格文静，才学出众，会书画，好诗文，对周恩来的抚育倾注了全部心血。

1902年 四岁

在嗣母的教育下，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

1903年 五岁

进家塾读书。取学名恩来，字翔宇。^①此后几年内，先后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中的一些篇章。

^① 后来用过的化名或笔名有：飞飞、飞、伍豪、伍、周少山、少山、冠生、冠、维思、陈宽、胡必成、赵来等。

1904年 六岁

随父母、嗣母迁到清河县清江浦镇（今江苏省淮阴市）外祖父家居住，在万家的家塾继续读书。常听嗣母讲历史和神话故事，“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

1905年 七岁

随生母和嗣母从外祖父家迁入陈家祖辈的旧居——陈家花园，在家塾中就读。

1906年 八岁

在嗣母的引导下，开始阅读小说。在以后的几年里，先后读了外祖父家的藏书：《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红楼梦》、《镜花缘》等。

1907年 九岁

春 生母病故。万氏生前经常出面调解家族内的纠纷，总是带周恩来同去。她处事的精明干练和排难解纷的能力，给日后周恩来的办事能力以影响。

夏 陪伴嗣母到江苏省宝应县治病，两个月后返回清江浦镇。

1908年十岁

七月 嗣母病故。家中料理完两次丧事，已债台高筑，靠典当借债度日。秋冬之交，父亲因经济困窘，离家去湖北做事。周恩来带两个弟弟迁回淮安老家居住，“佐理家务，并然有序”。

回淮安后，曾到表舅龚荫荪的家塾寄读。龚是革新派人物，结识同盟会成员，赞助革命，常向周恩来介绍些新思想和时事政治知识，使周恩来开始受到政治上的启蒙。

1910年 十二岁

春 到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堂伯父周贻谦家寄居，入银岗书院读书。

秋 移居奉天府（今辽宁省沈阳市）伯父周贻赓家，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在校两年，“肆力学科，兼好读散文小说及新闻杂志”，各课成绩都名列前茅，作文尤受老师、同学赞许。在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的影响下，先后阅读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并订阅《盛京时报》，养成了每天坚持读报，关心国事的习惯。为了适应东北的环境，无论冬夏都坚持室外体育锻炼，强健了体格，并习惯了吃高粱米。

1911年 十三岁

夏 暑假中，随同学到奉天南郊魏家楼小住，参观日俄战争遗址，听当地老人讲述日俄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饱受的苦难，悲唱当时流行的歌曲“吾党何日醒？”

10月 当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统治的消息后，在学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

本年 在一次修身课上，回答老师“读书为了什么？”的提问时，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

1912年 十四岁

10月 作《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文中提出：教与学的目的，都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起来。学生在学习中应奋勉学习，“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校长和教师则“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这篇文章被评为甲等作文，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并作为范文先后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

1913年 十五岁

春 因周贻赓工作变动，随伯父搬到天津，住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进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功课，准备升学。

8月中旬 考取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天津南开学校。十九日报到入学，编入己三班（以后改为丁二班）。

入学初期，国文成绩“早露头角”而“英文非佳”，经发奋攻读，很快赶上，各科成绩均优。课外，关心时事，经常阅读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报刊、书籍，如《民权报》、《民立报》、《大公报》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的著作，以及司马迁的《史记》、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在校期间，经常利用假日和课余时间，为学校刻蜡版，抄写教学讲义，以补贴膳食费，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1914年 十六岁

3月上旬 和同班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拟就《敬业乐群会简章》，规定组织的宗旨为“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十日，在全体会员会上，被推为智育部长。

春 写《春日偶成》五言诗两首。其中一首：

“极目青郊外，
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
博浪踵相踪。”

8月20日 进入第二学年。因家境贫寒而品学兼优，经教师推荐，从本学年起，免交学费。

10月15日 敬业乐群会会刊《敬业》创刊。周恩来担任编辑员，在创刊号上发表诗作《春日偶成》、散文《射阳忆旧》、侠义小说《巾帼英雄》（第一部分）以及和常策欧（孤竹野人）合写的《本会成立小史》。在为小说《部视学》写的编后语中，针砭时弊，抨击教育制度的腐败，写道：“在上者不图改良振新，只知重形式上为得计，则莽莽前途，莘莘学子，殆其危矣。青年如斯，国事又何堪设想哉！”

11月17日 参加南开学校新剧团成立大会，被推举为布景

1914年12月

部副部长。

12月14日 获南开学校“国文传观”比赛第二名。

1915年 十七岁

1月18日 担任敬业乐群会稽古部部长。五月，负责新增设的童子部工作。

2月1日 当选为南开学校演讲会副会长。

2月 参加敬业乐群会与其他学生团体举办的贫儿义塾工作。

3月 参加全校数学比赛，成绩优秀。所在丁二班成绩获全校总分第一。

4月 在《敬业》第二期发表侠义小说《巾帼英雄》（第二部分）。小说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赞扬扶危济困的女中豪杰。

5月9日 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修正案。周恩来在后来的一篇作文中写道：“呜呼！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一种爱国热诚，似已达于沸点”。

6月6日 参加天津各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并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奋起图强，振兴本国经济，誓雪国耻，坚决不当亡国奴。会后，写《广募救国储金致友人书》，宣传救国储金运动。

本学年内 作《尚志论》。文中列举古今中外大量史实，论述事业的建树与个人志向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无论“立功异域，封万户侯”的班超，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若论其成功之秘诀，固由于一种叱咤风云之气，坚韧不拔之操所铸成，要亦其最初之志，有以使之然耳”。而“志卑之害”在于“志在金钱者”和“志在得官者”，表示“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

7月 暑假中，因无力支付探亲旅费，留在学校，被推举为由留校同学组成的暑假乐群会总干事。

8月 30日 南开学校《校风》周刊创刊。周恩来为该刊成员，负责选录课艺及经理各会事务栏（即选登学生作文及报道学生团体活动）。

8月 在暑假演说会上作题为《人材与器识》的演说。

9月 29日 作《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文中主张“学问二字，非仅限于区区功课间”，批评“惟西是尚”的维新派和“惟返古是求”的复古派。并针对当时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效劳的行径，写道：“日言筹安，安未及见，不旋踵而国将亡矣。言念及此，东瞻朝鲜，西忆印度，不知涕泪之何从。”希望找到“独立不拔，放眼昆仑，为国家谋久远之计者”。

9月 当选为敬业乐群会副会长。

10月 17日 在南开学校成立十一周年纪念会上，参加演出新剧《一元钱》，扮剧中女主角。在随后写的作文《本校十一周年纪念新剧一元钱记》中论述新剧感化社会的教育功效，说：“学校教育在青年，欲联社会与化之，则新剧又为此集中利器也。盖改良社会，端赖感化劝导之功用，而新剧感人最深，迥非旧剧之以声调音韵胜也。”在校期间，先后参加《恩怨缘》、《老千金全德》、

《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等十多个新剧的编导和演出。

12月 敬业乐群会改选，任会长。

冬 作《或多难以固邦国论》。文中写道：“自海禁大开，强邻逼处，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文中针对袁世凯“忍耻受辱，逐条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一事，疾呼：“事急矣，时逼矣，非常之势，多难之秋，至斯亦云极矣”，“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

1916年 十八岁

1月4日 任《校风》文苑部部长。三月，兼纪事类编辑。九月，任纪事类主任和经理部总经理。

3月20日 在《校风》第二十二期发表《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一文。认为“新陈代谢物质循环而演成日新月异之物质文明世界”，老子、赫胥黎皆深明此“生存常道”，而之所以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是由于二氏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其实他们“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统世界之学理教说”的“儒之孔，西之耶，印之佛”的“三氏之说，非不善也。然其于生死存亡之观念，未免后于老、赫也”。

4月 在《敬业》第四期发表《送蓬仙兄返里有感》诗三首。其中一首写道：

“东风催异客，
南浦唱骊歌。
转眼人千里，
消魂梦一柯。
星离成恨事，
云散奈愁何。
欣喜前尘影，
因缘文字多。”

另一首诗中有“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之句。

5月6日 代表所在班级参加全校作文比赛，选《诚能动物论》为题，获第一名。文中认为诚是“人类之共有天性”，“发于中而形于外”，主张为人要以诚相待，“一人行之，而众人服之；一国守之，而万邦协之”，则可以“虚诈绝，诳伪逃，无人我之分，鲜名利之见，相跻于大同之境”。“执政者苟于感人动物之事，注意及之，则返诚去伪，一转瞬耳，又何至日以干戈相寻，欺伪相诈哉！悲夫！”文章作为《校风》第三十期代论发表。全班得班际第一名，奖品是一面写有“含英咀华”四个字的旗子。

5月下旬 率敬业乐群会同学参观农业实验场、工业实验厂和农事讲习所。

7月 暑假中，和校新剧团部分成员赴天津郊区高家庄编写新剧。

9月18日、25日 在《校风》第三十八、三十九期发表题为《吾校新剧观》的连载社论，详细论述新剧作，认为解决中国“昏聩愚顽”状况的办法，“舍通俗教育无由也”，而新剧则是普及这一教育的“最要之主旨”。主张新剧应达到“纵之影响后世，横之感化今人”的效果，以使“民智开，民德进”。

10月上旬 参加全校演说比赛，题目为《中国现时之危机》，获第五名。演说词从中国的内忧外患和道德精神状态等方面，论证中国社会已处于极危险的地位，指出这种局面“莫不由于取敷衍手段姑息手段以养成”。演说词批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使辛亥一役，不以敷衍结果，直捣黄龙，剪除旧类，彼时政治可以一新，又何致有二次三次革命？教育不振兴，工商不发达，农林（不）垦殖，以肇今日之危险时代哉！”呼吁青年学生们当此国家危难之际，应“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

这篇演说词在《校风》第四十五期作为代论发表。

10月 在《敬业》第五期发表《我之人格观》。文中认为“人格之造就，端赖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世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在校期间，围绕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拯救国家等问题，先后写《论名誉》、《国民宜有高尚思想说》等作文，认为一个人应当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但又不能“存邀名之心，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否则“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同时一个人应有远大志向，不为金钱高官所惑，而要以拯救神州陆沉为己任。

△ 在《敬业》第五期发表诗作《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

“茫茫大陆起风云，
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
虫声唧唧不堪闻。”

11月22日 在《校风》第四十七期发表为《破天荒大发明天地新学说》而写的志，提出在二十世纪文明时代，学者应以“发明新理别辟思潮为务”，以改变中国“舍上古所谓三大发明外殆寂焉”的局面，在科学上“继起有人”。

11月29日 在《校风》第四十八期发表研究奢靡问题的作文。文章叙述人类社会从人工时代、役物时代到目前汽力时代的发展过程，从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角度，具体分析奢靡问题，反驳认为当前“国匮民贫，由于世风奢靡”的言论，认为“国民生活之高低，与其国文明之进退，实处于相维系之境也”，尽管奢靡为“习性之恶者，然而施之于文化进步之国，则其因生活程度之

高，虽奢靡不得谓之奢靡也”，但奢靡之风“若盛行于吾文化蔽塞之邦，则吾行见其促国于亡”。

12月 参加全校习字比赛，获行书优胜奖。

△ 和南开学校教师、同学到天津北宣讲所，发表题为《社会之现象》的演说。

1917年 十九岁

1月18日 在《校风》报社全体人员会上，报告上学期社务。因临近毕业，辞去总经理职务。

2月13日 寒假中，随南开学校新剧团组织的观剧团到北京观摩。在京三天，“睹社会之腐陋，闻政府之黑暗”，气愤之极。在随后的一篇作文中抒发自己对穷苦人民的同情之心：“躊躇途中，睹乞丐成群也，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

5月2日 在《校风》第六十三期开始发表为《校风》撰写的社论《本社之责任观》（全文分六期刊载完）。文中提出“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及“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的论点。在校期间，还先后写《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皆治于人论》和《爱国必先合群论》等作文，提出“治人、治于人者，恒常系诸一人之身，此共和之真谛在是，民主之精神亦在此”，而“阶级不除，无平等之望；人群不合，无爱国之理”。因此，“欲爱国则必先合群，无分畛域，勿拘等级，孤寡者怜之，贫病者恤之，优者奖之，劣者教之。合人群而成良社会，聚良社会斯能成强国”。

5月23日 参加南开学校讲演会（由敬业乐群会等三个学生团体邀请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来校讲演），并笔录《蔡子民先生演说词》，后载于《校风》第六十七期。

5月 参与筹编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并撰写序言。

6月26日 参加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典礼，获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以平均分数八十九点七二的成绩毕业。《毕业同学录》中对周恩来作了如下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

7月下旬 和李福景等同学去北京筹划赴日本考官费留学事。经过奔走，靠同学、师友的帮助，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费用。行前，到东北探望伯父，并回到沈阳母校同师友相见话别，为同学郭思宁题写“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

9月 由天津登轮赴日本。行前写七言诗一首：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10月 入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初到日本，因独处异国他乡，孤寂苦闷，一度相信“无生”主义①。

12月初 参加南开学校留日校友会。在东京汉阳楼召开的第一次月会上，被选为评议员。曾在校友会上作《吾人日后求学之方针》的报告。

① 无生主义：佛教名词。认为一切现象之生灭变化，都是世间众生虚妄分别的产物，本质在于“无生”，修得无生，即是涅槃，即熄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

12月19日 致信在美国依阿华州格林奈尔大学学习的南开同学冯文潜，谈旅日留学生活，说：弟自来此预备，尚称合式。官费考试在明岁六月，届时背城一战，成败与否不敢预料。

12月22日 致信南开同学陈颂言，谈旅日留学生活，说：“留东学子在此，约分三派：一埋首用功，不闻理乱；一好出风头，到处声张；一糊涂到底，莫名其妙。此外，持求学济世，以用功为根，交接为道，糊涂藏隐者，乃属上流不可多得之士。”信中表示：“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乃争权者犹红其眼磨其拳，不顾生死，哀哉！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本年 书赠留日南开同学王朴山题词：浮舟沧海，立马昆仑。

1918年 二十岁

1月2日 诵读嗣母陈氏生前所写诗作遗墨，然后含泪焚香静坐，以表达对去世十年的嗣母的思念。

1月8日 接堂弟来信，得知留居淮安的叔父周贻奎在贫病中去世，异常悲伤，立志发愤读书，埋头用功，以考取官费留学生。随后搬到一租金低廉的住处，改包饭为零买，每天废止朝食，以节省开支。

1月25日、26日 连日在日记中评论前留日学生归国从政一事，认为他们“求学不足还是小事，最大的就是没有真正立身的根本去与这个恶劣社会交战”。并表示来日本求学，“第一样事情就得练铁石心肠、钢硬志气，不为利起，不为势屈”。

2月4日 旅日以来，留意观察日本社会，除每天用一个多小时阅读日文报纸外，还经常到东京中国青年会阅读报刊杂志，了解各种新思潮，与朋友频繁接触，广为交谈。本日，在日记中写道：求学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呢？“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以便了解他们的国情。并认为古人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句话实在是谋国的要道”。

2月6日 在日记中写道：大凡天下真有本事的人，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

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的人总是心里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不足论事，然而当他活着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是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2月9日 在日记中写道：人生在世，恋爱是一种事，夫妻又是一种事。恋爱的范围广，夫妻的范围狭，恋爱里可以有夫妻这一义，而夫妻绝不一定包括恋爱的。夫妻由恋爱中生出来的，是真夫妻；若随旁人的撮弄或是动于一时感情的，这个夫妻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价值。

2月11日 春节时，在日记中立下本年内应做的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2月15日 连日来，将在国内时看过的《新青年》杂志又仔细阅读一遍，对其中所宣传的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认为自己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到日本后所谓的无生主义，也“不容易实行”。表示要“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对能领悟到这一点，十分喜悦，在本日的日记中写道：“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2月19日 在国内曾一度认为要拯救贫弱的中国，非学德意志，实行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不可。到日本后，通过对同样实行军国主义的日本的观察，推翻了这一想法。本日，在日记中写道：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它必定

是以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这在二十世纪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在二十世纪的进化潮流中如不实行国家主义、世界主义，那是自取灭亡的。

3月4日—6日 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因日文成绩不好，未被录取。此后，为准备七月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给自己制定了紧张的学习计划。

4月3日 致信冯文潜，渴望交流学习心得，“甚盼时有以示我，新思潮尤所切望”。

4月23日 读新出版的《露西亚研究》杂志，从一篇论述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中，了解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分两派，过激派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的）党纲”；温和派主张“民主，如办不到，仍主张君主立宪”。在日记中写道：“按现在情形说，成君主立宪的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而“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灵，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

5月初 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政府即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消息传出后，激起旅日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各省各校的留日学生代表共议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号召全体留学生罢学归国，以示抗议。在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投入这一运动，积极参加各种集会，散发爱国传单，并在日记中逐日记载事态的发展。到五月底，要求归国的学生几达三千人，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恐慌。

5月19日 参加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并发表入会演说，分析中国衰弱的原因，“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

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的缘故，而“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希望呢！”并向其他会员赠送两句话：“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6月初 重新开始温习功课，全力以赴准备考试。

7月2日、3日 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又因日文成绩不理想，未被录取，心情懊丧。在随后的日记中写道：“这叫做自暴自弃，还救什么国呢？爱什么家呢？不考官立学校，此羞终不可洗。”

7月20日 参加庆祝新中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

7月28日 离开东京，经朝鲜釜山归国探亲。八月一日，返抵天津。八月七日回母校探望。八月十日至二十六日到北京看望父亲。九月四日返回东京。

7月下旬—9月中旬 日本发生席卷全国的米骚动。五十七天内，全国有三十三个县发生暴动。

10月17日 参加东京留日南开同学会庆祝校庆日集会，发表演说，并当选为该会副干事。

本年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传到日本，同时由于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时涌向日本，得到广泛传播，介绍各种思潮的书籍很多。周恩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先后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同时也阅读了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在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1919年 二十一岁

1月 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创刊。周恩来是该刊的热心读者。

3月 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决定回国学习。临行前，将自己十分喜爱的梁启超《自励》一诗，书赠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南开同学王朴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并以《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书赠为他饯行的南开同学张鸿诰，在附言中表示：“返国图他兴。”

4月5日 归国途中，在京都停留时写《雨中岚山》等三首诗，诗中写道：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4月中旬 由神户乘船离开日本，在大连上岸。先去沈阳看望伯父周贻赓，后又到哈尔滨东华学校作客，谢绝了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留他当教员的邀请，约在五月中旬返回天津。

5月4日 五四运动爆发。五日，天津学生响应投入运动。十

四日，成立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谌志笃、马骏为正副会长；二十五日，成立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刘清扬、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郭隆真、张若茗、邓文淑（邓颖超）为评议员，领导学生展开游行示威、集会、罢课等斗争。周恩来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开去”，全力参加运动。

5月中旬 致函留日南开同学会，揭露校方拉拢曹汝霖等担任校董，借以换取捐助经费一事。后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校方此举未成。

6月5日 北洋军阀政府在六月三日大批逮捕在北京街头进行爱国演讲的学生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纷纷起来支持北京爱国学生。本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南开学校广场召开数千人的爱国运动大会，通过六项誓言：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始终。会后齐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省长致电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争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九日，天津各界群众二万余人举行公民大会，配合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罢课、罢工、罢市斗争。十日，天津商界罢市。在全国各界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本兼各职。

6月16日 在北京、天津学联的倡议下，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随后周恩来收到天津学联赴沪代表马骏的来信：全国学联“抵死力争”，拒签和约。

6月27日 到车站为赴京请愿的马骏、刘清扬等十名天津各界代表送行。同日，北京、天津等地各界代表五百余人到总统府请愿，反对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要求政府拒签和约。经过全国人民的抗议以及旅法华工和留学生的斗争，二十八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6月下旬 天津学生联合会为进一步唤起民众，把运动引向深入，由谌志笃和马骏出面，请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表示：我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随即搬进南开学校，带头举行话剧义演，募集办报经费，并筹划解决纸张、印刷、出版、立案等问题。

7月7日 和部分留日归国的学生代表一起，出席南开学校慰劳茶话会，慰问假期中在校坚持斗争的同学，并在致词中对下一步斗争提出建议：“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7月12日 为扩大即将创刊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影响，在《南开日刊》发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文中在评价五四运动时，把它同日本的米骚动、朝鲜的独立运动并提，认为“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绩”。宣布《会报》将“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对于社会生活、各种学术进行“公允正确的批评”，等。文章为天津各大报转载。

7月21日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刊名下方用英文写着：“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周恩来在创刊号上发表他起草的社论《革心、革新》，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号召。《会报》初为日刊，辟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栏。最多时每期发行两万多份。周恩来主持采写、审稿、编排和校对，有时还参加早晨的卖报。

7月下旬 为抗议日本宪兵在山东济南、青岛等地擅自逮捕中国人，山东学、商各界数千人到省公署请愿示威，要求向日领

事馆交涉放人。北洋军阀政府宣布山东实行戒严，任命安福系马良为戒严司令，镇压人民的反抗。八月五日，杀害爱国的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

8月5日 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评现今舆论界并问〈益世报〉》一文，抨击军阀收买报社，批评天津《益世报》对和约签字、山东戒严等重大事件“一字不提”，质问说“外交到这个时候，安福派闹到这样子，我们还不赶快用我们舆论奋斗吗？”

8月6日 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黑暗势力》一文，疾呼：“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要“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

8月9日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天津其他各校刊物《醒世周刊》、《南开日刊》、《北洋日刊》、《师范日刊》等联合组成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周恩来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

△ 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敬告日本来华的学生》一文。文中对日本来华学生主张日中亲善的愿望表示欢迎，指出：“诸君既知道军阀不好，侵略主义不好”，“就应该同去做真正的平民运动，推倒你们的军阀，打破日本国民侵略的野心，然后两国国民的社会运动，才可以接近”。

8月23日 在天津各界联合会发出要求北洋军阀政府严惩马良，解除戒严，以谢国人的通电后，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同商定派出刘清扬、郭隆真等十名代表赴京请愿。本日，天津代表和北京代表一起前往总统府递交请愿书，要求惩办马良以平民愤，遭军警拘捕。消息传到天津，周恩来当即布置《会报》连夜赶出号外，报道事实真相，并与学联负责人商议发动学生进京，

展开更大规模的斗争。

8月26日 北京、天津学生三四千人，齐集总统府门前请愿示威。二十八日遭到军警驱赶毒打，请愿群众的现场总指挥马骏等人被捕。周恩来闻讯后，即和张若茗等率领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连日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并发动舆论支持示威斗争，积极开展营救活动。在全国舆论的一致声讨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于三十日释放全部被捕代表。

9月2日 从北京乘火车返回天津。归途中，和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男女学生代表总结请愿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这一倡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回津后，开始筹建觉悟社。

9月4日 主持《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例会。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警厅对待学生方法讨论案，各校从速组织周刊案，会报、周刊联络案等提案，决定付诸实行。

9月16日 参加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的觉悟社成立大会，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起草觉悟社宣言。觉悟社第一批社员有谌志笃、马骏、周恩来、潘世纶、谌伊勋（小岑）、郭隆真、刘清扬、李毅韬、邓文淑、张若茗等二十人，男女各半。会议决定团体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社内实行委员制，并出一个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要求社员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在《觉悟》上发表一切主张；对于社会一切应用的生活，取评论的态度。关于《觉悟》的内容，可以介绍名人言论（著作同演讲）和灌输世界新思潮。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9月21日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觉悟社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李

大钊来天津讲演，指导觉悟社的活动。李对觉悟社打破封建隔阂，将男女同学组成团体，出版《觉悟》等都非常赞许，并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此后，觉悟社还先后邀请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等，并开过各种问题的讨论会，分组研究“白话文学”、“学生根本的觉悟”、“妇女解放”、“工读主义”等新思潮专题。各人还献出自己的图书，建立图书馆，共同钻研新思潮的各种理论，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

9月22日 天津警察厅自八月底以来，根据北洋军阀政府查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密电，多次查禁《会报》，并派军警恫吓印刷局，不准承印该报。本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迫休刊。周恩来写了紧要启事，说明真相，并宣布报社照常办公，力争继续出版。

9月25日 出席南开学校大学部（稍后改为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大学部分文、理、商三科。周恩来为该部的第一届文科学生。

9月30日 全国学联应山东代表团的要求，决定组织各省代表再度前往北京展开请愿斗争，以解决山东问题。本日，周恩来随天津代表郭隆真、黄正品、关锡斌等到达北京，协助代表工作并照料生活。

10月1日 上海、天津、山东、河南等七省、市代表到新华门总统府门前举行第二次请愿。周恩来负责宣传和通讯联络。在当晚全部代表被捕后，开展营救活动，并与全国学联和各省市学联负责人商定，在“双十节”举行集会游行示威。随后赶回天津具体组织。

10月4日 出席天津各界联合会评议会，报告赴北京请愿代表被捕详情。

10月7日 出席天津各界联合会评议会，参加讨论“双十”大会及游行计划。

△ 在复刊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宣布政府当局“不能禁止我们人民存在”，复刊后的《会报》将“集世界的大事，作有系统的记载”；并将“选择各种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从这一期开始，《会报》由日刊改为三日刊。

10月10日 参与主持天津各界四五万人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的共和纪念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发表宣言，痛斥北洋军阀政府镇压、逮捕爱国群众的行径。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会场，阻止大会进行，并不准上街游行。男女学生多人被打伤。觉悟社社员邓文淑等带领女学生首先冲破警察的包围，走上街头，和陆续冲出包围的队伍一起，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示威游行。最后，游行队伍来到警察厅，推举周恩来、李毅韬等为代表找警察厅长杨以德质问，杨避而不见。这次斗争一直坚持到次日黎明。

10月13日 为抗议天津当局的迫害，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决定南开大学等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罢课四天（后改为六天）。周恩来起草《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短期停课宣言书》，揭露杨以德镇压群众的暴行，号召人民加强团结，奋起反抗，指出：只要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则目的终可达到。

10月20日 天津各界一万多人齐赴直隶省公署，强烈要求惩办杨以德。各校男女学生同时到街头演讲，控诉军警暴行。天津学生的这一斗争得到全国学联等的响应和支持。十一月七日，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十月一日在新华门前被捕的各地请愿代表。

11月15日 主持觉悟社特别会议。会议决定把觉悟社建成“预备‘牺牲’、‘奋斗’的组织”、“引导社会的先锋”和“作战的‘大本营’”。并决定在吸收新会员时，先由本人自我介绍，介绍人报告其优缺点，然后由会议审查其是否具有牺牲、奋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经大家同意方可加入。

11月16日 日本暴徒在福州打伤多名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并打死一名警察，造成“福州惨案”。福建学生罢课抗议，各省市学生奋起响应，形成抵制日货运动的高潮。

12月10日 由天津男女学生共同组成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新学联）成立。新学联回召抵制日货，声援福建学生。周恩来当选为执行科长。

12月15日 和学联调查科长沙主培到天津总商会，敦促采取切实措施抵制日货。

12月20日 天津学生和各界群众举行有十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场焚烧一批出售的日货。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

12月21日 主持觉悟社全体会议。会议总结觉悟社成立以来的工作，认为社员都具有奋斗的精神，但缺乏同一的目标和持久的精神。决定社员用抽签的办法取一个代名，替代各人对外的姓名。周恩来为五号，谐音“伍豪”。

12月27日 主持觉悟社常会。经过讨论，会议决定觉悟社的目标和宗旨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于‘人’的生活。”并决定头一步从改造中国学生和改革自己入手。

12月29日 根据觉悟社全体社员的讨论，执笔写成《“觉悟”的宣言》和《觉悟》两篇文章。《“觉悟”的宣言》指出：

“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觉悟”的主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在《觉悟》中写道：“为人类大多数生存进化比较现状为有进步的——是谓之大‘觉悟’。”“纵横起来说：横性的‘觉悟’，是利己利人，永无边境；纵性的‘觉悟’，是解放改造，破坏建设，永无止境。”

12月 作《死人的享福》一诗。诗中针对五四前后社会出现的“劳资协作”、“共同生活”的思潮，指出统治阶级所谓的“共同生活”，不过是“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

1920年 二十二岁

1月初 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同意日本提出的山东问题由日中“直接交涉”。此事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形成更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直隶省长曹锐下令各学校提前放寒假，以瓦解学生的爱国运动。周恩来主持觉悟社会议，提出“反对直接交涉”、“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反对提前放假”等口号，由学联组织学生广为宣传，并组织日货调查团，深入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1月20日 担任主编的《觉悟》第一期出版。^①

1月23日 天津学联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激起社会公愤。当各界代表向直隶省公署请愿时，当局非但不惩办店主和日本浪人，反而毒打学生，逮捕马千里、马骏等十二人。随后并查封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会所。

1月26日—28日 主持在法租界维斯理堂地下室召开的觉悟社秘密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周恩来、郭隆真出面领导。

1月29日 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提出四点要求：（一）驳回日本通牒；（二）拒绝山东问题直接交涉，

^① 《觉悟》只出版了一期。后因接连发生当局迫害学生事件，特别是周恩来等随后被捕，第二期已收到四十多篇文章，但未能编成付印。

催办福州惨案的交涉，取消中日军事协约；（三）恢复天津学联原状；（四）释放被拘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省长曹锐不敢出见。群众公推总指挥周恩来和于方舟、郭隆真、张若茗四人为代表进去见省长。四人竟被拘捕。在署门外的请愿学生亦遭武装军警镇压，重伤五十余人，造成“一·二九”流血惨案。晚，周恩来等四名代表被押往警务处，沿途高呼“同胞万岁！”“打倒卖国贼！”“誓死不屈！”等口号。

2月6日 和于方舟、郭隆真、张若茗等被押往警察厅。当警察厅长杨以德宣称“学生是为人利用”时，周恩来表示：“我们学生做事纯本天良。”下午，和于方舟各写一张质问被拘捕理由书给杨以德，以示抗议。

2月17日 受警察厅司法科传讯。被问到《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事时，答道：“我可负完全责任。”当问到给学生“捐款的是些什么人？捐大宗款项的是谁”时，答道：“你们现在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经济内容，我也无须回答你！”此后，警察当局采取拖延的办法，既不移交法庭公开“审讯”，又不释放。

4月1日 和难友商定，通告警察厅：限三天内速开庭公审，否则三天后全体绝食，表示不受非法拘捕、不屈人格的态度。

4月2日 因杨以德下令对被拘代表“严重看视，不许互相往来”，遂提前举行绝食斗争，以抗议警察厅的非法拘捕和迫害。司法科将一代表押入警察厅内的拘留所。

4月3日 和马骏等商议决定，发动难友闯拘留所，并提出三项要求：（一）释放押入拘留所的代表；（二）允许代表们到院中散步，互相往来；（三）将被拘代表送法庭或司法科受理，速开庭公审，按法律解决。杨以德被迫答应上述三项要求。代表们当晚复食。

4月5日 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谌志笃、邓文淑等二十四人到警察厅，要求替代被拘代表。杨以德被迫同意他们与被拘代表见面。警察厅禁止被拘代表与外界接触的界限被突破。

4月7日 警察厅被迫把周恩来等二十一名代表移送河北地方检察厅看守所。^① 此后经过斗争，除两名女代表外，大家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并争得一定范围的阅读书报和通信的自由。难友们组织起来，推举处理众人事务的各种委员，制定起居时间表和学习课程表。每日起床后做柔软体操一次，上午预备接受检厅讯问，下午读书，晚上研究社会问题和开娱乐会。

4月8日 会见来看守所看望的谌志笃等，商定以后向外通信的办法。

4月11日 难友们公推周恩来等筹办祝贺郭隆真生日。此后，每逢难友生日，都组织祝贺。遇难友生病，大家关怀备至，细心看护。

4月16日 难友们公举马千里、于方舟、周恩来主办读书团，并为“永久研究社会问题委办”，带领大家开展学习活动，研究各种社会问题。

4月25日 晚，参加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每日日记由周恩来记录。

4月28日 参加被拘代表纪念国耻日集会，并讲述山东问题始末。

5月1日 停止读书，全体早起分室大扫除，以纪念国际劳动节。

5月4日 主持被拘代表集会，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马骏报

^① 原二十四人中有病的和未成年的三名代表已由警察厅释放。

告一年来各方面斗争经过。晚上，周恩来主持庆祝会，并表演清唱。

△ 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五四’纪念。回想去年今天学潮突起，引得这一年来的学潮起伏，有无穷的感触”，“将来的希望，尤隐隐约约在各人脑中颤动不已”。

5月10日 参加晚间全体会议，议定每星期一、三、五开演讲会，由难友们分别介绍世界新思潮。

5月12日 参加晚间演讲会，听时子周介绍世界工业革命史。

5月16日 晚，参加特别讨论会。讨论的结果认定“今后的目的，注重在社会的根本改造”。

5月17日 晚，参加特别讨论会，讨论社会服务问题。认为出狱后应当进行的工作：商界组织商业研究所；社会举办向平民灌输知识的小报；学生成立演讲团，向城市或乡间演讲适合于平民的、有系统的知识，并组织平民教育团，利用课余时间加入各界的组织，灌输各种知识。

5月26日 参加晚间演讲会，听时子周介绍世界政治革命史。

5月28日 在晚间演讲会上，向全体难友介绍马克思学说中关于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 在晚间演讲会上，介绍马克思学说中的唯物史观。

6月2日 在晚间演讲会上，继续介绍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斗争史。

6月4日 在晚间演讲会上，介绍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

6月5日 根据被拘代表的回忆和日记编写的《警厅拘留记》完稿。书稿记录被拘代表们在狱中的斗争情况，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和镇压人民的罪行，从十二月开始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载，后由该报社印成单行本发行。

6月7日 在晚间演讲会上，继续介绍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

6月8日 写自由体长诗《别李愚如并示述弟》，赠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觉悟社社友李愚如。诗中写道：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炼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7月1日 和郭隆真、张若茗、于方舟联名写信给主持正义的著名律师刘崇佑，提供真实情况，驳斥检厅起诉案由，供其任辩

护律师时采用。

7月6日—8日 天津地方审判厅公开审理周恩来等所谓“妨害安全及骚扰案”。广大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对此极为关心，纷纷前来旁听，审判厅前无插足之地。周恩来等列举事实揭露当局迫害爱国群众的行径，说明爱国无罪，救国有理。辩护律师刘崇佑也据理力争，反驳当局强加给爱国群众的罪名。

7月17日 天津地方审判厅宣布“期满”释放马千里、周恩来、郭隆真等全体被拘代表。天津各界代表百余人前往检察厅欢迎被释代表，并把铸有“为国牺牲”四字的银质纪念章和红绸花佩戴在被释代表胸前，然后分乘插着“欢迎被拘代表出狱”旗帜的九辆汽车，到商会出席欢迎大会。会上，周恩来报告狱中斗争情况。

羁押期间 周恩来、马骏被南开大学开除，马千里、时子周也被迫辞去在学校担任的教职员职务。

△ 重新思考许多问题，更加认清严酷的社会现实。后来在谈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 写《念娘文》，寄托对母亲的怀念。

8月初 主持觉悟社年会。在会上总结一年多来开展天津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认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加以改造，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并把它概括为“改造”、“联合”四个字。会后，偕同觉悟社社员十一人到北京。

8月16日 觉悟社在陶然亭召开茶话会，邀请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四个团体的代表共二十多人，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问题。会上，刘清扬报告开会

宗旨，邓文淑介绍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情况。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的主张作出说明，倡议与会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斗争。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提议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会议决定由到会诸团体各推三名代表继续讨论联络问题。

8月18日 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五个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通讯图书馆召开联络筹备会。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通过《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布“本联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并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

8月 参加《新民意报》的筹备工作，对报纸的立场主张、内容材料、经营方式等，提出多项建议。

△ 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10月8日 为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推荐和资助，决定到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留学考察，本日，和南开同学李福景同获北京华法教育会开具的赴法证明。行前，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驻欧记者，以撰写旅欧通讯所得稿费来维持旅欧期间的生活。

10月12日 到《新民意报》社辞行，告知十八日将离津去沪候船赴法。

11月7日 由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赴法国，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届赴法勤工俭学生。

11月24日 在轮船航行到印度洋时，写成《〈检厅日录〉的例言》。到法国后，《检厅日录》全部脱稿，邮寄回天津，托马千里修正、补充，于一九二一年春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续刊登。

一九二六年由又新印字馆刊印成书。

12月13日前后 抵法国马赛港。翌晨，换乘火车抵巴黎，暂住拉丁街旅馆。

12月27日 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张崧年）应里昂中法大学之聘到达法国。张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旅欧期间负有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

1921年 二十三岁

1月5日 因病延至本日赴伦敦，决定投考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大学，并开始对英国作“社会实况之考查”。在致堂伯父周贻鼎的信中写道：“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并表示：“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1月25日 致信严修，禀报办理入学手续事，并谈及欧洲现状，说：“法受欧战影响为最大，战地恢复旧观至今日犹不能达百之五六，满目疮痍”，“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并谈及旅法勤工学生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和急待解决的问题，呼吁“国内诸贤达教育家暨有力之士设法救济”。

1月30日 自旅欧以来，采取各种方式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本日，致信表兄陈式周，探讨救国之道，说：“弟之思想，在日本未大定”，留学的目的“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在比较了俄、英两种改革社会的途径后，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

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健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同时又说：“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

2月1日 为天津《益世报》撰写第一篇旅欧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文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在分析了战后欧洲种种社会危机后指出：“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

2月中旬 因爱丁堡大学的入学考试在秋天，而英国生活费用昂贵，故从伦敦回到巴黎，住拉丁区，在巴黎近郊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不久，同天津的四名勤工俭学生一起，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镇继续学习法文。同时进行社会考察，密切注视国际国内局势的动向，经常通宵达旦地给《益世报》撰写通讯，向国内介绍国际大事。在巴黎期间，曾有一个短时间在巴黎雷诺汽车厂做工。

2月23日 致信陈式周，谈旅居英法的感受，说：“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吾国立国本以农，然今日之急，又非工农兼重不为功”，“使今日之留学界能有彻底的觉悟，回国能不为势动，能不为利诱，多在社会上做一点平民运动，则工场技师，农庄庄师，何不可兼为启诱农工阶级智识之良师。产业与教育之振兴兼程并进，根本方面只要多着一分力，表面上的军阀资本家政客便摇动一块，此种向下宣传，吾以为较空言哲理改

造者强多多矣。”信中在谈到自己向国内筹划官费留学事时说：“使弟官费不能图成，则留英将成泡影。退身步留法亦属一策，然此时尚不敢骤定。”

2月28日 由于华法教育会决定不再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生，北洋军阀政府也回电拒绝给予救济，激起广大勤工俭学生的不满。本日，四百余名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领导下，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解决求学和发放救济金等问题。法国当局派出上百名警察，出动马队驱赶请愿学生，并逮捕了学生代表。

3月21日 在对“二·二八”事件的原委进行详细调查后，撰写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报道“二·二八”斗争始末，对处于饥寒困窘境中的勤工俭学生深表同情。

3月—5月 采访大量国际新闻，为《益世报》撰写通讯，评述国际间大事，其中有《德国赔款问题之决裂》、《西欧对俄对德之方略》、《一周间西欧政象之撮要》、《欧战后赔偿问题之近讯》、《伦敦会议再开幕之经过》、《万目睽睽之日皇储来英记》、《英法最近之意见龃龉》、《协约国最高会议之延期》、《上西里西亚问题之近讯》等。

春 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①

4月1日 英国百万煤矿工人发起总罢工。周恩来对这次长达八十余日的罢工风潮进行详细考察，从四月十三日至六月二十

^①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八五年批准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确认，周恩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入党时间。

日，先后撰写《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九篇通讯，向国内介绍英国工人阶级的顽强战斗精神，赞扬他们在“饥饿困窘”的条件下，“犹坚持反对不懈”，“其精神，其魄力，其勇敢，又属难能可贵”。并指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而英国政府则“与资本家一鼻孔出气”，“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

6月16日 撰写通讯《近东问题与英法之态度》，详细报道希腊、土耳其战争经过，指出：列强之间的相互争夺是世界“祸乱之源”，而“俄国则在以世界革命之思想，鼓动其民族之真正独立”。

6月中旬 从法国报纸获知北洋军阀政府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秘密谈判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后，和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并调查借款内幕。

△ 和旅法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联络旅法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平和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巴黎通信社、旅欧周刊社等六团体，数次集会，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告》，揭露借款内幕，谴责军阀丑行，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并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了千余份，分送法国各界，以争取舆论。

6月30日 撰写通讯《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指出：“是直一分赃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梦死断无予以‘可’字者。”文章把这次斗争与“二·二八”事件相比，认为“两者均为对付官僚，而其性质则大异：一为生

活问题，一为国家问题也”。

△ 和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徐特立、刘清扬、袁子贞等三百多人参加由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的拒款大会。会上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人团体来函来电一百数十封，并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合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并请法人“赞助”。在舆论的压力下，吴鼎昌避居英国，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对借款问题的讨论。

6月—10月 继续为《益世报》撰写通讯，其中有《英帝国会议之内幕》、《待开声中之华盛顿会议》、《近两月间之西欧大事记》、《巴黎会议中之英法小冲突》、《欧洲之救济事业》、《英国经济现象之恐慌》、《问题中之英国经济救济》、《大西洋上之太平洋问题》等。

7月23日—8月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后移嘉兴）召开。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曾接到国内开会的通知，但因路途遥远，时间紧迫，未能派代表出席。

7月30日 法国《巴黎时报》于二十五日透露出中法借款合同已经商妥草签后，旅法华人群情激愤，纷纷集会，发表宣言通告，呼吁国人速起斗争，坚决反对这一卖国借款。本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一文，详细报道旅法华人开展拒款斗争的情况，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文章发表在九月二十九日、三十日的天津《益世报》上。

8月13日 和赵世炎等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要求驻法公使陈箓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箓不敢出席，派秘书长王曾思到会。王态度蛮横，遭到痛殴，被迫代表陈箓签署了反对中法借款的声明。这一《声明》由拒款委

员会电告国内各大报馆，并送法国外交部一份。法国政府怕事态扩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延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至此宣告胜利结束。十六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向国内报道这一情况。

8月24日 撰写通讯《西俄大旱之惨状》。文中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遇到的内政外交上的困难，深表关切与同情，详细报道了苏俄政府不遗余力进行救灾的种种措施，认为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可谓通权达变，以求改造后新俄之渐进的建设，与方革命后之急进步骤，大有分别矣”。

9月3日 撰写通讯《复辟声中之德意志》。文中详述战后德国政治的演变，分析德国复辟势力卷土重来的原因，对此深感不安，认为“两年来之反动，视诸方革命后之急进变乱，真有退步现象”。尤其是德国一部分大学生倡导复辟，出现与工人格斗事件，“为学生界之奇耻”，“此风不单行见智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有破裂之虞，门户之见，殊足为改造前途伏无穷隐忧也”。

9月15日 中、法政府当局不满勤工俭学生发起拒款斗争的爱国行动，指使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宣告从本日起，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在此之前，里昂中法大学也发出通告，拒绝勤工俭学生入学，另从国内招收新生。

9月17日—19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一致决定“争回里大”。随即通知各地勤工俭学生派“先发队”到里昂去。讨论中，周恩来提醒大家，斗争是复杂的，对方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并建议留下部分骨干负责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争。

9月21日 清晨，由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张昆弟、颜昌颐、罗学瓒等一百余人组成的“先发队”冲进

里昂中法大学，推选赵世炎为总代表继续与校方交涉。次日，法国当局出动武装警察把“先发队”一百余名成员押到法国兵营中囚禁。留在巴黎的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和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等四处奔走，进行营救。

10月13日 在中法政府当局策划下，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一〇四名代表被强行遣送回国。随后周恩来含愤撰写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向国内详细报道中法政府当局对勤工俭学生的迫害。文章疾呼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10月 自英返法后，充分利用当时自共产国际成立后，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的条件，结合对英、法等国社会实况和工人运动的考察，先后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订阅或购买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等。同时，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与觉悟社社员多次通信探讨，进行了反复的推求比较，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社会势力盘踞的社会里，“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法国总工会“大多数派大半已倾向于第三国际与国际赤色工联了”；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而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11月12日 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九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开幕。二十二日通过美国代表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原则。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十一月五日，周恩来撰写通讯《大西洋上之太平洋会议观》（一），十一月八日续写（二）。文中评述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写道：“昔日之巴黎和会，一列强分赃之会议也。今日之华盛顿会议，一斗角勾心之会议也。”并指出：美、日、英“三国所争所引者，咸以吾国为对象，关系之深，问题之重，实以吾国为首”。其后，又连续撰写《法报论中国在华会之地位》、《华府会议中之英法战略》、《裁兵赔款问题与英法》、《四国协定与英法中日》等，加以揭露。

年底（或次年初） 和赵世炎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事。议后决定分头进行筹备。

1922年 二十四岁

1月 赴伦敦采访国际新闻，住南开同学常策欧寓所。先后为《益世报》撰写《一九二二年开幕后之欧洲》、《英法问题最近之趋势》、《继爱尔兰而起者之埃及》、《珈恩会议与法内阁》、《英伦岛上之选举潮》等。

2月6日 为《益世报》撰写通讯《劳动世界之新变动》。文中指出：“劳动问题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各国已结成不解之缘”，“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凡是劳动界中人，都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应这个需要”。尽管社会主义派别很多，在欧洲“更是五花八门”，但是“旧派的社会主义已渐渐失掉劳动界的信任”，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大致的趋势，总是由右向左的”。劳动阶级“深知若不能整齐军旅，来同这样一致而又坚固的资本阶级奋斗，结果只有败退”。

3月初 因德国生活费用低廉，由巴黎迁到柏林，住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五十四号。旅德期间，和张申府、刘清扬以及原在柏林的共产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经常来往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作过多次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

3月 致信国内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叙述自己一年来

居法积感和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 C. ism (共产主义) 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并表示：“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 Communism 也就够了。”在分析、比较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后，强调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 得知觉悟社社友黄爱（正品）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十分悲愤，写《生别死离》诗一首，随信寄给国内觉悟社社员李锡锦、郑季清，以表心志和悼念之情。诗中写道：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信中说：“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并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4月下旬 和张申府、刘清扬等联名致信在法国的赵世炎，商议五一节成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问题。后因筹备不及，延期召开。

5月5日—10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5月底 为成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赵世炎、周恩来联络旅居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中国青年三十多人，并通知派代表到巴黎参加成立大会。

6月 出席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小空场召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大会。到会二十三人。会议由赵世炎主持，通过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会后，周恩来返回柏林。

7月16日—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制定了党的纲领，提出反帝反封建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等。

8月1日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

8月16日 为《少年》撰写《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文章批判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阐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指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因此目前中国“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

8月 为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言论，撰写《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① 一文。文章指出：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

9月1日 在《少年》第二号上发表《告工友》一文。文中针对旅法华工在华侨教育经费问题上与勤工学生之间存在的误会，指出：两方“同是现社会的被压迫者”，“劳工朋友必须急图团结组织，勿放松一切机会，勿远离可引为友的勤工同学”，呼吁双方必须无条件地携起手来，以图工学前途的发展。

10月下旬 在柏林住所接待为寻找救国真理和共产党组织而来的朱德，在倾听朱德陈述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后，同意他的申请。十一月，和张申府介绍朱德以及一同

^① 本文曾发表在法国印行的《新刊评论〈无所谓宗教〉》，后又发表在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少年》第二号上。

赴欧的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

10月 赴巴黎，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的会议。会议举行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五人当选。

11月20日 和赵世炎一起，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并委派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

12月1日 在《少年》第五号上发表《十月革命》一文。文章分析论述了十月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和成功之道，指出：“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奠定了革命始基”，实现全世界的革命，“俄罗斯现在已是这样地一个领路者了”。

12月15日 在《少年》第六号上发表《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和《评胡适的“努力”》三篇文章。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批驳胡适宣扬的“好人政府”主张，指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的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而想“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文章强调革命军队的重要性，说：“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一文中指出：“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在《论工会运动》一文中，论述了工会的性质、组织、工运目标以及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等，指出工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主要是“促进工人

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取得政权后则是建设新社会。

1923年 二十五岁

1月12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1月16日 致信李毅韬、谌小岑，附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①的照片一张，表示对照片中人和黄爱、庞人铨^②的怀念。

1月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收到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陈独秀的复信。信中建议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并将领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

①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被德国政府杀害。

② 庞人铨，一九二二年一月，和黄爱一起因领导长沙纱厂工人罢工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

2月17日—20日 出席在巴黎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之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通过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改选了领导机构，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肖朴生五人为执行委员，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候补委员，周恩来任书记。会后收到国内团中央一月二十九日来函，批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3月13日 起草《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报告第一号》，向国内团中央详细报告二月大会的经过。报告说：“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3月18日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派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十二人，第一批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周恩来陪送他们到柏林，并设法为他们办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

4月6日 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一期上发表致邓颖超的题为《德法问题与革命》的信。信中指出：“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后保证者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欧乱现正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并引证卢森堡所说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一语，认为这是“见到之语”。

夏 返回法国，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专门从事党、团工作。经常到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比较集中的巴黎拉丁区和近郊的小咖啡馆里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的真面目，并与他们展开辩论。此外，还筹备建立共产主

义研究会，组织青年阅读马克思、列宁著作，在此基础上发展团员。并通过袁子贞担任书记的华工总会对旅法华工进行工作。

6月12日—20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接受共产国际于本年一月十二日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推动孙中山、廖仲恺等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6月16日 和尹宽、林蔚等一起到里昂，与奉孙中山之命到法国筹组国民党支部的王京歧（后任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长）商谈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八十余人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后不久，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后称巴黎分部）筹备员。

7月2日 《巴黎时报》刊载消息说，列强鉴于中国五月间发生外国旅客被劫持的山东省临城劫车事件，准备在华设立万国警察，共同管理中国铁路。旅法华人闻讯，无不愤慨，酝酿组织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奋起反对。

7月3日 以《少年》杂志社代表身份，发起并出席旅法各团体代表在巴黎西郊华侨协社的集会。会议决定开展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群众斗争。

7月8日 和徐特立、袁子贞、许德珩等二十二个团体代表在巴黎中华饭店集会。会议通过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六项具体办法，决定召开旅法华人大会，并成立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临时委员会领导斗争。周恩来被推为临时委员会中文书记。

7月15日 出席在巴黎召开的旅法华人反对国际共管中国

铁路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之列强。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会上散发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号召“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卵翼下的北京政府。当晚，旅法华人各团体代表集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周恩来被选为书记股中文书记。

7月31日 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巴黎二十四家报馆记者等出席。次日，法国各报发表评论，支持旅法华人的爱国行动。在此期间，国内各界人民纷纷集会示威。在各方舆论压力下，在北京的十六国外交使团于八月十日照会北洋军阀政府，未正式提出“共管”中国铁路的要求。

8月 致信即将回国述职的王京歧，谈旅欧国共两党合作，开展革命活动问题，说：“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提出现时两党合作的三项建议：（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可随时势变迁而计划当前所要做的工作。

秋 任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

11月16日 致信留日同学王朴山，询问其别后思想生活情况，说：“‘五四’后的少年，颇多颓靡之气，本来革命精神是难得养成的，对旧社会多留恋一分，革命精神即减少一分。酷爱和平、善于退让、甘于认命的中国人，要振作起来……”

11月24日—25日 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

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一并加入”，并决定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通过成立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贯彻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央地位”。

11月25日 出席在里昂召开的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在演说中着重批评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说：“挂名党籍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会上当选为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在王京歧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长，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1924年 二十六岁

1月17日 出席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的成立大会，并以通讯处筹备员身份报告筹备经过。通讯处临时主任李富春报告巴黎党务的发展情况。会议选举聂荣臻为通讯处处长。次日，周恩来致函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报告通讯处筹备和成立情况。

1月20日—30日 在孙中山主持下，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2月1日 所主持的中共旅欧组织和旅欧共青团合办的机关刊物《赤光》（半月刊）创刊。创刊号上发表的《赤光的宣言》指出：“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是要以科学的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本此，便是我们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的始意，同时也就是《赤光》的新使命了。”

△ 在《赤光》第一期上发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等文章。文章指出：“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并预言“国民革命运动亦将兴起了”，“如许多的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净无波的中国民众海中，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来做弄

潮人”。

2月15日 在《赤光》第二期上发表《革命救国论》等文章。文章分析中国革命中敌、我、友三方面的力量，指出：“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指出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封建余孽、洋买办、官僚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海外华侨、工人阶级、智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农民阶级这“五派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

3月1日 在《赤光》第三期上发表《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等文章。文章指出：我们倡言救国运动“决非狭义的爱国主义运动”，“我们为救国而倒军阀，倒国际帝国主义，但我们心中却不容丝毫忘掉与我们受同样苦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亦即是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并且我们若认清事实，果想将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

5月 在《赤光》第七、八期上发表《将开的国际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实话的反感》、《北洋军阀的内哄》、《北洋军阀与外交系》、《德国革命运动的过去》等文章。

6月1日 在《赤光》第九期上发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文章。文章驳斥国家主义派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种种污蔑，指出：“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

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6月7日 出席旅欧华人各团体负责人集会，在发言中主张将各团体联合会的共同目标由“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改为“打倒军阀，推翻国际资本主义”。

6月15日 在《赤光》第十期上发表《太平洋上的新风云》等文章。文章分析欧战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指出：“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我们反抗帝国主义谋中国独立的战士，当兹风云起后，波涛涌起，切不要如欧洲大战时一般地逃避港中希图幸免。要切实地预备，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联合起各国被压迫的民众，携手冲上潮头，争先去做弄潮儿！”

7月13日—15日 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改选了执行委员会，由林蔚担任书记。二十日，新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委任即将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回国的周恩来、刘伯庄为其代表，向国内团中央报告工作，并代表旅欧团组织参加各种会议。

7月20日 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

7月下旬 和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从法国启程，由海路回国。临行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对周恩来作了以下评语：为人“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9月1日 在香港致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说明自己

“须往广州一行”，以后行动“须俟C·P·中央命令而定”。“我在广的通信地址，可由平山^①同志处转。”

9月初 到达国共合作后的广东政府所在地——广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阮啸仙、农工委委员彭湃到码头迎接。

9月7日 为纪念“九·七”国耻日^②二十三周年撰写《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文章回顾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剖析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指出：“中国民族既与帝国主义不两立了，我们便当将帝国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和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心理中。”“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的唯一出路，只有革命，只有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涵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文章刊载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

10月10日 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武装——商团自八月以来阴谋在广州发动反革命军事叛乱，扼杀广州政府。本日，周恩来出席广州各界群众为纪念武昌起义举行的警告反动商团大会，并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身份发表演说，严正警告商团，指出：“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

① 平山，即谭平山，时任中共中央局成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② 指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清政府同德国、俄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日子。

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商团在太平路向游行队伍开枪，打死二十余人，打伤一百多人；还张贴布告，公开要求孙中山下野，欢迎陈炯明①回广州主政。

△ 孙中山在苏联顾问鲍罗廷、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支持下，成立平定商团叛乱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随即从北伐军中抽调一部分军队回师广州镇压商团叛乱。周恩来、杨匏安等参加临时军事指挥部工作。十五日，在工农群众积极援助下，革命军击溃商团军，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的一次重大胜利。广东局势转危为安。

10月30日 撰写《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文章分析国共合作后广东的政治形势，并总结平定商团叛乱的重要意义，指出：广州政府受南方军阀挟持，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常常表示退让，而时时压迫工人、农民的解放运动，其原因是包围孙中山左右的，大都是些不革命的右派和机会主义者，他们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强调国民党必须让中间分子打破“妥协的心理”，“断然离开不革命的右派”，听孙中山指挥，与革命的左派联成一气，实行国民革命，“才能得到革命的工农群众作革命的基本势力”；“国民党当前急务是‘肃清内部’，界限便是革命与反革命”。此文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九十二期。

① 陈炯明，一九二一年五月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被任命为广州政府的陆军部长兼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一九二二年六月，勾结直系军阀，发动武装叛乱，妄图谋害孙中山，推翻广州政府。不久，被孙中山依靠滇、桂军逐出广州，逃窜到东江流域。

10月 任中共广东区委^①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

秋 任黄埔军校^② 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

11月8日 致信《赤光》社，详细评述国内政治状况。《赤光》以《中国底政治现状》为题，在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上发表此信的一部分。信中说：“中国底政治现状，是处在一个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底共同宰割局面之下，一时是不会变更的。”

11月10日 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十月下旬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和平统一问题。本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十三日由广州启程。

11月 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③主任。到职后，按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部内增加了部员，分为指导、编纂、秘书三股，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到各股任职。政治部负责制定士兵政治训练计划；举行学生政治讨论，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出刊物，办墙报，教歌曲。周恩来除指导、落实政治部各项工作外，还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

① 中共广东区委最早成立于一九二二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共中央鉴于中共广东区委实际只领导广州一地，故将它撤销，广东党的工作由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一九二四年十月，经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

②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在广州黄埔建立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这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由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培养革命军队骨干的军事政治学校。

③ 黄埔军校根据苏联的经验设党代表和政治部。政治部辅助党代表掌管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工作。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有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邵力子、鲁易、熊雄等。

领导在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 所主持的中共广东区委商得孙中山同意，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下属成员的配备与调动，都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及后来的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决定，主要工作和活动也直接向他们请示报告。队长、副队长、军事教官，由周恩来选调的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徐成章和第一期毕业生周士第、赵自选分别担任。党代表和政治教官由广东区委选派廖乾吾、曹汝谦分别负责。廖乾吾任队中中共党小组长，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广东区委还从各地调来一批工人、农民、青年充当队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

11月、12月 黄埔军校教导第一、第二团先后成立，第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曹渊、蒋先云、许继慎、张际春等分别担任教导团下属各连的党代表，统属政治部领导。

12月1日 撰写《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文中对国民党右派操纵广州市长选举，将广大工农群众排斥在外的作法提出质问，指出：“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之中坚，固国民党宣言所郑重承认者也。”目前作法，实为“违党义破坏民治也”。同时指出“革命之国民党中央确有一大部分不革命，违党义之做官发财人物”，“其于革命运动之扩大，工农利益之拥护，漠视乃属必然之势”。呼吁：革命之工农阶级“其速自起！其速联合！其速组织起吾人自身唯一可恃之革命力量！”

12月29日 出席广东反基督教大同盟在广东大学召开的大会。在会上演讲《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揭露基督教已成为“资本家的走狗”，“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

12月31日 撰写《中山北上后之广东》。文中揭露广东的国

民党右派在孙中山离粤北上后，“群起攘夺广东的权利地位”，以及“久困在广东的各军阀”“群思向外谋更大的发展”的野心。此文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九十八期。

本年 参加广东的工人运动。为广东平民教育委员会编写工人通俗读物《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曾到珠江小艇上与工人谈心，了解工人疾苦，教育工人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1925年 二十七岁

年初 应胡志明邀请，到广州文明路，为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主办的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讲课。

△ 听取铁甲车队军事教官赵自选汇报铁甲车队奉广州政府的命令到广宁县支援农民运动的情况后，经同廖仲恺等商量，指派大元帅大本营卫队携重武器前往援助，镇压反动地主的武装。

1月11日—22日 以中共留法组代表身份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作出了关于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的决议。

△ 会议期间，同高君宇^①相识，“欢谈甚深”，并互通了恋爱情况。委托高君宇会后在返北京途经天津时带信给邓颖超。

1月15日 孙中山北上后，盘踞东江流域的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北洋军阀资助下，乘机反扑，自称“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犯广州，推翻广州政府。广州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本日，发布东征命令。由粤、桂、滇、湘、鄂、豫各军组成

^① 高君宇，时为中共北方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主管宣传工作。

东征联军，分左、中、右三路作战。黄埔校军^①随许崇智率领的粤军参加右翼作战。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负责黄埔校军的政治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军队政治工作。

1月31日 在黄埔军校举行的东征誓师典礼上向全校师生进行政治动员。

1月 因准备随军出发东征，在中共广东区委改任常委兼军事部^②部长（军委书记）。广东区委军事部主要领导国民革命军及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组织工作，设在广州万福路南华银行二楼。

△ 领导黄埔军校政治部组织“血花剧社”，开展革命宣传。

△ 东征出师前，和中共广东区委指示铁甲车队政治教官曹汝谦和三排排长高超率第三排做东征准备工作。曹、高即率第三排乘铁甲车活动于被陈炯明军占据的广州至石龙间的铁路线上，进行警戒、侦察、修补铁路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掩护东征军集中、开进。

2月1日 所指导的革命军人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由蒋先云、曾扩情、贺衷寒、何畏能筹备组织）在广州举行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号召革命军人“为救国救民救自己计”，联合工、农、学、商各界民众，“拥护全民的利益及幸福”，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青年军人联合会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联

① 由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第二期学生编成的学生总队组成，共约三千人。

② 这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成立的领导军事工作的部门。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应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十二月十二日，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将“军事运动委员会”改称军事部。以后，逐渐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组织。

合粤军讲武堂、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等校的青年军人组成，是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军人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组织。联合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团结革命力量，同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后被蒋介石解散。

2月3日 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同校长蒋介石及苏联军事顾问加伦^① 等率黄埔军校校军出发，参加东征。所主持的政治部制定严明的纪律，规定不强拉伕役，不用军用票等事项，深得群众拥护。同时制定战事宣传计划。军队出发之前，政治部派宣传队先行向民众宣传东征意义。革命军每到一地，人民自愿帮助运输，做向导。政治工作产生了很大作用。

2月5日 到东莞。六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出席东莞商务分会举行的欢迎东征军队大会，并发表演说，论述革命军队与旧军队的区别，指出“如欲使中国和平，须有真正之革命军，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提出在革命军队中，“于军事教育外，授以政治教育，告以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要使每个军官每个兵士均能了解此理”。强调“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仗，彼等必不去打”，革命军队如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希望东莞人民通力合作，促使革命成功。并约定三事：（一）为革命军向人民宣传解释，使之了解人民与革命军的关系；（二）实行民治，县长民选；（三）各界均组织坚固的团体。还提出，民众如有任何痛苦和要求，可随时写信给政治部。当晚，参加东莞县国民党党部召开的市民联欢会，并发表演说。

^① 加伦，即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

2月11日 在平湖右路军司令部，和蒋介石^①、加伦听取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叶剑英报告攻取淡水城的计划，并进行商讨。

2月13日 东征军队向淡水城发起攻击。十五日，占领淡水城。下午，陈炯明军反扑。周恩来率政治部人员到前线同各级党代表密切合作，鼓舞士气。傍晚，东征军队将陈炯明军击退。这一仗，为这次东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并显示出政治工作的威力。

2月22日 和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候补执行委员成恭^② 率政治部工作人员到平山（今惠东）调查和宣传，动员群众配合东征军队的军事行动。

2月27日 东征军队攻克海丰。东征前夕，周恩来曾指示共产党员李劳工、林务农在广州召集海陆丰籍人力车工人数十人经过武装训练，组成先遣军，为东征军队向导。东征军队克海丰后，周恩来任命李劳工为后方办事处主任；留吴振民为政治部特派员，驻海丰办理一切党务及宣传工作，恢复被解散两年多的海丰农会，协助农会训练和武装自卫军。

2月28日 率政治部人员进驻海丰。在海丰期间，领导重建海丰共青团组织的工作，并出席第一次会议，推荐彭元岳^③ 为书记。推荐彭汉垣^④ 为海丰县长。还同彭湃等研究组建海丰中共党组织、今后的工作方针以及恢复农会和创办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问题。四月一日，彭湃等在海丰县成立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

2月底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东江各地党务

① 蒋介石，当时兼任粤军参谋长。

② 成恭，又名陈恭，中共党员。

③ 彭元岳，广东海丰县人，早期参加农民运动。

④ 彭汉垣，广东海丰县人，受堂弟彭湃影响参加革命，一九二八年三月被捕，后在广州就义。

组织主任；并授权他委派各团、营、连、排党代表为组织员，在东征军队克复地区着手组织国民党党部。

3月1日 在海丰县各界联欢大会上发表演说，热烈赞扬海丰农民支援东征的英勇行动。

3月2日、3日 调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宛旦平、卢德铭等到海丰协助训练农民自卫军。

3月6日 随军进驻揭阳。七日，出席群众大会，作题为《国民革命的宗旨和三民主义的真谛》的报告，指出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才能救中国，只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革命才能胜利。在揭阳期间，同中共秘密党员杨嗣震等谈话，告诉他们不久将要筹建国民党县党部，要他们注意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中共党团组织，并动员较成熟的同志加入国民党，以扩大革命力量，争取先机。

3月8日 在揭阳真理中学讲话，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鼓励学生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并点名谴责英商代办兼真理中学董事长林逸才的罪行。

3月中旬 派共产党员鲁易、杨石魂为中国国民党潮州、汕头、梅县一带党部特派员，方临川为普宁、揭阳一带特派员。他们到职后，一面做“国民运动的事情”，一面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地方组织。中共汕头特支和共青团汕头支部随之成立。

3月12日—22日 东征右路军一部攻占潮汕后，左路滇军、中路桂军与陈炯明军林虎部暗中勾结，订立密约，滇军由河源、老隆撤兵。十二日，林虎率万余人向棉湖反扑，企图消灭东征军队。十三日，黄埔校军教导第一团千余人与林虎部激战。周恩来亲赴前线，激励士气。下午，教导第一团在第二团和粤军第七旅支援下，击破林军。十五日，再次击破林军反扑，林虎部败逃兴宁。东

征军队乘胜追击，十八日取五华，二十日克兴宁，二十二日收复梅县。林虎残部溃败后向江西逃窜。至此，取得这次东征的胜利。

3月21日 率政治部人员抵兴宁。

3月30日 出席黄埔军校在兴宁举行的追悼孙中山逝世^①大会。会上，以政治部主任身份宣读祭文。

4月上旬 兼任黄埔军校军法处处长。

4月12日 抵梅县。十五日，在梅县东校场对学生发表演说，论述东征的意义，勉励青年从事革命斗争。

4月13日 根据廖仲恺的建议，国民党中央决定黄埔军校教导一、二团组成党军第一旅，仍由军校节制。

4月18日 率黄埔军校政治部人员抵达潮州。

4月21日 在汕头。以政治部主任身份组织抚恤东征阵亡将士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各团党代表为委员组成，负责查清黄埔军校的东征阵亡将士人名并给其家属发抚恤金。

4月26日 出席梅县第九届商会举行的欢迎大会，并同商会代表合影。

5月7日、8日 中共中央局鉴于自身远处上海，不能直接指导广东地区的工作，遂同鲍罗廷商议决定：由谭平山、周恩来、罗觉（罗亦农）、陈延年、鲍罗廷五人组织临时委员会^②，代表中央局就近指导广东一切实际工作。

5月中旬 在英帝国主义收买、支持下，驻守广州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利用东征军队主力远在东江地区的时机，勾结北洋军阀段祺瑞、云南军阀唐继尧和广东军阀陈炯

① 孙中山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

② 为时不久，这个组织实际上即不存在。

明，在广州密谋发动武装叛乱，妄图推翻广州政府。广州政府急令东征军队主力从前线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五月二十一日，东征军队兼程回师。周恩来将鲁易、杨石魂、方临川等留在潮汕地区，继续开展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工作。

5月30日 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随后，全国各大城市形成大规模的全民反帝运动。

6月2日 随军回师途中向黄埔校军作题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讲演。在讲“军队之组织”一节中指出：阶级分为压迫与被压迫阶级，凡压迫阶级都是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军队“是工具不是一个阶级”，“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觉悟的时候“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造成他本身的武力，达到世界革命的成功”。因此，“军队的组织更有重大的意义！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同时阐明“军队通通是由被压迫的兵士集成出来的”，有“拘捕”、“招募”、“征兵”三种方式，这方式是依社会环境各时代的生产方式而变迁的。讲演词刊载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一九二六年出版的《政治工作须知》中。

6月4日 将学生军中的伤病员三十多人组成战时宣传队，直属政治部指挥。十日，委共产党员李之龙兼任特别宣传队^①队长，专做对滇、桂军的宣传工作。

6月12日 东征军队回师抵达广州郊区龙眼洞，向叛军发起进攻。遵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指示，留守广州的铁甲车队配合主力作战。在工农群众的大力协助下，六月十五日，迫使杨、刘两部缴械。广州政府转危为安。

^① 特别宣传队由滇、桂叛军中起义的学生组成。

6月19日 香港工人在共产党员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下，举行支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省港大罢工。后来，罢工人数达到二十五万。

6月23日 率领党军两个营和黄埔军校学生军一个营参加广州各界群众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的反帝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途经沙基时，在沙面的英帝国主义军警悍然向游行队伍开枪，造成“沙基惨案”。党军和学生军在游行中牺牲二十三人。

7月1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任主席，聘任鲍罗廷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六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汪精卫为主席。

△ 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革命军人自觉遵守纪律的重要性。指出遵守纪律“并不强迫的，是各同志甘心愿意遵守的”。希望大家“虚心求学”，“努力研究主义”，并指出：“我们无论求什么学问，如果只求一点观念，就是任何目的都不能达到，我们总要在实际上去做。”

7月31日 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坚决支持省港大罢工。报告指出：现在中国工人、农民、士兵的生活都十分痛苦，“这些痛苦是帝国主义给予我们的”，帝国主义是工农兵的共同敌人，打倒这个敌人的唯一方法是“工农兵大联合”。并指出：“工人不仅要努力工人运动，而且要努力跑入军队里去做军士运动。”“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此后，又和中共广东区委选调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担任省港罢工工人纠察委员会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陈赓等担任纠察队的教练。

7月、8月 经常到黄埔军校为学生讲演。

8月4日 出席黄埔军校追悼沙基死难烈士大会。在会上宣读祭文。

8月8日 和邓颖超^① 结婚。

8月20日 闻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赶到医院。随即同陈延年、邓中夏、鲍罗廷商讨对策。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号召全体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工代会所属各业工会会员、市郊农民、黄埔学生军和广州学生组织强大的队伍，为廖送殡。三十一日，出席军校举行的追悼大会，同何应钦联名撰写祭文，内说：“总理逝世，骤失重心，承继统率，端赖先生，先生革命，凡三十年，躬行实践，不尚空谈，尤任劳怨，不避险艰，扶持正义，反抗强权，万流共仰，如日中天”，“工农阶级，革命先锋。帝国主义，蠹国正凶。唯公知此，团结工农”。在追悼会后刊印的《廖仲恺先生哀思录》上以《勿忘党仇》为题著文，痛斥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指出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央历史上仅存的有数领袖之一”，是孙中山“革命志愿之承继者，孙文主义之最真实的信徒”。杀害廖仲恺的“决不是普通的政敌，至少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暗杀案的后边藏有极大的黑幕阴谋”。廖案的发生涉及与胡汉民^②、许崇智^③有关的人员，胡、许离广东出走，蒋介石掌握了军事领导权。

8月25日 任国民政府为审理廖仲恺一案组织的临时特别法庭的检查委员。

△ 党军奉命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① 邓颖超，八月初从天津调到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

② 胡汉民，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③ 许崇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广东省政府军事厅长、粤军总司令。

9月中旬 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下，陈炯明旧部由刘志陆、林虎等指挥卷土重来，向广州政府进攻，重占潮汕平原。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东征军分为三个纵队，第一军三个师和警卫军的独立第一师、鄂军共同组成第一纵队。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授少将军衔。这是中国军队设立政治部的开始。这种制度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中得到继承和发展。二十八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周恩来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在第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中，二人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七人是共产党员。

9月29日 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全权负责前方政治工作。在总主任之下，分设秘书处和社会运动科，分别处理部务，指导社会各方面运动和宣传总队工作。周恩来就职后，从军队中抽调几十名共产党员到总政治部工作，领导总政治部组织一百六十多人的政治宣传队，开展军内及对敌军、民众的宣传工作。并指导制定战事政治宣传大纲，提出肃清东江残敌，统一广东；打倒陈炯明，拯救东江人民，废除苛捐杂税，不拉伕，不筹饷；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口号。

9月 发表《沙基惨案与廖党代表之惨死》。文章揭露制造沙基惨案和杀害廖仲恺的凶手是帝国主义，指出今天国民党人的最大目标应该是“本民族主义的精神打倒帝国主义”。

△ 东征前夕，秘密乘船到广西梧州，召集龙启炎①、钟山②

① 龙启炎，时任共青团梧州市支部书记。

② 钟山，当时在梧州负责工人运动。

和周济^①开会，了解广西军队内部派系斗争的情况和梧州地区工运、农运情况。向他们介绍全国的革命形势，要他们重视农民运动和对工人的教育。翌日，返回广州。

10月1日 东征军第一军第一师召开第二次东征誓师大会。五日，东征军总指挥部发表出兵布告。

10月6日 东征军总指挥部及各特种部队和各部随军人员出发，晚九时抵石龙镇。总指挥部在石龙商会设行营。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后，仍以广东区委军事部长身份，通过在军校任职的共产党员鲁易、熊雄、恽代英、肖楚女、高语罕等继续领导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

10月8日 在东莞石龙各界人士欢迎东征军大会上讲话，号召“人民应与革命军联合起来，如同兄弟一样互相亲爱，互相提携，将敌人早日打倒”。

10月10日 抵博罗。在博罗期间，多次向群众发表演说，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同革命军队合作，共同打倒反动军阀，打倒列强。并同博罗县城的知识界人士谈话，了解县政、民情，鼓励他们参加革命。

10月13日、14日 参与指挥惠州战役。在关键时刻令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组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登城。东征军经三十小时激战，于十四日傍晚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取得第二次东征的决定性胜利。此后，周恩来在惠州期间，布置共产党员肖雋英留在惠州，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后方群众运动，支援前线。

10月16日 出席在惠州举行的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会上

^① 周济，一九二四年在广西任职时对广西军政情况作过调查。

宣读祭文。并发表演说，勉励革命军人为实现孙中山统一广东、统一中国、打倒帝国主义的遗志而继续努力。指出，为此就“要把全中国的军队都要化为革命军”。

10月17日 和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率部从惠州出发，二十日到达赤石。陈炯明军洪兆麟部二千余名在海丰东都岭、宋公岭一带布防。周恩来同何应钦制定了进攻计划。

10月22日 和何应钦指挥第一师攻占海丰，次日占领公平。二十六日，占领陆丰后乘胜进占河婆。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同林虎、洪兆麟等部万余人决战于华阳、河婆一带，在河婆击败洪部，在安流双头横流渡附近歼灭林虎部主力部队。

10月31日 回河婆。在河婆期间到中华医院治病时，见过往军人很多，恐医院受扰，着人张贴布告，规定军人“一律不得侵犯”医院。向中华医院赠匾额“同心同德”，并为该院院长彭克猷题词“博爱”。在此期间，还到大同医院看望伤病员，向医院赠匾“造福军民”。

11月1日 率第一师第一、三团进驻鲤湖。三日，进驻揭阳。随后在揭阳榕城接见中共领导下的工、农、学生运动骨干谢培芳、林桂芳等二十多人，指示要全面开展革命群众运动，强调工农运动是国民革命的基石。

11月4日 在东征军收复汕头后，率政治部人员于晚八时抵达，时“码头欢迎者数万人，沿途各巷路为之塞”。随后，东征军收复东江各地。

11月5日 致电广州国民政府，报告进驻鲤湖、揭阳和汕头的情况。建议国民政府制定更新潮汕行政和统一军民财务的方针。

11月7日 出席汕头市各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八周年军民联欢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支援革命斗争。

11月8日 东征军总指挥部决定入闽追歼陈炯明残部，第一

军全军驻防潮汕。中旬，东征军在福建永定、平和全歼逃敌。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

11月9日 在潮州。出席潮安各界在西湖运动场举行的欢迎东征军大会，并发表演说。会后，与各界群众一起在涵碧楼前摄影留念。

11月16日 出席汕头各界庆祝国民革命军东征胜利大会。晚，汕头各界举行提灯游行。

11月中旬 以东征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令在全东江地区实行禁绝烟赌。

11月21日 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下属二十五县行政工作。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地区行政的主要领导职务。由于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周恩来没有立刻就职，继续以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身份处理地方行政事务。

11月22日 和邓颖超出席汕头市妇女联欢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大会决定成立汕头妇女解放协会（后来成立时称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潮汕分会），并通过保护妇女利益的协会大纲。

11月23日 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林森、居正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通过开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担任的中央部长职务，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等案。他们以戴季陶^① 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

^① 戴季陶，国民党右派。当时虽未出席西山会议，表面上也不赞成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但他写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书完全抽去了孙中山学说中的革命思想，为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提供了思想武器。

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为理论基础从事反共活动。这些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11月23日—27日 以国民党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身份出席并主持国民党惠、潮、梅、海陆丰各县党部大会。会议期间作关于党务问题的报告。会议强烈谴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

11月下旬 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主任陈公博，告知惠州城烟赌又渐开放，请予查禁。

△ 令第一军政治部李侠公将在东征战斗中缴获的四百多支枪发给海陆丰中共党组织，充作武装农民之用。

11月 指导组建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全团约有二千人，由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分别任团长和参谋长。团设党支部，连有党小组。党支部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周恩来亲自过问排以上干部的任免、人员补充和重大军政训练问题，并亲自编定干部和新兵训练计划，向官兵进行政治教育，经常听取叶挺的汇报和予以指导。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力量。

△ 收到揭发外籍海关人员勒索中国商人的投书后，经交涉迫使外籍税务司将该员撤职。

△ 东征途中，蒋介石召集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要求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加入了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的名字也都告诉他。周恩来以此事关系两党，需请示中共中央为由，予以拒绝。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周恩来从汕头返回广州，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讨对策，计划给蒋介石回击，全部撤出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另组国共合作的军队。由于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一提议未能实施。

11月、12月 撤销勾结工贼携款潜逃的汕头市代理市长陈个

民的职务后，多次电请广东省政府令汕头市市长范其务速来就职。并下令将饶平、澄海、揭阳、普宁、潮阳、惠来等县的反动不法县长撤职。委任温其藩、罗师扬、江董琴、刘琴西、刘侯武、陈卓凡等分别担任五华、兴宁、梅县、陆丰、潮安、揭阳等县县长。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国民党左派或中派人士。

12月初 召集汕头市南强学校、淑德女校、童子部小学、福音国民学校、贝理书院五所教会学校代表开会，商讨收回教育权问题。周恩来在会上发言强调，要把学校办成一个中国学校，办成一个革命学校。并宣布，要组织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委员由学生联合会、教育会、教职员联合会、外交后援委员会、政治部各派一人组成，处理收回教育权一切事宜。

12月2日 主持汕头市收回教育权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会上讲话，号召打破“帝国主义者借文化侵略中国之势力”，希望汕头“收回教育权之工作，能得良好之结果”，“树全国收回教育权之先声”。

12月4日 电请广东省政府颁布县组织法。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广东省务会议通过颁布县市组织法，规定县为自治单位，人民有直接选举罢免官吏之权。

12月5日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成立中共潮梅特委^①，以赖先声为书记，刘锦汉负责组织部，丁愿负责宣传部，杨石魂负责工运，彭湃兼管农运，邓颖超负责妇运。在周恩来指导下，潮梅特委召开的各县市党支部会议决定汕头市工作以工运为主，各县工作以农运为主。还决定各县市的党团员尽可能取得领

^① 中共潮梅特委辖区有潮安、丰顺、潮阳、揭阳、饶平、大埔、澄海、普宁、惠来、南澳、兴宁、梅县、五华、平远、蕉岭十五县。

导地位，采取团结革命左派，联系中派，打击右派的策略。当时汕头市约有中共党员二百多人，各县党支部以海丰、陆丰、潮安、普宁、澄海、揭阳、五华、梅县、大埔等地较强，人数从十余至数十人不等。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共潮梅特委改为中共汕头地委。

△ 出席在潮州举行的公祭东征军阵亡将士大会。在会上宣读祭文，并发表演说。

12月6日 潮安县公署奉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命令，在《汕头星报》刊登布告：凡农工团体，均应一律切实保护，并允其充分发展。

12月8日 指导组成国民党潮梅特别委员会。共产党员赖先声、彭湃、邓颖超等当选为执行委员。办事处设于汕头。

△ 出席在潮州行营举行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各级国民党代表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一）军校内共产党员活动均应公开；（二）军校内国民党员如有愿加入共产党者，须向军校特别党部声明并请准。

12月9日 派共产党员杨嗣震、刘康侯以总政治部代表名义到潮安县金山中学处理驱逐反动校长黎贯的学潮。全校师生举行大会，一致同意：驱逐黎贯，由政治部推荐新校长。二十四日，进步知识分子杜国庠出任校长。

1926年 二十八岁

1月1日 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指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发展国民党和进行国民革命。国民党改组以来，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政策“最有力的拥护者”，是历次革命运动中“最勇猛的奋斗者”。而国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却代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利益，“极端的排除共产党员”。希望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

1月1日—19日 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共产党员占五分之二，左派占绝对优势。大会决议接受孙中山的遗嘱，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会前，周恩来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议，决定利用各地选举的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优势的条件，在大会上公开提出开除右派戴季陶等人的党籍，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计划在大会选举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但中共中央没有采纳这个计划，在大会选举中向右派作出让步，致使戴季陶在受了党纪处分后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次会上，蒋介

石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精卫被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推选为主席。

1月中旬 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乘汕头市工人同警察连日冲突之机进行挑拨时，召集该市各工会代表、市政厅长、公安局长及警察署长共百余人开会，演说四小时，“动以联合救国之大义”，“与会者皆感动”。

1月20日 所领导创办、并推荐国民党左派李春涛任社长的《岭东民国日报》^① 出版。本月，还为该报副刊题写刊头《革命》，作为办报的宗旨。

1月21日 出席汕头各界纪念列宁逝世二周年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

1月31日 以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布告，结束东征军总政治部工作，“所有受理惠、潮、梅各属行政诉讼及政治社会运动未结案件，即日移交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继续办理”；“宣传、组织两科事务，同时移交第一军政治部接办”。

1月 为训练党、团骨干，到中共潮梅特委和青年团汕头地委联合开办的特别训练班讲《世界大势》。

△ 为培养干部，中共广东区委开办粤区干部训练班，讲课的有陈延年、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苏兆征、蔡畅、邓颖超等。周恩来讲军事运动，训练班共办了三、四期，北伐战争开始后停办。

2月1日 宣誓就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布《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组织大纲》，任命该署职员。晚，以东征军总政治部名义在汕头市永平酒店四楼召开汕头市各界代表会议，在会上作

^① 这是国民党在潮、梅、海陆丰地区的主要党报。

国民革命军在东江的工作报告，总结总政治部在潮、梅各地数月的工作情况，说明总政治部改为行政公署的任务及以后施政的方针。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民权，为此，各县议会、商会等只有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方可谋发展，否则可以取消或改组；工会如为少数贵族所操纵，图谋个人活动，也要取缔；学生应参与政治，求其本身的利益，教职员不应阻止，但学生不应干涉教职员职权。还指出，政府应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经济，“造成革命之中心”。说明现在“革命基础已稳固，如教育、实业、水利、交通诸大端已定计划，从事建设，惟政府之力仍恐有所未逮，尚望各界加以督促与援助，俾建设计划均得实施”。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通过决议，任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副党代表。由于汪精卫以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的名义兼任各军党代表，所以各军副党代表实际上即各个军的党代表。

2月2日 发表就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通电，提出行政方针：“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聊期实现总理训政主张之初期，立潮梅革命之基础。至于建设计划，一以总理建国方略为依归，首重物质建设，疏河筑路，开港筑堤，先谋交通之方便，再期实业之发展。”在任期间，革新行政，实行民主政治，惩办贪官污吏，建立革命秩序，统一财政，帮助地方建立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以及发展文化教育等事业。并支持工农运动，关心农民武装建设。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和汕头、海丰工农会组织联合举办各种工农运动人员讲习所，为东江的工农运动培养骨干。海陆丰、潮汕各地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许多地方还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农军等武装组织。

2月16日 致电东江所属各市、县长，各机关，各团体，预

告将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讨论市政建设、教育方针、改善农工生活、发展商业等议案。

△ 宣布给拒绝上缴财政收入的惠阳县县长以撤职处分。

2月20日 被国民政府各部部长联席会议指派为汕头市国民党党部改组委员会委员。改组后的汕头市党部成员大多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2月22日—3月3日 在汕头市岭东商业学校主持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潮、梅、海陆丰各县县长，教育局长，以及工、农、商、学、妇女等人民团体代表九十五人，特聘代表二十四人出席。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的政治很显明是一部分帝国主义者在里面捣鬼，压迫至于极点”，“而军阀却压迫各个阶级，买办却压迫工人，土豪却压迫农民，最后是官僚政客来做弊骗人”。而在广东，工农运动正在发展，商人也渐渐与政府合作，这是政府主张能够实现的力量所在。提出：肃清奸商、买办；惩办贪官污吏；向外发展，同时整顿内部，实行工商联合，封锁香港，注意政治。会议通过商务、财政、妇女、教育及组织人民自卫军等议案九十三件。

2月25日 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致电省港罢工委员会，表示“愿作诸君后盾，坚持到底，以争最后之胜利”。并赠写有“反帝国主义先锋”的旗帜一面。二十六日，第一军政治部致电省港罢工委员会，拥护罢工条例及复工条件，声援罢工。

春 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题词：“扰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我们民众要期统一与和平，须要打破这两大障碍物。”

3月初 电请国民政府颁布广东国民会议组织法。三十一日，国民政府令法制委员会起草国民会议组织法。

3月8日 在汕头妇女界举行的“三八”妇女节庆祝会上发表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讲演，指出：“妇女运动四字，时人往往误解，以为是联合女性而向男性的进攻，谓男性常压迫女性，把女性形成一个被压迫阶级”，殊不知这“实因旧礼教、旧思想、旧历史束缚之故”。“妇女运动是制度的革命，非阶级的或性别的革命。”

3月12日 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刊》总理逝世周年纪念号上发表两篇文章：《纪念总理》和《孙文主义（一）》。在后一篇文章中，论述孙中山的遗嘱是历史的产物，是“孙文主义成熟的结晶，亦即是孙文主义”。驳斥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对孙文主义的歪曲。

3月16日 根据周恩来所提同时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和第一军副党代表，“事繁责重，不能兼顾”的请求，经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广州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周恩来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职务。

△ 和第一军将领何应钦、钱大钧等发表通电，主张遵奉孙中山遗嘱召开国民会议。

3月17日 应蒋介石来电要求，乘船离汕头回到广州。到广州察觉蒋介石同国民党右派来往密切的情况后，告知张太雷①，但这一情况没有引起当时正在广州访问的苏联共产党访华使团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重视。

3月20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大部分离开广州，返回各地，而蒋介石加紧同右派勾结。本日凌晨，蒋介石在广州以国民党右派制造的“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等谣言为借口，擅自下令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

① 张太雷，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兼任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

产党员李之龙和第一军中几十名共产党员。同时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和苏联顾问，包围苏联顾问住宅，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武装。并且同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谈判，提出把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全部赶出军队的具体计划。谭、朱怀疑蒋介石有阴谋而予以反对。此后不久，汪精卫称病离职去欧洲。

△ 闻讯后到广州造币厂，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被蒋软禁一天。“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和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在广东区委议论，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认为从力量对比看，于蒋不利，反击取得胜利是可能的。还和毛泽东在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讨论，大家也主张反击。这一主张提出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未予采纳，主张妥协让步，以致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地位更加巩固。

3月22日 出席有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宋子文、伍朝枢、陈公博、甘乃光、林伯渠等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报告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的经过。

3月30日 中共广东区委发表《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的信》。信中指出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加紧对共产党造谣、诬蔑，影响到了广东局势，必须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使中国无产阶级与农民得到解放，为此积极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在国民革命中共产党是努力于工农群众组织的；工农的组织是国民政府的保障，是国民革命的基础；共产党决不会因敌人的谣言而放弃革命工作。

4月上旬 蒋介石提出：军队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军队；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要完全的国民党员才可担任；第一军的党代表统统调回再训练。之后，已暴露身份的二百五十多名共

产党员开始撤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及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迫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

4月23日 返抵汕头，办理移交东江各属行政公署和第一军政治部的工作。在汕头期间，告诉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的汕头国民通讯社社长梁若尘：有关“中山舰事件”，除党组织提供的新闻材料可用通讯社名义发给各报外，任何方面和个人提供的消息和稿件，一律不宜转发。

5月初 回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举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主任。二十九日，训练班正式开学。学员多是“中山舰事件”后被迫离开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结业后，周恩来将大部分学员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

在此期间 为了加强北伐军的政治工作，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合作，用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名义，办了一期军队政治干部训练班。学员来源多数是国民革命军各军现职政工人员，约一百多人。训练时间二三个月。结业后多数仍回各军，学员中第二、第三军的较多，第四、第六军的略少。周恩来负责训练班的工作，并参加讲课。

5月15日—22日 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八条具体办法，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名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等。根据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意见，中共中央代表在会上作了让步，此提案获得通过。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撤职。蒋介石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人部长和组织部长，控制了党权。在此期间，黄埔军校中共党团核心组织成员

饶竞群请示中共广东区委，军校的共产党员如何措置？周恩来和陈延年明确指示：一个都不要向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表态，未暴露身份的仍同以往一样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在该校各部门工作。

5月23日 中共广东区委发表《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工农群众利益的党。为国民革命的成功，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促进国民党改组，使国民党有今日之发展。说明共产党员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态度，是以“全部革命利益为前提的”。

5月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锋，首先由广东肇庆、新会出师。途经广州时，周恩来在司后街叶家祠堂叶挺寓所向连以上共产党员干部讲话。讲话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北伐的有利条件，介绍湖南、湖北的工、农、学生运动情况，说明党决定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的重要意义，指出我们是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同任何别的军队有原则区别。号召大家要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要起先锋模范和骨干作用。独立团党支部将这篇讲话作为行军中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以后在北伐战争中，独立团英勇作战，屡建功勋，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

5月—7月 在广州期间，以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身份主持共产党员参加北伐的准备工作，时常约集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军和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检查工作，布置任务。并向各军中的共产党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夏 在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讲课中指出：“西方的社会革命与东方——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同的地点（方）虽多，而其最重要的就是农民问题”。过去“中国的社会，还是封建制度。所有凡是作军队的群众，都是

生活很苦的”，“肯来当兵的，都是下流阶级的苦工人、流氓等人”。现在的军队由于社会制度与环境的改变而不同，大多数士兵具有“丰富民族思想”，“知道彻底革命”。还指出，黄埔学生军所以能所向无敌，不数月而肃清广东全境残敌，一方面是由于工农群众拥护，一方面是由于兵士的觉悟。

△ 为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举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讲《反吴与反帝国主义》、《中国政治军事的观察》、《政治工作的设施及运用》等课程。

6月22日 出席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的北伐军战时工作会议，被推举为宣传员训练及补充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编制委员会主席。二十三日，在会上报告战时宣传训练班计划。二十四日，在会上报告编制委员会审查结果。

6月7月间 应邀同邓演达商讨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工作方针与人事配备，并向邓推荐共产党员朱代杰任总政治部秘书处长。

7月4日—6日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出师北伐等问题。九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

7月12日—18日 在上海出席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中山舰事件”的经过。

△ 会议期间，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向中共中央请示在北伐中对蒋介石应采取何种方针。中共中央没有作明确答复。

7月 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讲《国民革命及军事政治工作》。讲话中说：“军事政治工作，要以军队为背景。讲到军队的背景，要以社会经济不安为背景”，“现在的

军队，无论是北洋军或革命军，都是由于社会上经济不安里崩溃来的”，“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

△ 应邀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开办的政治工作人员特别训练班讲课，主要讲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 为加强中共对北伐军作战必经地区的领导，发展工农运动，配合作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派刘九峰从广东去江西接任中共江西地委书记，筹备成立中共江西区委。向刘说明江西是农业区，工作重点应是农民运动。

△ 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派聂荣臻以特派员身份，到北伐军中做联络工作，向带兵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军事部的指示，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或反映给军委。

7月8月间 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指示，东江农工运动宣传员养成所在汕头成立。林修雍^①任所长，罗明任教务主任，杨石魂、彭湃、林甦等任讲师。全所有学员一百多人，学期三个月，结业后分赴潮梅各县发展农民运动。

9月4日 出席在广东国民大学礼堂召开的国际青年纪念演讲会，并发表演说。

① 林修雍，广东澄海县人，国民党左派。一九二六年一月曾由周恩来委任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第二科代理科长。

9月24日、25日 出席广东各界慰劳北伐军演讲大会，并发表演说。

9月10月间 两次到上海。

10月10日 北伐军攻克武昌。随后，主力部队移东南战场，到达江西前线。十一月四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攻占九江。八日，占领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二十六日决定迁都武汉，并在广州设政治分会。

10月14日 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新政治队讲《武力与民众》，指出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强调要依靠群众进行武装斗争。

10月24日 为响应北伐军的进攻，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起义被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镇压而失败。

10月25日 代表中共广东区委致信中共中央、报告北伐前线各军的军事情况。

12月10日—17日 为批驳国民党右派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诬蔑之词，在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连续发表《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等文章，分析国民党改组以来广东的政治局势，说明现时广东应是“由战争到政治”，“过去打倒反革命的军阀的战争，是几处集会战，故国民革命军的练成乃成为重要条件。现在进而与一切半封建势力作政治斗争，面积遍及全省，这非靠民主势力的扩大和充实，决难致胜。故民众的组织力和武装战斗力之发展，民主政治的怎样实施，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指出：共产党领导工农参加国民革命的目的虽然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但当着资本家压迫工人谋生活改善的正当要求，或是地主联合一切旧势力摧残农民谋解放的运动时，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其争斗、其要求亦自较他人为急

迫。这并非超过国民革命，而实是推进国民革命”。申明共产党要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实行国共合作，同时“还应为工农阶级在民主政治范围内提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并督促国民党政府加以实施。强调“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号召全体革命分子“当此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作决死战的时候”团结起来，以最终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

12月 离广东，秘密至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

年底 在北伐军攻克武昌、直系军阀吴佩孚败逃豫南后，多次会见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要他们利用北伐军准备进攻河南的有利时机组织农民暴动，发展党的组织，并强调建立党的武装的重要性。以后，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根据上述指示，发动了确山农民暴动，建立了河南第一个县级革命政府。

△ 以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央组织部秘书身份多次听取陕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中共党组织负责人汇报，并针对各地不同情况作了指示。

1927年 二十九岁

1月1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召集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广东问题的报告，分析广东的政治局势和国民党中各派的政治态度，指出：“中山舰事件”是国民政府被所有旧势力包围的结果，事件以来，国民党中的新右派积极压制共产党，摧残工农运动。但“广东工人愈压迫则愈可发展”；广东农民则由于代表农村地主民团势力的李济深“权限尚小”，和“国民党左派尚能助农民，所以更可发展”。

△ 国民政府命令以武汉为首都，并开始在此行使职权。十七日，蒋介石在南昌自立中央，正式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议作出决议：“国民政府于本月十八日开始在南京办公，同时举行庆祝典礼。”形成宁、汉对立局面。

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会议听取罗亦农的政治报告，并讨论上海区委的组织工作和职工运动等问题。

1月27日 为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取得胜利，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宣传队本月三日在武汉江汉关附近演讲。当时大批英国水兵登陆寻衅，打死打伤听演讲的民众多人。此事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驱逐英帝国主义、收回英租界的反英运动。为此，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宣传英兵委员会，由周恩来、赵世炎等担任委员会国际代表。本日，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代表

中国共产党就反英运动发一宣言，并组织工人散发传单，扩大影响。

1月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作出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全文传到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案所指出的中国革命要向非资本主义过渡，今后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以及在国共关系上“组织左派并与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等要点，“经过详细讨论和辩难之后”，决定接受，并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随后，中共中央即把共产国际决议案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接受国际决议案的解释发至区委、地委和特支进行讨论。

2月 任中共上海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

2月9日 中共上海区委举行全体会议，讨论筹备区代表大会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农民问题、工人问题等七个委员会。周恩来任组织问题委员会委员。

2月11日 以旁听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代表大会。会议传达并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作出的《中国问题决议案》。

2月18日 同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会工作人员谈中共中央于二月十七日通过的关于必须举行罢工的决定，开始考虑起义后政权建设的形式问题。

△ 北伐军占领杭州。十九日，上海总工会宣告全上海总同盟罢工，提出“响应北伐军，打倒孙传芳”。

2月22日 中共上海区委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并领导发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周恩来没有参与起义

的准备和领导工作，临时被派往南市区指挥行动。起义遭到军阀孙传芳部与租界工部局的联合镇压。

2月23日 中共中央、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停止这次起义，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为此，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组织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组成。

2月24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各部书记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各部汇报情况，决定采取“为进而退”的策略，集中力量准备新的武装起义。周恩来发言指出：“军事工作，继续进行，组织要特别严密。”

△ 下午，组织各区军事专员分批开会，商议起义的准备工作。

△ 晚，在特别委员会上作军事问题的报告，分析敌我双方力量状况，汇报特别军委作出的关于起义准备工作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的内容包括：（一）加强领导机构，特别军委除原有五人外再增加罗亦农，各部委分别组织军委；（二）组织武装力量，计划起义依靠纠察队（目标五千）、自卫团（目标五百）和独立团；（三）加强队伍训练，教授巷战等；（四）准备武器；（五）加强敌军工作和情报工作，由周恩来、郭有恒、郭寿生组织海军委员会，从事策反工作。会后，即派人到松江、龙华及南京、无锡等地了解情况。

△ 中国共产党发出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全体工友书。文中总结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缺点主要是“没有武装准备，没有准备武装暴动的决心”；其次是“工人的组织与团结还没作到充分的程度”。指出：工友们是上海市民争自由的先锋，上海市民要得到

自由，非以暴力根本铲除残暴的孙传芳的政权，建立上海市民民主政权不可。呼吁工友们向新的斗争努力。

2月25日 孙传芳在江西战败后，曾于上年十一月中旬同张作霖、张宗昌在天津举行会议，就地盘分配及进兵计划达成协议，同意直鲁联军（张宗昌和李景林的联军）南下援助。本年二月下旬，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到上海，渤海舰队也南下。本日，周恩来决定让海军委员会委员郭有恒等做北洋政府驻沪海军的工作，并以传单形式发表告市民书，反对渤海舰队和直鲁联军。

△ 晚，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党务、军事及派工人代表团联络北伐军等问题。周恩来发言指出：可先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对小资产阶级群众要尽量争取。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派人同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联络，向他说明上海工人罢工的意义，催促他迅速进兵上海。同时决定派人同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联络。

△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民众书。书中号召上海革命市民动员起来，同工人一起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联合干涉中国革命，如不停止，即将“以武力回答武力”。并号召工人及革命市民起来夺取武装，响应北伐军，拥护国民政府。

2月26日 得知第二军已到湖州，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也已开抵杭州，但不愿再前进的情况下，分别致信何应钦和第二军副军长（代军长职）鲁涤平等，告诉他们上海的罢工情况和口号，促他们继续前进。

△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报告罢工的准备情况。会议对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总同盟罢工等作出决议。决定：北伐军到达之前，只做些准备工作；快到时，“迅速举行群众的夺取武

装”，设法夺取兵工厂；罢工时间“在松江确被北伐军占领以后，再定办法”。

2月下旬 特别军委派人到各处筹款，购置武器。

△ 为训练武装起义的骨干，从工人中选调当过兵、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共产党员任教员，举办军事训练班。

△ 到商务印书馆、法商电车公司、上海市各区工人中了解起义的准备情况。

△ 同赵世炎等动员、说服一批进步工人参加闸北商会会长组织的保卫团，利用合法身份参加军事训练，取得枪支弹药，等待时机，配合武装起义。后来起义时，参加保卫团的工人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 派人同前来接洽的孙传芳部士兵和军警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站到革命一边。

2月27日 收到南京永济舰海员对倾向革命的北洋政府驻上海海军表示同情的来电后，组织军委讨论决定：对海军工作一方面公开致信驻沪海军司令杨树庄，推动他参加革命，同时加紧开展进步组织新海军社的活动。

2月27日、28日 连续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报告军事形势和起义的准备情况，要求在罢工开始后，以自卫团、手榴弹队在前面，从曹家渡、梵皇渡依次到闸北，缴溃兵的械。南市、浦东各自进行起义。并指出无论形势如何，我们都要准备发动，口号是“随时随地夺取武装”。

2月28日 出席小沙渡部召开的纠察队队长会议。在会上指导解决纠察队员集队过租界时如何避免租界当局干涉和行走的路线等问题。

△ 参加自卫团群众会议。

3月1日 先后参加浦东和引翔港地区自卫团会议，调查研究地势，决定“夺取最大的机关”。

△ 派顾顺章到兵工厂接洽购买军械。

3月2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发言介绍敌军情况：孙传芳部军心动摇，分南北两派，南方人想投靠北伐军，北方人想卖掉武器回家乡。提出分化敌军的工作原则：鼓励前者响应北伐军，帮助后者返乡并设法收买他们的武器。

3月初 鉴于直鲁联军要到上海，孙传芳部已退出，军阀正在调兵期中，提请各部委注重铁路罢工问题。

3月3日 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指出：目前自卫团应注意要武器，打工贼，练技术和调查路线；对前来接洽的军队和保安团警察“应特别注意”。

△ 在军委会上作“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的报告。报告总结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肯定这次起义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起义”，“仍然具有很大的意义”。但起义“是在事先根本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之前，“全党甚至没有夺取政权的打算”，“我们的工作充其量只是帮助国民政府和帮助国民党而已”。党似乎只是辅助的力量，军事工作也就被看作一种次要的工作，所以遇到需要独立行动的场合，就没有力量，没有准备。最主要的原因是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另外，“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报告提出目前需要同时进行的两项工作是：召开市民代表会议；进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并对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作出部署。

3月4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报告军事情况和起义的准备工作，说明目前主要是购买武器问题。提出限明天将起

义的各项技术性工作做好。

3月5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宣布：“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会议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暴动时机：“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军队必有一部分溃散。”会议还就起义领导机构进行讨论，罗亦农说明整个行动由特委会指挥，中央和上海区委负责同志每天两次定时到约定地点碰头，紧急情况下由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陈独秀负责。具体分工是：闸北区由赵世炎、顾顺章负责；南市区由周恩来、徐梅坤、陆震负责，“如南市不重要恩来调闸北”；浦东区由马玉夫、孙良惠、宣中华负责。会议通过准备提出的临时政府名单。

3月6日 蒋介石指使其党羽在南昌惨杀共产党员、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随后在九江、安庆等地接连发生反共暴行。

3月7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指出奉贤、川沙、南汇三县革命形势很好，“所有农民、市民甚至警察都表同情”。提出应先驱逐旧县长，请上海区委速派农运、工会等方面代表前往指导工作。还指出，当前对工人的组织训练，实际是整顿技术（包括交通、运输、侦察等），要告诉他们，这些工作很重要，必须特别注意。

3月8日 接待何应钦派来接洽上海罢工和军事布置事宜的陈霍涛（共产党员）和江东清（国民党左派）。

△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就上海资产阶级反对国民党市党部派代表参加市民会议的问题，提出扩大市民公会^①，增加

^① 由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南市商会、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组成。

工会代表。

3月10日 利用驻在兵工厂的军阀部队准备撤离的时机，派人前往该厂拆卸十四架飞机的器件，保留下 来。

3月10日—17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坚持国共合作和将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权集中于党，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

3月上旬 鉴于起义时机迫近，指导制定各部委的作战计划，内容包括进攻的主要目标，各路的人力和武器配备，进攻的方式、时间、通信联络及注意事项等。

3月11日 在特别委员会上提议由上海总工会组织纠察队委员会，获得通过。

3月13日 收到去九江联络蒋介石的郭有恒来信，得知蒋介石对上海工人起义“似不表同情”。

△ 出席特别委员会议。会议讨论市民代表会议和军事问题。周恩来报告已按照新划分的区域（全上海共分八个部委，即闸北、南市、沪东、沪西、公共租界、法租界、浦东、吴淞）组织了军委；纠察队、自卫团都有所扩充；作战方法较以前有头绪。

3月15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议。在会上介绍军事情况，说何应钦已下令在松江的部队到龙华后不准前进，免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指出这对工人起义后夺取政权“有许多便利”，“可安得上海”。

3月16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议。在会上针对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主席钮永建动摇于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之间的情况指出，上海政治分会应增加左派分子。

3月18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提议，讨

论罢工的时间、毕庶澄投降^① 和武装组织等问题。

3月19日 在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分析“毕有败退可能，同时也有暂时压迫我们的可能”，提出：“今天都准备好，如果十二点以前，有毕军溃退消息，即一面下令罢工，一面今晚动作。”下午，罗亦农在上海区委各部委、各产业总工会联席会议上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预备动员令，并代表中共上海区委颁布《行动大纲》，规定：“此次上海革命民众的广大动作，中心思想是民众与武力合作，中心目的是建立上海革命民众的政权——民选市政府。”

△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指出，毕庶澄现正在投机，起义仍以“松江、苏州下来为标准”。还提出，鉴于钮永建不赞成工人罢工，可去联络即将来沪的白崇禧，使之不与钮十分接近。

3月20日 晨，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派人到枫泾联络白崇禧和薛岳^②，由周恩来起草致白、薛的信。

△ 傍晚，北伐军前锋逼近上海近郊龙华。

3月21日 晨，中共上海区委发出举行起义的指令。十二时，上海总工会颁布总同盟罢工命令后，全市八十万工人举行总罢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周恩来担任起义的总指挥，赵世炎为副总指挥。战斗分七个区进行，最后的激战集中于闸北，由周恩来、赵世炎直接指挥。他们亲临现场，察看地形，确定进攻

① 三月十八日毕庶澄向钮永建提出两项投降条件。一种报告说：（一）继续控制上海及无锡到松江地区；（二）暂时灰色的投降，不悬党旗。另一种报告说：（一）投蒋不投国民政府；（二）除任军长外还要加司令或指挥的职衔。

② 薛岳，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方针。以三千名工人武装纠察队为骨干组成的起义队伍，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同驻在上海的毕庶澄部和其他军警总共五千余人激战两天一夜，于二十二日下午六时，攻克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

△ 战斗进行中，上海总工会派人到龙华请北伐军支援，遭到白崇禧等拒绝。在起义军占领北火车站，毕庶澄军已溃败时，薛岳率师赶到。

3月22日 经上海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由钮永建、杨杏佛、张曙时、侯绍裘、虞洽卿、王晓籁、王汉良、汪寿华、顾顺章、林钧、谢福生、郑毓秀、白崇禧、罗亦农、丁晓先、陈光甫等十九人组成。

3月23日 连日来辛劳、疲惫不堪。本日，罗亦农建议休整并严密改编纠察队。

3月24日 北伐军占领南京。当晚，美、英等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炮轰南京城区，造成“南京事件”。

3月25日 罗亦农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一切指挥集中，恩来出来找一个地方接洽重要事”；赵世炎负责中共上海区委及上海总工会工作；罗亦农负责与国民党接洽及其他一般政治工作，并留在上海区委内。

△ 晚，特别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军事、政治问题。会议根据会前苏联顾问和周恩来所报关于白崇禧已将薛岳调离上海，将刘峙为师长的第一军第二师调到上海闸北，谋划解决工人纠察队的情况，主张“拥护留薛”。

3月26日 蒋介石到上海。一方面同帝国主义暗中进行政治交易，一方面勾结青红帮头目杜月笙等人成立“中华共进会”，并由虞洽卿出面筹措经费和武器，同工人纠察队对抗。

3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指出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但工人阶级的行动也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官僚、劣绅及其他反动分子的恐慌，“他们尽力注定目标向上海工人进攻”，人民要警惕反动派的阴谋活动。此文发表在四月六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一九三期。

△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建议上海总工会致电国民政府，报告组织纠察队的意义，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并发给津贴。提出开展政治工作，争取第二师的士兵。

3月29日 上海特别市政府召集市民代表大会，举行市政府委员就职典礼。但蒋介石命令“暂缓办公”。

3月下旬 同从汉口到达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宋子文见面，争取他支持上海市政府。

△ 分别探望进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东路军第三纵队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劝导他们支持革命，并要他们做蒋介石的工作。

△ 同何应钦交谈政治、军事、外交、党部、交通等问题。何说武汉政府为对抗南昌的蒋介石而按兵不动是不好的。周表示，中国共产党是“谁妥协就反对谁”。事后，周恩来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同何交谈的情况，提议请国民党左派何香凝等去做何的工作，使其“消极而不助蒋”。

3月30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详细分析起义后上海的政治形势，指出：蒋介石、白崇禧等“对付我们已有预备”，“将来或许是借扰乱治安等名目来干”。建议中央派人同已去南京

布置战事的程潜^①联系，争取程潜；并使在安徽的李宗仁^②守中立。还指出“武汉策略有大的错误”，主张也派一人去。提出在下级军队中多做宣传工作，促使士兵拥护武汉中央及国民政府，还要动员民众、工人轮流不断地慰劳士兵，向他们宣传，使之左倾。此外，还可利用黄埔同学联欢会欢迎蒋介石，使之不敢说反革命的话。为加强对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建议调蒋先云到蒋介石处；调胡秉铎到何应钦处。在民众方面，建议推举郭沫若^③为知识分子的领袖。最后宣布中央的军委同上海区委的军委为统一的机构。

△ 同蒋介石面谈。蒋谈话重点在对武汉政府的意见，对鲍罗廷不满，表示现在决不下台。

4月上旬 蒋介石连续召集会议，密谋反共清党，指派吴稚晖、陈果夫、白崇禧、钮永建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掌握上海市的军政财权；公布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严禁罢工、集会、游行。十一日，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律实行‘清党’”。同时题写“奋斗到底”的锦旗，派人赠送给上海总工会，以麻痹工人。

4月5日 陈独秀和四月初经苏联回国的汪精卫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中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

4月12日 上海发生蒋介石策划的反革命政变。按照蒋的部署，大批武装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在凌晨袭击工人纠察队驻地。当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时，第二十六军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企图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周恩来闻讯后赶往设于商务俱乐部内的

① 程潜，时任国民革命军江右军总指挥。

② 李宗仁，时任国民革命军江左军总指挥。

③ 郭沫若，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到后，被骗至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在交涉中表示，工人纠察队的“枪无论如何不能缴去”。但当即“被禁于司令部”（后经罗亦农派黄逸峰通过第二师党代表将周恩来救出）。与此同时，分散各处的工人纠察队受骗缴械。接着叛军在上海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南京、广东、湖南、杭州等地随后也相继发生同样事变。

△ 上海工人奋勇夺回上海总工会会址——湖州会馆。总工会立即在大院内召开代表大会，决议全市总罢工，重新组织工人纠察队，继续同帝国主义、蒋介石进行斗争。

4月13日 上海二十万工人罢工。周恩来和赵世炎参加在闸北青云路召开的群众大会，到会的有十万人。会后和群众一起上街游行。游行群众遭到叛军的残酷屠杀。

△ 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于事变前夕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维金斯基^①到上海，任务是：（一）同赵世炎、周恩来共同组织特务委员会，传达贯彻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讨论江浙区委^②执行中央决议案的具体方法和计划，报告中央；（二）促江浙区委推选出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还决定派聂荣臻到上海，解决工人纠察队方面的问题。李立三等十二日路过南京，知蒋介石已发动反革命政变。本日，赶到上海，辗转找到上海的同志。

4月14日 会见刚到上海的郭沫若。郭沫若谈了蒋介石在九江、安庆叛变革命的罪行，说上海局势紧张，劝周恩来从速离开。

① 维金斯基，苏联人，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驻中国的代表。

② 江浙区委即上海区委。

4月14日（或15日） 就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情况拟一电报交宋子文转汪精卫。从宋子文的谈话中得知，蒋介石要通缉周恩来。

4月15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在会上分析北伐军各军对蒋介石的态度后，指出“蒋的力量并不大”，只要武汉出兵，有“五万精兵一月即可削平”蒋的势力。指出“上海过去太退让，是错误”，提议立即将此意见电告武汉政府。

4月16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参与研究武汉政府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和工会的策略以及党的宣传工作问题。在会上指出：自十二日以来，我们毫无一点宣传，致市民不知惨案的真相。提出立刻动员，扩大宣传，“号召群众反帝、内含反新军阀”，“反帝反蒋并行”。

△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李立三宣布由李立三、陈延年、维金斯基、赵世炎、周恩来，并增加罗亦农和三个苏联人共同组成特务委员会。周恩来首先发言说，应致电武汉提出两点：“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四·一二”事变说明“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在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同时指出，汪陈联合声明“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

△ 汪精卫通电声讨蒋介石。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通过清党等反革命决议，同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形成宁、汉对立局面。

4月18日 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五点：（一）“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①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二）“特委的政策有错误，起头是模糊，后来是妥协”；（三）“政权运动的宣传没有做得好”，“没有抓住小资产阶级”，而“对于资产阶级的妥协直到缴械以前并未停止”；（四）“对于反帝行动的消极”；（五）“技术工作太坏”。指出：对“中央的错误，应有根本解决的办法”，要提到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并说：“应提出上海与广东两次的错误，中央完全承认才能指导全国，尤其是述之不能再占中央委员的地位”。同时批评“此次运动东方局^②也要负责”。

4月 起草致中共中央的意见书^③，署名的还有赵世炎、罗亦农、尹宽、陈延年、李立三。意见书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明确提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但一师、二十一师薛、严走后，战斗力已失泰半，现改驻镇江、苏州；二师久败之师，现驻昆山；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四十军已一半渡江，余者未必尽为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于扬州，大溃。二十六军、十四军都有反蒋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

① 指中山舰事件。

② 指共产国际东方部。

③ 即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的《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

4月25日 从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处得知，敌人正悬赏二万五千元缉拿周恩来。

4月下旬 在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后，要邓颖超速到上海。五月一日，邓颖超抵沪。

4月下旬—5月上半月 在聂荣臻协助下，处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善后工作，并安排江浙一带地下武装斗争。

4月27日 出席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策略等问题。周恩来提议军事工作由王一飞负责；职工运动的口号是：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工厂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孙中山的农工政策、拥护上海总工会。

4月27日—5月9日 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陈独秀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以及忽视农民土地问题的错误，但会议未作根本的纠正，仍坚持忽视掌握军队领导权的错误方针。大会仍选举陈独秀任总书记。周恩来为五大代表，未出席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秘书长（未到任）。

5月下半月 从上海秘密乘英国轮船到武汉。此时，由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发动的武装叛变，被武汉卫戍司令叶挺于二十日率部击退。武汉政府转危为安。二十一日，国民党长沙驻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解散湖南省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5月22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5月25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央军人部（军事部）长。并决定，军人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

会议。此后直至七月下旬，周恩来以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人为助手对军队进行组织、联络和政治工作，并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

5月26日、27日 连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马日事变”后湖南的政治局势及党的军事工作，决定致电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质问解散工会、农会事，并决定派瞿秋白、张国焘赴湖南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5月28日（或29日） 听取湖南来人汇报情况，得知湖南农军准备从三面攻取长沙后，对来人指出，通知部队“暂集中湘南”待命，“不作硬来”。

5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报告“马日事变”后长沙的政治局势及军事情况。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这期间，常委会几乎每天举行一次会议，处理各项紧急事务。六月三日，增选瞿秋白为常委。六月四日起，中央常委由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四人轮流值日，持续到六月下旬。

5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工委人选名单及对付蒋介石的策略。周恩来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军事问题。

5月 主持成立特科。特科分设特务、情报、保卫等四股，以情报工作为主。

△ 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出指示：（一）开展土地革命；（二）吸收新的工农领袖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党；（三）动员二万名左右的共产党员和五万革命工农，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四）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

庭，惩办反动军官。中共中央六月一日收到上述指示。六月五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将电报内容告知汪精卫，这成为汪精卫分共的一个借口。

6月5日 汪精卫解除鲍罗廷、加伦等的顾问职务，并于十日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预谋反共。二十日，冯玉祥同蒋介石在徐州开会，秘密达成反共协议。

6月6日、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陈独秀针对共产国际五月指示说：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现在国民党未开代表大会，怎能增进领导成员；建立军队的问题，不是言过其实，就是一种幻想；组织革命军事法庭一事也是行不通的。从而拒绝了国际指示。会议还讨论了湖北、湖南的工作。

6月8日 出席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部、国民党特别党部等部门发起的安葬蒋先云（在河南北伐前线牺牲）的追悼会，并发表演说。

6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发言同意蔡和森“以鄂做中心，湘鄂赣三省左派做基础”向反动派作斗争的意见，并提出以“三省救各省，东南讨蒋”的斗争方针。

6月中旬 派出军事干部十人到湖南浏阳、平江一带组织农民，准备武装暴动。

6月17日、2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两次提出举行湖南暴动的计划。指出在暴动中可集中力量进攻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问题临时委员会。关于组织工作，提出在长沙设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技术上建立交通处（后建立）。并说明准备另派一百五十人到各地做农军及地方工作。会议决定由周恩

来前往指挥暴动。后因共产国际代表反对，这个计划未能实行。

6月22日 鉴于政治形势紧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紧急提议在武昌、汉口等地设秘密办公处。此提议获得通过。

6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提出：“为学习争斗，应学习争斗技术。”

6月28日前后 出席陈独秀召开的紧急会议。在会上报告第三十五军何键部准备在汉口制造“马日事变”的消息，说明中央军事部和省委军事部已采取应变措施，准备将武汉总工会纠察队调到武昌参加第四军。会议决定，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会后，周恩来、张太雷在处理纠察队及童子团等问题时，只交出部分破旧枪支，把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隐蔽、分散，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部队里。

6月 会见在普宁暴动^①失败后到武汉请示工作的惠、潮、梅农工救党军代表方临川，指出武汉形势将起变化，要暴动队伍不去武汉，尽快返回湘南同汝城的农军合编为一个师，就地暴动。

7月3日 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关系问题。会议通过陈独秀提出的重申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向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有十一条内容的决议案。

7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湖南局势的会议。在会上提出在唐生智^②与何键有冲突、唐生智与蒋介石有矛盾的

^①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广东省普宁、揭阳、潮阳等县的农军举行了武装暴动，进攻普宁县城。中共潮安县委书记方临川等人组织的武装队伍闻讯赶来参加战斗。五月中旬，暴动失败，队伍撤到湖南汝城，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即派方临川到武汉向中共中央军事部周恩来请示。

^② 唐生智，时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

情况下，我们应采取“拥唐反蒋”政策，并可促唐生智解决何键。

7月上旬 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参加中国共产党。

7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工作。在此期间，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提议“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

7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抛弃劳动群众，默认、掩护和帮助一切反动派的进攻。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申明，中国共产党仍将同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7月15日 在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后，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久，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

7月中旬 在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分共清党后，中共中央确定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同时决定以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

△ 随中共中央由汉口暂移武昌办公，和张国焘等一起主持党的机关和党员的紧急疏散撤离和隐蔽工作。在武昌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撤退部署的报告后，迅速将党的各级组织转入地下，并把聚集在武汉的中共党员派往各地，掌握工农武装力量，

以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还将从事军事工作的中共党员集中南昌、九江一带，做联张返粤的准备工作。

△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云集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会后，周恩来指定以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先去九江做准备，并交代何时发难要听中央命令。

7月20日 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谈话会，鉴于张发奎态度日见右倾，认为“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会后，委托正在庐山的瞿秋白返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根据张发奎的政治态度，改变依张政策，决定“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得便解决他”。

7月24日（或25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在发言中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接济军火物资。会议最终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7月26日 由陈赓陪同赶到九江，向正在讨论有关起义各项问题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针对讨论中发生的要否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的争论，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统一了大家的认识。随后，组织起义部队向南昌集中，交代聂荣臻设法

将在马回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7月27日 到达南昌，先住朱德寓所，后住系马桩附近一学校内。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大旅社主持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详细讨论起义的有关问题，决定在七月三十日晚举行武装起义。

7月28日 前往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告以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具体行动计划。贺龙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7月29日 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九江，给中共前委连发两份急电，说起义宜慎重，无论如何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周恩来和前委其他成员商定：起义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

△ 汪精卫、孙科、张发奎、朱培德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决议：（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和九江国民新闻报等；（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廖乾吾、高语罕、恽代英等人。

7月30日 张国焘到南昌后，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并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周恩来和前委其他成员等一致反对这一主张，坚决表示：起义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激烈争论数小时，但因张国焘是中共中央代表，不能以多数决定。为保证武装起义按预定计划进行，周恩来最后愤然以辞职相抗争，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

7月31日 主持中共前委紧急会议，继续讨论。经过数小时辩论，在得知张发奎参加庐山反共会议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

会议最终决定八月一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 由于第二十军的一个营副告密，中共前委决定起义提前举行。

8月1日 凌晨，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中共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二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几小时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三千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

△ 出席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由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 所改定的《中央委员宣言》发布。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并提出七项主张，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

△ 晚，主持参谋团委员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的预定方针，讨论南下行军路线问题。为了避免国民党军的尾追堵截，尽快与东江农民起义联络，会议决定选择走国民党军兵力较为薄弱的从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行军路线。

8月2日 中共前委在对起义部队初步整编后，决定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下辖三个军。同日，革命委员会任命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

△ 聂荣臻、周士第率领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大部由马回岭赶

到南昌。

8月3日 起义军开始分批撤离南昌，向临川（抚州）进发。四日，在左翼行进的蔡廷锴所率第十一军第十师在进贤脱逃，经余江折往浙江。

8月5日 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出发前，致信中共中央，报告南昌起义情况。并找当地中共负责人谈话，了解南下沿途各县的农民运动、地主武装、封建族姓以及风俗习惯等情况。

△ 率起义军开始沿崎岖山路行军。

8月7日 抵临川。鉴于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和思想比较混乱的状况，中共前委决定在此休整几天。为筹措急需的军饷，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主张改变以往派款、借款的办法，实行征发地主粮食，没收劣绅反动派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罚款。经过讨论，革命委员会决定采取这一财政政策。

△ 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和结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当前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会议选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周恩来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8月9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十日决定成立南方局，任命周恩来为南方局成员和南方局军事委员会主任。

8月12日 抵宜黄。当晚指示总政治部起草《土地革命宣传大纲》，油印分发。并同在这里赶上部队的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委书记陈毅谈话，分配他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主力团——第七十三团的指导员。次日启程，继续南下。

8月18日 抵广昌。因连日军旅劳顿，患病。二十日离开广昌，向瑞金进发。

8月26日 起义军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同布防在瑞金、会昌一线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的两个团遭遇，将其击溃。随后进占瑞金。周恩来从报纸上得知各省国民党新军阀封闭工会、农会，捕杀中共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消息后，感到再继续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已经不妥，即主持召开中共前委会议，决定政权的性质须从根本上改变，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提出乡村政权应完全归农民，并须以农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多数。

8月30日 从缴获的国民党军文件中，获悉钱大钧、黄绍竑两部正在会昌一带集结大量兵力，准备进攻起义军。为解除后顾之忧，和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商定兵分两路，先击破会昌之敌，再行南下。本日，周恩来前往前沿阵地，和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第十一军向驻守会昌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击溃钱大钧部全军九个团，占领会昌。之后返回瑞金。

8月31日 主持中共前委会议，讨论南下路线问题。鉴于洛口至寻邬一线国民党军已屯驻重兵，而福建兵力空虚，且可利用水道运送大批伤员和枪支，决定取消原定由寻邬入东江的行军计划，改为绕道长汀（汀州）、上杭入东江。

8月 和李一氓^① 介绍郭沫若^② 参加中国共产党。

9月初 根据贺龙从南昌起义到会昌战役的表现和本人的要

① 李一氓，时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团秘书长。

② 郭沫若于八月三日在九江得知南昌起义消息后，和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赶赴南昌参加起义军。

求，和周逸群提出同意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共前委通过这一提议，由周逸群、谭平山作介绍人。

9月5日 随起义军进抵福建长汀。在此休整两日，筹办给养。

在长汀期间 致信中共中央，报告起义军撤离南昌后进行瑞金、会昌两战役的经过，说：“经此两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提出“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促请中央电告共产国际在起义军取得潮汕后，设法支援经费和枪炮弹药，并电告广东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

△ 主持中共前委会议，详细讨论攻取东江的计划。周恩来和叶挺认为潮汕国民党军兵力空虚，地势无险可守，预计可不战而得，如先以主力取潮汕后再折回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迂缓，从而使国民党军有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攻击起义军的可能，因此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但因多数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都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的国民党军，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以便尽早得到休息和共产国际接济，遂按此实行。

△ 为应付外交，革命委员会决定仍沿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并讨论了财政政策问题，镇压了当地的土豪劣绅。

9月9日 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10日 和彭湃率领一团起义军沿汀江先行进占上杭。在听取中共福建党组织负责人罗明等人的汇报时说：当前是要打到潮汕，和海陆丰农民斗争汇合起来，建立革命政权和根据地。要

求地方党组织协助起义部队做好后勤工作。并指示部队留下五六十条枪，要他们在闽西组织武装斗争。还接见了永定县党组织的张鼎丞等。

9月中旬 在上杭休整期间，出席在第九军军部召开的政工会议，提出整编起义军的设想，拟到汕头后，将起义军的名称改为“中华革命军”。此外，革命委员会在讨论土地政纲时，作出决定：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后又按照中共广东省委送来的政纲，改为没收五十亩以上地主的土地。

9月19日 起义军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按照长汀会议的决定，兵分两路，由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留守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的钱大钧部。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进军潮汕。

9月23日 起义军在与驻守潮汕的国民党军王俊部短时交战后，进占潮州。

9月24日 率起义军先头部队进驻汕头。随即着手布置驻防警戒，肃清反动分子，维持社会秩序，并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张贴革命标语，宣传土地革命政纲，开展民众工作。其后，成立市革命委员会，赖先声为委员长，郭沫若为海关监督和交涉使，李立三为公安局长，彭湃为东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

9月25日 出席汕头市人民欢迎起义军大会并发表讲话。

9月26日 张太雷奉中共中央之命到汕头，召开南方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前委的指示，要求取消起义军原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改为苏维埃，将军队开往海陆丰，会合当地农民武装，改组为工农革命军。并布置张国焘、李立三、谭平山等离开部队，起义军一切事宜由周恩来负责处理。周恩来表

示目前军情紧急，一切变更要待击破汤坑之敌后，方能实施。会后，赶赴前线部署作战计划，随后返回汕头。

△ 因筹办军饷，起义军未能按预定计划行动，延至本日始向揭阳集中。

9月28日 起义军在揭阳北部的山湖地区，向占据有利地形的国民党军王俊部发起攻击，初胜；后与前来增援的陈济棠部激战两昼夜，歼国民党军三千，但因力量悬殊，伤亡严重，无力再战，三十日向揭阳退却。

△ 国民党军在“飞鹰”号军舰的炮火掩护下，在汕头强行登陆，袭击革命委员会驻地。周恩来指挥战斗，将其击退。

9月30日 国民党军黄绍竑部进攻潮州，起义军抵抗至黄昏后突围。

△ 晚，主持召开中共前委会议，决定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会后，带领一连人前往揭阳方向，接应从前线撤退下来的起义军部队。

9月底 患恶性疟疾，连日高烧。

10月3日 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流沙，同先期撤到这里的革命委员会机关会合。在随后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作报告，宣布今后不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并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行动方针：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编，向海陆丰撤退，帮助农民开展斗争，作长期革命斗争准备；其余人员分别由海口撤退，转往香港或上海。自己不顾病重，坚持随部队行动。

△ 会后，率起义军向海陆丰方向的云落前进。行至莲花山时，遭到从乌石赶来的国民党军陈济棠部的拦腰截击，虽经周恩来和贺龙、叶挺组织反击，仍遭致溃败，大部损失，一部突围进

入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随后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10月5日 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指挥下，经与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激战后突围转移，抵饶平县。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闽、赣、粤边，转战到湘南地区。

10月上中旬 同起义军主力部队失散后，和叶挺、聂荣臻等率领警卫部队赶往海陆丰。途中病重，有时昏迷，无法行进，遂令警卫部队赶往陆丰的金厢镇集中。自己则和叶挺、聂荣臻等在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的陪同下，到陆丰县南塘区黄厝寮村休养治疗。在此期间，还向陆丰县委农协提出开展今后斗争的建议。后在杨石魂护送下，和叶挺、聂荣臻从金厢镇的渚村乘小船，飘泊两天一夜，到达香港。

10月中旬 宁汉战争爆发。

10月中下旬 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住所养病。曾参加当时在港的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

10月23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于十八日决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后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的经验教训。本日，中央致信南方局并广东省委，通知周恩来务必于十一月七日以前赶到上海出席会议。

11月上旬 从九龙深水埗乘船到达上海。

11月9日、10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通过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不断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并由此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各地普遍举行城市暴动，并“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形成

“左”倾盲动主义。会议还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政策，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受到警告处分。会议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1月14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在中央常委下设立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出版分配、会计等科以及妇委。并决定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罗亦农为主任。随后，因罗亦农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武汉指导工作，由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

11月17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广东和北方工作等问题。在发言中提出为配合东江农民暴动，二十五师不应回湖南，要在东江增加反抗力量。会议通过周恩来代表组织局提出的两项提议：由张太雷、恽代英、张善鸣、黄平、陈郁、黄谦、周文雍组成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和取消中共北方局，派蔡和森为北方五省特派员兼顺直省委书记。会议还讨论通过由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利用国民党粤、桂系军阀对广东的争夺，“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并指示退在江西信丰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即第二十五师）宜迅速使之开往老隆、兴宁、五华一带，与当地农军会合，以开展五华、紫金等县的农民暴动。

11月27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等问题。在发言中提出：党对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应有一明确的认识。共产国际过去对许多问题

未有明了的认识和肯定的指示，国际反蒋的决定也是很迟的。叶贺事件是逼出来的，不是事前有一个具体的坚决的政策。这些问题一定要弄清。

11月29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职工运动决议案时提出：目前是如何发展经济斗争，反对黄色工会的问题，要说明各地过去忽视职工运动是主要的毛病。并提出从团中央的任弼时、关向应、李子芬、刘昌群四人中至少调二人到党中央工作，由团中央决定人选。中央妇委由杨之华、邓颖超等六人组成。此后不久，任弼时、关向应到中央工作。

11月、12月 对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机关进行整顿。将原有的特务股改为总务、情报、行动三科，后又增设无线电通讯科，并展开各方面工作：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

△ 为使中国共产党适应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着手改变党的各级机关的活动方式，实行“机关社会化”、“机关家庭化”，并逐步建立健全秘密工作的制度。

12月1日 兼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委。

12月4日 自十一月扩大会议后参与中共中央领导以来，对于会议形成的“左”倾盲动主义，开始有所觉察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有所制止和纠正。本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讨论浙江省委议决的《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时发言说：这一布置恐怕太乐观了。其结果恐如江苏一样，民众终未发动起来。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致浙江省委的指示信，说：“你们上次的暴动计划因为太不切实故中央未予核准”，“但中央非取消了浙江暴动”。信中指出浙江“各县农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

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强调浙江省委今后的工作重点在于：一方面须努力于党和工会及农民间组织的迅速恢复或建立，一方面须指导这些已建立或将建立的组织，发展广大的乡村游击战争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争。这一斗争必须是群众的，然后才能发展到暴动的局面。并指出浙西“只要有可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可以创立起来的”。

12月6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党团关系时，批评共青团内存在的先锋主义倾向，说：上海党部近来实在有点军事投机——冒险，为的是怕共青团说是机会主义。如不严重注意，共青团将变成冒险主义，走到虚无主义之别一面去。共青团大部主张实验，即失败亦不要紧，也是孤注一掷的错误，这与“一暴成功”是两个极端，这个危险可以牺牲许多同志，此点要注意。并针对江苏省委提出的全省暴动定于明年元旦前后，江北江南一齐动的计划，说：日期不应如此定，要看预备的程度来定。是否乡下同志有非暴动无出路的观点呢？七日，中共中央致信江苏省委，指出：“冒昧地定了一个全省或无锡等地暴动的日子，于发展农暴有碍”，“定期暴动的条件是应该在统治阶级趋向崩溃、群众斗争加紧时的必要根据上”。“现时江苏各县最切要的工作便是发展这游击战争，有些地方如无锡、常州、宜兴这一区域便可从游击战争发展到割据的暴动局面。”

12月11日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张太雷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在广州举行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三日，起义失败。

12月13日—15日 连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讨论广东问题。在会上提出要加紧湖南、湖北、江西的

斗争，扩大暴动局面，海陆丰应向北发展，琼州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的局面，建立交通网，恢复各地关系及已损失的工作。并提出派自己去广东开展这一工作。但因中央工作离不开，会议决定派李立三前往广东，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事宜。

12月16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江西问题时说：江西农运还是群众自发的初步的斗争，应加紧宣传，使农民明了土地革命的意义。提出：江西的发动太单调，纯粹农民式的，最大缺点是城市工人太弱，军事计划也太早了一点，要注意到无动不暴的危险。并提出第二十五师不一定到赣西南，应根据实际情形而定。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告以第二十五师今后的行动方针，说：“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并派军事科科长李鸣珂前往送信。

1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安徽省委的指示信。信中提出在安徽省长柏文蔚下属部队中筹办学兵团应采取的策略：“我们同志对外态度开始工作可灰色点，以求握得实权而不致立即为人所忌遭人排挤”，并强调指出：党团组织在学兵团中须绝对秘密，以连为单位组织支部，彼此间严禁来往。

12月24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取消原定的当唐生智在宁汉战争中败退时，湖北省立即举行暴动一事。周恩来在发言中说：估量时局，共青团实有无动不暴的意见，可见他们的暴动观点并未成熟。会议确认：在唐生智溃退时，因革命主观力量薄弱，武汉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罗亦农对于湖北的政治指导并没有犯机会主

义的错误。

12月29日、30日 连续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硕夫（尹宽）和福建临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凡是斗争就认为暴动的观念要纠正过来”，“暴动这一个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至若城市工人带有武装性的斗争，或是乡村农民非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都不得谓之暴动”。并强调“城市的暴动必须与乡村的暴动相衔接”。

1928年 三十岁

1月1日 和瞿秋白、罗亦农、王若飞、李富春、任弼时一起同陈独秀谈话，交换对中国革命的意见。

1月2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陕西省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对于新旧军阀应取同样的失败主义。提出兵暴时机成熟的条件是：（一）驻地附近要有群众运动，要有工农的坚强组织；（二）要有党的指导；（三）要能造成一个暴动的割据局面；（四）要较有胜利把握。强调如果条件不成熟，宁可迟缓一点动作，竭力使这些条件中的主观成分达到成熟境地。万一环境不相宜，亦可采用移动的方式到农运发达的地方去参加农暴。

1月3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湖北问题时说：两湖工作很严重，在布置暴动的工作上缺点太多。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长江局反对马上暴动是对的，“估量总暴动的时期，不能单只看到统治者的崩溃，尤要注意工农群众革命的高潮和主观的力量”，“如果不顾及这些条件，单纯的拿统治者崩溃来决定爆发总暴动，是有玩弄暴动的危险的”。会议决定湖北应迅速发展游击战争到割据的局面，并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李维汉为中央巡视员到武汉巡视，停止原定的两湖年关总暴动，并对两湖的暴动重新加以部署。

1月6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发言中说：

中央对暴动问题是一天一天清楚的，湖北问题对暴动的认识是有帮助的。长沙的暴动，我第一天即觉是过早的。过去的观察是浅薄一点，现在对暴动的认识要更清楚些。所以不是更正过去的问题，而是要有一个更明显的解释。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我的观点是：客观条件的充足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暴动的布置及区域问题。同时只靠客观条件是不够的，主观条件也要重视。两湖客观上肯定要继广东而开出一个新局面。主张在强有力领导的情况下，派贺龙回湖南。

1月8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浙江问题时，指出：浙江在各地斗争尚未发动起来的情况下，就订出四县联合暴动是错误的，浙江不应每次都把暴动列为第一议事日程，而应普遍地发动农民的斗争。在讨论两湖问题时，提出湘西特委是很重要的，要派一批人去，造成割据局面。会议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会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同周逸群谈话，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要他们组织湘鄂边前敌委员会，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并派卢冬生护送前往。三月下旬，贺龙等在湖南桑植组织工农革命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福建临委信发出。信中针对其准备在闽南发动暴动一事，指出：“你们现时所决定的暴动条件，既缺少主观力量的估计，又没有农民群众激烈斗争的事实，这样子便冒然说‘闽省的暴动条件已十分成熟了’，实在是一个错误。”“斗争还没起来，暴动便先决定，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弄暴动。即使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农民由激烈斗争中已发展到最高形式，而党的主观力量还一点没有或有而不能发生领导作用，党在此时还

应先加紧党的工作，发生领导作用，然后才能谈到暴动。”要求福建临委做极艰苦的群众工作，依照闽省各地实际情形定一个由斗争发展到暴动的工作计划，切实地督促各地党部执行。

1月10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为组织局主任。

1月11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发言中提出：少年先锋队作为体育式的组织不适宜。目前主要的是弄工农的武装，由党团合起来做。会议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告湖北同志书》。文中指出：主张在武汉三镇马上暴动，这不仅是一个错误，且系玩弄暴动，工人群众的斗争和组织力量都很脆弱，推翻统治军阀夺取政权的决心还未成熟，假使硬要暴动起来必致成为徒然的牺牲。强调武汉暴动问题“足以给各省党部尤其是指导机关一个经验上的教训”。

1月16日 李立三在月初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指导广东省委召开全体会，检讨广州起义失败问题。会上他批评省委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并处分了许多起义领导人。本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在发言中表示：这次省委会议对广州暴动的认识太粗浅了，省委这种指导的影响是很坏的，对同志的严厉处罚是不对的。会后，根据会议的决定，于十八日和二十五日连续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省委指示信，指出：中央坚决不同意省委全体会的根本精神和主要结论，这次省委会的根本错误在于将省委会讨论和注意的中心寄托在查办当事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这一问题上去，太侧重主观上的责备而忘记客观的困难，表显一个极不正确的指导和估量。指出广州起义失败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党的力量薄弱，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南昌暴动是结束了国共合作的

最后一幕，广州暴动则开创城市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第一次实现！”

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信中强调“暴动要从各地的斗争开始”，而“现时浙东的情形还是一个暴动割据的成熟局面。省委的指挥必须注意于各地斗争的不断发动，千万不要因为有一两处有点类似暴动的机会，便立即准备一个暴动割据的布置而忘掉从斗争到暴动的不断发动”。信中具体指出奉化忠义乡的斗争，“本可由斗争的逐渐扩大成为武装的游击战争以达到暴动”的。

1月27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广东、浙江问题时说：北江暴动计划中“奖励自由杀人焚屋”的精神是很不好的。奉化暴动的决议是不正确的，因为奉化过去并无大的斗争，农民情绪亦不甚好，暴动的条件并不充分。

△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发出。信中说：中央认为广东全省暴动的布置除海陆丰的发展、北江的发动以外，应特重琼崖的割据，中路的斗争，西江的响应，以及香港、广州工人斗争的发动。强调“在暴动割据的局面中，省委要十分注意于工农武力的创造”。

· 1月28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江西省委信发出。信中批评“省委计议在南浔路沿线举行暴动并造成割据的局面”的布置不妥，指出在“南浔路路工、九江城市工人、南昌工农群众的斗争，尚未达到剧烈的发展，兵士运动尚没有成绩的时候，这一沿路暴动必致流产，必致引起统治军阀更残酷更广大的屠杀，必致影响全省割据的发动而削弱了党在南浔路一带的力量”。强调“南浔路及九江、南昌的暴动，必须在全省割据的暴动逐渐汇合的时候，益以客观主观的条件逐渐齐备，一个总暴动在一省的完成才能在南昌、九江出现”。

1月30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夏明翰汇报湖南工作。在发言中提出：在严重压迫之下，我们的工作非常困难，以前的方法是不够用了，要想出一些新方针。并再次对广东实行“烧杀政策”提出批评，强调“屠杀问题不要过于蛮干，可多做点宣传”。会议决定调夏明翰加入湖北省委，王一飞为湖南省委书记。

2月2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广东问题时说：我们要改正的是政治路线的问题，工运方面要提出联合战线的口号，琼崖要注意黎民的工作。并建议：朱德部队既已到湖南边界，不宜回广东，在湘南发动暴动也是好的。

2月8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云南临委信发出。信中强调目前云南“不能空想一个总暴动之来临”，“暴动的发动是要在工农群众继续不断的争斗中才能产生，暴动的时期也要依着环境情形、斗争程度、革命情绪、组织力量如何而定，决不能在斗争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便预定一个期限认准三月后便可发动暴动”。要求云南临委要有重点地艰苦细致而又谨慎地发动工农斗争。

2月12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召集的政治谈话会，讨论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量问题。在发言中针对认为目前革命潮流是低落的看法，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发生的观念不但是低落而且会悲观，如仅看到主观方面的损失而未看到敌人的损失和动摇是不对的。广州暴动对各地工人是有影响的，工人的自发斗争并未停止过，农村割据方面还在继续发展。扩大会议后，中央的政治的确是进步的，自然很多地方有盲动现象，对此中央仍在奋斗，但我们不能因为政策及运用政策的方法而怀疑到革命潮流是在低落，这是不正确的。

2月16日 和瞿秋白一起同张国焘、罗章龙、刘少奇、汪泽

楷谈话。在发言中说：中国革命是不平衡的发展。我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是高涨的。暴动是要在革命潮流高涨的前提下才能做成。割据有长时间的可能，我们应有长期的准备。

△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福建临委信发出。信中批评临委对形势的过高估计和急于举行暴动的布置，指出：福建目前总的任务是发展城市工人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领导乡村农民自发的斗争并谋扩大，指导他们以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土地革命的政纲，由日常斗争而达到工农暴动的割据局面，夺取政权，推翻乡村封建统治。

2月17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江西问题时说：要在江西各处形成割据，预备一个总暴动是对的，但立刻就要定期举行一个总暴动而不顾湘、鄂、粤三省是不对的，要立刻夺取政权也是太乐观了，目前是一个准备总暴动而深入割据局面的前途。

2月19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广州起义和总政策等问题。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中国现在革命的发展，事实上形成特殊的方式：‘农民割据’”，同时“这种割据局面必须发展大城市的中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要在这上面表现坚强起来”。

2月20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发言中说：立三提出的在党的指导机关中把知识分子的作用降到极小限度的意见是不对的，党的改造是一个积极无产阶级化的问题，对知识分子也应领导他们无产阶级化。

2月2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议决案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

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高潮，但是，“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强调党在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纠正“工人阶级某种成分之中的盲动主义”，“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同时“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

2月27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上海问题时提出：上海要用新的方法来接近工人组织，工作既不是退让、保守的，但亦不是仓促的。和罗亦农提议要老老实实开始党组织的改组工作，准备作长期的斗争。并开始进行党员登记工作，不怕少，只要质量好。会议决定由项英、王若飞、李富春、徐炳根、黄平组成江苏省委常委，李硕勋代理浙江省委书记。

3月5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土地问题时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是有碍的。没收自耕农土地重新分配，至少要在夺取一省政权后才能提出并实行。现在有许多地方不可能做到。

3月9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两湖问题时说：湘鄂赣边界的割据区域要连贯起来。朱德军队要坚决留湖南，向茶陵发展为好。毛泽东的部队还是在遂川。军队的调遣由两特委协商。十日，中共中央致信湘、鄂、赣三省委：“湘东特委与赣西南特委必须经常发生密切关系，如将来在这些地方的割据将会合时，临委可以决定此两特委合并归湖南指挥。至毛泽东的军队之分配应看两特委之需要由两特委共商调遣，不必专于死板的决定其驻在某地。”

3月12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江苏问题时提出：江苏最近的工作，总的政策方针依然是经过艰苦的

工作发动小的斗争，改造党，然后再进到大的斗争。

3月中旬—4月中旬 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所作的错误结论和惩办做法。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充分肯定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和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出的革命精神，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敌强我弱，未能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又未及时撤退转移农村。同时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批评，并宣布撤销原来省委对起义领导人的处分决定。

△ 指示中共广东省委组织营救在香港被捕的广东省委书记邓中夏。不久，邓中夏获释出狱。

△ 对广东省顺德、广宁、英德、琼崖、曲江等地的土地占有、地租、雇工等情况进行调查。四月三日，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在四日给中共中央关于广东省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省委已近于集体指导，虽中经挫折和破获，但较前确大进步”。

4月中旬 返回上海。

4月15日 在罗亦农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后，当即组织营救，未获成功。二十一日，罗亦农在上海龙华遇难。后周恩来指示特科人员惩处了叛徒。

4月28日 自大革命失败后，在指导中国革命特别是各地农村游击战争的实践中，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中城市与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性。本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刚收到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在发言中说：中国革命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由此发生一个不平衡的发展问题。过去城市工作的的确不好，但在中国很适宜地配

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致引到乡村的等待，这是不好的。我们在乡村的工作还不够，如建立红军等，但配合不匀，城市领导非常之弱，也是事实。我以为现在是加紧配合工作，但各地自发的斗争，我们还是要领导。关于革命潮流问题，中央认为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但不是一个最高潮。会议决定起草一通告，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4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第四十四号通告，表示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通告指出：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的群众组织，巩固并健全党的组织，以与白色恐怖奋斗，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也是准备工农总暴动胜利的必须条件。至此，“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4月 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中共中央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4月底（或5月初） 因郭沫若、成仿吾即将出国，约见阳翰笙，派他和李一氓到创造社工作，充实和发展这块阵地，开展文艺战线的革命斗争。他们去后，办了两个刊物：《流沙》和《日出》。前者表示纪念流沙的失败，后者表示太阳又出来了。

△ 装扮成古董商和邓颖超从上海出发，途经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由满洲里转赴莫斯科，筹备并出席中共六大。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经沉着应付后脱险。

5月16日 参加部分六大代表在莫斯科召开的南昌暴动讨论会^①。在会上发言说：南昌起义后，当时情形造成了回广东的条件。起义军南下采取的路线，走赣东可能阻碍少些。在会昌是需

① 此会在三月十四日开过一次，周恩来未参加。

要解决黄绍竑部的，后来应该出寻邬。主力下潮汕是错的，到汕头后忽略了军事。

6月3日 在莫斯科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起草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济难国际的财政预算报告。报告中说：最近国际帝国主义图谋瓜分中国更急，日本已开始其端，国内正将掀起反帝的新潮而有待于我们党的加紧工作，为此申请给中国革命以物资援助。

6月6日 同联共（布）军委代表讨论中国革命中军事的中心任务、红军的建立、编制、军队中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等问题。

6月7日 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召集已到莫斯科的近六十名六大代表开谈话会。会议讨论了政治、组织、职工、农运等决议草案的起草问题，确定六月十二日前后成立大会秘书处和各个委员会并开始工作。

6月9日 斯大林同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谈话，分析论述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等问题，说：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创建红军，如果能够把参加农民运动的人们争取过来，并且集中部队打下几个城市，那末，这将对今后的局势有更大的意义。并强调说：在任何时期，农民都是不能领导工人和革命的。革命必须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

6月14日、15日 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召集政治谈话会。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黄平、邓中夏、向忠发、王若飞、张国焘等二十一人出席。会上，周恩来和王若飞报告了陈独秀拒绝来莫斯科出席六大的理由和意见。会议围绕对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过去的经验教训和党在今后的任务方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6月17日 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会议初步通过大会主席团、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名单等，并作出大会有关规定，强调大会应以能切实解决一切重要问题为原则，尤应减少各种琐碎问题的争辩。

6月18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大会对在中国革命中死难的烈士表示哀悼，通过了大会主席团、秘书长、副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周恩来为主席团委员、大会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

△ 出席主席团会议，讨论大会各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参加政治、组织、土地问题、苏维埃、军事、青年、财政审查等七个委员会，并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

6月19日、20日 出席大会，听取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和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此后，参加分组讨论。

6月27日 在大会发言，谈到中国革命的性质时说：共产国际取消罗米纳兹应用到中国革命的“不断革命论”，这是很对的。因为它一方面很容易与托洛茨基的错误相混，另一方面也没具体说明目前革命阶段的特质。在谈到革命形势时，强调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并针对会上对高潮和高涨的争论，说：这样字义上的抽象分别，我想工农是不会明白的。其实高涨也罢，高潮也罢，我们虽然不能说目前革命是高潮，的确也说不到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向高潮、高涨方面的前进，我们对于这一点是深信无疑的。在谈到党的主要任务时指出：要夺取千百万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促进革命高潮的到

来。在目前就应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

6月30日 向大会作组织问题报告。报告回顾自五大以来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指出：自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但革命并没有失败，共产党人在“英勇的长期的反抗中重新得到新的力量的结合”。报告指出目前组织工作存在的问题：（一）党的无产阶级化问题；（二）支部生活不健全；（三）组织上的错误倾向——命令主义、盲动主义、极端民主化、惩办主义、反知识分子倾向等；（四）不注意执行保密制度；（五）命令群众而不是说服群众，党代替了工会、农会。报告提出今后党的组织任务，说：我们必须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战斗的革命党。要求地方党对建立红军和乡村苏维埃的工作予以极大的注意。

7月3日 向大会作军事报告。报告总结党自从事军事活动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为了联合战线而仅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始终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二是南昌起义失败后，“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事实上将取消军事工作”。报告强调指出：“目前任务在夺取成千成万工农群众，在军事方面，开始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工作”，秘密组织工农武装，加强敌军工作，特别是士兵工作。报告专门论述了建立红军的问题，指出红军的来源应包括游击队的扩大和军阀军队的倒戈，一定要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方能有巩固的红军组织。红军的建军

原则是：改变雇佣性；军官要无产阶级化；一定要有政治工作。总之，“在中国军事新局面上，武装暴动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在准备武装斗争（中），军事力量是主要原素”。

7月9日 出席大会。会议修改通过《政治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

7月10日 出席大会主席团与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报告各代表团对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预选结果。随后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

7月1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并致词，说：这次大会是空前未有的。为求得革命的真理，得到了很多的批评。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在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我们有了正确的路线，还要把大会的精神带到工作中去！

7月17日—9月1日 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资格审议委员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大会通过《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提出目前处于“第三时期”的理论，认为“这个时期必然要通过资本主义稳定中的各种矛盾的不断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提出“目前时期应为积蓄群众力量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的阶段”。

7月19日 出席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会议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七人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五人，候补

委员三人。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在讨论布哈林提出的由瞿秋白、张国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问题时，周恩来提议：他们驻国际应是短期的，并应（一）在短时间内为中国共产党起草出党纲；（二）将近几年中国革命的情况、斗争经验写成小册子向国内外宣传介绍；（三）将各国和国际革命斗争的经验介绍给中国共产党；（四）沟通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以及各国共产党的关系。

7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常委分工，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7月下旬—10月初 留在莫斯科，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办理六大各项未了事宜，并向正在苏联院校学习的中共党员传达六大精神。

△ 审阅中国留苏学生的档案，并同留学生逐个谈话，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介绍国内革命形势，征询他们对回国工作的意见。

△ 参加由共产国际监委会、联共（布）监委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审理陈绍禹等人控告的所谓“江浙同乡会”案件，查明并无此事，据此作出结论。

10月初 离开莫斯科回国。途经沈阳时，向中共满洲省委传达六大精神，并看望伯父。

10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定蔡和森对顺直省委问题负有责任，决定由李立三接替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决定周恩来继续为《布尔塞维克》编委。

10月 所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发出。决议案提出秘密党必须运用的六个条件：（一）要深入群众，

必须找正当在业人员。(二)机关要少而秘密，要职业化与社会化。(三)开会人数要少，时间减短，开会时尽量留一部分人在外。(四)指导机关集体分工，注意养成各级党部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五)全省交通网要有严密的布置，几个交通路线，要避免互相知道。(六)技术人员要尽可能减少，一切技术事件，尽量地保密。

11月上旬 回到上海，参与中共中央领导。因当时强调工人成分而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在实际工作中并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故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在此期间，常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机关——由熊瑾玎^①、朱端绶在云南路四四七号开设的福兴字号楼上开会研究工作。并经常到浙江中路一一二号由张纪恩、张越霞负责的中共中央及军委联络地点，同各地负责同志接谈，如云南的王德三、河北的张兆丰、浙江的卓兰芳等。

11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顺直省委领导间产生严重分歧，各级组织涣散，派别纠纷不已的问题。在发言中说：顺直残留的斗争直到现在，主要是缺少政治的指导。这点中央要特别注意。中央有一人去一下才好。不同意李立三提出的采取发展工人斗争，打击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意见，认为这样只能增加纠纷，主要的还是政治的说服，不应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会议决定新中央的工作计划由周恩来起草提出。

11月11日 中共中央为贯彻六大决议发出《告全体同志

^① 熊瑾玎，时任中共中央会计，以商人身份，和朱端绶组成家庭，掩护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

书》。周恩来撰写其中第四部分^①。文中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并具体分析当时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个人意气之争、小组织倾向、工学界限、雇佣观念等错误表现，提出要加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提高党的政治理论水平，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坚决地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

11月13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军事部致南路军的指示信发出。信中传达六大精神，对兵士组织工作给以指示，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行动的口号而是宣传的口号”，“我们今后的工作，无论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或军事工作，都应根据这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总的路线做去”，“要很艰苦地深入群众发展党的政治影响，树立党的群众基础，领导群众斗争，扩大群众组织，才能更有利于革命高潮的到来”。

1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职工运动委员会由项英、罗登贤、周秀珠、王克全等组成。妇委由项英、周秀珠、邓颖超、彭湃、蔡畅等组成。特务委员会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

11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李维汉、康生和团中央一人组成委员会巡视上海工作，以周恩来为主席。

11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顺直省委

^① 即《周恩来选集》上卷中《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一文。

问题，认为他们停止省委职权的做法是错误的，决定周恩来到顺直巡视工作，张金刃（张慕陶）参加顺直省委工作，韩连惠仍任省委书记，恢复省委职权，改组省委常委。在讨论上海问题时，周恩来说：群众要求罢工是实在的，问题是在工作方法，现在危险的可能性还要估量得多一点，以后不要专门在罢工上做文章。

11月28日 和李维汉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发出。报告说：中央当前工作主要是肃清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残余，在争取群众的策略上和工作路线上不断纠正各地党部或“左”或右的倾向，以推进革命的微波走向高潮。强调“目前对于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的策略是从小斗争的胜利中求扩大，纠正只注意扩大的盲动精神”。在报告各地工作时说：安源工人运动开始复兴起来，“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

△ 布置张沈川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之后，由张沈川培训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参加学习的有李强、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等。一九二九年冬在上海建立起第一个地下无线电台。同时派李强、黄尚英到香港设立分台。一九三〇年一月两台开始通报，沟通了中共中央与南方党组织的电讯联络。

12月 应湘赣边区要求，指示中共中央军事部和组织部，派出三十名工人出身的党员，前往湘赣边区担任党代表。

12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上海电车工人罢工问题时，强调一定要深入群众，要与非同志的积极群众接近，如此可以开辟一条工会的新路线。

△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发出。通告分析造成党员自首叛变的主要原因，提出消灭这种现象的措施，强调全党应以极大的努力注意遵守秘密工作

的纪律，“坚守‘深入群众’的口号，指导每个党员俱能从群众生活中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健强他的阶级意识和对革命的信念，使党真能生长在群众中而不是架空和脱离群众的组织”。

12月7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山东省委信发出。信中分析了山东的政治形势，指出：山东目前统治阶级的中心是日本帝国主义，只有工农群众起来直接行动才能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的统治。指示山东省委要把争取群众的工作作为主要任务，同时要加紧反帝运动，要使这一运动能与工人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唯一的领导。

12月11日 受中共中央委托，到达天津，解决顺直省委问题，指导北方党的工作。在津期间，先后参加省委、区委、支部的会议，召开谈话会，听取各方面意见，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方针，多方做工作。在此基础上，召开顺直省委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的精神在会上作报告，指出：必须积极到群众中工作，从参加和领导群众斗争做起，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正确出路。说服大家接受了中央的意见。会议决定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解决这一问题。十七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报告工作情况。并利用会前的时间，前往唐山，召集矿山同志会、铁路同志会，考察下层群众的实际生活与工作情形，以备作决定工作计划的根据。

12月18日 在中共顺直省委机关刊物《出路》第二期发表《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几个问题的回答》一文。文章分析顺直党的历史及现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顺直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的看法，强调指出：顺直党内固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顺直党的旧基础还不是全要不得，也不须立即解散，“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

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生新的斗争”。文章还针对顺直党内存在的模糊思想认识，具体分析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

12月底 出席在天津张庄大桥秘密召开的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这次会的总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陈潭秋^①、刘少奇^②也分别作了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准，会议恢复顺直省委职权，并改组省委常委和京东党组织，开始扭转顺直党组织的原有状况。

① 陈潭秋，时任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宣传部长。

② 刘少奇，时任中共顺直临时省委组织部长。

1929年 三十一岁

1月1日 所撰写的《各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形势》一文在《布尔塞维克》刊物上发表。文章分析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和由此产生的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指出：“在帝国主义彼此间，在中国统治各阶级彼此间，矛盾虽然存在，冲突虽然加紧，未来的大战虽然必不可避免，但我们切不可忽视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结合的力量现在还是比革命力量（工农兵士贫民）大，他们对革命的压迫和摧残现在还是一致。”因此，共产党“不仅要看清了敌人——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的将要到来，并且更应针对着这一加重革命危机的矛盾，执行争取群众，加紧群众斗争，团结的正确而更有效的策略，以准备并促进这一革命高潮来到时的伟大胜利”。

1月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政治局下设立军委，同时为加强江苏工作，决定由中央兼江苏省委。这一决定引起江苏省委的强烈反对，省委随即召集各区书记联会，报告中央与江苏省委纠纷经过，并向来沪汇报工作的部分省委负责人进行反对中央的宣传。

1月11日前后 由天津返回上海。从李维汉处得知中共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决定，感到不妥，即找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要求中央政治局重新讨论。

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江苏问题。在发言中提出中央兼江苏省委的作法是危险的：（一）必然减少中央对全国的政治指导；（二）并不是深入群众的好方法；（三）妨碍中央本身工作，使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许多危险。主张解决江苏省委问题的办法是加强区委，改组省委。会议决定由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组成特别委员会，重新研究解决这一问题。

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江苏问题。在发言中认为江苏省委违反组织原则的活动，是党内无产阶级基础薄弱的必然结果。强调指出：目前中央政治局负的责任十万分的重要，需要一个坚强一致的中央才能指导全党实现六大任务。如各地同志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上来与中央讨论问题，而仅从个人的不正确的倾向上来反中央，实是一条死路，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七点办法。经过周恩来的说服，向忠发、李立三放弃原来的意见。会议决定中央不兼江苏省委，待江苏问题解决后，改组省委，由中央政治局派出部分同志参加省委，同时加强各区委的领导。

1月16日—24日 和向忠发、项英出席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江苏省委会议，解决省委与中央对立的问题。十九日，江苏省委通过决议，承认错误。

1月18日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起草《中央关于党内宣传派别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指出：最近江苏省委“扩大此种宣传以号召省委与中央对立”，这“在目前党的艰难困苦转变的时期于党有极大的危害。只有在六次全国大会的精神之下以无产阶级最高原则铁的纪律与党的一致才能战胜这一危害”。同时指出：“主要的是以教育的方法开始在全党内做改造的工作——这是目前党内急迫而又长期的中心任务。”

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河南问题时提出：冯玉祥是代表中小地主与大地主对抗，接近民族资产阶级，在某些方面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但不可以此忽略了根本。

1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鉴于江苏省委已接受中央的批评，承认了错误，决定改组江苏省委，由罗登贤、李维汉、彭湃、徐锡根、康生组成省委，罗登贤为书记。二十五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苏省委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在报告中强调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党内并没有原则上不同的派别。对中央的缺点错误，省委可以讨论，但应在组织原则以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

1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国内政局和阶级关系问题时说：现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虽然得到暂时的妥协，但并不是实质的调和，他们内部的冲突必愈加紧。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1月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蒙委信发出。信中对蒙委的活动范围、工作对象、民族政纲、对内蒙国民党左派的策略、蒙汉被压迫民族的联合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强调“内蒙民族运动，应确定为蒙委主要工作之一”，要争取广大蒙汉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推动民族运动的发展。

2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军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于一月中旬撤出井冈山以后的行动方针。会议听取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关于红四军遭到强敌尾追的报告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作出分散红军，隐蔽大的目标，调朱德、毛泽东出来的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指示信。

2月5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信中指示省委在领导抚顺铁厂工人的斗争中，应注意“与全国反日运动联结

起来”，“要有计划地忍耐地去建立基础工作，千万不要因这一斗争的发展，便急切不顾一切地作孤注的一掷”。

2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组织秘密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向忠发、余泽鸿三人组成，周恩来为主席。会议通过周恩来修改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军事化的通告。通告针对大多数党员不懂军事的状况，强调军事工作对整个革命斗争的重要意义，提出“以实现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做整个军事工作的核心，整个军事工作能否做得有力，完全要视党员军事化的程度以为断”。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夺取工农群众的中心工作的同时，开始实行有系统的军事政治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通告还提出了实行军事化的具体方法。

2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修改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信中分析国际国内局势，指出：目前党正处在困难的环境，但中国革命高潮仍是必不可免的要到来。中央依据六大确定的方针，决定有计划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同时强调说：“中央决不是要你们采取失败主义的精神，将红军遣散回乡，而是要你们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指示信要求朱德、毛泽东来中央，“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

△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中共中央，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前途，提出中共在目前的基本任务，说在当前情形下，特别危险的

是右倾，党内存在着合法主义、消极、妥协、动摇的倾向，“如果中国共产党不用警觉的激烈的自我批评态度来批评这一切右倾的错误和动摇，来加以预防，则右倾是会变成可怕的危险的”。

2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顺直、满洲、广东等省委名单。其中顺直省委常委由韩连惠、陈潭秋、张金刃、陆沉、郝庆宇组成；满洲省委常委由王立功、刘少猷、韩西平组成；广东省委常委由黄钊、陈郁、贺昌、聂荣臻等组成。

2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的发言中不同意李立三提出的“地主阶级‘蜕化’到资产阶级来领导资本主义”这一提法，说：中国资产阶级还是有独立发展的要求，但是无论对内对外都不可能实现，因为他是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不可能从与帝国主义的妥协中来发展资本主义，消灭封建势力，也不可能从与封建势力的妥协中来蜕化封建阶级。

△ 和李立三到医院看望病危的苏兆征。下午苏兆征病逝。二十六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电，报告此事，说：苏兆征死在工作中，实足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目前艰难困苦工作环境中奋斗不息的精神，中央决定通告全党追悼，并经过全总、济总在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尽力宣传。

2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提出党应在工会群众之中来发展，除赤色工会外，可以在有群众有下层组织的黄色工会内，以各种组织形式组织部分群众，当然这不是赤色工会，而是黄色工会里的左派组织，是中心分子的组织。

3月 蒋桂战争爆发。

3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分析当前党组织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说：目前党的

组织上的中心口号是深入群众。如果组织上不深入群众，政治上的争取群众就无法做到。党员不要环绕在党的机关周围，而要分散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党的机关主义必须打倒，头重足轻的办法必须改变。七日，在讨论组织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机关主义使下面的基础一天天削弱，上面工作反一天天加多，这样必然要使党走到崩溃的地步。要做到职业化、社会化，这是有关地方党部强健的问题，是组织上的一个中心问题。

3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政治问题的报告，指出：国内军阀战争主要是蒋桂的冲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着重分析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指出：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资产阶级只能采取摇摆于几大帝国主义之间的政策，同时与封建阶级既存在矛盾也存在妥协，这是决定资产阶级不革命的根本点。工农革命斗争的发展又使资产阶级本身有很多的恐惧，因此更要维持封建制度，严厉施行白色恐怖，同时加紧改良主义的欺骗。因此我们的策略不应很乐观，应加紧夺取群众的工作。

3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所起草的政治通告内容。在谈到目前党内存在的右倾思想时说：党的右倾来源不单是对资产阶级估量过高，还在于对工农革命斗争估量太悲观。这种动摇观念很容易从极左跑到极右，由反盲动主义又走到不动主义。如将自己看得不行，这不但是右倾而且是消极离开党了。这种分化一天天严重，要在政治上解释清楚。李立三提出：当前应特别注意右倾的危险。会议决定这一通告交李立三修改。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军阀战争的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通告在分析国内形势后指出：军阀战争本身并不是革命高潮，全国仍然没有总暴动的局面，目前工作的总方针就是要

在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中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通告提出既要反对盲动主义，又要反对不动主义，但“目前党的主要路线还在反对右倾思想”。

3月17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种直接革命的形势，故工、农、兵士、贫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强调在农村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农村苏维埃的重要性，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关于游击战争的发展区域问题，原则上“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并向他们介绍了朱毛红军中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经验，以备他们将来在部队建党时参考。

3月25日 就白色恐怖下如何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工作问题，起草中共中央致顺直省委并汪铭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必须改变目前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的状况。强调必须重视党的下层组织工作，杜绝只满足于建立空架子机关的现象。“各级党部的设立，必须其所管辖区域的下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有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并根据这一原则决定：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复和建立，山西工作改归顺直省委兼管。

3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二月八

日来信。在发言中说：国际训令的精神是正确的，指出目前在政治上组织上表现了右倾的危险。自然我们不能轻视了敌人，这也是危险的，可以帮助盲动的情绪。我们不但要反盲动，而且要防止盲动走入右倾。会议决定：全体接受国际训令，由周恩来起草一决议案。

3月31日 所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问题给各省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士兵运动必须根据目前党夺取群众的总路线，去做夺取广大士兵群众的工作。各级党部应尽量在各军队中找旧有线索，或选送自己的同志到军队中去当兵或任其他职务，设法组织发动兵变，领导他们走入农民斗争区域发动游击战争或投入红军。

4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向忠发起草的中央给朱德、毛泽东的指示信时发言说：朱、毛出来的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根据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红四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说的呆板了一些，不好困守到一个地方。会议决定该信由周恩来修改。

4月7日 所修改的中共中央致毛泽东、朱德指示信发出。信中分析军阀混战的国内政治局势，指出：“军阀战争客观上应当是助长革命发展的一个条件，但他本身并不是革命高潮”，“以为有军阀战争就一定表示着统治阶级将要很迅速的崩溃，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红军目前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并说：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

4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问题的通告。五月十六日，周恩来又撰写成《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一文，进一步阐释这一通告。文章分析

当时党内的思想、组织状况，在批评党内存在的和平发展、合法运动、公开主义等倾向后，指出：“党内左倾危险，也还易凭着党的组织弱点而存在，还需要党以极大努力消灭党与广大劳动群众脱离的现象，获得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并使之革命化，以战胜党内左倾的危险。然反对党内左倾危险绝不能掩盖了党内右倾危险的特别严重。”文章并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具体措施。

4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顺直省委信。信中分析蒋桂战争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各派军阀之间的相互矛盾，指出：深入反对军阀战争，扩大反帝运动，深入产业工人群众，建立产业支部，反对和平发展，这是顺直党目前主要而急迫的任务。并强调说：在已有了群众有了下层组织的黄色工会中，我们决不应采取站在黄色工会外面来笼统地反对黄色工会，以致使群众对立的办法。

4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唐山煤矿工人罢工情况，说：北方党组织存在两个极端的倾向，一是关起门来讲赤色工会；一是与国民党合作。他们现在是反对整个工会，不能正确运用黄色工会的策略，结果很容易引起群众的对立。我们应影响这些未加入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赤色工会的基础，同时在举行罢工斗争时仍应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在一起。

5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东省委信。信中针对山东党组织经过几次破坏后，少数地方出现畏缩不敢露面的倾向，指出：“这些明显的取消观念，省委必须以坚决的态度、艰难耐苦的工作精神与他们斗争。否则，山东党再经几次白色恐怖，便会退缩躲避到更加涣散的地步”，因此“反对党内右倾更成为山东党目前主要的任务之一”。同时又强调说：“现在反对这种右倾危险，决不

应如福坦^①所说山东省委曾有一站在左边以反对右倾的错误观念（即是宁可左点不要让他右了），而应站在正确路线上与各种偏向奋斗”。并指示山东省委抓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方面的工作。

5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修改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中央对国际二月八日训令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指示足以成为中国党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党目前“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这一右倾的危险绝不仅是继续着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而复活，他更有现实环境之不可轻视的基础”。“当然这还不是说中国党内右倾危险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形成，已经有了一个危险的派别，但依着他有可能的发展前途来看，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右倾特别危险。”同时又说：“另一方面，党内左倾危险自六次大会后虽逐渐失去了他发生的基础，但假使以为‘左倾’的错误已经完全肃清，那便等于容许这左倾的残余在党内存在，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同样要有危害。”

5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江苏省委在上海组织群众举行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的示威游行，并成立有李立三、项英、周恩来参加的行动委员会。三十日，周恩来、李维汉亲临现场观察指挥。

6月前后 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央组织部派遣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分别到鄂东北和广西，以加强红军和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6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国内局势时说：我们要特别注意形势，要指明斗争前途的开展是走向革命的高潮，但斗争是一步步地开展，一步步地走向革命的高潮，而不能怀过

^① 即卢福坦，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高的幻想，以为就是革命高潮的前夜。会议决定派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

6月7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农民问题致信中共中央。信中认为中国的富农“多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底代表人”，批评中国党“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最重大的错误”，要中共中央“极坚决地克服在富农问题中最有害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害怕富农‘退出革命’”，“甚至在这类富农参加抗税运动或反军阀运动的时候，也不应该向富农让步”。

6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复信。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形势估计悲观，分散红军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朱、毛如需改换工作，需派得力人来。周恩来认为，红四军前委批评中央对形势估计悲观“是不十分正确的，因为站在全国来分析不能如此”，同时表示中央二月来信中让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常委已决定召集一次军事会议，详细讨论各地红军问题，朱德、毛泽东处应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并建议征调一部分军事人才派往红四军。在谈到农村武装割据问题时说：目前农运问题客观上是忽略的，中国游击区域割据的形势是存在的，问题是要有城市的领导。城市工作一旦发展，割据局面一定可以发展到固定方面。而目前城市工作表现出主观力量之弱，同时客观上亦有许多挫折，不能太乐观了。

6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反对派问题①。

① 留苏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自一九二八年秋被先后遣送回国后，即开始在中国建立托派组织。一九二九年五月，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接受托派的理论和主张，反对中共中央和六大路线，打出反对派的旗号。

在发言中说：反对派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他们主要是找不满党的和被开除了的。凡理论上一知半解而又不懂实情的人，是易于走到反对派的。强调一定要在拥护中央路线之下进行斗争。并提出了政治、宣传、组织上的解决办法。

△ 中共中央致信贺龙并湘鄂西前委。信中指出：你们目前主要任务是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发动群众斗争，肃清反动势力，深入土地革命。关于“游击战争的战术，你们应从每一次战争中吸取经验，以作以后战争的指南”。并介绍朱毛红军总结的包括“十六字诀”在内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指出“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

6月22日 所修改的中共中央对陕西问题的决议案发出。决议案指出：虽然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因此不能过分估量目前革命斗争的复兴，然而新的革命高潮之不可避免的到来与革命高潮微弱的象征已经可以看见。陕西党目前总的路线，在于尽力扩大对群众的工作与斗争的领导，建立城市工作的基础，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从部分的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展到大的斗争，到农民的游击战争，以至于建立地方的苏维埃政权。

6月25日—30日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二十九日，作组织问题的报告。会议总结六大后一年来的工作，指出中央依据六大路线“一方面把党从削弱涣散的现象中挽救出来，得到重新巩固与一致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工作上也表现着党的进步，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了新的进展”。全会重申今后党应该继续执行六大规定的“争取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并规定了争取群众的十五项政治任务。

7月3日—19日 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第十次全会。会议通过《国际状况与共产国际的目前任务》的政治决议案，阐述“第三时期”的理论，提出中国“革命浪潮的条件无疑正在成熟，必将导致创立苏维埃，成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并强调“右倾的危险现在是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要“加紧反右倾的斗争”。

7月9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十号——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与精神》发出。通告在分析国际国内局势后指出：“依据目前的政治局势，益发加重了党之争取广大群众装备武装暴动的总任务”，提出了加强反帝斗争、加强对农运的指导、扩大并深入土地革命、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和建立红军等项任务。

7月12日 和向忠发一起同陈独秀谈话，交换对政治问题的意见。陈独秀批评中共中央三十四号通告^①“是帮助蒋介石的宣言”，坚持中国目前无封建阶级，南京政府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府。周恩来当即同他争论，指出陈的中心问题是忽略农民这一根本问题。南京政府的性质是豪绅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并指出国内已有反对派组织的活动，征询其是否去莫斯科。陈表示今年不能去，要把自己在政治上的意见写一个东西。

7月14日 所修改的中共中央致鄂东北特委信发出。信中批评鄂东北特委“在斗争口号及工作方法上，都完全充满了原始的

^①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三十四号通告，分析蒋桂战争的性质、形势、前途，提出了党的工作方针，指出：反对战争是目前中心工作，以为“蒋桂系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也就是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这是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

农民意识的精神”，强调目前要特别注意“由农民意识转变到无产阶级的策略，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着重城市，由英雄土匪式的乱动转变到无产阶级的政党行动，由无原则的军事烧杀转变到发动群众斗争”。同时指出：“我们党不要以为农民太多，不如此我们将要失败，其实，若我们不能领导农民，若不能使农民运动在无产阶级的路线之下而发展，则结果一定失败。”

7月15日 出席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一”国际反帝大示威行动委员会，派周恩来、项英参加行委，周参加行委主席团，不任书记，由省委推举一人为临时书记。

7月17日 鉴于国民党军张学良部占领中东路，并查封苏联远东贸易局、商船局等机构，中共中央就这一事件发出通告，指出：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7月底（或8月初）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事会议，与各地红军负责干部讨论研究红军的性质、发展方向、游击策略和组织机构等问题。六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报告军事会议的情况。

夏 派贺诚、柯麟以医生身份，在上海威海卫路开办达生医院，掩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活动，周恩来曾多次来此开会。

△ 主持举办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培训红军急需的军事干部及政工干部。九月，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央组织部派遣在训练班结业的许光达、孙一中到洪湖苏区工作。在向苏区培训输送干部的同时，筹划组织了对处于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下的苏区的物资支援工作，指示有关省委在苏区周围各县建立一批文具、百货、布匹、药材、电器店铺，向苏区输送物资，并逐步建立了中共中央

同各地红军、苏区的交通联络网。

8月1日 所修改的中共中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发出。文中高度评价红军转战湘、鄂、粤、赣、闽数省，深入土地革命，创建工农政权，扩大苏维埃区域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指出：这不仅在革命的历史上有伟大的光荣，而且在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前途上亦有很大的意义。号召每一个红军战士不仅要做一个革命的武装战士，而且要做一个革命的宣传员和组织员，继续努力奋斗，完成肩负的使命。

8月3日—5日 撰写《上海八一示威的意义与教训及今后的工作路线大纲》一文。文章肯定了上海八一示威活动，并总结了其中的教训，说：与不正确观念的斗争主要是右倾。在这次示威行动的前后，党中还表现有一些合法、调和、妥协、动摇、恐惧、失望的观念，党必须坚决地与之作不断的斗争。同时指出：“盲动主义的情绪，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这次行动中已逐渐减少，但还未能完全消灭，一些个人的脱离群众的英勇，个人的恐怖主义，还需要党严厉地予以纠正。”这篇文章在《红旗》第三十七、三十八两期连续刊出。

8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中共红四军前委内部发生分歧一事^①时说：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应和即将来中央的陈毅讨论后再作整个的回答。目前应去一封信，勉励他们，要他们努

^① 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党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发生争论，未能统一认识。会议改选了中共红四军前委，陈毅为书记。会后，毛泽东到闽西养病兼做地方工作。

力与敌人斗争，已解决的问题不应再争论，同时要批评他们不应有的消极观念。并提议把刘安恭^① 调回中央。二十一日，周恩来根据会议决定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信发出。信中指出：你们的任务首先是发展游击区域，加强农民武装，扩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对于目前三省“会剿”，“你们必须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这一战斗，来冲破这一狭小的局面向各方面游击骚动”，并且强调说：“凡你们经过之区，必须使红军不仅尽其作战的努力，还须成为广大的宣传队以发动群众联系，才能保障红色区域不至易被敌人包围和消灭”。

△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发出。通告阐述中共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原则分歧后，指出：“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险的企图，是布尔塞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故中国党除掉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8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农民问题的来信。在发言中说：国际来信的中心问题是富农，我以为六次大会的解释原则上并无错误，不过我们日常的指导多注意于富农的态度与策略的运用而发生了一些语病。今后在乡村中要加强对富农的斗争，但不要混乱了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在不违反这一主要内容之下来加紧这一斗争。会议决定起草一决议案接受国际训令。

① 刘安恭，时任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

8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你们在目前敌人四面包围中，主要的任务“是在向敌人奋斗”，“首先是：游击区域的发展，农民武装的加强，红军的扩大，而土地革命的深入更是根本任务”。还说：“红军扩充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地方武装上”，“武装农民实是扩大红军的前提”；“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目前环境中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军中党员农民占多数，“要多使之受到无产阶级的教育”，“趋于党的一致”。最后说，润之、玉阶两同志应“一致地努力工作”。

8月23日 就处理叛变分子问题，起草中共中央致山东临委信。信中指出：消灭叛徒，原是我党最后最不得已的办法，积极方面，我们还应从减少这种叛变与减少破获之可能性入手。强调说：严密党的组织乃是指深入群众与严整组织关系说。且只有在群众的工作建立后，党能掩护在群众中，则敌方不易于发现我们，破获我们。

8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等四人，因叛徒白鑫向国民党当局告密而被捕。当晚，周恩来主持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彭湃等同志和惩办叛徒的措施。

8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报告彭湃等人被捕事件。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兼中央军事部长，罗登贤调中央，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立三兼农委书记。

8月28日 在上海市郊指挥特科人员准备武装劫持国民党军警押送彭湃等人的刑车，但因准备不周，错过时机，营救未获

成功。三十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龙华遇难。十一月十一日，特科人员处决叛徒白鑫。

8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德、毛泽东之间争论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

8月31日 起草《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群众书》。文中愤怒声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当局屠杀彭湃等革命领袖的罪行，追述他们的革命业绩，号召“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们！起来！纪念着彭杨诸领袖之血的教训！起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坚决不断的斗争”。

8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工会中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共产党在目前阶段上的中心任务，是要领导和组织正在增长的斗争。同时，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党内各种对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倾向，这种取消主义倾向是右倾危险和十足机会主义的表现。要求中共“不顾国民党的法律，并且违反着国民党的法律而努力使赤色工会擅自公开起来”。

9月1日 就刘少奇、孟用潜被捕事件，起草中共中央致满洲省委信。信中指出刘少奇、孟用潜到满洲省委后的工作，“在精神上路线上迥与前异，的确创造了满洲党之斗争的精神”，并分析了被捕的原因和应记取的教训，强调要克服脱离群众的盲动情绪，指示省委要“用全力去营救”刘、孟二人。

9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建议改变目前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方式，每周开一次会，变更开会时间，专门讨论政治问题，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常委五人也要有一人保留在外。会议并讨论了陈独秀的问题，决定中央派人与共

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一起同他谈话，指出他一再违反党的纪律的错误。

9月14日 为纪念彭湃等烈士，撰写《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文章指出革命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他们将“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号召革命人民“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此文在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日彭湃等遇难周年时发表在《红旗日报》上。

9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湘、鄂、赣、豫四省的组织问题，决定要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致湖南省委、江西省委和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宣布恢复湖北省委，改组江西省委常委。并决定在贺龙游击战争区域及其附近设立湘赣边特委；彭德怀红军归赣委指导；方志敏部队受赣东北特委指导；鄂东北与豫南的红军统一指挥机关，属鄂豫边特委指导。

9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全总工作时，对共产国际八月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中公开赤色工会的指示提出疑问，说：目前客观形势不容许我们安稳地公开活动。只有在黄色工会之下争取多数转变为赤色工会，而不可能互相对立公开存在争取群众。

9月28日 在中共中央军事会议期间，和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会后，要陈毅根据会议和谈话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此信经周恩来审定后，要陈毅带回，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

清是非，作出决议。本日，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发出。信中分析军阀混战的形势，提出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红军的发展方向与战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并对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等，作了具体指示。信中批评了朱德、毛泽东各自在工作中的缺点，要他们及前委注意纠正。并要前委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

10月5日 陈独秀曾于八月五日致信中共中央常委，谈对中国革命的意见，称中共中央“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对“革命高潮过分的估量与宣传”，“在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等等，并把该信私下传播。本日^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理论作了系统的分析，指出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陷入取消主义的观点，完全背离了六大与中央关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同时违反党的组织原则，进行分裂党的小组活动，是“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决议警告陈独秀等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拥护中央的决议，肃清党内取消主义思想与一切反党的小组织”。

^① 一说为十月十五日。

10月8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要求广东党尤其是广西党在反军阀战争中打破对于任何一派统治阶级的任何幻想，驳斥改组派的改良理论，公开党的面目与之对抗，以争取和发动广大群众。同时要深入土地革命斗争，扩大游击区域，建立红军乃至发动可能的游击战争。要求省委“决定一详细行动计划指示东江特委及海陆丰地方党部，并要与朱毛红军的游击及惠属的工作联系起来”。

10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农村党的组织问题时说：目前军阀战争的爆发，客观上有利於农村斗争的发展，但是主观上阻碍了这一形势的发展。主张加强农村工作。

10月26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国民党改组派^① 和中共任务问题致信中共中央。信中提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已是“革命高涨底初期”，“我们现在不能预先断定，究竟全国危机会如何迅速地进到直接革命形势，然而，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此信给予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量和应取的策略以重大影响。

10月 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报告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模糊认识，分析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发展前途，强调进行思想理论战线斗争的重要性。指出：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除了组

^① 改组派，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派别之一。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等在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主张改组国民党，标榜国民党一大、二大的改组精神，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从事联合各派军阀的倒蒋活动。一九三一年初，改组派在香港宣布解散。

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务使每个同志认识以正确的路线同不正确的路线斗争之必要，使党的正确路线得到组织上的巩固。”

△ 指导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保管文件的干部，将干部资料和工作记录用俄文字母编成密码式的文件档案，以便于保存和查阅。

11月3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江苏省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就学生运动的斗争策略问题指出：在“革命斗争走向高潮的条件之下，举行公开的向敌人示威的路线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群众的情绪与决心，决不可单凭主观来决定示威”，“如随随便便的单凭着主观，来决定示威的日子，以致不能有好的准备，不能有充分的发动，则结果真将成为玩弄示威”，“这一点要求你们特别注意”。

11月13日 中共中央在听取福建省委书记黄钊的汇报后，致信福建省委。信中指出：福建自朱毛游击后，各地民众已相当的起来，闽西的红军游击战争可以长足的发展，要求省委扩大其组织，发展群众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尤应注意朱毛许多战争的经验与他们的行动规范。

11月15日 自秋冬以来，在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和要否组织暴动的策略问题上，同李立三存在分歧和争论。李立三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而直接革命形势就是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主张目前就应采取行动，布置各地的武装暴动。周恩来则认为：新的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现在正走向新的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强调在反对主要危险右倾的同时，必须反对“左”倾盲动。不同意布置一些地方轻率举行不顾主客观条件的武装暴动。除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数次阐述这一观点外，并在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说明这一问题，强调在采取行动时应慎重。本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谈到目前全党工作时，说：党的策略在下级党部运用还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提议在中心工作上应发一通告加以解释，各种工作须个别的指示。

△ 中共中央发出由李立三起草、周恩来修改的《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11月17日 中共中央致信江西省委。信中指出：“你们正在布置响应一两省夺取政权的暴动，发动全国总暴动，这一估量是错误的，目前是走向革命高潮，不是已经到了革命高潮的时候。你们犯了严重的盲动的错误，须立刻停止你们的结论之执行，遵照中央通告及指示改正。”

11月22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致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信发出。信中说：国内已面临着群众革命斗争复兴的形势，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并专门通报了各地红军迅速发展的情况。信中在谈到党内开展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斗争时说：党内右倾危险依然存在，“但这并不是说左倾便不危险了，现在城市工作中尚遇有脱离群众的盲动情绪，农村工作中尚有不合条件的暴动计划，甚至还有超乎条件的全省暴动计划”，“这都是值得全党注意，须予以坚决之纠正与肃清的”。

11月23日 中共中央在讨论农村游击战争问题后，由中央军事部制定出《目前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大纲指出：扩大红军与有计划的组织兵变成为目前在军事工作上的两大任务。大纲对六大区域的红军即朱毛红军（闽粤赣）、湘西鄂西红军（湘西贺龙红军、鄂西红军）、赣西南红军、彭黄红军、赣东北红军、鄂东北

豫东南皖西红军的扩红策略、发展方向、发展路线与策略、联络方法，作了具体布置。

11月28日 毛泽东写报告给中共中央，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十二月下旬，红四军前委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12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远东局为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所作出的决议。远东局决议批评中共离开布尔塞维克路线，在对待富农、黄色工会和广西改组派问题上“右倾动摇”。会议不同意远东局这一指责，认为远东局在以往与中共中央的数次争论中，主张放松对中共党内最严重的右倾——取消派的斗争，要求取消游击战争等，才是“一贯的右倾路线”，并对远东局过多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问题提出批评。周恩来在发言中说：远东局这一决议不以中央反右倾为前提来指出中央在某些问题上反映右倾的错误，而专门指出中央右倾，只对取消派轻描淡写说几句。这是站在调和派的立场来批评中央。在工作方式上，应该事先与中央商量，否则这一决议传到取消派手里是很不利的，徒增纠纷，妨害工作。会议决定召集一次会议，同远东局讨论这一问题。

12月10日 所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中国工农革命很显明的是继续发展而正在复兴，目前红四军“最大的任务就是尽所有的力量以扩大红军，发展地方暴动”。提出红四军发展路线的几个方案：既可向广东韩江上游游击推向东江发展，也可与闽西、赣南的游击队及各种农民武装

取密切联络与声援等，红四军前委可“依照具体的情况来判断执行的程度”。

12月上中旬 中共中央接到贺龙九月二十日的报告后，开会讨论湘西红军发展的计划和策略。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致湘西红军前委的指示信，要求扩大红军，推动游击区周围广大的农民斗争，发展地方暴动。并派陈昌等三人到湘西工作。临行前，周恩来同陈昌谈了话。

12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分歧。会议认为，鉴于双方各执己见，这样争论下去，势必妨害工作，决定作一决议案将争论结束，并派一人带文件到共产国际解决这一问题。

1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信中说：中共中央不同意远东局决议中关于中国问题部分，“因其完全抹杀中央一年来反右倾斗争，以广西非事实的问题扩大中央错误，减少陈独秀派错误，且对此斗争动摇，显然成为调和主义”，要求共产国际讨论解决这一问题。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致信共产国际远东局，抗议其决议对中共的错误批评，要求改正这一决议中有关中国问题部分的根本精神。

12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由李立三起草、周恩来修改的《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决议表示：完全同意第十次全体会的精神、路线与一切决议，全会指出的“‘政治罢工，成为直接的时代的坚决问题’，是异常正确的”。“在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之下，在城市在工人中组织同盟罢工，示威运动，发展到政治的总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尽量的扩大红军，组织兵变，是现在党领导各种革命斗争汇合起来成为推翻国民党军阀政权，建立苏

维埃政权之直接斗争的主要策略。”

12月24日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代表大会。

1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的指示信。在发言中表示：这封信总的精神是非常正确的，在政治分析、策略制定上将对中国党有极大的帮助。对革命形势的解释，我们过去认为高潮即是马上武装暴动，所以译成浪潮，以免同志误会，而国际认为浪潮即是高潮，要以直接革命的形势来说明。在目前的形势下，政治的总同盟罢工，是为武装暴动而组织的。会议决定接受这一指示信，由周恩来起草决议。

本年 在上海主持筹办党的干部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审定讲课提纲并讲授“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等课程，向各地中共党组织和苏区输送党的干部和政工干部。参加过训练班的有唐宏经、王立功和金贯真、恽雨棠、吴亮平等。

1930年 三十二岁

1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所起草的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的指示信的决议。在谈到改组派利用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时说：小资产阶级应该分上层与下层。我们应注意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包括没有店员的小商人、贫农、零工、学生等。并认为学生是城市工人的同盟军，因为学生在中国不如欧洲，中国学生有许多是很贫苦的。我们要吸引学生参加革命；在策略上，不能将阶级斗争的方式运用到学生群众中去，我们只能以革命的纲领来争取学生的大多数。

1月8日 所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致四川省委并转军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对四川军事工作路线作了若干布置，指出：工农革命斗争正在复兴的形势加重了党对军事工作的任务。目前四川的军事工作首先须着眼于全省的工作布置，同时要针对着各中心区域的特殊情形订出更具体的工作计划，强调根据革命形势的开展，应特别注意发动地方暴动，扩大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并扩大红军。

1月11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发出。决议说：“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革命新浪潮更加平衡的发展起来。现时虽不能预言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

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但我们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

1月15日 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机关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创刊号全文刊登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编者按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一目了然。朱毛红军在编制、筹款、政治军事训练、官兵平等、开支公开与群众关系等方面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1月16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福建省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加紧组织群众向着同盟罢工，游击战争，地方暴动，以造成全省暴动的前提，这是目前福建党主要的任务，指示福建省委“应当在全闽扩大援助闽西苏维埃、援助朱毛红军的运动”，同时“要在周围各地很艰苦的发展党的工作，利用各地群众自己的斗争，扩大土地革命”。

1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提议，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先在上海开准备会，然后到苏区开正式会，由周恩来起草通告。

1月、2月 中共中央军事部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江西军事工作。会议认为江西军事工作主客观都有优越的条件和形势，中心工作要放在土地革命和发动群众上，并对江西军事工作作了具体布置。

2月1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分析了红四军攻梅县失败的原因，说：“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惟中下级干部缺乏一事，“中央已用了极大注意，而留在莫方的军事同志又急切无人归来，

上海能去的人已搜罗殆尽”，但因“四军是所有红军的主干，中央必将以最大力量注意”。

2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筹备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问题。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告指出：“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扩大，的确要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虽然目前“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充实，尤其党的组织力量还不健全，我们还不能预言这一实行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到来的速度，但我们必须坚信六次大会所指示的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前途，并不是很远的将来”。号召全国各级党组织公开宣传今年五一节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联系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统一中国革命的指导与行动。

2月7日 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会筹委会会议，并作报告，对会议日期、代表名额分配、会议议程和决议草案等作了说明，指出：苏维埃区域发展的配合与深入，实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改良雇农生活等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2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改变目前中央组织机构问题。周恩来发言说：常委组织法存在“滥费、重复、迟缓”的现象，如果将常委缩小权限，成立组织局，采取集体指导的工作方式，更适合于秘密工作的条件，可以避免这些毛病。政治局则应集中政治的指导。在谈到军委的设置时说：中国党是处在夺取政权的前夜，有红军、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军委一定要健全，军事部与军委合而为一，直属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组织局，由向忠发、关向应、任弼时、罗登贤组成，并成立九人军委，周恩来、关向应、曾中生为常委。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参加组织局。

2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蒋、冯、阎军阀大战即将爆发前的国内政治形势。在发言中说：目前党的任务，是在军阀战争继续，群众斗争日益发展的情形下，要以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夺取政权。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起草一通告。

2月26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发出。通告指出：“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全国群众斗争之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因此，我党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加强政治领导，加强主观力量以反抗和冲破反动统治的压迫与进攻，以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来到，便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在这一总路线下，党应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确定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为目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准备暴动的中心策略。”并强调“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必须“无情的肃清”。

2月底 在听取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对河南东南部的工作汇报后，代表中共中央召集郭述申、许继慎、熊受暄等开会。在会上讲述目前政治形势，强调湖北、河南、安徽边界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宣布中央决定：统一鄂豫皖边区党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委，郭述申任特委书记；统一三省边区军事指挥，建立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委，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并在许继慎前往鄂豫皖苏区前，同他谈了话。

3月2日 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前，周恩来已发现上海进步文化阵营出现某些裂痕，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论战。回国后从潘汉年和冯雪峰处了解到矛盾有新发展，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中共中央抓文艺工作的开始。中共中央向文艺界有关

代表人物提出“停止内战，加强团结”，并决定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周恩来将夏衍（沈端先）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在中央文委领导下于一九二九年冬开始筹组。本日，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第一届执行委员为鲁迅、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阳翰笙（华汉）、郑伯奇、洪灵飞。主席团由鲁迅、夏衍、钱杏邨组成。

3月初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离开上海，途经欧洲前往莫斯科，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自六大以来的工作以及解决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等问题。行前编写《中国红军的数目与区域》和《中国赤色工会数目》。表中注明红军人数、装备、分布等情况：共有红军六万二千七百余人，枪支三万八千九百多支，编为十三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湘、赣、桂、粤、闽八省一百二十七个县；并且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十省内的二百六十二个县为游击县。

△ 行前，指示李卓然等在上海秘密组办兵运训练班，训练投诚或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学员结业后，派回国民党军队进行兵运工作。

3月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因周恩来离开国内，决定改由李立三参加组织局。

4月27日 途经德国时，在德共《红旗报》以化名陈广（译音）发表《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文。文章介绍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状况，指出：中国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涨。“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号召工农群众为在全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中国的革命工农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保卫苏维埃政权。

5月 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

报告工作，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解决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并处理中共代表团因解决中山大学派别斗争问题而与共产国际发生的分歧，以及留学生等其他事务工作。

△ 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地区爆发大规模军阀战争。

6月11日 自周恩来离沪赴苏后，成为中共中央工作实际主持者的李立三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使中共中央在指导各地的工作中发生愈来愈大的偏差。本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提出：“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并规定了组织政治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兵士暴动，猛烈扩大红军，号召红军积极进攻的策略路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

6月12日 中共中央致信周恩来并转共产国际主席团，说：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并要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党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

6月19日 共产国际远东局看到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后，认为不妥，提出周恩来、瞿秋白目前不在国内，中央政治局很弱，应停止发出这一决议。本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决定坚持发出这一决议。向忠发在做结论时批评周恩来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意见，是“割据观念”，与中央的路线不同，决定发一电报，指出这一“错误观念”。

6月20日 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指出：“在你们代表还在那里讨论时，你们又有一新的决议”，“在国际已快有决定时，为什么不可等国际决议，而先发这一决议在支部中去讨论，使其赞助你们决议呢？”并再次要求停发决议案。

6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向忠发名义致书共产国际远东局，表示不能接受远东局提出的停止发出六月十一日决议的意见，认为“如果停止这一决议的发出，便是放弃对革命的领导”，“现在已经是积极准备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时候了”，“如果认为现在还是准备夺取部分的政权，无疑是右倾观念”。

6月25日 中共中央致信周恩来，说明国内目前面临“革命巨潮——直接革命形势的大爆发日益逼进的形势”，告以在六月十一日决议等问题上，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说：“如果是怀疑准备武汉首先胜利的总路线，那末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务请你向国际力争。”信中说：“在你的报告中曾提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意见，我们觉得这一名词可以解释成为割据观念，极不好的，应当改为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并要周恩来“即刻动身回来，万勿迟延”。

7月5日 应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联共代表大会祝贺。并在会上作《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革命“主要的革命内容还是消灭封建势力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故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并且强调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争取群众、组织群众、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

在谈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指出：“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报告提出在党内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右倾，“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和闭关主义”。

7月16日 出席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会议，在会上作《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提出“为转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而斗争，便成为目前党之争取动员与组织群众的总路线”。

△ 中共中央以向忠发名义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报告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要求“国际动员各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联共的积极援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材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

7月下旬前后 会见斯大林，介绍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显著发展情况。斯大林建议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7月23日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发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底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和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要在斗争本身过程中，准备和收集力量，去迎接最近将来的决战”。强调中国党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

7月27日 红三军团乘虚攻占长沙，八月六日被迫退出。

7月30日 共产国际电复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国党的

目下路线是盲动精神”，目前“中国党本身的组织力量太弱，不能领导工人群众的暴动”，要中共中央停止执行六月十一日决议。

8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和共产国际来电。李立三在发言中说：国际之所以不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总趋势，是由于恩来同志没有报告清楚，恩来同志客观上应负政治上的责任。并进一步谈了部署全国武装暴动的设想，提出尽快成立中央总行委与成立南方局、北方局。向忠发在作结论时说：恩来对于这一问题，不仅应负政治上的责任，而且还包含着一右倾的危险。会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党、团、工会的各级机构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了中央总行委。

8月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继续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全国工作布置。会议决定举行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调集红一、二、三、四、五、六、八等军分路向武汉推进，布置南方局在广州组织暴动。会议再次批评周恩来，提出：中央对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更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政治问题解决后，恩来同志可去北方局负责。向忠发作结论说：恩来同志尤其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的责任。

8月上旬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瞿秋白先后动身回国，纠正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的错误。行前，和瞿秋白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在中共中央没有新的决定或改变以前，我们正式通知你们，张国焘同志是这一时间的中共中央负责代表。

8月19日 回到上海。即参加总行委主席团会议，在发言中针对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局的正常工作，成立中央总行委

的问题，说：关于现在的组织方式必须向共产国际解释清楚。并提议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应加入总行委。会议决定扩大总行委和主席团，周恩来、瞿秋白等加入总行委和主席团。

8月22日 在和向忠发、李立三两次谈话后，本日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并作报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说：中共中央与国际绝没有路线上的不同。国际对目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没有丝毫的怀疑，只是在武汉暴动问题上，感觉中国党只顾到客观，不注意主观，担心党的主观力量的领导能否实现这一任务，所以来电反对暴动。报告着重强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重要性，批评中央在近半年来对苏区、红军注意和领导得不够，说：我们过去一方面屡屡批评农民保守观念的错误，另方面反对单纯军事游击式的策略，中央还特别提出割据的错误，对于根据地确实注意得比较少，这是工作中的缺点。指出：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地有力地发展。目前在中国赣西南、闽粤边等处最适合作苏维埃的根据地，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便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与统治阶级形成两个政权的对抗。

8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指示。李立三在发言中说：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对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了，承认国际指示“确与中央策略的决定有程度上的不同”。向忠发作结论说：应有一电报去国际。有几点要声明：过去是有误会。同时说明周恩来回后，政治局已讨论二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致共产国际电。

8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以向忠发名义致共产国际主席

团电：中央政治局对国际的指示完全同意，决定坚决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同时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与国际的并无不同之处，表示等国际决议案到后，中央即作出接受国际指示的决议案送国际并发给下级党部讨论施行。

8月26日 出席总行委主席团会议。在发言中提出在对全国主要中心城市加强主观力量的同时，要巩固统一苏维埃区域，应在几个赤色区域内统一党的领导，提议在赣西南苏区成立中央局，以指导红军及苏区的工作，并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一切军事工作。

△瞿秋白由莫斯科回到上海。

8月29日 由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新近组成的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其后曾两次进攻长沙，均未奏效。

9月1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长江局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整个的形势是有利于革命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但实现这一胜利，以促成全国的革命高潮，是要有步骤的，是要依据于主观力量（这当然要联系到客观发展的可能）来作正确决定的。”在分析湘、鄂、赣、豫四省的政治形势后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强调必须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量，不容许我们忘掉敌人的任何强点；当我们估计我们自己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夸大的估量，不容许我们有架空而不切实的计划，尤其不容许我们忘掉我们自己的弱点。我们必须在这样条件下，估计各种可能，针对各种可能设计，这样，才能决定敌我的胜负。”

9月4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武汉工作问题致长江局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

布置暴动上做文章，而忘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是要动员最广泛的群众”，“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必须从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之不断生长中培植起来”。“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自然，在目前右倾还是党内主要的危险。”

9月6日 出席总行委主席团会议。在会上发言说：行委应是暴动前夜的组织，而现在则是解决经常问题，这种状况长期下去是很困难的。在谈到李立三问题时说：我们可以通过自我批评解决一切问题。会议决定早日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选举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作传达共产国际决议和组织问题的报告。

9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电，“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坚决的执行转变长沙两次进攻”，“城市工作要有更实际的发动群众以代替空喊的冒险”。并报告“中央即开扩大会议，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

9月9日 出席总行委主席团会议。在会上作苏区军事报告：苏区拟划分为六个军区和若干游击队。组织系统为：中央局指导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中央政府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局也可指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军区。会议决定召开苏区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为临时中央政府。

△ 就加强红军干部问题，起草中共中央致长江局的指示信。信中指出：为加强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的工作，军事干部必须以派往三、四、五、八、二、六军去为第一等工作，党的干部也须

照前信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信中针对红一、红三军团攻长沙受挫一事，提出“是否可调转头来，击破赣边敌人，以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巩固自己的阵线”。并且强调说：巩固的而不是猛进的向前发展，更成为目前的中心问题。十二日，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转至株洲、萍乡地区，寻机歼敌。

9月16日 出席总行委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草案。起草人瞿秋白报告说：第一，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第二，中央在策略上有相当错误，主要是对工农斗争力量的估量、红军力量的配合，犯有冒险主义的危险。

9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宣读中央工作大纲，获会议通过。在讨论职工运动决议草案时说：指出政治罢工是中心的战略，是没有问题的，但不是唯一的战略。北方同志对于矿工工作，以为或是暴动或是惨败，中间没有其他的余地，而不注意日常斗争，应注意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罢工。会议酝酿三中全会的补选问题，决定补选毛泽东、顾顺章、李维汉、温裕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 出席总行委主席团会议。在发言中总结组织南京、武汉等地暴动的教训，说：我们对于策略的决定与分析，有时离开了辩证观点，因此也可走到抓住一方面的可能而掩盖了全部的危险。过去对于速度与程度有过分的估量，策略上也有错误。我同意指出这一点，给全党以教育。

9月24日—28日 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先后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报告批评李立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论述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和表现，指出：“在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分割状态中，因之中国经济发展还保存很多地方性，政治变动有先后，革命经

验有多少，这些条件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强调“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报告认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报告还批评了李立三忽视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成立行委，停止党、团、工会独立活动，在工作布置上的“左”倾冒险错误，强调加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报告也批评了不同意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何孟雄，但仍提出在党内反对当前主要倾向右倾的同时，必须反对“左”的倾向。会上，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会议通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纠正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错误。

9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提出：关于全国工作布置，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的建立，苏区下级组织的健全，加强红军的领导，是组织上的首要工作。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苏区工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六届三中全会总结通告。

9月30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报告回顾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以来红军成长的过程和所分布的六大区域，指出：目前红军的主要任务已不仅是发展游击战争生长红军，而要更进一步强固红军，集中红军的领导来担当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强调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应反对只注意到发展而不注意巩固与加强的错误观念。报告提出游击队与游击战术，在目前绝对不能取消，但应有现代战术的充分准备，

并建立集中指挥。针对会议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打下大城市要较发展广泛的农民战争的意义要大得多”的认识，在作结论时指出：这一般是对的，但如像上回拼命围攻长沙延期而不能下的时候，则发动全湖南的农民战争，不但比死攻长沙要意义大，而且即是进一步的扩大革命战争。会后，中央军委制定了改编红军的计划。

9月 部署营救恽代英^①，使恽代英得到减刑。

9月、10月 和聂荣臻等在上海为前往苏区的同志举办军事训练班，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讲述党的工作中心开始转到苏区后的任务以及军队政治工作等。张爱萍、黄火青等参加学习后被派往中央苏区。

△ 支持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后送往各苏区，成为红军遵行的第一个条令和条例。

10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三人组成中央常委，并初步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项英先去。

10月上旬 出席并领导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辖江苏、浙江、安徽）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纠正“左”倾冒险错误。

10月12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九十一号——三全扩大会的总结与精神》发出。通告指出：“全会认为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是与国际的路线一致的”，但“对革命发展的形势，在程

^① 恽代英于一九三〇年四月在上海被捕。

度上与速度上有了过分的估量，以致在部分的策略上，工作的布置上犯有‘左’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嗣经过国际指正之后，中央政治局坚决的执行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并开始策略上必要的转变”。通告强调指出：目前“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任务是：巩固与发展苏维埃区域，发动更广大的群众，集中与巩固红军的发展，加强党在苏维埃区域的领导，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起苏维埃的临时中央的政权”。

10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关向应汇报红军二次进攻长沙的情况。周恩来在发言中说：一方面要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恐惧动摇意识，另方面亦应防止冒险倾向的产生。必须指出不可能再回到井冈山的时代，因为我们已有广大的政权，一切反动势力正联合起来组织反革命“围剿”，必不允许我们回复旧的时代。并向会议报告拟定的苏维埃工作计划，提出了巩固根据地的条件、办法、发展方向和红军的战略战术等问题。

10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最终确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二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会议并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黄公略、周逸群、叶剑英、张云逸、邓中夏、曾中生、邓发、邓小平、黄甦、袁国平、刘伯承、周恩来、关向应、恽代英、李富春等二十五人组成苏区军委。

10月18日 所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致鄂豫皖特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分析了国内局势，提出了苏区的中心任务和策略，指出：目前还没有全国的客观革命形势——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全党具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任务是：加强红军，集中苏维埃区域的指导，巩固根据地的发展，组织苏维埃的中央政权。强调在反对

富农的斗争中，对“冒险主义的杀尽一切富农，同样要纠正的，因为这必然会动摇中农甚至要危害到中农的利益”。

10月28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为发动全国的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运动，以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发出。通告指出：国民党军阀最近在湘、鄂、赣三省调动了将近二十个师的兵力，准备实行他们的“围剿计划”，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最容易发生右倾的失败主义危险，“然无论如何，反动统治之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总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当前最中心的任务，是调动全国劳动群众和红军，打破敌人的进攻。

10月29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说：听说你们为攻长沙或南昌而争论以至发生分兵行动，“问题的中心并不在攻南昌还是攻长沙。照今天的形势来说，攻长沙或是攻南昌，并不是第一步工作”，目前党之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必须根据巩固地向外发展的原则来计划行动方针，坚持进攻以击破敌人的策略，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统一指挥，利用敌人的弱点，尽力的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打击。各苏区要进行适当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动都能牵制敌人的调动和援助，而收到我们自己相互策应之效。信中提出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朱德为红一、红三军团总司令。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

10月 为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鸿、吴德峰组成委员会，吴德峰为交通局长，担负建立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和全国的交通网，输送党的干部和苏区急需的各种物资。

△ 共产国际执委会得知李立三在八月初的几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底趋势”，要求苏联积极准备战争，出兵援助中国革命，并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还声言“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的情况后，致信中共中央。信中提出“立三路线”问题，说：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什么“在时局底估计和策略任务底认识方面有次要的不同意见”，而“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是用假冒的‘左派’空谈遮盖着自己的消极性，而在实质上却是机会主义的立场”。要求中共中央“必须向所有的积极党员，十分明白地和用布尔塞维主义的自我批评态度，去解释这两条政治路线底实质，说明立三路线底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党员团结在正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底周围”。

11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同赣东北苏区来人接谈情况。会议决定由林育南任赣东北特委书记。十三日，中共中央致信赣东北特委：特委组织，中央指派一人前来，与邵式平、方志敏、邱泮林、唐在刚，并由当地得力工人同志与农民领袖同志各一人为常委。分工方面，邵式平可代理特委书记，周建屏为红十军军长，涂振农为政委，方志敏为政府主席。

11月13日 陈绍禹^①从新近由苏联回国的人员处得知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后，不仅拒绝本已接受的去苏区参加实际工作的组织分配，而且四处串连，以“反立三路线”为名，积极反

^① 陈绍禹，又名陈韶玉，化名王明。曾留学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任《红旗》编辑。一九三〇年七月，因和秦邦宪等人一起与李立三教条式地争论过政治问题，受到党内处分。

对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本日，陈绍禹、秦邦宪（博古）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说：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并且声称：“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在对于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中央要以布尔塞维克的勇敢和自我批评来承认差误”。十七日，陈、秦再次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撤销对他们的处分。陈绍禹在此期间还写了名为《两条路线底斗争——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反对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后经过增订，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意见书，在党内一部分人中散发，宣称：三中全会后维它（瞿秋白）同志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已经不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

11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十一月十六日收到的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在发言中说：国际来信的批评，指出过去对于路线的动摇。我们虽曾说过立三这一理论的发展可以形成另一条路线，但我们的指出是没有这样的明显而深刻。同时强调说：党的总路线是与国际一致的，只是有“左”倾路线侵入中央的路线。关于国际来信的发表问题，我党应遵照国际指示，不允许扩大讨论，而使工作停滞。并且特别指出：已经知道国际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开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提议召集一次临时政治局会议专门研求和讨论过去的错误，同时指出陈绍禹他们的错误。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批评，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采取了调和态度。

1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共产

国际十月来信。在会上发言说：自我回国以后，只在各个“左”倾策略上加以纠正，到三中全会时则作了总的纠正，但对“左”倾斗争不够，留有调和倾向。三中全会是接受国际路线的指示，并依此定出总的方针。但过去对立三路线错误的揭发，取了调和态度，没有指出其理论的基础，没有指出因他的理论而产生各种问题上的错误。并强调说：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这样来回答攻击中央的人。

11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红军和苏区问题时说：红军的战略与党的政治策略不同，政治的策略是要向敌人进攻，但在军事方面，有游击的进攻，有防御的进攻，有暂时的退守。若军事必如政治，只有硬碰是不对的。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决定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和这一决议发给各级党部，并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信给已经赴苏的李立三，要他公开承认过去的错误，不容稍有怀疑。

△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决议说：完全同意国际执委的这一封信，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是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这种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同时“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

11月下旬 陈绍禹等人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指责中共中央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并且与罗章龙等联名致书共产国际，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改组中央。与此同时，党内一些受过李立三

和三中全会批评的或对立三路线不满的同志也纷纷起来，在党内形成一个反中央的风潮。

11月 为曹瑛、吴泽霖、应修人等举办训练班，讲授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12月1日 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报告在分析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及实质后，指出：“我们决不能因为要揭发伯山（李立三）路线，便说三中全会也没有正确的传达国际的路线，也没有纠正过去策略的错误”，“这决不是掩蔽不讨论，而正是因为过去揭发的不彻底，更必须要在日常工作中来认识并解释伯山路线的错误”。报告批评了陈绍禹、秦邦宪反对中央和拒绝组织分配的错误，指出陈绍禹在与李立三的争论中，有许多观点如“夺取武汉”、“革命转变”等问题“与伯山同志是同样错误的”，强调目前“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之超组织的活动”。

12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说：党内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有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秦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他们把这认为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一切中心任务。强调说：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不是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

12月9日 连日来，为平息党内风潮，到处做说服解释工作，但由于陈绍禹等人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无法平息下来。本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针对党内发生的争论和派别纠纷，说：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党的领导机关的威信再也经不起

了，撤换指导机关是没有什么要紧的，问题是会发生许多派别，党会受大的损失。并坚持要陈绍禹到中央苏区去。会议决定同意召开紧急会议。

△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的决议》。决议说：“六月十一议决案前后——三中全会之前的最后一期，立三路线是领导了政治局的工作”，“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是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的”，“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议决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

12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撤销李立三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何孟雄同志政治意见书一般的是正确的，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央代表给何以“取消派暗探”、“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评与处分，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特决议取消这些决定。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

12月中旬 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上海，分别会见陈绍禹、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人，在谈话中批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否决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召开四中全会，中心是反右倾。此后陈绍禹等人改变态度，一面继续攻击中共中央，一面又指责罗章龙、何孟雄等为右派，并放弃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拥护召开四中全会。

12月20日 在《军事通讯》第四期发表《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和结论，并在文后加了说明，指出：这一报告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精神之下做的。主要的是没有揭发过去立三路线的取消游击战争，集中农民武装，冒进攻坚等等错

误主张。因此对了解过去错误有帮助。同时指出：其中对于一些问题的解释和发挥，仍然不失其正确，所以“就决定不加修改而在此公布”。

1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强调说：三中全会是合法的。党要立三退出政治局，即是表明要负政治责任，但这不能用到多方面去，因为这不是“大兴党狱”，而是要同志负起责任来纠正自己的错误。现在不能说党中央不能负反立三路线的责任，如果口头上说得很“左”，而事实上又不进行积极的反立三路线，而使工作停顿下来，这是极不应当的。会议通过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结果起草的《中央紧急通告》，并决定改组江苏省委，由刘少奇、夏曦、王克全、陈云、何孟雄等十三人为省委委员，刘少奇为书记。会议根据米夫的提议，决定在刘少奇回国前^①，由陈绍禹代理省委书记。

△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发出。通告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十一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九日两个决议案中“还是保持着调和主义的态度”，决定以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并提出“为要保障国际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彻底的执行，党内应实行改造”。

12月下旬 为了消除党内不同意见，数次参加中共江苏省委会议。在会上根据紧急通告的精神，说服大多数人接受了中央的意见。但王克全等人认为紧急通告仍是调和主义，称中央现在不能信任，坚持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开除周恩来、瞿秋

^① 当时刘少奇在莫斯科担任赤色职工国际执委。

白、李维汉、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并立即停止瞿秋白、周恩来政治局委员职权。

△ 在此期间，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导致党的分裂，和瞿秋白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所犯调和主义的错误承担责任后，又提议他俩一起退出中央政治局。并且认为自己在处理立三路线的问题上“既已错误，就应团结各方面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人在一起，来一致执行国际路线”。为此推荐何孟雄等去见米夫，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委名单时，又提名何孟雄，但均为米夫拒绝。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去留问题上，米夫采取“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

1931年 三十三岁

1月1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等人通过《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并声言“对于在党的历次错误中负有严重错误主要责任的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同志（均是不堪教育与学习的）应执行铁的纪律，立即离开指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

1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发言中说：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必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肃清立三路线的影响，拥护国际路线。在谈到开展反对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会议问题时说：我们是号召全国示威，但示威、集会的方式，要看各地发动群众的情形来决定。

△ 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1月7日 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决议案说：“立三主义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强调要“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会议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陈绍禹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以陈绍禹为代表的“左”倾

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周恩来在会上检讨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并针对由于派别分歧而使党面临分裂的危机，着重强调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在党内斗争中清除派别观念的重要性，指出：“党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立三路线是涣散了党的，现在正要加紧的将他恢复与健全起来。”“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塞维克党所许的。”四中全会后，看到中共党内思想混乱，派别纷争不已，面临分裂的现实威胁，内心“充满着苦闷”，但仍以“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心情，拼命工作，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帮助党渡过困难时期。

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政治局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陈绍禹为候补常委。周恩来提议：陈绍禹仍应做江苏省委书记。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

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谈到目前反倾向斗争时说：立三时代以为“左”倾比右倾好，谁反对“左”倾，谁便是放弃反右倾。不能说不正确倾向即是右倾。并针对党内一部分人不同意四中全会决议和选出的中央，说：若有不同意见，要揣在肚子里来执行决议。对底下同志要解释。一脚踢开领导机关的作法，是站在派别观点，我们要斗争。

1月15日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小布正式成立，项英为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委员。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

1月17日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王克全等人积极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召开所谓“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议通过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推举出罗章龙、王克全、徐锡根等人组成临时中央干事会。本日，罗章龙控制下的全总作出《全总党团对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反对四中全会决议，认为“是继续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精神”，要求共产国际“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代表”。与此同时，王克全等人占领江西省委机关，成立第二省委。

△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发言中批评罗章龙分裂党的活动，完全停顿一切实际工作，是帮助敌人和托陈取消派，指出：这是极严重的问题，前方血战，后方这样，一面反对立三路线，一面离开实际工作，这是非常要不得的。强调中央必须加强政治领导与实际工作的领导。

1月中下旬 代表中共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分裂党的行为，要他们立即停止反对党的活动，承认错误，回到党这边来。并告诫他们：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1月21日 出席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会议，并作报告。会议决定转变立场，接受四中全会决议，通过《海总党团对于扩大的四中全会的决议》，表示：海总党团在拥护国际路线拥护四中全会拥护中央的领导的精神之下，要像一个人一样，坚决地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反对右派分裂党的行动。会后，周恩来又找海总党团书记陈郁长谈，说服他进一步转变态度，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

1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鉴于罗章龙、王克全继续坚持错误，会议一致通过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开除

王克全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

1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军委由周恩来、陈郁、聂荣臻、陈赓等七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聂荣臻为参谋长。

1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分工等问题，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军委和苏区工作。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所主持建立的从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经打通。提出：现在必须迅速进去。交通线应保证继续畅通。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分工方案。

1月 所起草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第一号通告发出。通告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指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成为目前对于革命的最主要的危险。”“如果轻视了反革命‘围剿’的力量，过于夸大了自己的力量，这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因此目前“动员和集中一切力量来击破‘围剿’，要看成刻不容缓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通告提出：“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调动最广大的武装群众，在敌人军队的前后左右，发动最广泛的游击战以疲惫敌人”，“来便利红军的作战和对敌人施行各个击破的进攻”。

△ 指示聂荣臻安排参加过无线电训练班的伍云甫、曾三等前往中央苏区，与王净、刘寅等会合。后来他们利用反“围剿”中缴获的电台，于一九三一年秋，沟通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香港与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讯联络。

2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上旬在赣西南发生的富田事变。周恩来提出：应立即去

一训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会议还讨论了苏区中央局、湘鄂西中央分局、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赣东北特委、鄂豫皖特委、闽西特委等的组织调整，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苏区中央局常委，夏曦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沈泽民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

2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一委员会，对富田事变进行讨论，提出处理意见交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给红军的训令，决定由周恩来加以修改。二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训令指出：冲破敌人的“围剿”，这是目前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红军的主要任务是：不让敌人有整顿自己队伍的可能，要击破敌人的弱点，要扰乱敌人计划的实现，要用占优势的力量，去打击敌人。并且强调指出：“如无胜利的把握时，即不应采取决死的战斗。并且随时要注意到在必要时有退却的可能。如形势上必须退却，则就应退却，不要因为怕失却地域而发生姑息。我们始终不应忘记，必须保存红军的基本实力，为的是可以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2月19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赣东北特委“彻底肃清立三路线在赣东北工作中的影响而坚决的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信中强调在粉碎国民党军“围剿”中应取的方针是：“发动最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联系着苏区非苏区的群众运动，集中与巩固红军的领导，配合着农民的游击战争，加紧在敌人士兵中的工作；这样，来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敝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并且指出：“你们的发展方向，应以打通与西南一、三集团军的联系为主

要任务。”“在发展中，必须求得巩固，绝对反对只发展不巩固的冒进政策。”

2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问题。代表三人委员会提出：赣西南的AB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和红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在客观上也可为AB团所利用。根据这一总的结论，须立即写信去，要他们停止争论，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等候中央解决，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的权限。会议决定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由任弼时起草一信。

2月22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委电发出。电文详细报告中国党半年来反对立三路线斗争、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和反对右派分裂党的经过以及四中全会后的工作布置。电文说：“中央对全国工作的指导，过去是偏重形式上的文件，如通告、指导信等等，现在则侧重在活的指导，派人去直接巡视与加强省委及地方工作”，“现在正依照国际的指示，要从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力量去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都要以百分之九以上派往苏区”。

2月23日 中共中央致信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信中指出：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前，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

3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必须立即动身前往中央苏区，任弼时五日走，王稼祥七日走。并决定凡去苏区的人，统由周恩来、康生^① 负责安排。

3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广东党的工作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在立三路线布置全国武装暴动的总方针之下，广东党完全脱离了工人的厂内日常斗争的领导，而空喊街上示威与召集厂内集会，完全放弃了农民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斗争，而空喊地方暴动与农民战争。”要求广东省委“根据国际路线与四中全会决议，彻底的揭发立三路线在广东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影响”，并且刻不容缓地派遣一百至一百五十名工人到红军中去，征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和党内百分之六十以上干部到苏区去加强军事工作和苏区领导工作。

3月10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湘鄂西特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说：“党内斗争的主要火力是反对右倾与富农路线，但同时要坚决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应当指明湘鄂西党直至现在还在继续和扩大立三路线之执行”，“你们没有巩固苏区建立根据地与改造红军的根本认识，而只凭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企图取得大城市乃至最大城市。这完完全全是立三路线之不要根据地的冒险盲动主义的策略”。指示信强调红二军团在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作战中要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在配合群众的斗争，利用敌人的弱点的条件之下，击破这一线敌人的一方，以震动敌人的整个阵线。

^① 康生，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为着适应鄂豫皖苏维埃运动的扩大，红四军与皖西独立师的发展，中央政治局特决定在这一地区成立中央分局，以直接领导这一地区的土地革命的开展。

3月12日 得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三人在龙华就义后，很悲痛。本日，为《群众日报》撰写社论《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社论说：何孟雄等二十三个同志，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的牺牲“是革命中巨大的损失”，“革命战士英勇斗争的热血，必然更要燃烧着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火焰，更迅速摧毁和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反动势力到死亡的进程”。

3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兵运工作对于冲破国民党军“围剿”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党以及一切革命的组织必须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并具体部署了各地的兵运工作，要求各地方党部应建立起兵委，指导各地的敌军工作，并特别注意秘密工作原则。

3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红一军、鄂东南苏区等问题。在发言中说：红一军最近的胜利，已冲破了敌人第一次“围剿”，但敌人正在进行第二次新的进攻，这是不能轻视的。鄂豫皖特区必须在巩固的基础之上向外发展，扩大苏区。在谈到加强敌军工作的原则时说：当我们向当前的敌人进攻时，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甚至可以收买）以击溃之，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与次要的敌人结成暂时军事联盟，以打击主要的敌人，但绝不能存什么幻想。会议决定由刘伯承起草一关于红一军的意见书，由

聂荣臻起草一关于鄂东南的决议，交中央讨论。

3月25日—4月13日 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第十一次全会。会议通过的决议提出，中国和印度这样一些最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深刻的革命危机迅速地成熟了”，“中国处于殖民地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首位”。决议继续强调要坚决反对右倾的危险和一切消极情绪。

3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报告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富田事变的意见。并说：苏区内现在确有一种观念，夸大了敌人在内部进攻的估量，这种过分的估量，会动摇阶级斗争的信心，应指出来。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指出：富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同时，过分的估量反革命的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战胜阶级敌人的坚强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

3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鄂豫皖苏区问题时说：此地较中央苏区为好，更易发展，而形成对敌人京汉铁路的威胁，必须加强。会议决定由张国焘前去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在讨论张国焘走后，中央常委的人选问题时，周恩来提议罗登贤、聂荣臻可参加常委。会议决定常委由五人组成：向忠发、罗登贤，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军委参谋长参加会议。

3月 指示中共中央军委朱瑞、李富春举办兵运策略训练班，并将参加学习的袁汉澄、王超、李肃等派往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工作。

△ 指示特科在上海开办华南通讯分社。以后特科通过这个

公开的新闻机关进行活动，获得许多重要情报。

4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湘鄂赣边苏区问题。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对于鄂东鄂南两特委及十六军工作的决议》。决议要求鄂东鄂南的党和红十六军“必须迅速的执行路线上的转变”，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各地苏维埃政权，以求得湘鄂赣边区的巩固，指出“只有在这一苏区根据地巩固的条件下，才能冲破敌人四面的‘围剿’，才能与中央区打成一片，而给一、三集团军以直接的帮助”。并且规定了红十六军目前的作战方针，要求应与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取一致行动，以打破这一方面的当前敌人。

△ 所修改的中共《中央对福建目前工作决议》发出。决议要求福建省委“依据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全部的彻底的转变”。指出：“党在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巩固红军苏区反对军阀第二次的进攻。这一任务，在福建主要是反对军阀张贞等进攻闽西。”同日，中央致信闽粤赣特委，指出闽粤赣是整个中央苏区的一部分，保持与巩固闽西根据地，即是巩固中央苏区的后防，保障中央苏区的胜利。要求尽力发展闽西的广大游击队，从军事政治方面坚强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

4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中央的组织和工作方式时，提出：中央各部门要精简人员，要尽量减少文件，内部交通要用口头传达的方式，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不在家中办公，家中不放文件，党的领导人也要社会化、职业化。

4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苏区内党的组织问题，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决议。五月，中共中央发出《中

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决议案说：中央为加强对于苏区党的直接领导而派遣中央代表去设立各苏区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这是绝对需要的，但“决不能因为中央局是集体的组织便代替了当地最高党部的自己组织，这将妨碍当地党部自己职权的行使与工作的独立”。“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过去的错误办法，现应立即改正。”

4月24日 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中共中央在得到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钱壮飞转报的这一情况后，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周恩来在陈云等的协助下，果断采取紧急措施：（一）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二）将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区或调离上海；（三）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使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指导机关的计划未能实现。

此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的处境困难，一度陷于停顿状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难以举行。中央决定改变工作方式，尽可能少地召开会议，采取分头负责的办法。周恩来被指定负责军事工作和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

5月中旬前后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出中央五月九日发出的《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没有对苏区有一更具体与整个的指导，以真正肃清立三路线的存在。会议决定起草一对红军的训令。

6月1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周恩来起

草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总结说：特委工作虽有许多成绩，给予党以不少保护作用，但终因顾顺章一个人的叛变，遂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这不能不说这是特委工作本身错误的结果，尤其是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历史病源。周恩来并在总结中作了自我批评，表示：直接指导这项工作的伍豪同志要负错误的主要责任。总结对今后特委的组织、工作方针、纪律等规定了原则。

6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训令指出：目前阶段中的中心任务——建立湘鄂赣整片的苏区，成为这几省有力的根据地，并建立起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以争取这几省尤其是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目前红军主力军的行动方针，应是巩固的向前发展。我们要反对立三路线不要根据地脱离群众的冒进政策，但同时我们要使苏维埃根据地在红军胜利与群众斗争发展的条件下，日益向外发展，日益扩大他的领域而威胁着中心城市。在这时，诱敌深入与击破敌人一方的策略是应互相为用的，中心要放在运用广大群众的游击战术击破敌人主力以至完全消灭他们上头。”

6月22日 隐蔽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擅自外出过夜后被捕。周恩来闻讯，立即组织营救。获悉向忠发叛变，即亲往寓所附近观察暗号，查实后迅速隐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此后周恩来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苏区。

8月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决议案批准了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指出：四中全会“使中共在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中的转变”。强调“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去反对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机会

主义以及与右倾调和的态度”。决议提出扩大非苏区的群众工作，苏区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加强和巩固红军，击退国民党的新进攻，扩大苏区。

8月30日 在听取欧阳钦关于中央苏区全面情况的汇报后，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肯定中央苏区党所领导的红军和群众在最近八个月来艰苦奋斗的成绩和取得第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指出“现在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应是：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军事策略方面，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不是说要集中主力，便连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备去发展游击战争，去巩固后方，去袭击敌人的力量都不要了，也不是说只有诱敌深入的办法，才可各个击破敌人，在力量许可时，我们还要用追击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信中批评“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要求其纠正“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并着重指出中央苏区在反AB团斗争中存在着简单化和扩大化的缺点，强调说：“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团。”要求纠正“过去夸大敌人的破坏力量与减弱我们自己阶级的坚信心”的做法。

△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反革命向苏区与红军进攻是目前革命形势的主要特点，湘鄂西的党在目前这种困难状态之下，应积极动员群众准备向敌人的弱点进攻，而消灭其一部分，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且强调说：“保持红军的战斗力，是我们党目前的中心任务。”随后，中

央将关向应派往湘鄂西苏区。

9月中旬 鉴于陈绍禹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也将前往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绍禹提出秦邦宪进入中央负总责。商议结果确定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同时规定，今后在多数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时，须将此事提请中央委员会讨论。

9月18日 九一八事变发生。

9月20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陈绍禹起草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文中提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形成“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画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要求“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红军“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

9月22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议提出党在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同时提出“这个占领与军事行动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要求广大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

10月12日 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起草致李立三的复信。信中说：你对于立三路线的基本错误观点还没能彻底了解，“如你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观点，显然是‘左’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而你却又解说成‘实际上是极右的反列宁主义的托洛茨

基的观点’，这样，将取消了‘左倾’错误的存在。好像立三路线的主要内容不是‘左倾’而是右倾”。信中表示：中央希望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坚决地反对你自己曾经领导过的立三路线。

11月7日—20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二十五日，组成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十七日，大会选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毛泽东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周恩来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委任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大会并通过了周恩来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起草的《宪法大纲》。

12月6日 为中共临时中央起草致苏区中央局电。电文指出：国民党军正计议大举进攻鄂豫皖苏区，“对赣江上游防守较松，红军主力似宜乘此改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

12月上旬 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苏区。

12月14日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编为红五军团。

12月15日（或16日） 在中共中央交通局负责人肖桂昌等护送下进入闽粤赣苏区。

12月18日 赴长汀途中，致信中共临时中央，报告沿途同李坚贞等人谈话中了解到的闽西党组织在处理“社民党”问题上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说：“据我在途中所见到闽西党的最近决议及中区党的文件，都还只言反AB团反社党的成功，而未及他的错误。可见此事转变之难与问题之严重性。”建议中央作一有力

的决议，“中央如对闽西有决议，对中央区亦有力也”。

12月22日 到达长汀。随即连日出席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会议，与各负责同志谈话。二十四日，作目前形势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

12月25日 致信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说：“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假使不是肃反工作做得那样严重错误，则群众的积极性与干部的产生必不致如现在感到困难。因此，加强党的正确领导，是闽西党的根本任务”。信中主张闽西的发展方向，“以闽西独立师与红军三军团配合取下上杭、武平，巩固闽西根据地，与中央区完全打成一片，以红军十二军主力军向闽北发展，与江西红军联成一致行动”。

12月底 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 三十四岁

1月7日 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检讨中央苏区肃反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并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案肯定“过去反AB团反社党斗争的正确和绝对必要”，同时指出肃反工作中存在的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是在对反革命派的认识和估量的错误，是在对反革命派斗争的方法的错误”。强调“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今后肃反工作，要执行彻底转变”。

1月9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领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1月上旬 在中央苏区了解实际情况后，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电复：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为执行中央指示，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选择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之中的赣州，以便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一月十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攻

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1月28日 一二八事变发生。

2月4日—3月7日 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红军自一月下旬起向赣州开进。二月四日，担任主攻部队的红三军团开始围攻赣州。但因对国民党军兵力估计过低，且守军据坚城顽抗，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红军于三月七日从赣州撤围，陆续集结江口圩地区。

2月7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并在会上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致词。

2月9日 撰写《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与党的目前紧急任务》一文。文章分析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指出各帝国主义国家正准备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中国已首先受到日帝国主义的屠杀和宰割，而“国民党政府更宣称‘赤祸甚于日祸’，‘对日必先剿共’”。强调在这种形势下，“党的中心紧急任务是要以‘拿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变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为反帝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动员全中国群众”。苏区的党应积极领导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迅速地巩固地向外发展，开展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配合全国的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争取一省几省革命的首先胜利。此文发表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实话》第一期上。

2月19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文中分析了一二八事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苏区党应利用目前极端有利的时机，发动和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夺取中心城市，扩大和贯通各苏区打成整个一片，配合和领导全中国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提出在集中主要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的同时，也不要放松那种“左”倾的反中农倾

向，对帝国主义战争乐观，驱使群众硬打敌人工事甚坚的城市土围的山寨的盲动主义，以及立三路线的一切残余。

2月20日 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等自二月中旬以来，连日登载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对此，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当即采取措施进行反击。本日，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二月下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对此发出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3月中旬 由瑞金赶赴江口圩，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红军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夹赣江而下，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

3月下旬 主持在瑞金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决定：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由毛泽东率领东路军入闽作战，首先打击闽军和进入闽西的粤军，巩固闽西，筹措经费，尔后集中全力争夺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西路军则西渡赣江，进入上犹、崇义地区活动。

3月30日 率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议东路军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并告以漳州难守易攻。

4月初 从瑞金赶赴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批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

役计划，并具体部署了前后方的各项工作。此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

4月10日 红军东路军攻占龙岩。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通报战况和下步行动计划，说：龙岩胜利原因为团结兵力，击敌不备。我军入漳，必能诱动粤敌。

4月14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说：“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这些右倾机会主义是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忽视反苏联战争的危险，忽视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轻视中国革命的民族解放的任务与帝国主义直接干涉，不了解红军的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于庸俗的保守主义”，强调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和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

4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动员对日作战的训令，正式宣布对日战争，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同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发出《关于红五月运动中实行对日宣战的动员决议》，号召全国“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站在苏维埃领导之下，一致的对日作战，首先便是消灭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及其统治”。

4月20日 红军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歼灭国民党守军张贞部约四个团，俘一千六百人，缴获两架飞机及大量军用物资。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漳州大捷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影响时局甚大。东路军下步行动方针为：发展闽南游击战争，准备消灭入闽之敌，以期迅速北上。

5月11日 接到中共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给各苏区党部的指示信后，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同意和接受中央的指示和批评。本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决议承认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决议提出：“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同时对‘左’倾的‘轻敌’‘盲动’的错误，也应反对”。

5月16日 出席苏区党团中央局、福建党团省委、长汀党团市委在长汀联合举行的招待会，招待漳州工人参观团，并代表苏区党团中央局致欢迎词。

5月20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致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批评自苏区党代会后的中央苏区的工作，说：苏区党代表大会“一般的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在苏区工作的转变上有了进步的作用。但大会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伍豪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指示电再次强调“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5月30日 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第五期上发

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一文。文章说：“我们应当承认是犯了不可容许的迟缓、等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来源是由于中央局过去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估量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与积极进攻的路线，便缺乏明确的认识。”提出要“坚决的不调和的进行在苏区发展路线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倾’的‘轻敌’‘盲动’等等错误，尤其要集中火力反对目前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一切动摇”。

5月 国民党政府改设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第十九路军开赴福建“剿共”，粤军三个师侵入赣南，向雩都窥进。

6月初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军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途中决定于八日在上杭县官庄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入赣粤军的作战计划。西路军也于六月上旬撤出上犹、崇义地区，转入桂东以东地区。

6月5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布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命令：中央苏区红一、红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红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

6月7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转出席红军东路军上杭军事会议的全体同志：望坚持积极进攻路线，以全力求得此次战役完全胜利，给粤敌以重大打击。会议决定红一、红五军团经广东梅县，回师赣南，计划月底到达赣南与红三军团会合，打击进犯赣南的粤军。

6月9日 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然后移兵“围剿”中央苏区。

6月19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告以敌情变化和鄂豫皖红军最近取得的连续胜利，说：这一胜利“证明迅速行动与相互配合策应之万分重要”，指出对粤军作战“必须专赖果断之攻击，与实施迅速之追击，才得将敌完全歼灭，取得连续的胜利”。

6月中旬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6月21日 红一方面军发出准备进攻南雄国民党军的命令，以求调动入赣粤军回援南雄，在运动中歼灭之。红一、红五军团随即向乌径开进，红三军团在湘南桂东以东地区撤至大庾东北地区。

△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提出“必须最严厉的打击那些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这一‘围剿’前面，表示张皇失措，对此无疑地是对于革命力量没有信心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机会主义的动摇”，要求苏区党尽量扩大与巩固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击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计划，争取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

6月25日 主持在瑞金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下仿苏联内战例，组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七月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周恩来任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经济、财政、劳动的动员事宜。

6月 主持在长汀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五月二十日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十七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苏区党大会前后工作的检阅及中央苏区党的目前中心任务》。决议承认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苏区中央局是犯了“不可容

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的错误，提出“中央苏区党的任务，应领导红军与广大工农劳苦群众，配合和响应全国工农革命斗争与各苏区红军的行动，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同时指出：“革命发展不平衡，在全中国目前还是存在的，如果以为国民党军阀已经无力进攻我们与新的‘围剿’不可能，这是极有害的‘左’倾词句。”

7月上旬 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水口圩地区发起水口战役，经过激战，共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入赣粤军退缩回大庾、南雄，中央苏区南部基本得到稳定。

7月21日 水口战役后，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赴前方。后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本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项英，报告红一方面军与粤军作战后，在信丰、南雄一带休整训练筹款的情况，提出红一方面军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进，准备与国民党军作战。

△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的指示信。信中继续批评苏区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全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面”，责成中央局“根据中央的指示来严格与切实的检查各部门的工作与进行彻底的转变”。

7月23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出下一步行动方针：须迅速过河，并须以极迅速的行动打击宁敌。要估计到粤敌仍有增援可能，迟缓则将增加困难。

7月25日 鉴于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

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复中共苏区中央局：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截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

7月27日 致电中共江西省委，告以红一方面军已向北开动，将经过小溪、雩都到兴国。要求省委在红军经过的沿途，做好慰劳红军的工作。

7月29日 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详细报告池江、水口圩作战经过，说两战虽胜，但只是打成击溃战，教训在于：行动迟缓犹豫，分兵应敌，未以全力对付粤敌。在谈到下步行动方针时，再次强调“在赣州上游渡河成为不可能，如准备与敌人作战后再渡河，则敌又有凭河而守以稽延我军行动的可能”，“你们说河东决战可能极微，是不尽然的。只要行动迅速，必能给敌人各个击破”。鉴于中央局仍坚持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信中再次陈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坚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

7月30日 由雩都转赴兴国。

7月31日 致电尚在途中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告以国民党军布置，说：南丰一线敌二十师有三团伸出白舍、罗坊，在宜黄、乐安为高树勋部。我意红十二军可经宁都、广昌，配合红

二十二军。在白舍、罗坊敌力不强、后援较迟的条件下，先进攻白舍、罗坊消灭该敌。

8月初 主持在兴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消灭驻守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进而威胁与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反“围剿”斗争。并决定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会后，周恩来随军行动。

8月8日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布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8月上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兴国会议决定的红军行动计划，说：当南雄胜利后，因战略战术有错，未能乘胜渡河，中央局指示渡河困难，但未引起前方注意，未立即改道沿赣河东岸北上，在信丰龙南迟延十数天是一错误。

8月13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乐安、宜黄一带敌情和红军北向行动的作战部署。十五日，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我军决以迅速坚决秘密的行动，先攻乐安、宜黄消灭孙连仲大部，乘胜攻南丰、南城消灭朱部，开展赣东一面，求得巩固的向西近击陈、吴等师增援部队，以更有利的取得赣江下游中心城市。

8月17日 红一方面军攻克乐安，二十日攻占宜黄，二十三日乘胜占领南丰，共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大部，俘五千多人。

8月24日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军抵南城近郊，发现国民党军已集结十七个团的兵力，且城防工事坚固，强攻不利，当即决定放弃攻城计划，改令红军在南城、南丰、宜黄间做发动群

众的工作。二十七日，周恩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这一情况，说：南城内外险要，工事坚固，硬攻未易得手，下一步行动计划为俟西来增援吴、陈各部进至相当地点，便给予迎头痛击，以消灭敌人主力。

8月27日—9月15日 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第十二次全会。会议认为中国“已出现革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反帝斗争中应“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

8月28日 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致电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提出：我主力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应绕至乐、宜一带，从敌之左侧背，给以各个击破。

8月底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电文分析红军攻占乐安、宜黄两城后的敌情动态，指出国民党军已注意固守城镇，正积极筑路，做工事、炮垒。对此，必须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攻其要核，能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这点很重要”。

△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红一方面军撤至宁都县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待机。

9月3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提议：我军应集结东韶、吴村、洛口一线，坚决打击南进之敌，但我军现在颇疲劳，应有两天以上的休息，并作大的行动。

9月5日 连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敌情变化和红军所在位置，说：目前战役将在东韶、水口、洛口一带，我决集最大力量决战。

△ 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第七期发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与中国工农红军当前的任务》一文。文中提出红军当前的任务是坚决地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以胜利的

进攻，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既要反对对此悲观恐惧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也要反对忽视敌人“围剿”而不去进行广大群众的战争动员的“左”倾错误。

9月7日 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致电周恩来：这次方面军北上，虽表示其行动迅速秘密的进步，但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吴则是缺点。这将造成敌人更积极向苏区中心前进，使之受敌摧残，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关于行动方针仍以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为最有利。

9月8日 电复中共苏区中央局，不同意袭取永丰的行动方针，说：敌之目的在驱逐我军，恢复据点，攻入苏区。我军五号始在东、洛集中完毕，西袭永丰不仅疲劳未恢复，且敌军将先防我西进，袭取永丰将成为不可能。强调说：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七天绝对必要，已令二十二军及十二军在宜乐、宜南之间广大发展游击运动与新苏区。

9月上旬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前方获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在反“围剿”中分兵作战的计划后，电复湘鄂西分局，指出：分兵作战只有利于敌人，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面，各个击破敌人。并强调说：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9月14日 致信中共江西省委余泽鸿、聂照良，建议做地方工作时尤其是在赤白交界地区应注意政策，不要乱打土豪，造成赤白对立，并以实际行动的影响开展争取群众的工作。

9月17日 在宁都小元地区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自兴国北上宜黄、乐安，在赣、抚河之间转战月余所见情况。信中指出：“西从固县，经招携肖田，东达甘竹——这一线以北，在永、

乐、崇、宜、南、抚、丰、黎之间，有一块极大的地区，纵四五百，横七八百里，还完全没有赤化。”提请中央局和江西省委重视这一地区的工作，并且纠正红军主力在河东不能发展和地方离开红军不能发展以及忽视白区工作的错误观念。

9月中旬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获知鄂豫皖红军在反“围剿”中作战失利，撤离苏区后，电复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的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9月23日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步行动方针，说：“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同时表示：“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当敌情变化“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

9月24日 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申述前方确定的行动计划的理由，说：“据我们看来，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的办法。当然敌情不是不变的，敌情一有变迁，我们仍当迅速的找住敌人弱点，实行攻击其一方以便各个击破。”信中针对前方在作战指挥中

存在议而不决的问题，提出应改变目前的作战指挥方式，说：“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而“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在检阅时予以批评，否则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表示本应回后方一行，“将前方对于群众工作的心得贡献到中局”，但因王稼祥、毛泽东主张中央局来人到前方开会，故建议后方中央局同志到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9月25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复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下步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配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近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需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提议即刻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等问题。

9月26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复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

稼祥，坚持“向西进击永丰”的意见，提出：如在轻敌之下分散布置赤化工作，则不但将失去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稍缓即逝的时机，而且有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并以“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的理由，表示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表示：目前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师，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队。此点，请中央局特别注意。并且坚持中央局全体会以项、邓两同志回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

△ 朱德、毛泽东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做一时期争取群众、发展苏区以及加强本身训练的准备工作，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与消灭敌人的条件。

9月29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九月治（二十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三十日，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恩来：“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方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去深刻领会攻取宜黄受分散所造成之严重的错误教训。”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要“给以无情的打击”。

9月30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转告中共临时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国民党军即将倾全力向我中区及赣东北取进攻之势，我方须立即紧急动员警戒，

并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望即定军事动员计划。

△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复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我们估计到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并已首先向赣东北、湘鄂赣摧残进攻，提议全苏区紧急动员起来，布置中央苏区与湘鄂赣、湘赣、赣东北的配合行动，并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局全体会议上决定军事行动计划。

10月3日—8日 主持在宁都小源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接受临时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和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决定立即紧急动员起来，采取积极迅速的行动，在国民党军完成合围前，主力红军首先北向出击，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以粉碎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会议过程中，“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后方中央局成员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强调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这种“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集中批评了毛泽东，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也批评了后方同志对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指出了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留在前方。为此提出在两种办法中选择一种：“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但因与会的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

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

△ 会后，和朱德率军从广昌出发，赴前线指挥作战。临行前，到毛泽东处道别。

10月9日—11日 分别出席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军团干部会并作报告。

10月10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邓发、顾作霖：现主力红军已集结苏区边境，准备由东北出击敌人，消灭敌人一面，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并求得与赣东北联系起来。

10月12日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布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10月1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我主力红军遵照中央电示及中央局决定的方针，决以广昌之东北为出击点，首先打击周志群部，进占黎川、建宁、泰宁三城，赤化宁化、建宁、广昌之间的一片地区，打通与赣东北的交通，附带地解决给养棉衣问题，并集结兵力，准备求得战争。

△ 在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名义发布的红一方面军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上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此后，所起草的作战文电在报送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同时，也报送临时中央政府。

10月17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批评江西省委违反宁都会议的决定，拖延把省委迁到宁都一事，指出：这仍是对目前敌人大举进攻的忽视与估量不足，“证明我提出以主要火力反对等待

主义同时要反对松懈动员工作的右倾的绝对正确，绝对不是调和结论”，提议中央局必须与和平保守和松懈动员工作的错误作无情的斗争。

10月18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连克黎川、建宁，十九日再克泰宁，二十二日又克邵武。

10月21日 得知红四方面军在河口战役失利后，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鄂豫皖分局，提出：“四方面军本身目前应力求避免与敌人强大主力作战，应迅速行动，选择敌人弱点，突破一方，愈快愈好的脱离敌人包围线。”强调“要严防部队中右倾的情绪发生，对不顾一切的乱拼也要反对”。

10月26日 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0月29日 和朱德、王稼祥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国民党军正将第四次“围剿”的重心从湖北移到江西，加速布置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号召全体红色战士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消灭敌人，争取比第三次反“围剿”更大的胜利。

10月 蒋介石在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的“围剿”以后，把“围剿”的重点转移到中央苏区。

11月8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攻克福建省光泽县。十七日，再克江西省资溪县。十九日，又克江西省金溪县。

11月9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敌已在找我主力作战，我军已严为戒备，如西南之敌再东进，我决集中黎川东部与之决战，将不待敌会师，击破一面。敌进如较缓，我军拟在黎川集中训练十天，缝好冬衣，增强士气，并补入新兵。

11月12日 宁都会议后，有的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曾

批评周恩来“在斗争上是调和的”。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本日，周恩来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分别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的经过和争论情况。后方中央局成员在电报中说：“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并且“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周恩来在电报中表示：“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但“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临时中央接到这两份电报后，电复苏区中央局，指出：“中央局会议所取路线与一般的方针是正确的”，“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恩来同志在会议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复电强调“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11月13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报告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考虑，说：“我如不能破坏敌之大举进攻布置及其各个击破企图，在政治上将铸成大错，贻战争以极不利之地位，故我方面军以出东北为最有利。”

11月14日 任弼时致电周恩来，认为出击东北国民党军的行动计划，主力离根据地太远，有被截断归路的危险。二十二日，项英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也对这一行动计划提出不同意

见，认为不应久留这一地区，以回向光、邵，争取时间向东开展局面为宜。

△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湘赣军区总指挥蔡会文并转中共湘赣省委，批评他们轻与国民党军作无目的的战斗遭致损失一事，要求“应力戒浮躁轻率”。指出：湘赣苏区与红军应积极地与敌人进行运动的战斗，集中力量给敌人弱点以重大打击；地方武装应依据着现有的根据地，采取强有力的出击防御，不断主动地到敌人侧翼后方去行动，尽可能地牵制、阻碍、麻痹和疲劳更多的敌军，在各方面组织战斗消灭敌人，以便利我主力军选择一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

11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向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发布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训令指出：红一方面军在一个多月的作战中，连占七城，赤化建宁、泰宁、黎川，扩大苏维埃领土数百里，破坏了敌人大举进攻的封锁和包围的布置与其各个击破我们的企图，现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要求红军全体指战员“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抛弃一切动摇，来争取战争胜利”。

11月26日 接到中共临时中央询问执行进攻路线的情况和苏区中央局领导是否团结一致的来电后，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以下列内容电复临时中央：“中区执行进攻路线确有成绩，首先是红军采取积极运动的路线”，并“已划分全苏区为三个作战地区，组织各个战线上基干红军与基干游击队，实行运动的战斗，并布置有力的防御”；“党内反倾向尤其反右倾斗争尚未发动到下层”，“最高领导是在为执行中央指示而斗争而团结一致，更无分歧的行动”。

12月1日 和朱德发布关于加强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密令，指

出：无线电已成为苏区红军主要通讯工具，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目前，必须使电队之组织与工作更加健全起来，切勿以其为技术人员而加以丝毫的忽略。

12月2日 和朱德发布关于加强部队军事政治教育的训令。训令指出：现在红军的政治动员很不深入，特别是军事技能更有落后的现象——这在敌人大举进攻中是不可容有的现象。要求必须加紧在战斗间隙，予以迫切的训练，重点学习《步兵战斗条令》、《步兵教程》等，进行单个战士、步兵班、连的教练。

12月12日 因部队给养发生困难，和朱德决定红一、红三军团向东出击福建邵武，以筹集资材。后因国民党军扼城固守不出，遂和朱德接受彭德怀提出的放弃攻邵武的建议，令红一、红三军团回师黎川，在附近地区继续筹款补充给养。

12月16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转临时中央，对临时中央来电要求红军攻打南城的指示，提出不同意见。指出由于国民党军目前采用“固守坚固堡垒工事，集结兵力待机出动”的策略，“我乃须另变战略”，“集全力引动敌人，求于运动战中解决之，如直攻南城，则敌集重兵于此，地形工事较邵武尤险，攻之于我不利”。

12月20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转临时中央：敌人在大举进攻布置齐备前，对中区主要是厉行封锁防御与袭击我方面军。现在决乘敌人撤兵固守西南之际，立即集中黎川，同时组织一特务师专门担任筹款与袭击敌人后方任务。如此集训后，即再出动以找蒋系主力决战为破坏其大举布置的中心。

12月21日前后 和朱德决定利用国民党军固守南城、南丰的机会，红一方面军进行战前整顿改编，着重精减机关，减少指挥层次，充实连队战斗兵员，同时进行战前军事训练。

12月27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湘鄂赣军区等，指出在国民党军即将对苏区大举进攻面前，红十六军主力决不应分散使用，应以独立师组织挺进队、游击队，到敌人侧后方广泛的发展和繁殖游击战争，号召群众瓦解敌军，应发动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从各方与敌人进行小战斗，以便红十六军集结兵力，选择敌人弱点进攻，避免同过于强大的敌人决战。

12月29日 在项英接连致电前方，批评前方没有计及节俭，称“若不深刻注意，对于争取整个战争胜利是有害的”之后，电复项英：“你始终认为前方未深刻注意财政问题，我不能同意。因既要不失时机的出击敌人，就必须集结备战，就不能从容分散筹款”。强调如果“只是认为未筹大款便是对于争取战争胜利有害，而不了解客观上困难，这将使主持战争的为难”。

12月30日 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命令。随后陆续调集约三十个师计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全面围攻，以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约十六万人为中路，担任主攻任务，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在黎川地区与红军决战。

12月31日 和朱德决定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红一方面军主力立即从黎川地区移师北上，到外线抚河流域寻机作战。本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转临时中央，报告抚河一带敌情动态和红军作战计划：我方面军决集全力，先迅速消灭金溪、黄狮渡之敌，占领金溪城，以得力部队游击贵溪、东乡、浒湾、南城各方，期吸引金溪西南方之敌，尤其十四、九十、十一等师与之决战，以消灭抚河之敌主力，破坏敌人大举布置。

1933年 三十五岁

1月2日 和朱德率军北上，向黄狮渡、嵩市一线进发。

1月5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攻克黄狮渡。八日再克浒湾。两役共俘国民党军四千余人，缴枪四千支。红一方面军再次占领金溪、资溪、东乡和光泽等地。

1月6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转临时中央，报告战况和下步行动部署，说：“迅速敏捷坚决主动与协同动作作为全部红军争取四次战争全部胜利的必要条件”，“现我军改取战备姿势，集结于金溪、左坊营、后车、黄狮渡一带，派队逼近南城、浒湾、贵溪游击，并以卅一师前出东乡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中解决，在这几天努力筹款与进行赤化”。

1月12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闽浙赣省委等：“你们应将作战重心转到信河南岸，以威胁抚州来吸引并钳制抚河敌军的左侧背，以便我方面军尽全力消灭抚河之敌，冲破两南崇宜之线”。要求他们与中央红军协同作战，打通建宁、泰宁、光泽、黎川、金溪、资溪、余江和贵溪等地，使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造成红军犄角之势，压迫赣江以东的国民党军。

1月16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等，建议领导机关下达的各种文件，“不仅要严格批评与纠正各种错误与倾向（这是必要的），并也应将许多成绩表扬出来，鼓励一般下级干部

前进”，“《红色中华》在这一点上太少注意了”，建议以后应注意改进。

△ 项英、任弼时致电周恩来、朱德，就今后行动部署提出意见，说：在敌人目前布置情况下，我们依托的安全后方各方感受敌之威胁，应迅速机动转移战场，调动敌人作战为宜。提议“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次日，周恩来电复任弼时、项英，申述红军数天来集结金溪、浒湾一带的原因，是为运送伤兵与筹款，说：“前方这几天不急征资材，何能连续战斗？”“转移地域作战固好，但须估计退回黎川又将成为等待，进击南城附近敌人则须背水作战”，“这两天必须先将十军接过河来，是为先着”。

1月17日 在日军攻陷山海关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表的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项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1月21日 和朱德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分析目前战局，提议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即将开始的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迅速消灭赣江、抚河流域的主要敌人，全国各苏区红军必须配合作战和集中统一指挥，“请中央、中央局给全国红军以原则上方针上的指示，以便前方能以电信直接指挥各地红军”。

1月23日 和朱德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急转临时中央，指出：在敌人即将大举进攻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赣敌人主力，成为四次战役（争）生死关键，亦

苏维埃中国胜负所系”。要求中央苏区各县须进一步加紧战前的动员工作，动员计划和军事后方的迁移、军事物资的存储，均须于一月底以前布置完毕。

1月24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前方负责同志，提出改变原定作战计划，要求集中红一方面军所有主力“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他”。强调其中“占领南城和南丰，是以上新作战计划重要的一部分”。并且表示：“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上述指示。

1月26日 电复中共苏区中央局并速转临时中央，申述说：在目前敌情之下，我军本日北出金溪，调动敌人之主力决战，获大胜利，并接应十军渡河配合，并无错误，更无以为敌人退却而不进攻的右倾观念。三月来我们时时注意及此，并未疏忽，时时以求得消灭敌人主力，击破抚河之围为目的。

1月27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转临时中央，说：“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剿’军还未组织完备以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攻城与消灭增援队，一有暴露企图，二有易受夹击的不利”。并且再次申述说：“我军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决无忽视敌之进攻与截击的观念。”

1月30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再次陈述强攻南丰、南城的不利条件，说：“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主张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并且强调说：

“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

1月31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二月六日，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在南昌设置行营，统一指挥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1月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等从上海抵中央苏区。其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约在六月改称中共中央局。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随即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二月十五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决定说，在闽粤赣省委内“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为此，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2月2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蒋介石到南昌后国民党军固守城防，增调部队的新部署，提出：我军在抚河东调动敌人似已无望，因不北向深入，不攻敌之要害，蒋可以部署为重，暂置不理。如深入，蒋可以一支较强游击队断我归路，逼我南返。因此，决定红一方面军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

2月3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陈述对重新划分作战地域决定的意见，提出：“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

2月4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指示，电告周恩来、

朱德、王稼祥，指令红军先攻占南丰，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指出“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2月7日 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坚持攻南丰的指令下，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提出红军准备作进攻南丰的部署。同时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如不便强袭，“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稍后，再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为着在连续的战斗中有更多的运动战好消灭敌人，同时在敌人进攻布置未完毕前仍可求得运动战，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斗力，如损伤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

△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以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且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到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要求中央局派代表来前方一行，以“明了前方作战与红军状况，我们亦有许多意见要当面陈述”。

2月9日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由黎川附近集结地区向南丰开进。十二日完成对南丰城的包围，傍晚对南丰国民党守军发动进攻。

2月12日 出席红一方面军师以上党团积极分子会议，作《在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四次“围剿”决战前面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并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布置，作了反“罗明路线”的报告。

△ 对红军的强攻南丰，陈诚令驻守南丰的国民党军第八师

据城固守，同时急令所属各纵队迅速增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

2月13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战况和敌情变化，表示因南丰工事险要，红军强攻未克，伤亡较大，且国民党援军将到，“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当夜，除留少量部队担任佯攻任务外，红军主力从南丰撤围，秘密向南丰、里塔圩以西地域转移。

2月22日 为调动驻守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南进，和朱德命令留在南丰城外的红军继续佯攻南丰，令红十一军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地区运动以吸引敌人，红军主力则秘密向西南运动，转移到宁都东韶、洛口地区隐蔽集结待机。

2月26日 国民党军第一纵队为配合其主力寻歼红军于黎川地区，以右翼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从乐安分两路向宜黄南部的黄陂地区前进。

△ 和朱德命令红军主力冒雨从东韶一带的集结地点秘密北进，在黄陂一线山区隐蔽接敌。

2月27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在黄陂地区伏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经过两天激战，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全部和第五十九师大部，俘师长李明、陈时骥。

3月2日 和朱德命令红一方面军向宁都小布、南团、东韶、水口地区集中。四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下步行动部署：我军拟俟集中后，仍选敌一翼于运动战中消灭之。

3月上旬 国民党军在黄陂战役后，调整部署，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将中路军缩编为前后两个纵队，梯次轮番向东南搜索前

进，企图在广昌地区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3月16日 为迷惑和调动国民党军，和朱德命令红十一军向广昌开进，以吸引并抑留国民党军前纵队，红军主力则待机侧击国民党军后纵队。

3月20日 和朱德签署红一方面军作战命令，指出国民党军后纵队第九师将到东陂，第十一师将到草台冈、徐庄附近，要求各军团各军立即作好战斗准备，“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3月21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向进入草台冈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第十一师发起攻击，经一天激战，将其大部歼灭。次日，又在东陂歼国民党军第九师一部。国民党军前纵队见此经南丰向抚州方向退却。黄陂、草台冈两役共俘虏万余名，缴枪万余支。至此，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3月25日—29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乘胜围攻乐安。因城防坚固，未克，遂令红军主力移向乐安西南，以期调动国民党军，继续在运动战中给以各个消灭。

4月1日 撰写《论敌人的要塞——（堡垒及炮台）与围攻乐安的教训》一文。文章总结了红军作战中的经验教训，指出国民党军在苏区边界上构筑要塞的企图“是要用野战军乘我军长久硬碰踌躇紧贴或留恋不舍（如攻赣教训）于某一要塞之下来消灭我们”。强调指出：“我军对敌人要塞用兵，应基于战略和政策必要上来决定，实行时又须依据当时情况来决定”，“一般说来，我们应先消灭敌的野战军，再攻取其要塞”。批评了“以为在要塞大空隙中不能作战，而主张专打要塞”和“以为打要塞是不可能的事，而主张不打要塞”的观点。

4月6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赣、闽西省委：北面敌人惨败，“围剿”中粤闽敌将渐居重要，现除利用目前时机大踏步向北发展外，赣闽两省应即加紧南方战线的工作。强调目前应“主要布置运动防御”。

4月10日 和王稼祥致电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各军政委、政治部主任，要求红军在待机出击中须努力争取所在地的赤化，强调指出：以赤色包围地方与以武力封锁城市，前者较后者尤能持久地围困敌人，便利红军由间隔中出击，使敌人失其支点的作用。

4月11日 和朱德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东移，留一部于新淦、永丰间迷惑引诱国民党军，以调动其在运动战中相机各个消灭之。同日，和朱德签署红一方面军东移凤岗圩地区的命令。此后，因国民党军慑于红军威势，坚守不出而未获战果，成相持局面。

4月14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转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对军事计划的指示以及对红一方面军最近行动的批评，说：“不要为着击破驻在乐安、宜黄、崇仁的敌人力量的抵抗而将方面军束缚在大的行动中，应企图在堡垒的外面向敌人的实力取得胜利。”

4月下旬 询问代表中共临时中央来前线慰劳红军的博古，毛泽东是否已回瑞金（在此之前，一月间曾致电洛甫，要他劝毛泽东回瑞金），博古答毛泽东已回，在政府工作。

5月1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就中共临时中央对目前红军行动的批评进行申述，说中央“恐我军在宜乐之间为敌吸住摆脱不开，现无此危险，因我处待机位置，敌进易打则打，不便打则可转移地区”，而要红军迅速转移至永丰东南，这“正合敌人要求，因敌人目前首在驱逐我军于永乐之南”，“我军现仍以集结主

力于宣乐之间，引敌南进以便决战为目的”。

5月8日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提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至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由项英代理主席。同时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此后，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完全由中共临时中央直接掌握。

5月 撰写《从实际战斗中来认识战术原则》和《火力与突击》两文。文中强调“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和“运动成为步兵战斗中很重要的元素”的两个思想，指出：“我们要用少数的兵力放在次等方向，去抓住多数的敌军，以便抽出多数的兵力，在主要的突击方向，有把握的去消灭敌军。”两文收入八月出版的《红色战场汇刊》。

△ 蒋介石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再次设置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直接组织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6月上旬 出席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会议肯定了前一段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决定扩大红军一百万。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报告，在已经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形势下，强调红军中无罗明路线。会上，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周恩来保留原来观点，博古在结论中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会后，周恩来和朱德一同返回前方。

6月11日 和朱德等签发扩大红军的训令。

6月13日 中共中央局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告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拟定的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出

的关于夏季军事作战计划的指示电。电中批评红一方面军前段军事行动的缺点在于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以致对于北方的敌人，很少机会再给以有力打击”。为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提出从红一方面军调出若干部队，组成东方军团，进行分离作战。中共中央局强调要“切实执行这一作战计划”，提出以红三军团为东方军基干，入闽作战；红一、红五军团依计划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并要求迅速答复。

6月14日 电复中共中央局，就中共临时中央关于夏季军事作战计划的指示电中对红一方面军的批评进行申述，说：东黄陂战役后，除攻乐、宜外，方面军与敌战斗凡十二次，每次敌损失一团左右兵力，决不能说在北面战线没有设计削弱敌之主力。并针对命令入闽作战一事，说：须估计到对清流、归化、将乐、邵武等地的攻击必须时日，六七两月正是给养最困难的时候，清流泉上一带是贫瘠的地域，目前方面军已有断炊之虞，不知你们估计到否？

6月16日 致电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等：“在围攻宜城，挺进龙骨渡上顿渡以东，逼近抚州十五里，敌人大震动的前线指挥中，加之以非挺进筹款便断炊的时候，限二十四小时答复，整个改变部署的意见，并先以中央局的决定告诉我们，无论如何是要妨碍和动摇我当前指挥的注意与决心的，提出诚恳请求宽限答复。”

6月17日 和朱德电复中共中央局，表示原则接受夏季作战计划的方针，提出：暂时抽调一部分主力，但不能过分削弱主力，去领导东方军削弱和消灭敌人的羽翼，分散和各个击破敌人以增强我们自己，但须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和矛盾，须充分估计敌我力量对比与地形物质等等条件。同时强调指出：该计划中“许多

具体规定须加考虑与修改，才能实现这一行动的总方针，否则预先可看到的将不能达到他所预想的要求”。

6月18日 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局，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夏季作战计划，提出具体作战部署，同时对计划提出不同意见，坚持“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指出东方军入闽作战是“酷暑远征”，“在选择敌人方面，攻清流、将乐又将陷于攻坚”，主张“东方军以活动于建泰将乐邵光地区为合宜”，“这不仅较打卢兴邦十九路军易于求得补充，并容易求得运动战，且对于赣东北目前严重现象也给了直接援助”。

△ 电复博古、项英，对他们十七日两电指责前方贯彻沪电（即夏季作战计划）不力的批评进行申述，说：“正因有沪电，关系全盘利害及前途，故在同意他的总路线下，须仔细考虑他提出的具体步骤是否能够达到他所预期的要求，而不致将两月时光空空过去，甚至影响到许多不对（部队）的减员与减弱战斗力，这必须从敌情地形物质条件与我们的任务各方面加以估计。”并表示：如果我们待机是守株待兔，当是错误，但自东黄陂战斗后，每次转变阵势确是有机可待。

6月23日 在接到中共中央局二十二日严厉斥责的两电后，电复中共中央局，表示：“绝对服从你们命令，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

6月30日 中革军委决定以举行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七月十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个决定。

7月1日 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发布命令，以红三军团（缺第

六师)和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计划东出福建清流、归化地域，然后北进将乐、邵武到赣东北；八月间在抚州地区与方面军总部会合，形成对赣军的夹击之势。同日，东方军由广昌地区东进，五日到福建宁化以西地区，开始入闽作战。

7月10日 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周恩来，改变原定东方军作战部署，提出主要突击方向不应向着沙县，而应向着清、连。

7月11日 和朱德连电中革军委，不同意改变原定作战部署，指出：在敌未动之先以红三军团主力过清流河猛进不妥，现红三军团每日搜山征发，只吃两餐稀饭，尤不利这样行动。同时指出：闽省不利游击，各河流急水深，运动大兵团不便，加以天热多病，红三军团沿途已留下五百多伤员，请你们决定部队行动时稍稍顾及此点。

.△ 致电博古、项英、刘伯承，再次申述不同意改变原定作战部署的意见，说：“实行上海计划第一阶段，目的在尽可能求得运动战中消灭卢部与增援之十九路军，但在战略实行上必须有步骤且须以极坚决的信心与一贯的路线赴之。”并恳请说：“除直接通知敌情与紧急危险时的处置外，项代主席请勿直接电令彭、滕、周、曾，使他们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这在战斗中大忌。”

7月16日 在接到中革军委命令东方军迅速消灭驻守四堡的国民党军的急电后，和朱德电复项英、博古、刘伯承：这使我们命令彭、滕发生困难，如此部署是否能适应变化，不能有很好把握，但已令彭、滕努力争取。并敦促后方火速解决东方军的粮食问题。

7月20日 致电项英：我们争论并非企图不同，更非执行上海计划不忠实，你何以喋喋虑此？并且强调指出：在战术问题上须估计到当时当地敌情、地形与我兵力、给养条件等，我坚决执

行已定步骤（每一步骤是有前后接应的）达到胜利。

7月中下旬 中共中央局连电周恩来，转告共产国际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连续发来的对红一方面军改变其拟定的夏季作战计划的意见。共产国际表示：我们仍然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对于军事策略的建议，绝不能当作在军事行动中纯粹采取防卫路线的提议。必须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

7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说：“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提出“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

8月1日 出席红一方面军为庆祝“八一”建军节而举行的阅兵式和前方军事比赛大会，并作总结报告。本日，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一等红星奖章。

8月5日 在红一方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作《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央区红军的紧急任务》的报告，要求中央区红军应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以常胜的英勇精神，粉碎国民党军五次“围剿”。强调要建立各方面的正式战线与游击战线，创造众多的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8月7日 致电中共中央局并转项英等，对中革军委轻率改变东方军作战部署一事提出批评，说：在上海计划未实现前，我有不同意见，不断提出。既经决定，我坚决主张应依照一个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不要因暂时危险与变动转移已定路线，必要的修改不应与其基本原则相反，因为原则变动过多，这个计划便残缺不全，失去中心是军事大忌。同时表示：军委电令不变，仍绝对

遵照执行。

8月12日 东方军自入闽作战后，先后攻占归化、清流、泉上、连城、白砂等地。本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提议：东方军进入第二阶段之目的在求得继续消灭闽敌一二个师，于运动战中以破坏赣敌的东方侧翼并藉以分散闽敌兵力，最后集结强大的优势兵力出现邵武、光泽、资溪之间，寻求敌之五六两师突然袭击之。以便迫使赣敌移动与重新集中，造成中路军北向的有利条件。

8月15日 根据中革军委八月十三日电令，和朱德致电彭德怀、滕代远、林彪、聂荣臻、董振堂、朱瑞，部署下步作战任务，令东方军经归化、夏茂地区，于八月底以主力攻占洋口、峡阳等地，消灭洋口、顺昌、将乐地带的国民党军；令由红一军团等组成的中央军担任钳制正面国民党军的任务，并破坏北线国民党军的碉堡封锁线，打击筑碉部队；令红五军团组成抚东支队。

9月3日 鉴于驻守信江的国民党军第四、第二十一师南下，进犯中央苏区，且东方军一时无法攻克顺昌、将乐等坚城，和朱德连电中共中央局，报告已令东方军于四日结束战斗，“集结延城附近，准备回师”，并作了迟滞国民党军南下的布置。七日，中革军委电复朱德、周恩来并转彭德怀、滕代远，坚持要东方军消灭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基干兵团，完成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后再回师北上。

9月4日、6日 和朱德并红军全体指战员两次致电在上海召开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祝贺会议召开，表示坚决与全世界反帝战士一致行动，以“百战百胜的铁拳，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五次‘围剿’，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9月8日 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瑞金，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

9月12日 接到中共中央局转来的共产国际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从上海发来的指示电。电中提议延长东方军在福建的作战时间，在闽浙边界的崇安、浦城、松溪一带创造一个广大的游击区域。本日，周恩来电复中共中央局并转上海，指出这样一来，“北上期必更延迟”，“五军团调一个师东去，在目前只打将、顺、邵敌人实无必要”。十三日，再电博古、项英并转上海，强调：实行沪电第一步关键在“求得胜利的结束东方战斗，迅速北上”。并提出了东方军回师路线与作战方案。同时表示：“沪电主要作战方针，我是同意的。当然在执行时还须随情况改变以扩张战果到最大限度。”

9月14日 中革军委电复朱德、周恩来并转彭德怀、滕代远：顺昌、将乐未打下，将束缚我军不能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方向，且保障我后方交通线周旋较难，故现应力求在决战前，打开顺昌或将乐。要求东方军迟于二十日若干时间再行北上。

9月22日 蒋光鼐、蔡廷锴于八月间秘密派遣代表吴明（陈公培）到延平前线与红军联络。本日，周恩来致电项英、彭德怀、滕代远，建议派袁国平到福建西芹地区同吴明面谈，进一步了解蒋光鼐、蔡廷锴派代表到红军驻地的真实意图。

9月24日 鉴于东方军围攻将乐、顺昌一月仍未攻克，而北线敌情已日益紧张，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提出：必须“迅速结束东方战斗，否则将会失去剪除赣敌左翼良机，坐视其抢先集中抚河”。二十五日，再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提出：东方军必须最大限度集结兵力，以最大机动求得胜利地结束东方战斗，不

为坚城所系，不为强敌所滞，以便能在运动中灭敌一部，赶早北上。二十七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地区，会合抚西红军，以全力与国民党军在抚河会战。

9月25日 国民党军乘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之机，以四个师的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方重镇——黎川，开始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二十八日，占领黎川。

9月28日 获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连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抚东战局因我为将乐、顺昌坚城所系之误，将使赣敌得先筑据点以守，现我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建议“东方军与中央军会合”，“目前行动仍以先剪除赣敌左翼为方针”，并提出具体作战部署。

10月2日 博古、李德为急于收复黎川，由李德制定了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以中革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命令东方军兼程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以及黎川附近之敌；命令中央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牵制驻守南城、南丰的国民党军。

10月4日 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目前敌既抢先着，我东方、中央两军主力必须首先靠拢，并派有力支队加紧向赣敌两翼活动，迷惑与分散敌人，以便主力决战。”六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报告具体作战部署。同日，中革军委电复朱、周，强调说：无论任何情况，中央军不得过抚河，以后你们决须根据军委意图。

10月10日 接彭德怀、滕代远报告攻击硝石受阻的电报后，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硝石东南为河所阻，恐亦不易强攻，东方军应以一部继续作有力佯攻，催促敌援主力，集结机动消灭援敌。”十一日，和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滕代远等并报中革军委：“我东方军各兵团在目前几天中须以最大的积极活动，尽力求得阻止和迟滞敌人集中（但不应强攻堡垒，不应向阵地战的敌

人作正面攻击），以便东方军能用大的运动机动包围和迂回，争取在有利条件下首先侧击行进中敌之部队来扭转局势。”

10月22日 根据李德制定的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红一方面军进攻国民党军重兵扼守的硝石未克后，本日又向资溪桥发起进攻，连攻四日未能占领。周恩来鉴于红军在上述战斗中连续因分兵受挫，建议中共中央局集合红军主力向资溪、光泽或黎川的外翼，觅取战斗寻机歼敌。此项建议未被采纳。

10月26日 吴明于月初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秘密到达瑞金。双方经过谈判，本日，由潘健行（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徐名鸿代表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临时军事疆界线，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等。

11月4日 和朱德致电彭德怀、滕代远并报中革军委，提出红三十四师的作战部署，指出：“敌以分散的村落战与我持久，一部不能解决战斗则不利过早暴我主力”，强调“一切行动都为引敌出战，须以极度紧张极大机动，临之尤重本身侦察”。

11月7日 根据李德拟定的中革军委作战计划，和朱德作出红一方面军的具体部署，命令红三、红七军团进攻浒湾、八角亭，想以此调动南城、南丰的国民党守军在运动中歼灭之。激战两日，未能夺取浒湾、八角亭，也未能调动国民党军。

11月20日 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和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 中革军委致信红军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检查未能迅速撤去将乐、顺昌之围，迟缓了开赴东北去的所必需期限，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同时批评说：方面军首长是动摇的，对军委

的一般意旨没有了解，对敌人计划的估计，与中革军委的不同，一到执行命令的时候就越发明显起来。

11月24日 致电中革军委，并以红一方面军名义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报告福建事变后的敌情变化，指出蒋介石目前正推延进攻中央苏区，调集兵力东进由浙入闽，以资光为入闽辅助和侧击方向，镇压福建政府，敦促早为决定红三、红五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钟贤、嵩市、贵溪等方向前进的国民党军入闽部队。

△ 和朱德致电刘畴西^①、曾洪易、寻淮洲^②等，指出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要求赣东北和闽北抓紧这一机会：（一）广泛发展上述地域的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二）集中红七军主力准备随时可以截击或尾敌之行动部队，意在消灭敌之实力，切忌正面迎击与强攻堡垒。

11月25日 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的训令，强调“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

11月27日 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报告闽赣浙方面敌情变化，说：赣敌向闽北行动由浙边入浦城已不是主要路线，由金、资入光泽、邵武，将是主要道路。提议在资光间组成新独立团并令闽北独立团移在邵、光以北活动，令陈毅尽力迟阻敌之进扰。

11月29日 和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下达截击国民党军吴奇伟师的命令，强调这一截击应是迅速突然短促的，然绝对不应正面强攻，要求林、聂依照实际定出更具体布置。

① 刘畴西，时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

② 寻淮洲，时任红七军团军团长。

12月5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批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因此“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断言“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12月11日 出席在建宁召开的闽赣省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并作形势报告。

12月12日 红三军团在黎川城东的团村与国民党军十二个团激战。由于按照博古、李德决定的作战方针，和红一军团分兵作战，仅打成击溃仗，大部国民党军得以逃脱。十三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报告团村战斗情况，说：昨日团村战斗，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不至如此。提出目前“我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在一般干部乃至战时将新战术应用，尚未了解与熟练条件下，常不能达到高级要求的胜利，且常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建议应立即集中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主力在东山、得胜关与入闽的国民党军主力决战。

12月13日、14日 中革军委连电朱德、周恩来，不同意前方提议，并下达重新布置密令，将红军主力西调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而不向东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四次变更作战命令。

12月16日 致电博古、项英，对中革军委下达给前方的命令屡次变更，造成部队指挥混乱一事提出批评，再次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请”。

12月20日 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

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作战，实际上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军队。本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等：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组织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方面军司令部即回瑞金。

12月22日 和朱德致电红三、五、七、九军团：依据最近几个侧面袭击战斗的教训，应切忌正面强攻与相持恋战，要力求在敌移动中从侧翼进行最短促干脆的突击，最好是用优势兵力找敌弱点，迅速扑灭其一部。

12月28日 和朱德连电寻淮洲、乐少华^①：入闽敌军右侧正对着闽中苏区，且后方延长，给闽中部队以活动和发展的机会。要求他们积极扩大并发展闽中游击战争，不断截击邵、顺间敌人后方联络部队及进行一切破坏工作。并与十九路军士兵亲善，在反蒋反日的共同行动下进行政治工作。

① 乐少华，时任红七军团政委。

1934年 三十六岁

1月4日 和朱德从前方返回瑞金。

1月6日 博古、李德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连续失利，把黎川失守的责任归咎于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称肖为“退却逃跑主义”，下令逮捕肖劲光，并决定在党内、军内开展斗争，反对以肖劲光为代表的消极路线。本日，周恩来出席公审大会，并被中共中央局指定为公诉人。公审大会判决肖劲光五年徒刑，并开除党籍、军籍。^①一个月后，肖劲光被释放，到红军大学任战术教员。

1月上旬 为援助十九路军在福建延平地区抵御入闽国民党军，布置杨尚昆率红三军团东出延平地区截击国民党军，并给该军团配备了一个炮兵营。随后，红三、红七军团即向沙县地域移动。但当红军赶到延平时，国民党军主力已过，无法扭转整个战局。

1月13日 起草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出的致福建人民政府

^①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周恩来找肖劲光谈话，指出是搞错了，恢复肖的党籍、军籍。后曾多次检查这一错误。延安整风期间，又专门同肖劲光谈话，说：把你搞错了，这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至今深为内疚。

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电。电文指出：“目前情势，福州既濒危急，人民政府已在危险之中”，提出为挽救危局的六项紧急建议，敦促福建人民政府应立即实践其宣言中及协定上所允诺的人民民主权利，向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宣布为反日反蒋，只有与苏维埃和红军合作到底，并采取一切有效方法与联合一致的军事行动。

1月15日—18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前，未让周恩来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通过的《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提出：“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强调在党内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被指定作闭幕词。

1月21日 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题词：红军烈士们的英勇血迹，凝结成铁的红军之不可战胜的力量，写下了国内战争光荣的历史。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与战争的烈火当中，我们要继续烈士们牺牲精神，为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奋斗到底，为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流尽最后一滴血。

1月21日—31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前，曾就洛甫代替毛泽东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询问博古，提出“似无此必要”。博表示“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未予理睬。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月3日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月7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开幕会上的致词中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十二日，在会上作题为《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的胜利》的报告，说：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的胜利。在谈到红军目前实行的堡垒战、阵地战时，强调指出：“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我们要进行运动的防御”，“从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这是最有把握的”。

2月 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后，将入闽部队组成东路军，和先已成立的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相配合，形成对中央苏区的合围之势，重新开始进攻。

3月13日、18日 先后在中革军委会议和红军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论持久战》的报告，分析国民党军在五次“围剿”中的战略战术特点，提出为粉碎国民党军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术，红军在学习阵地战、堡垒战的同时，应注意发挥自己的特长，“使堡垒战、阵地战的胜利，能够配合着我们基本的运动战的胜利，来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4月2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畴西、聂洪钧并转方志敏，指出：目前蒋敌主要进攻方向在北线是向广昌，依靠堡垒主义战术步步前进，封锁我们，紧缩苏区，并企图以持久战消耗我们，求得最后决战。指示闽浙赣军区应集中和扩大红十军，在运动战中打击和消灭敌人的进攻部队，同时“派遣得力的独立部队，伸入到浙西活动”，发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征集资材，创立新的苏区，并首先要不断破坏杭江水陆交通，以达到有力地调动敌人，增援浙江的目的。

4月上旬 蒋介石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广昌进逼，企图首先占领广昌，打开中央苏区的北面门户，进而攻占瑞金。

4月中旬 为进行广昌战役，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九个师的兵力，全力保卫广昌，与国民党军“决战”，由博古、李德赴前线直接指挥。为此，中央决定在前方成立野战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周恩来在瑞金留守中革军委。

4月28日 广昌战役中，红军虽集中主力，苦战十数日，但由于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尽管予敌重创，但自己亦遭受很大伤亡，仍无法守住广昌。本日，红军被迫撤离广昌，转移到贯桥、高虎塹一线进行防御。

4月30日 致电博古、朱德、李德：我们主力经长期战斗相当疲劳，有损伤，新兵多，干部缺员大。尤其广昌战役后，极需有把握胜利和极大机动。

△ 撰写《红星》第四十期社论《广昌虽然陷落了，我们无论如何要粉碎敌人！》。社论指出：严重的形势摆在我们面前，历史给我们的时间是很短促的了。需要我们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顽强性，不动摇地执行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号召，一切工作集中在战争的动员，一切动员为着前线的胜利。社论在列举目前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若干表现时，把“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兵把口子”也分列其中。

4月 应中共鄂豫皖省委要中央派遣军事干部的要求，根据中央的决定，派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前往。行前，同程子华谈话，分析鄂豫皖苏区的形势，部署工作，指出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鄂豫皖红军主力应当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就能把敌人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苏区的压力。留下的一部分红军，可以长期坚持。后鄂豫皖省委根据这一意见，决定红二

十五军西征，留下红二十八军坚持。

5月17日 和朱德、王稼祥发布《中革军委关于划分军区分区及其目前任务的命令》，将中央苏区各军区及下属分区重新划分为五个军区：江西、赣南、粤赣、福建和闽赣军区。要求各军区在国民党军的远近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钳制和吸引国民党军，协助红军基干兵团机动作战，以争取决战的胜利。

5月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

6月10日 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曾数次就打“阵地战”和“多路分兵”的作战方针问题同李德争论。周恩来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使红军保持优势和机动的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遭到拒绝后，仍尽力进行补救。本日，致电博古、朱德、李德，答复对阻遏头坡东北国民党军前进部署的意见，说：“头坡以北，不利作战，惟可调三军团一个师，参加十三师突击，既可迟阻陈敌，更可诱惑吴敌前进，而一军团及三军团主力可仍留原地待机，至注意各方情况变动，以便进行新的机动。”

6月14日 致电博古、朱德、李德，对前方拟派红一师到河东攻击国民党军邹、孔两师的方案提出不同意见，说：“天雨河水不能徒涉，预先移过东岸又最暴企图，且前临大水背靠封锁，地形极不利，我意请你们重新考虑，放弃这一战斗。”

夏 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7月初 中共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指示红七军团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后方。七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由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率领，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界前进。因时机已晚，兵力单薄，没有实现调动国民党军的任务。

7月10日 为《红星》第五十三期撰写社论，题为《纪念“八一”我们要消灭敌人在苏区门内，要瓦解敌人在他们的背后！》

7月上旬 国民党军集中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博古、李德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作战方针，在前方指挥各路红军节节抵御，同国民党军打阵地战。在以后的高虎垴、万年亭战斗中，虽给国民党军以重创，但红军伤亡亦很大，最后不得不撤出高虎垴、万年亭，退至驿前等地设防。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声明：为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中国工农红军在反击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决定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提出五项抗日主张：（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领土主权，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伪满洲国；（二）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宣布一切中日秘密条约和协定无效，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对日作战；（三）武装全国民众，组织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积极支援东北义勇军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四）没收日寇和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停止支付一切中日债款本息；（五）普

遍地组织民众的反日团体。

8月1日 出席在瑞金大埔桥红场举行的“八一”阅兵典礼和授奖典礼大会，并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战斗任务的报告。

8月7日 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在任弼时等率领下，自湘赣苏区突围西征。

8月18日 为《红星》第六十期撰写《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我们要坚决地挺到敌人的后方去，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求得整个的战略部署的变动，以在运动战中消灭白军。

8月31日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完全被突破，西线和南线也更加困难。

9月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博古在决定留苏区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时，仅就军事干部名单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

△ 为进行转移前的各项准备，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项英等签署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的《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关于军团后方勤务组织的命令》、《采取具体步骤减少和消灭减员现象》的通知和《关于巩固和扩大地方部队及自给问题的训令》等，强调“目前部队管理与指挥的首要原则为最高限度的保全有生力量，特别是干部及现有物质资材”。

△ 和朱德主持同陈济棠的停战谈判。

9月1日 获知陈毅在战斗中负伤后，即令总卫生部赶送药品，并派医术好的医生前去治疗。本日，和朱德致电红六师师长彭雪枫并转李富春：同意陈毅同志回博生休养，但须看途中担架是否适宜，并待稍愈时即来瑞金休养。

9月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信寻淮洲、乐少华并转曾洪易，下达对红七军团作战计划的补充指示，要求他们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并在进军途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以扩大影响。

9月21日 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二十一师、红二十三师合编为第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

10月上旬 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去寻邬同陈济棠^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旭初谈判，叮嘱潘、何要“勇敢沉着，见机而作”。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往来；（三）互通情报；（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借道路，各从现在战线后退二十里。这个谈判为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作了有利的准备。

△ 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向兴国、雩都、瑞金等地集结，令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国民党军随即进占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

△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坚持斗争。

10月9日 接陈毅报告自己的伤情和要求做手术的来信后，当即和朱德令卫生部长贺诚取出已装箱的医疗器械，派两名医生为陈毅进行手术治疗。并在次日赶到医院看望，说：中央决定留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丰富，特别是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苏区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

① 陈济棠，时任国民党南路军司令。

领导，坚持到胜利。

10月10日 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在此之前，周恩来曾先期赶赴雩都，选择行军路线，组织架桥，为大部队行军做准备。

10月11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命令，决定将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共五千人，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随总司令部行动；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编在一纵所属的中央队。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门、总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10月12日 和博古致电凯丰，二十二日致电刘少奇，令他们分别到红九军团、红八军团任中共中央代表。在此期间还派陈云到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

10月18日 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突围西进，命令陈济棠、何键、白崇禧分别在粤赣、湘南、桂北布防阻击，并令第六路军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追击。

10月21日 夜，中央红军在赣城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从大庾、崇义间西进。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4日 红六军团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0月30日 在大庾县密溪地区看到红三军团的部队绵延数里，和朱德、王稼祥电告彭德怀、杨尚昆：减少不必要的担子，不

得超过编制规定的范围。

11月2日 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广东省仁化县城口。红三军团监视钳制汝城国民党守军。五日晚到八日晨，红军从汝城以南的天马山到城口间，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1日 红三军团第六师占领湖南省宜章城。

11月12日 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薛岳、周浑元及在湘各部，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何键调集三十万大军，部署在湘江东岸。

11月13日—15日 在宜章黄茅岭廖家湾，和博古、李德指挥红军从郴州良田至宜章间，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继续西进。

11月17日 因红八军团损失较大，和朱德令红八、红九军团各由原来的两个师合编为一个师，不设团，直辖五个营。

11月25日 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发布《我野战军将进行突破敌人四道封锁渡过湘江之新战役》。文中指出：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并已完成阻我西渡的部署，红军中的“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的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征服湘江天险，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与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当前战役的胜利完成，“将决定着我们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块苏区，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11月27日 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占领渡口，与国民党军激战，红军开始渡湘江。

11月30日 到前线指挥军委纵队渡江，并关照毛泽东等人过江。红五军团、红三军团六师在广西灌阳新圩作战，掩护红八、红九军团向湘江前进。

12月1日 凌晨，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在全田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今日战斗关系重大，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红军将被敌层层切断，要不顾一切牺牲，保证红军全部突过封锁线。下午，除红三十四师、红六师一个团、红八军团部分兵力外，全部渡过湘江。部队从西征开始时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周恩来支撑着困难的局面。

在此期间 国民党判断中央红军将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遂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

12月4日 鉴于军委第一、二纵队及各军团、师的后方机关过于庞大，使所有野战军都成了掩护队，致红军西征以来，行动迟缓，被动挨打，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命令缩小军团、师级的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及兵站，将所有后方机关直属队多余人员全部编入作战部队，立即检查、抛弃和销毁不必要的担子。

12月4日—6日 红军翻越老山界，进入苗族聚居区。国民党军进行坚壁清野和纵火。十日，周恩来在龙胜县龙坪指挥灭火。十一日，军委发出指示，要求注意宿营地失火及严防反革命纵火。

12月上旬 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焦点是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军应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并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二、红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1日 中央红军占领湖南省通道县城。

12月12日 在通道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向贵州进军的建议。会后李德、博古仍坚持到湘西。十四日，军委发布命令，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屏，开辟前进道路；并令红二、红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12月13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命令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陈伯钧任参谋长。刘伯承、周昆、黄甦调回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12月14日 军委第一、二纵队在黎平洪州司合编为中央纵队。以后朱德任命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12月15日 红军攻克黎平，突破国民党军在黎平、锦屏的防线。

12月16日 国民党军的黔军和何键、薛岳所率部队以及桂军分别固守清水江一线和向贵州铜仁、锦屏、天柱之线以及榕江等地逼近。

12月17日 进入黎平。和朱德等分析敌情后，决定不渡清水江，对天柱、锦屏侦察警戒，沿清水江南岸西进，占领剑河。向李德提出：红军需要休整，贵州的敌人兵力比较薄弱，应当到那里去。因李德拒绝采纳而发生争执。

12月1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目前已不可能，且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对蒋、湘、

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会议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鉴于中央内部有争论，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讨论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会后，周恩来将会议决议译文给李德看，李德因争论失败而大怒。

12月19日 朱德、周恩来签署《中革军委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决议具体规定红军月底占领剑河、台拱（今台江）、革东、施秉、黄平地区，并要求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分别钳制湘、黔、川之敌。

12月20日 从黎平出发，经南加堡、革东、施秉，三十一日到达瓮安县猴场（今草塘）。为组织红军抢渡乌江，派干部团上干队队长肖劲光带队到江界河协助工兵连解决架设浮桥所需的器材。

1935年 三十七岁

1月1日 在猴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和大多数与会者反对博古、李德坚持不过乌江，要回头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必须争取时间，使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的状况，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准备。

1月2日—6日 红军从瓮安县江界河、余庆县回龙场、开阳县茶山关三个渡口渡过乌江。

1月5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向各军团负责人发出《关于我野战军迅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战的指示》，令各军团须于六七两日先后到达遵义地区，迅速休整补充，并准备反攻，红军“仍分三路前进，坚决并迅速消灭阻我前进之黔敌，并实行追击”。令红二师及干部团为主力担任攻占遵义消灭黔敌的任务。周恩来在江界河渡过乌江。

1月7日 红二师占领遵义。十一日占领桐梓，继续北上，向松坎、赤水县前进。

1月9日 随中央纵队进驻遵义。十三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命令红九军团压缩军团部、师部、营部机关人员，充实战斗连队。在遵义期间，为创建根据地，中央及各军团成立地方工作部；部队进行休整，扩充新兵四五千人。

1月13日 电告李卓然、刘少奇十四日赶来参加将于十五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1月15日—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博古先作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说红军失利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李德坚决不接受对他的批评。会议指出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主要是由于红军的军事领导在战略战术上基本是错误的，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也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会议认为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领导非常不够；书记处应负更多的责任；军事领导的错误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同志负责，而李德、博古应负主要责任。会议提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议最后作出下列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二）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1月19日 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赤水、土城前进。周恩来及中央纵队离遵义到泗渡。此后政治局加强对军委的领导，每天讨论作战及行军路线。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会议，根据决定下达作战或行军命令，组织实施。周恩来改变了指挥方法，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之能机动。

1月20日 翻越娄山关到桐梓。军委发给军委委员及各军团首长渡江的作战计划，规定“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计划决定改变战术，“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左右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或“集结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

1月22日 经九坎向西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指示四方面军“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1月中下旬 蒋介石认为红军已威胁川南，可能北渡长江，急电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和川军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任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调上官云相部由豫、鄂入川集结于川黔边之松坎，令薛岳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控制主力吴奇伟部

在贵阳待命。

1月23日 和朱德致电各军团首长，要求各军团在接近赤水时查明渡河点及地形，架桥占领左岸，并规定各军团执行任务的地段。

1月29日 拂晓，由于陆续由桐梓地区西进到图书坝、猿猴场（今元厚）、土城的中央红军在土城同川军作战失利，遂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域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四川南部，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周恩来、毛泽东指挥部队渡河。

2月2日 因攻永宁（今叙永）不克，红军西行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前进。

2月5日前后 在鸡鸣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2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央军区的问题后，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及中央分局：“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区分会，由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成。

2月7日 因川军兵分三路向古宋、兴文、长宁堵击，中共中央及军委在云南扎西院子地区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

2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内容与遵义会议决议相同。中央常委开始在各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2月9日 红军占领扎西（今威信）。

2月10日 在扎西。出席洛甫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川军十二个旅沿长江布防，并入滇追击，滇军三个旅由镇雄向扎西急进，为迅速摆脱追兵的侧击，会议作出部队“缩编”、“回师东进”、“特别注意党的民族政策”等决定。

△ 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命令缩编中央红军充实连队的战斗力。红一、红三军团各编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三个团，加上干部团、警卫团，红一方面军共十六个团。

△ 红军入川后，因山高路险，给养困难，屡有技术人员离队。本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发出《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

2月11日 离扎西，经石坎子东进，十四日到四川摩泥。

2月16日 向中央纵队二局作报告。

△ 在古蔺白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周恩来和朱德命令各军团迅速向赤水河岸前进，准备渡河。

△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电告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负责人：红一方面军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并创造新的苏区。

2月18日—21日 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向桐梓地区急进。

2月20日 在古蔺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和朱德电令各军团进攻桐梓。二十四日红军占领桐梓。二十五日攻下娄山关。二十八日进入遵义，乘胜追击，直到乌江北岸。这一战役击溃黔军王家烈部八个团，吴奇伟部两个师，俘虏约三千人，缴枪一千以上，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2月23日 在仁怀大坝地区。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项英：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一切供给应取之于活动地区，干部应分散到游击队、被占领区、白区。应向干部解释清楚，“万一被敌人冲散或隔断时，应有决心独立进行工作，顽强奋斗”。你们“必须特别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机械的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

3月2日 进入遵义。在遵义期间和洛甫出席团以上干部会，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并派肖劲光到红三军团当参谋长。

△ 蒋介石飞往重庆“督剿”，下令围歼红军于乌江以西地区。

3月4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决定“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五日规定：“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但第一、三军团后方部则受野战司令部指挥。”

3月7日 离遵义到鸭溪。

3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指出：最近遵义战役的胜利“是在党反对了军事的单纯防御路线之后，证明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的正确”。这一胜利给了我们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将配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的胜利，赤化整个云、贵、川以至湖南的广大地区。

3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研究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认为红军十二日才能赶到新场，届时滇军也将赶到新场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还可侧击红军，因而反对这个计划，但是由于大多数同志赞成，计划仍被通过。晚，毛泽东到周恩来处，建议推迟发命令，再加考虑。周恩来当即召开负责人会议，再次研究作战计划，说服了与会者。二十一时，军委下令不进攻打鼓新场，而向平安寨、枫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其后，鉴于作战双方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渡乌江前，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

3月13日 在青坑地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红军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控制赤水河上游，作转移枢纽，消灭薛岳、王家烈部。

3月16日 中央红军于十五日攻打鲁班场未下后，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三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将国民党军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在仁怀路口，周恩来指挥中央纵队让野战部队先行，保证部队占领渡口。

3月20日 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达到后，中共中央令各军团首长坚决迅速东渡赤水河，事前不得下达命令，以保守秘密。二十一、二十二日红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四渡赤水）。周恩来在九溪口渡河。红军渡河到贵州后，在国民党军的间隙中穿插疾进南下。

3月24日 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指挥。

3月27日 红军从遵义、仁怀大道南侧南下。军委命令红九军团暂留乌江北岸，在狗坝西马鬃岭地区“伪装主力活动”，“钳制周、吴纵队，以配合主力作战”。此后，红九军团经川、云、贵

三省单独行军，军委通过电台指挥红九军团。周恩来特别指示电台注意收听红九军团电台呼号，要优先接话。

3月31日 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四月二日佯攻息烽，前锋逼近贵阳，后又派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佯作东进湖南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之势。蒋介石在贵阳急调滇军入黔增援，并急令中央军和湘军、黔军堵击红军东出湖南。四月五日，滇军到清镇、贵阳一线。

4月7日 中央红军从洗马河、龙里、贵阳之间南进，从十日起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今长顺）、长寨（今属长顺县）等。十六日至十八日在贞丰县白层跨过北盘江，接着连占贞丰、安龙、兴仁等县。二十三日进入云南，随即占领平彝（今富源）、罗平。

4月25日 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首长，指出云南东北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于我们向东及向南作战，在不利与必要时亦便于向北向西的转移”。鉴于国民党军主力正向云南东北地区运动而滇军距红军较远，中革军委命令红一、三、五军团“首先在白水、曲靖、沾益地域消灭滇敌的先头部”，“然后迅速进入另一机动地区”，消灭周浑元、吴奇伟部，以开展新的局面。

4月27日 红军连克白水、曲靖、沾益、马龙，前锋逼近昆明。

4月29日 在寻甸县鲁土。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敌人集中七十个团以上的兵力追击，红军在云南不可能机动作战，而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决定红军“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为此，军委派刘伯承率干部团直奔禄劝县皎平渡。周恩来到干部团了解情况并作布置。同时决定红一军团夺

取龙街，红三军团前往洪门渡，占领渡口。

5月3日 干部团抢占金沙江渡口皎平渡。四日周恩来过江，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起指挥红一、三、五军团于九日全部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红九军团也在云南巧家过江。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5月8日 中央红军到达四川会理城下。攻城未克，在城郊进行休整、扩军、筹款。

5月10日 蒋介石由贵阳抵昆明，命令川军杨森、刘文辉扼守大渡河、西康，主力在富林；令薛岳、周浑元及滇军孙渡向金沙江边追击。由于缺乏渡江器材，国民党军十六日才渡江。

5月12日 在会理郊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批评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意见；赞扬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用了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两进遵义，甩掉了敌人，取得顺利渡过金沙江的重大胜利；进一步阐述只有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方针。会议决定立即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根据地。

5月14日 离会理大湾营北上。十七日到永定营。二十一日到泸沽石龙桥。

5月19日 军委派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经泸沽、冕宁，夺取大渡河渡口安顺场。同时派左权率红一军团第五团在大树堡佯渡，并广为散布红军将由此强渡，攻打富林、雅安、成都。

5月20日 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我军过江后方针任务的训令》，指出：“敌人已预知和预防我军北渡大渡河进入川西”，蒋介石企图以刘湘部及彝民与红军的隔阂“突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刘文辉、杨森、郭勋琪所部在北岸层层扼守，红军目前“应

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

5月22日 红军进入彝族地区。由于正确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在彝族同胞协助下，用两天半时间顺利通过小相岭。

5月24日 红军占领石棉县安顺场。二十五日，红一团第一营第二连十七名战士在连长熊尚林率领下强渡大渡河成功。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赶到安顺场。因大渡河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且只有四只小船，每天只能渡一团余人，军委决定夺取泸定桥为渡河点，部署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归聂荣臻、刘伯承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彪率红一军团指挥部、第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

5月29日 红一军团第四团第一营第二连二十二名战士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占领泸定桥，至六月二日，全部红军胜利地渡过大渡河。

5月 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统治华北的要求。六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通过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的协议（“何梅协定”），攫取了中国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6月1日 红军占领化林坪。二日，军委决定取小道转向天全、芦山前进。七日，红军占领天全河上的铁索桥，突破杨森部的防线，占领天全。八日占领芦山。

6月8日 鉴于国民党军在后面又占泸定桥，红军只有北上一条路。中共中央及军委发布《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指示》，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取得懋功及小金川流域是关系全局的枢纽”，号召“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

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

6月9日 到达天全。听取红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的汇报。赞扬红九军团不但完成了任务，而且扩大了队伍，有不少缴获，表示慰问。十日，军委决定红军向懋功前进。

6月11日 离天全。十二日到宝兴县野茅坪。十四日到硗碛。十五日到筲箕湾、新寨子，准备过雪山。

6月12日 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过宝兴县西北的雪山夹金山，到达懋功（今小金）的达维，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李先念部会师。

6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6月16日 和毛泽东、朱德等翻越雪山，到达达维镇。当晚，红一、红四方面军举行了会师的庆祝大会。

△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及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每次得到你们的捷报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携手打大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①、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

△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洛甫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

^① 胡宗南，时为国民党第一军军长。

昌浩，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电文指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大渡河西岸和西康“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6月18日 洛甫、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若红军“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使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

△ 中共中央令李先念部进占崇化、绥靖、丹巴，控制大金川。

6月20日 洛甫、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① 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电告红一方面军各军团负责人：目前所处地域给养非常困难，每天改为两餐，一稀一干。

6月22日 离懋功向两河口进发。

6月25日 在两河口出席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大会。

① 田颂尧，时为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 会见张国焘。张问及红一方面军实力，周恩来告以约三万人。张国焘自恃有八万人，对中共中央的态度立即变得强硬，并说红四方面军计划西去。

6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首先作报告，阐述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去的理由：（一）川陕甘地域便于机动；松（潘）理（县）茂（县）地域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不利于红军反攻。（二）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区域，便利红军扩大；而松、理、茂一带人口只二十万，又是少数民族区域，不利于红军扩充。（三）松、理、茂地域粮食、牛羊缺乏；川陕甘物产较丰富。红军如陷在松理茂地区，将无前途。并指出，向南是不可能，敌人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集结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只有向北，只有采用运动战，发扬红四方面军的勇猛果敢精神，迅速打松潘的胡宗南部。为此，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红军分三个纵队北上，派六个团攻松潘，对岷江东岸佯攻。会上，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意见，决定红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统一领导，责成司令部做出计划。

6月28日 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此，“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 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精神，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前进。左

路军以林彪为司令、彭德怀为副司令率十六个团向卓克基、壤口、噶曲河、色既坝前进。中路军以徐向前为司令率十个团经马塘、墨洼向黄胜关前进。右路军以陈昌浩为司令率十二个团经黑水、芦花，向松潘前进。王树声率八个团在岷江东岸，何畏率四个团在懋功、两河口、抚边，钳制敌人。派一个团到阿坝侦察并征集粮食。周纯全在卓克基负责后方事务。中央军委及总司令部随中路军前进。

6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会议听取博古关于从无线电得知日军向北平打炮情况的介绍，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宣言或通电；在部队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做东北军、白军的工作；研究了派人到白区工作的问题，以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

△ 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下达《松潘战役计划》。计划指出敌人已调集一百五十个团以上的兵力，阻止红军入甘南与岷江东岸，防止红军复渡大渡河，利用西北广大草原封锁、困饿红军；胡宗南部首先向南坪、松潘集中兵力截击红军。计划要红军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控制这一地区的道路，以利北上。计划规定红军分三路北进，部署同二十八日的军委决定。

7月1日 和朱德、洛甫等发布《中央决议售粮政策》，规定：不得侵犯被压迫群众的利益，对喇嘛寺严禁私人筹粮，除没收反动头目的粮食外，其他应照价收买。

△ 张国焘认为红一、红四方面军离开根据地是总退却，革命处于低潮，不同意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及北上战略决定，想再向西退却。在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理县后，于本日致电朱德、周

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洛甫，提出“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

7月2日 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命令各部队每人带十五斤粮食和够吃一个月的食盐。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告康藏西番民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书中号召藏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现民族自决。

△ 离开两河口，翻越雪山梦笔山，到卓克基（今属马尔康县）。在卓克基期间派军委三局的干部带电台到红四方面军工作，说：红一、红四方面军各有特点，作风不大一样，一定要尊重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搞好团结。

7月6日 翻越雪山，到马塘（今属马尔康县）。八日，军委组织筹粮别动队，以解决粮食困难。

△ 张国焘向李富春提出解决“组织问题”，“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中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十八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转朱德，要求由张国焘任中央军委主席，并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后，给军委独断执行的权力。

7月10日 翻越雪山到上芦花（今黑水县）。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指出：“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要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速来芦花集中指挥。

7月16日 红一、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占领毛儿盖，十九日攻到离松潘十里的地方。

7月18日 在芦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暂时由周恩来帮助。会议决定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同志任副主任；徐向前任前敌司令部司令，陈昌浩任政委。会后，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

7月21日 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决定规定“前方一切作战部队统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 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发布《关于松潘战役军队部署的决定》，命令作战部队于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分别到达松潘外围的哈龙、小姓沟一线，集中完毕。

7月21日、22日 在芦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张国焘等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汇报。会议肯定红四方面军的政治路线、战略战术是正确的，指出轻敌、分散兵力是四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退出通南巴根据地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在少数民族未发动的情况下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不妥的。周恩来

发言指出，建立根据地要有很多条件，要重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批评张国焘宣传中央红军有十万人，使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失望。

7月25日—8月20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通过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大会通过《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提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路线及策略路线，一般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务。周恩来被大会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7月28日 到松潘毛儿盖。

7月31日 在张国焘延误战机，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①下，军委取消松潘战役的部署。

8月1日 张国焘等发出《红军攻占阿坝，向夏河流域进发的指示》，指示红军钳制松潘、岷江之敌，并在有利时机集中一部回击。八月初得到红二十五军在天水一带活动消息后，朱德、张国焘发布《夏洮战役计划》，提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反蒋抗

① 七月，张国焘要求增九位同志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未达目的，即借口“组织问题”未完满解决，迟误军机，并将进攻松潘的命令改为佯攻松潘，从二十六日起停止进攻，致使胡宗南集中兵力于松潘。薛岳部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策应胡部，于二十六日占领懋功，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日，提出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主张。

8月4日—6日 在沙窝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五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决定，指出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等活跃在这一地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力量增大；西北几省反动统治薄弱，又接近苏联、蒙古；这些都是有利条件。会议确定“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为此，要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会议强调红一、红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是创造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申明“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决议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指出其“具体的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会上，张国焘在发言中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表示怀疑，不承认退出通南巴是由于轻视根据地造成的。他的发言遭到与会同志的反驳。周恩来指出，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现在的最高原则是取得作战胜利，其他问题要服从这个原则。会议决定朱德为中央军委常委，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补选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会议还决定为加强与统一红一方面军的领导，组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

8月上旬 中共中央及军委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

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红四、红三十军组成，由中央率领，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红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红五、红三十二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以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右、左两路军分别从毛儿盖、卓克基北上。

△ 和朱德、刘伯承告别。朱、刘随左路军出发，八月十五日由卓克基向阿坝推进。

△ 自长征以来，一路上十分辛劳。每到驻地，参加中央或三人团会议，处理各军团来的电报，研究战情，下达作战及行军命令，遇有紧急情况，常常彻夜不眠，终于积劳成疾。沙窝会议后，不能进食，发高烧，昏迷不醒，诊断系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经多日抢救治疗，脱离危险。

8月8日 军委发布命令，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

8月11日 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要他们依照夏洮战役计划，准备七至十天内出发，经班佑北上。同时抓紧物质准备，并在部队内详细解释与讨论沙窝会议的决定。

8月15日 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班佑以北粮、房均备，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五军、三十二军速开毛（儿盖）。”“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8月20日 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因病未参加。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

略方针的补充决定》：为实现北上方针决定，“主力迅速占领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的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决定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会上，陈昌浩提出右路军待左路军到班佑后才可行动。会议决定左路军随右路军行动。二十四日，中央将此决定电告张国焘，强调红军主力出洮河东岸向东进攻，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由于地形、经济、居民等不利条件，只能派支队出黄河西岸。命令右路军出哈达铺，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断不宜出青海，免失先机。

△ 以红一方面军政委名义和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发布《关于北进前的政治保证工作指示》：北上要“经过相当时间的草地行军，与可能的战斗，因此在北进前，必须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与必要的物质补充”。特别在毛儿盖，要动员割麦子、做草鞋，准备羊毛、皮子做衣服。并要向排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8月下旬 随红三军北上，带病过草地。由红三军迫击炮连的战士组成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负责护卫。从毛儿盖出发，经七星桥、蜡子塘、分水岭、后河、色既坝、小森林、班佑，到阿西（今属若尔盖县）。九月四日，周恩来电告林彪、聂荣臻：“据三军收容及沿途掩埋死尸统计，一军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望“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

9月2日 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水涨，提出不能北渡。三日，张致电中央：“决于明晨（四日）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

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要右路军立即南下回击松潘。

9月6日 在阿西得知甘南仅国民党军鲁大昌^①一部，和彭德怀、李富春电告红一军集中俄界，向罗达侦察，探明北上路线。并告红一、红三军休整五天。

9月8日 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在周恩来住处召开会议。会上，陈昌浩表示再走草地不好，但北上有王均、毛炳文等敌人，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主张南下。周恩来认为北进有出路。经讨论，决定七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文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有绝食之虞”；“（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希望左路军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并告拟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配合，吸引敌人，以利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9月9日 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周恩来、洛甫、博古、毛泽东、王稼祥，仍坚持南下，并说“左右两路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②，企图危害中央。叶剑英看到电报后，即到中共中央驻地将它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感到情况紧急，立即与洛甫、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等待张

① 鲁大昌，时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②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中央会议记录，毛泽东的发言。

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当即到红三军驻地与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中共中央和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周恩来率后梯队出发，途中制止了前来追趕的红四方面军同志动武，保护红一方面军干部危秀英等人脱险。中共中央北上后致电张国焘并转徐向前、陈昌浩：“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9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敌人在那里已筑成堡垒线，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牺牲，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绝路。

△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因张国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的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及政委并责成实现之”。中央已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红四、红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红一、红三军后前进。并告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

9月11日 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9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北上的决定，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的争论实质是由于对目前形势与敌我力量的对比估计有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

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退却，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在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并指出：张国焘有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会议认为目前仍是党内斗争，为等待张国焘的醒悟，暂不做组织结论，此决定暂不在党内下达，只发到中央委员。会议决定红一、红三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会议还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五人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

△ 下午，率后梯队到达俄界。电告徐向前、陈昌浩：沿途粮食甚多，敌情无变化，望率部于十四日经腊界、俄界随红一方面军跟进。

9月14日 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一、四方面军目前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和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团结与一致。”电文再一次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并具体部署左路军与红四、红三十军继续北上。

9月17日 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周恩来过白龙江到麻牙。

9月18日 陕甘支队占领哈达铺（今属甘肃省宕昌县）。

△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和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本日举行党政军民大会。会师后，组成红十五军团。

9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组织部工作及

地方干部等问题，并决定陕甘支队编制方案，除红一、红三军改为第一、二纵队外，原中央机关、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组成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

9月22日 在哈达铺期间，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本日，和毛泽东等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并宣布红一、红三军改编为陕甘支队，下属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林彪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第二纵队彭雪枫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委；第三纵队叶剑英为司令员，邓发为政委。

9月26日 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五省军队。

9月27日 陕甘支队占领榜罗镇。随后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此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向陕北苏区行进，和当地红军会合。

10月1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红军将领率红军全体指战员向全国党政军界发出快邮代电，呼吁为了抗日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停止内战，共同御侮。

10月3日 陕甘支队到静宁界石铺。随后在宁夏固原县翻越六盘山。

10月5日 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党籍，“免职查办”杨尚昆、叶剑英。

10月12日 陕甘支队经甘肃环县西北地区向陕北苏区前进。

10月19日 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受到苏区军民热情

接待。

10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后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会议还提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要将保卫苏区的斗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反帝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因此要加强白区、白军的工作。随后中央派贾拓夫为先遣人员，寻找陕北红军主力及其负责人，李维汉同行。

10月下旬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南下和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会师，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巩固、扩大苏区，解决给养。常委内部分工为：毛泽东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领导组织部、宣传部及后方军事工作。

10月底或11月初 和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陕甘支队到甘泉县下寺湾，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等会面。

11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苏区、红军、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在研究他们的汇报后，认为肃反有问题，需要调查解决。随后，中央成立董必武等五人委员会负责此事。本日，还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目前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苏维埃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的军事工作，目前先到前方工作；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属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红一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红十五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会议还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和红十五军团

会合，以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洛甫、博古等人率中央机关到瓦窑堡（今子长县）。

11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陕甘特委范向真的汇报，决定为配合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将陕甘特委改为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在此期间，中央决定陕甘晋省委改为陕北省委，郭洪涛任书记。为此，周恩来两次和郭洪涛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

△ 拟订西北军委后方工作计划。计划规定后方办事处设于瓦窑堡，管理前后方供给、粮食运输、后方医院、学校、地方的武装动员、兵站及军委委托指挥的军区、军分区。

11月8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本会设立后方办事处，以周恩来兼主任。

11月12日 和彭德怀到鄜县（今富县）张村驿，负责筹粮并拟订肃清土匪的计划。

11月18日 出席军委会议。会议部署直罗镇战役。

△ 和毛泽东、彭德怀联名致电洛甫、博古，指出：陕北肃反中，“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应予以平反。月内，中央作出决议并释放了被错捕的同志。

11月20日 和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直罗镇战役。二十一日，周恩来到前线观察地形，指示徐海东：对固守寨内的敌人不要强攻，在运动中消灭它。二十四日战斗结束。这次战役歼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及第一〇六师一个团，俘五千余人，缴枪三千五百余支。

11月中旬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到瓦窑堡，带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八一宣言》以及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

11月25日 日本在河北发动“冀东事变”，成立傀儡政权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11月27日 率军委机关部分人员离前线，十二月八日到瓦窑堡。

12月上旬 在瓦窑堡接见曾被错捕的刘志丹等人，并给他们分配了工作。

12月9日 “一二·九”运动爆发。

12月上中旬 召集副参谋长张云逸、中央供给部长叶季壮及陕甘晋军委供给部长白如冰开会，宣布：一、成立工农红军总供给部，叶季壮任部长，白如冰任副部长；二、清理陕甘晋供给部库存物资，优先补充红一军团；三、加强军需工厂的建设。这次会议解决了冬装问题，使部队安然过冬。

12月17日 致电彭德怀，同意攻打甘泉、宜川。并告已向前方送棉衣三千七百套。

12月17日—25日 在瓦窑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形势及任务，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确定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主张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会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在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错误。之后，中共中央设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

12月24日 毛泽东、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制定《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

12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在会上发言指出：现在学生运动大活跃，他们起着开创革命的作用。学生运动的根本出路是到工人中去，到士兵中去，主要是到农村去。北方局的基本工作是工人运动，要克服关门主义，工人运动应同农村的斗争联结起来。河北各县有武装，在日本吞并河北的情势下，容易发展为武装斗争。红军东进，可以得到赤色游击队的响应。发言还提议准备人及款项，由北平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经上海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渠道。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准备作组织问题的报告；派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

12月 指示中共陕甘省委做东北军一〇六师等部工作。

△ 出席中共陕北省委会议。在会上提出将苏区的游击队编为红军。三十日，红二十八军成立，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随后红二十九军（军长谢嵩、政委甘渭汉）、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相继成立。

12月31日 红军和驻甘泉东北军达成抗日协定，双方互不打枪。

1936年 三十八岁

1月1日 邀请瓦窑堡白军军官训练班的学员（东北军被俘军官）参加阅兵式，并在阅兵式前讲话，号召东北军与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

1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就新形势下的组织任务发言说：政治形势中心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当前要解决几个组织原则问题：（一）无产阶级要在各种群众斗争中取得领导权；（二）随着民族战争的开展，党要迅速地发展；（三）由于党在苏区和白区所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不同，同时各个苏区也被敌人分割在不同地区，所以各地只能在统一政策下独立地进行斗争；（四）虽然我们没有取得城市，但是有自己的政权、武装，已有的武装已成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力量，党的干部随红军行动，党要依靠武装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在政治上反对关门主义，要改变对于党员成分问题的机械理解，还要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隘观点，欢迎他们参加革命。提出党在白区不组织赤色工会，而要打入到一切组织中去；还要争取白军和地主武装；要大力发展战略党组织，发挥支部的堡垒作用。

1月5日 毛泽东、周恩来命令红一军团、红二十五军向洛川、白水、澄城、韩城、宜川地区进军，扩大苏区、红军，扩大

抗日宣传。为了向南发展，十二日，中共中央将陕甘边南区党委改为关中特委，任贾拓夫为书记。

1月7日 为巩固苏区的北部，毛泽东、周恩来电令刘志丹、宋任穷率红二十八军、红七十八师直逼横山县城。

1月9日 博古^①、林伯渠^②、毛泽东、周恩来电告彭德怀、杨尚昆：红军、游击队的筹款应在没收汉奸、国民党卖国贼财产，充裕抗日基金的口号下进行。

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在陕北渡黄河，东征山西。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兵员补充、财政、供给等准备工作。

1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宣布东征的人事安排。会议决定二月中旬东征，毛泽东、彭德怀、洛甫、张浩、凯丰随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留在后方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

1月19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③命令》，宣布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尽快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1月21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收到李克农自洛川来电^④：

① 博古，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

② 林伯渠，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

③ 阎锡山，时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④ 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经教育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认为张学良及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都要求抗日，可以合作抗日。他主动回到洛川做劝说工作。张学良见到高后，要高回苏区联络谈判事宜。一月十六日，高回到甘泉红军驻地，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判。十九日，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二十一日，李克农来电报告情况，随后回到苏区。

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

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除已电令他取消另立的“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1月25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书中说，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1月31日 和博古致电洛甫、毛泽东、彭德怀：依目前形势的发展，应将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为总方针。现在的军事行动应是巩固扩大根据地，而不是远离苏区，形成流动；须能扩大武装人员和解决经济困难，有利于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2月3日 中共中央局作出《关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形势及策略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在目前困难当头的形势下，兵运工作的任务是使白军逐渐走上民族觉醒的道路，没有白军的参加和响应，民族战争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兵运工作应成为各级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兵运工作不是瓦解白军，而是争取白军，订立抗日讨蒋的联盟，但不放弃瓦解与红军敌对的白军。兵运工作应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同时并进。

2月10日 布置李克农再次前往洛川，同王以哲、张学良谈判，说：按照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决议的精神，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问题，力争谈成；对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中央请示。

2月17日 电告洛甫、毛泽东、彭德怀：我将到清涧指挥红二十八、红三十军，在晋军撤走时，抢先占领吴堡一带，相机过河。

2月20日 接到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发来的中共中央及军委给李克农的训令。训令指出，张学良同意抗日，愿意同中共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因此，我们的策略是：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同讨伐卖国贼不可分离；要求停止内战，不阻止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锋队；原则上不让步，交涉不破裂。次日，经周恩来安排，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等人由东北军军官高福源陪同从瓦窑堡出发，二十五日到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谈判。

△ 红一方面军渡过黄河。至二十三日，占领山西临县三交镇、石楼县义牒镇等地。

2月21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通电要求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开始实行抗日战争的具体步骤。

2月下旬 到清涧折家坪红二十八军军部和刘志丹、宋任穷指挥攻打义合镇的战斗。战斗结束后，周恩来过无定河，三月五日到绥德沟口。沿黄河南行，巡视河防、渡口、船只、兵站，并

检查中共清涧、绥德县委工作。随后过黄河，进入山西。

2月 写《东征胜利与我们》。文章指出：目前任务是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战略方针是巩固、发展、扩大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力求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

3月2日 致电彭德怀、博古等：对蒋介石、张学良的外交工作应分别进行，对张工作仍经过王以哲。和蒋谈判^① 以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条件。

3月3日 致电肖劲光^②、贾拓夫、张云逸、钟赤兵^③：请完成红二十九军、地方部队的发展计划，广泛开展关中、陕甘游击战争，对敌人筑堡垒、修路加以破坏，阻止敌人进犯苏区。

3月5日 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博古、周恩来致电红一方面军各军、中共陕北、陕甘各省委负责人：李克农和王以哲订立的口头协定今日开始实行。协定如下：（一）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肤施（今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通商。（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四）恢复红区白区之间通商。电中要求陕北、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省委、军区口头传达协定，“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

①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蒋介石要同中共建立联系，责成陈立夫负责。陈交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办。曾通过谌小岑找到中共上海地下党和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分别同上海地下党员张子华、北方地下党员周小舟及吕振羽会晤、商谈。张子华（和董健吾）二月二十七日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瓦窑堡，向博古、林伯渠汇报了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会商情况，及南京政府希望同中共谈判的要求。

② 肖劲光，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长。

③ 钟赤兵，时任中共陕北省委军事部长。

步与整个东北军讨论抗日讨伐卖国贼之目的”。

3月10日 和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朱理治、肖劲光：我们同意王以哲派兵到甘泉换防，你们“不得对王部攻击”。

3月中旬 和博古等到山西隰县大麦郊地区（今属交口县），与洛甫、毛泽东、彭德怀等会合。分别听取王世英、张子华汇报。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汇报北方局党组织情况，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同曾养甫接触的情况，几年来北方局做十七路军工作情况及二月份他同杨虎城^①达成的四项协定^②。张子华汇报他同曾养甫接触的经过和上海地下党的情况。中央同意王世英和杨虎城商定的各项原则。在此期间，刘长胜带回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及同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码。

3月16日 李克农向中共中央汇报洛川会谈情况，中央决定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会谈。

3月18日 电示朱理治、肖劲光、欧阳钦^③：依目前我们与东北军的关系，我们决不应组织或同意在东北军中的兵变和士兵暴动，如果有人来和我们接头，我们应尽力劝阻，以免影响统一战线的进行。

3月20日 电告刘志丹、宋任穷：红二十八军有“恢复打通

① 杨虎城，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② 四项协定内容是：（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第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三）第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③ 欧阳钦，时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长。

并扩大神木、府谷、葭县（今佳县）、米脂苏区消灭敌高双成^①一部的任务”。月底，晋军全部退出陕北，红军占领吴堡、神木。四月三日，红二十八军占领山西兴县罗峪口。

3月20日—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②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议决、统一战线问题及战略方针问题，认为：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议符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议决的精神；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方针下，第一期经营山西，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做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并采纳周恩来的意见，提出“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华北”，以推动全国抗日。会议不排除蒋介石允许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可能，没有再谈反蒋的问题。会议决定今后中共中央不随红军行动。二十三日，周恩来发言指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有推迟的可能。并分析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已认识到抗日的必要性，但也有人想挑动日苏战争，所以至今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俄仍举棋未定。提出抓住“联共”的口号和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是抗日的中坚力量，要发动、准备组织抗日战争。当前三大任务是：（一）向东发展，扩大山西根据地；（二）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以推动抗日运动；（三）正确运用上下层统一战线，推动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还提出中共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不放松准备建立，但又不麻痹群众；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要求国民党有实际行动；我党保持批评的自由；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

① 高双成，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

② 由于战争，会址不断变动，会议先后在隰县大麦郊镇附近的上益千村、石楼县罗村、四江村等地召开。

的工作。

3月27日 和博古、邓发、李克农等人离石楼，经义牒、延川、永坪，于四月初回到瓦窑堡。途中检查中共延川、延长县委工作并作社会调查。

3月29日 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签署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发表。书中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联合抗日；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全国红军首先集中河北，阻止日军前进。

4月1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签署发布命令：为迅速对日作战，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的根据地。

4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在会上介绍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情况，说杨虎城过去和我们有关系，这两支军队不仅有可能联合反蒋，而且可能联合陕甘其他部队及孙殿英、宋哲元等部。会议认为杨虎城是可靠的同盟者，应真诚地同他谈判，决定加强做这两支部队的工作。由于洛甫等回到瓦窑堡，会议决定取消中央局。会后，王世英到西安将中央意见转告杨虎城，并请杨注意搞好和东北军的关系。

4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介绍东征以来所取得的胜利，指出：国民党中央军已开进山西，但是与五次“围剿”时期不同，因内部起了变化。我们要提出红军、白军联合共同抗日，联俄联共等口号。因鉴于蒋介石已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北上进攻苏区，会议动员备战并做出军事部署。

4月7日 由李克农陪同，从瓦窑堡启程，八日晚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九日晚张学良、王以哲偕中共党员刘鼎乘飞

机到肤施。当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城内教堂里举行谈判。张学良表示：（一）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参与酝酿此事。（二）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如红军坚持东出，他可以通知在直南、平汉路西的东北军与红军联络。还答应可使驻陕甘的东北军为红四方面军北上让路。在云南的红二、红六军团的活动则需取得中央军同意，他愿为此事活动。（三）蒋介石现在歧路上，虽不会彻底抗战但有可能争取与其合作。目前他尚做不到反蒋，如蒋降日，当离开蒋；在张公开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驻苏区。（四）将派代表去苏联，中共方面的由他派人送至新疆，他可联络盛世才。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没有群众基础。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参加是不可能的。双方并就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商定了办法。

4月10日 偕李克农、刘鼎离肤施返川口后，遇雨受阻，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谈判经过。十二日返瓦窑堡。

4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派刘鼎到张学良处继续谈判；白坚驻张处任联络员；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派戴季英经张处去陕南巡视；邓发为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在肤施、宜川、洛川、店子、西安建立中共与白区的交通机关。鉴于张学良不能不执行蒋介石的进犯苏区的命令，会议决定在关中加强军事力量，陕南红军逼潼关大道，陕甘地方部队在甘泉、鄜县、肤施公路上积极活动，并加紧抗日宣传，争取东北军不打红军。

△ 致电朱理治、肖劲光、贾拓夫并告彭德怀、毛泽东：东

北军正以主力在关中“围剿”，企图配合第十七路军北进延长、延川、清涧、绥德。电报命令陕甘、关中两苏区红军，破坏敌人的交通工事，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运动，以钳制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北进。二十七日电告陕甘省委：如东北军离开公路抢粮、收租、保护豪绅，则以武力劝阻，严惩东北军政训处人员。

4月14日 接到彭德怀、毛泽东的来电：“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

4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研究苏区财政问题，决定少印纸币，开源节流，厉行节约，以达到收支平衡。

4月22日 致函张学良，内称：九日会谈“快慰平生”，中共中央领导诸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信中诚恳忠告张学良“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如约派刘鼎赴张处工作。

4月23日 刘志丹在四月上旬攻打三交镇战斗中牺牲，本日，遗体运回瓦窑堡。周恩来亲视入殓，并向家属表示慰问。二十四日，在刘志丹追悼会上致词。

△ 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委任宋任穷为红二十八军军长、蔡树藩为政委，宋时轮为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为政委。

4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宣言提出：（一）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讨逆。（二）全国红军与全国海、陆、空军集中华北打日本。（三）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四）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实行外交公开。（六）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与国家。

4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军事问题，决

定关中、华池、赤安（即保安，今志丹县）、三边地方部队会合南下同官（今铜川）、宜君、中部（今黄陵）以西行动一时期，牵制并打击北进敌人。次日，周恩来致电朱理治、肖劲光、张浩、贾拓夫、关中军分区司令黄春圃（江华），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应跳出敌人围攻圈外，以转向西北，配合华池、庆北、赤安、三边各地方部队，创造陕甘宁的西北局面为主要发展方面。

4月28日 接到彭德怀、毛泽东来电，得知：因在山西受阻，红军拟西渡黄河在陕西、甘肃发展。

5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讨论陕甘问题及东北军问题，决定做东北军的工作以政治为主，要教育干部正确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5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研究陕南工作，认为陕南根据地应扩大到鄂豫陕区域，争取白军是中心工作之一。在党和红军内部要注意干部间的团结与对他们的培养，更应注意训练培养本地干部。戴季英去陕南后要详细地解释中央的政策。

5月2日—5日 在延长一带迎接从山西回师陕北的红军。红军在东征中扩军八千人，在山西二十多个县进行了抗日宣传，开展了群众工作。

5月5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5月7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刘鼎转张学良，提出

“再度会谈极为必要”，讨论东北军与红军今后行动方针问题，东北军准备抗日的具体步骤，同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等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十二日，周恩来和张学良会商。

5月8日、9日 在大相寺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及红一、红十五军团干部会议。会议总结红军东征的经验，决定西征。

5月中旬 会见第二次到陕北的张子华，听取张汇报与曾养甫、谌小岑谈判情况及国民党上层和各界人士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态度。张转告说陈立夫提出解决国共问题的四项办法是：（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对日作战时，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5月15日 致函时子周^①。信中说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时子周现在是否有意联合各界作救亡图存之举，“愿先生广布斯旨于华北，求得抗日战线迅谋建立”。

△ 致函张伯苓。信中赞扬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救国热忱；说明中共主张“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实现团结抗日的方针，希望张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同日，致信谌小岑，对他为国共合作奔走表示“益增兴感”，希望他继续推动各方，“迅谋联合”，“共促事成”。并表示欢迎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来“商讨大计”。

5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在会上就军事形势及人事安排作报告，指出阎锡山部及中央军有西渡黄河占领瓦窑堡的可能，野战军西进后，在苏区的东部要坚持游击战。会议批准周恩来提议，为配合西征，开辟根据地，将陕甘省委改为陕甘宁省委，

^① 时子周，时任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

李富春为书记；成立陕豫鄂省委（又称陕南省委），贾拓夫为书记；并研究了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此时东工委委员有叶剑英、李克农、李涛、边章五、朱理治等，东工委下设办事处、特派员等以开展工作。

5月18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大相寺发布《西征战役计划》，决定组织西方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第一步夺取并赤化安边、定边、环县、曲子（镇）”，命令部队于五月十九日、二十日出发。

5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的汇报，肯定东征期间地方工作的成绩，决定西征时采取更灵活的政策以争取回民、蒙民，基本原则是实行民族自治，并决定在少数民族中不打土豪。周恩来建议用借粮办法解决给养问题。会后，周恩来、毛泽东将以上决定电告红一方面军将领。

5月20日 回到瓦窑堡。张浩、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肖克、关向应等，告以红军与东北军合作情况。并说：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拥护。“全国几十个政治派别在联共反日或联日反共的问题上起了分裂、震动与变化，我党与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欢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讨论建立红军大学的问题。周恩来发言认为应着重于战术学习，整理过去的经验。并被聘为红大教员之一。

5月21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作《论中国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的报告》。

5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发言指出：由于东北军

已从要求抗日发展到有反日反蒋的初步决心，我党可以争取东北军的大多数，目前的政策不是瓦解东北军，而是巩固它；建议成立抗日会、俱乐部等组织团结其左派，坚决打击其内部的法西斯反动分子。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于六月二十日发布《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

5月25日 张浩、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任弼时、贺龙等，告以抗日统一战线顺利开展的情况，指出：“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5月27日 在瓦窑堡红军大学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5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现在是全国大革命前的准备阶段。为推动大革命的到来，当前要建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的三位一体，争取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在红军内部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周恩来发言指出：张学良、杨虎城现已不完全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因此蒋对苏区的“围剿”不可能做到全面配合。为了争取扩大西北局面，现在要：（一）创造以甘肃洪德为中心的新苏区；（二）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三）争取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四）争取回、蒙少数民族；（五）在东边坚持游击战争，阻止入陕的中央军、晋军西进，并具体布置游击战争。

△ 出席中央军委白区工作部部务会议，发言指出：在伊克昭盟对蒙古王爷应分化、争取，对喇嘛完全争取，我党的基本群众是蒙民。要抓紧时间作东北军的工作，可以组织东北军军官来

参观。

5月29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前方：争取与各地教堂的牧师、阿訇、教民建立和平关系，他们承认红军的抗日救国，反对军阀、卖国贼的主张；红军承认他们信仰的自由。

6月6日 毛泽东、周恩来电告彭德怀：横山、定边间五百里是北出绥远、宁夏通往苏联的战略枢纽，应以红八十一师与红二十八师骑兵团，在一个半月内完成初步赤化。庆阳、洪德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红一军团及陕甘宁红军主力七月半前完成初步赤化。

6月7日 和毛泽东、杨尚昆电告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甘肃地区哥老会盛行，可设法与哥老会的龙头唐宝山联络，并争取他参加抗日。

6月8日 和毛泽东、杨尚昆电告彭德怀、刘晓、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只有在回民群众同意下，才能打回人土豪。”“红军不得自己动手打土豪。”规定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乱用回民器具，回汉两族团结。

6月10日 近日来陆续将中共在东北军中的统战关系介绍给前方将领。本日，和毛泽东电告李富春、肖劲光、彭德怀、左权、聂荣臻：“以主要力量进行争取东北军工作而不是向东北军突击或攻击。”

6月上旬 经过中共中央、朱德、刘伯承以及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和劝说，张国焘被迫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发动两广事变，成立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出兵湖南。七月，陈济棠失败；九月，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

6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报告两广事变情况，分析事变爆发的原因，是：（一）由于日本对华侵略，英、日矛盾加剧；（二）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反蒋抗日运动高涨；（三）民族资产阶级的推动。肯定这个事变是抗日的、进步的，削弱了蒋介石的力量，有利于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并提出中共的基本政策是：推动全国反日反蒋力量的发展，更广泛地运用统一战线，不仅做桂系的工作，而且要做蒋介石集团内部的工作；呼吁召开全国救国代表大会，推动抗日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成立。会议肯定两广事变反日反蒋的要求，但是也指出事变如不深入发展扩大，有和南京妥协的可能。会议决定中共策略是：（一）支持两广提出的北上抗日，反对蒋派兵南下；（二）用召开救国会议来反对国民党的五届二中全会；（三）号召全国人民抗日，实现西北大联合。

6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鉴于东北军分三路向瓦窑堡推进，已到平步塔、青化砭、下寺湾一线，同时驻绥德、清涧的中央军也有配合进攻的可能，会议决定中央撤离瓦窑堡，由周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敌人并布置中央及军委转移。随后，由李维汉、邓发负责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组成一个赤卫队。在赤卫队的誓师大会上，周恩来检阅了部队并发表讲话。

△ 致电王以哲：“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否则“造成两方敌对，于目前局势实有大害”。王以哲部立即撤回蟠龙、永坪以南。十九日电告王以哲：如果中央军将占领瓦窑堡，我们

必事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

6月15日 和毛泽东命令阎红彦、蔡树藩率红三十军于十七日赶到延川城，准备侧击由清涧或永坪向瓦窑堡进攻的中央军。同时，命令谢嵩、甘渭汉率红二十九军到延川冯家坪待命。

6月19日 张浩、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指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认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因为这样可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的马步青、马步芳和宁夏马鸿宾；也利于补充和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且甘南敌情较弱。七月二十二日，再次致电朱、张、任，希望他们“迅速出至甘南”。

6月2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电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仅不妨碍你们抗日，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通电支持西南的抗日行动，表示愿意与西南诸领袖合作；呼吁南京政府将军队开进华北对日作战。

6月21日 国民党军高双成所属骑兵张云衡部加民团近千人从横山县石湾出动袭击瓦窑堡。周恩来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撤退，然后向西撤退到磁窑。中共中央迁往保安。

6月22日 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包围瓦窑堡。二十三日，东北军进入瓦窑堡，红军撤销包围。周恩来、毛泽东、洛甫等启程赴安塞。

6月28日 毛泽东、周恩来电告彭德怀：东北军缺乏食盐，请令盐池、定边部队首先运送五千斤到吴起镇。

7月1日 张浩、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红

军诸将领电贺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7月5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颁发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为政委兼红二军团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为政委。

7月5日—7日 在安塞和毛泽东、洛甫召开会议，听取刘鼎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会议要刘鼎放手大胆地工作，争取张学良，做好东北军的工作，并指出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或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使之成为抗日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

7月9日—10日 在安塞白家坪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表示中共欢迎他考察苏区，并为之拟定考察的路线及项目，同时回答斯诺所提的许多问题。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周恩来说，当时党的错误在于没有深入发展农民运动，没有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争取革命领导权。当时的党还年轻，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以及经验都不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占了主宰地位。并说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达到了他权力的顶峰。如果抗日战争发生，国民党的大部将领将会拥护统一战线。

7月14日 在安塞谭家营召开中共陕北省委军政干部会，研究如何争取游击战争的胜利。会后到各地巡视，检查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情况，指挥作战，筹划、解决布匹、粮食等物资。二十五日回到保安。

7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指出东北军忽视内部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一般军人对张学良依赖甚深，如张万一被扣，他们便束手无策。建议加强对东北军的宣传工作。会

议决定将扩大联合战线放在工作的首位，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主持。

△ 红一方面军西征以来占领甘肃洪德、环县、曲子镇及陕北三边广大地区，完成了扩展西部根据地的任务。本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等军事将领，指出现在要打破马鸿逵^①、何柱国^②的进攻，在沈克^③、马鸿逵、何柱国部队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把统一战线提到较其他任务更高的地位。

△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

8月初 派李景林到延长做第十七路军统战工作。

8月1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除红军大学及总政治部直属毛泽东领导外，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机关统归周恩来指挥。

△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并介绍北上沿途情况。

8月2日 电告李富春、肖劲光及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副部长赖传珠：目前东线汤恩伯^④敌重在扩张和巩固沿河西各县的占领，而以高双成、高桂滋^⑤向西掩护；马鸿逵、两高敌有乘虚取定边、盐池可能。提出“红军八月份中心任务在巩固西线胜利，

① 马鸿逵，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五路军司令。

② 何柱国，时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

③ 沈克，时任东北军第一〇六师师长。

④ 汤恩伯，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

⑤ 高桂滋，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

发展东线游击战争，并加紧训练和扩大部队，努力争取东北军及其他白军，以准备迎接新的局面到来”。同日，将此内容分别电告陕北省委及阎红彦、蔡树藩。

8月5日 致电谢嵩、戴季英并告郭洪涛、钟赤兵等，要他们做晋军骑兵第八团统战工作，写信勉励其回绥远抗日，打击汉奸李守信部，“我们保证不扰其后方并愿与之共同行动”。

8月8日 潘汉年从莫斯科经上海、南京、西安回到保安，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汇报说，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一九三六年春曾在莫斯科找陈绍禹谈国共和谈事，共产国际表示应由国共两党中央在国内谈判。潘还汇报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代表张冲会晤的情况。

8月9日 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函张学良，建议“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指出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表示准备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到西安同刘鼎一起协助张学良工作。

8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统一战线问题，认为蒋介石由对日退让，镇压革命，改变为愿谈统一战线，同中共来往，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使日本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决定继续国共谈判；还决定为推动蒋联共抗日，中共在确保对苏区、红军领导的前提下，可以放弃苏区、红军的名称。周恩来在发言中主张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在与南京谈判时提出停止内战和允许人民抗日，发动抗日战争。指出目

前任务的中心是实现西北的大联合，在东线开展游击战争；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三个方面军的会合是大的胜利，要公开宣传、解释团结的重要性。

8月12日 洛甫、张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凯丰、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对今后战略方针作如下的建议：“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电报“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目前不出河南，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

△ 宋哲元的代表刘子青到西安，同中共建立联系。夏秋，中共中央通过北方局和上海地下党，同刘湘、傅作义、阎锡山等建立了联系。

8月18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发布训令说：“根据最近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新决定，对于地主阶级，只要他不反对红军抗日，可以用捐募的方式使他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来，要做到宁可少没收一家，不可错没收一家。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给商人以适当保护，在不损害商业的条件下，进行募捐运动，以筹得抗日经费。

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肯定蒋介石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所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

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一段话较之过去有若干进步，然而“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敦促国民党政府实行抗日、民主，表示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

△ 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电王明：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靠近苏联，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但这一地区遍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城池和围寨，希望苏联能提供飞机、大炮。否则，由于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困难，红军以后的发展方向就不得不移向甘南与陕南。“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

△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转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西方野战军九至十一月之任务是消灭二马部队于运动战中”，“占领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区”，发动回民，“发展西北苏区，保障定（边）、盐（池）、豫（旺）苏区，策应二、四方面军之作战”。三十日，西方野战军从豫旺堡地区向西出动，控制中宁至固原大道，九月十四日占领将台堡、打拉池。

8月27日 张子华到保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到南京联络的情况，并带回曾养甫邀请周恩来去谈判的信件及联络用的密码。

8月30日 李宗仁、李济深的代表钱寿康到保安，要求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并对协定做了修改。九月下旬钱寿康离保安南返。

△ 张浩、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

任弼时：估计蒋在西南问题解决后，将出兵到西北，在此两个月左右时间内，有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之企图。我们的基本方针：（一）迫蒋抗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二）联合东北军以及西北其他各部，造成西北新局面。（三）准备冬季“打通苏联”。（四）发展甘南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巩固、发展陕南苏区。（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8月31日 致函曾养甫，表示“亟愿与贵方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但是“弟等外出不易”，请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或陕西省华阴县会晤。

8月下旬 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到西安杨虎城处加强对第十七路军的工作。

9月1日 致函陈果夫、陈立夫：“近者寇入益深”，“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信中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诚意，希望他们敦劝蒋介石“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同时希望他们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

△ 致函胡宗南，希望他“力排浮议，立停内战”。

△ 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但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

9月4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介绍陕甘各苏区的地理等情况，并说陕甘宁苏区东西长约一千二百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个县城。有陕北、陕甘宁两省委，陕

甘特区及中央直属保安县。山多沟深，人口只有四十余万，物产贫乏，不能供给大军久驻；神木特区东西长二百余里，南北约三百余里，游击战争颇发展。关中苏区距西安九十里，在中部、宜君、耀县、三原、淳化、栒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十县之乡村。陕南苏区发展到二十余县。还提到鄂豫皖、湘西、湘南巴均有红军活动。

9月8日 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我们已有几个电报给国际，并派邓发经新疆去莫申请。”“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

9月上旬 和朱理治谈话，说：中央已决定叶剑英、彭雪枫和朱理治到西安工作，叶、彭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朱理治为特派员领导东北军中共地下党组织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向他介绍了东工委书记刘澜波等人情况。

9月13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告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宗南敌占领该线。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滞阻胡宗南西进，以便红四方面军到陇定大道，准备作战。随后，数次致电红二、红四方面军，介绍北上的路线、地形、敌情。

9月14日 张浩、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你们应准备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

9月15日 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致电红一方面军负责人：

九、十两月全力进行对宁夏军队与回民哥老会的工作。各军团领导及政工人员务必克服对统一战线及回民工作认识不足、教育不力、工作不切实的弊病。

9月15日—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八月下旬收到的共产国际指示，讨论通过《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它“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决定一旦民主共和国在全国建立，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决议指出，要保障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不放弃对苏区及武装力量的领导。周恩来在发言中说：实行联蒋抗日虽然暂时要放弃已占领的某些地区，但对取得对全国抗日的领导权有很大的意义。过去把蒋介石所代表的力量除外是不对的。蒋自国民党五全大会以来有变化，在对日问题上，蒋是动摇的，但倾向于抗日。我们应逼蒋抗日。民主共和国是各阶级统一战线的政府。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与批评。为了反对日本进攻，停止内战，西北联合非常重要。应取消西北国防政府的口号，西北联合应包含胡宗南、汤恩伯等部队在内。发言还检查以前对肖劲光等人的处理不当，“我是负责人之一，应承认这一错误”。

9月19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任弼时、贺龙、指出“三个方面军须迅速统一指挥”，红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靠拢非常必要，使之了解新策略才能统一战略方针，才不会因某些临时事变来动摇基本方针”。

△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因宁夏是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

也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外蒙宁夏间是草地，有许多汽车通行路，过去即从这些道路接济冯玉祥，邓小平同志亦亲从定远营汽车路走过，他们从外蒙接济，我们当先占领定远营。”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待明春再攻甘西，这亦须得到苏联协助才能攻克。目前只须速进静宁以西，占领广大阵地，我在七十天内逐步北移，至十二月红一、红四两方面军各以一部阻止南敌，各以主力北进攻宁，配合苏联帮助，夺取宁夏，至明春再决定分路西进、南进、北进。夺取宁夏打通苏联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决定的一环则是抗拒胡军隔开红一、红四两方面军的企图。九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张国焘等连电中共中央和军委提出要渡黄河西进。

9月上旬 和汪锋谈话，代表中共中央派汪到西安地区做第十七路军的工作。谈话中总结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指示汪在友军中不搞兵暴或分裂、瓦解的活动，要保存现有的党组织，着重做上层军官的工作。

9月21日 张浩、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统一指挥十分必要，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的意见，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周恩来准备去南京谈判），地点在同心城附近为宜。

9月22日 听取从南方来人汇报后，致函坚持游击斗争的中共闽西军政委员会负责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代表中央对他们苦斗不懈表示敬意和欢慰，并介绍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 致函蒋介石，重申“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

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提议“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并指出蒋如徘徊歧路，“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 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希望他们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二十四日，潘汉年携周恩来致蒋介石函、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函以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保安，经西安前往南京。叶剑英、彭雪枫、汪锋、边章五等人同行到西安做东北军、十七路军工作，彭雪枫由西安到兰州会晤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

9月24日 张浩、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电告任弼时：“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当前政治的军事的总方针，已为大家所同意，则中央内部的团结已有充分保障无疑。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

△ 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毛泽东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胡宗南部进入西北，我们应集中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胡敌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之企图。再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敌。在占领宁夏我们处于有利地位后，分兵取甘西、绥远。现红一方面军一师已占领界石铺，红四方面军宜以先头师迅速进入，余部则陆续北上。

△ 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接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北上

方针，我们正在设法挽救中。

9月26日、27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连日电催张国焘率部北上，一再指出“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如红四方面军西渡，敌将先堵击青海至兰州线，次堵凉州（今武威）至兰州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要张率部迅速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九月三十日红四方面军分五路向通渭、庄浪、会宁前进。

10月1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说：如白军派人同红军接洽，“我方均一律以诚恳面貌招待他们以期沟通关系，扩大西北统一战线范围”。

10月4日 为渡黄河占领宁夏，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准备即派铁匠至同心城，造铁钉”，“你们究有多少造船工人，每星期能造几只船，来电请再告”。

10月5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同意你们六号开始经天水以西向通渭转移。”

△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之意见，但甘谷、庄浪仍宜配合置必要兵力迟滞胡敌掩护二方面军北进。”

△ 毛泽东、周恩来致函张学良：中共建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国民党仍游移不决，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扩大内战，我们仅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祈先生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10月6日 为进一步贯彻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的精神，致函陕北省委郭洪涛、王达成、龚逢春等，指出开山堂是争取哥老会的有效方式，过去有些同志没有着眼于争取哥老会的广大群众。中共争取对哥老会领导的最基本任务是：将苏区的哥老会引导到保卫苏区的任务上来，将边境白区的哥老会引导到发展苏维埃运动上来，将一切哥老会会员统一到抗日救国的事业上来。为此，要求省委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党内进行争取哥老会基本方针的教育。

10月7日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合。十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10月8日 接到张子华9月28日从广州来电：曾养甫再次邀请周恩来飞香港或广州谈判。

10月9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子华，要他转告陈立夫、曾养甫：“只要国民党方面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攻击。”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互派代表举行谈判。至于周恩来飞赴广州会谈，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在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沪的潘汉年先与陈立夫、曾养甫会谈。

△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得知蒋介石组织通渭会宁战役计划后，致电红二、红四方面军负责人：红一方面军佯攻靖远，威胁兰州，抑留于学忠守城。红二方面军在现地域钳制王均、关麟征。朱德、张国焘率部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会合实行宁夏战役。请兄等提出意见。

10月10日 因东北军何柱国部屡与红军为难，致电王以哲

建议由王部进驻固原，何军改驻平凉，以利抗日。此事经张学良同意，刘多荃^① 部被调驻固原。

10月11日 中共中央及军委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十一月十日前完成攻击宁夏的一切准备。

10月11日、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政治工作。周恩来发言说：政治工作对红军的发展起过很多作用，尤其在长征中表现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指出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应加强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教育仍是阶级教育，既注意民族教育，也不可忽视国际主义的教育。并提出政治工作要与实际相联系。要加强对红军的历史，尤其是朱、毛的历史的研究和宣传。

10月14日 接到张子华从西安发的电报。电报说，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条件是：（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得知蒋介石将到西安后，通知张子华，要他出面要求蒋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同蒋谈判。

10月21日 因蒋介石下达对苏区的“进剿”令，致电张子华，要他转告曾养甫、陈立夫，中共中央决定由潘汉年进行初步的谈判。

△ 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会师。

10月22日 致函王世英，告知在白区做统战工作人员应遵守的纪律：（一）保守秘密；（二）不得和地方党发生横的关系；

^① 刘多荃，时任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师长。

(三) 谢绝无谓的应酬；(四) 不得接受对方的馈赠。

10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陕北省委汇报哥老会开山堂的情况。在发言中，肯定这项工作取得初步的成绩，指出要教育、改造哥老会的群众，使之适合于革命的需要；利用哥老会是争取白区群众的一种辅助办法。

10月25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认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至二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并提出具体部署。

10月26日 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等四十六人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要求“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

10月28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完全同意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同志俭日（二十八日）七时之海（原）打（拉池）战役战略计划，望各兵团首长动员全体红色指战员下最大决心，努力争取整个战役的全部胜利，开辟今后伟大的战略胜利之途径。”三十日，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计划。同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撤至贺宗集、同心城等地。三十一日，国民党军抵靖远，向打拉池进攻。红军海打计划未能实现，向东转移。

10月30日 和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

10月 致函陈诚、汤恩伯，说：若贵军及其他国军一旦开赴前线，苏维埃与红军誓以全力相助，红军愿同赴前线，共效驰驱。

11月1日、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共青团工作。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的基本方针不变，但是团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应该改变，应成为群众性的抗日团体，联合各种青年组织，在下层建立分散的组织，在上层建立联合统一的组织。并建议青年工作的重点应放在白区。会议决定为了团结广大青年一致抗日，取消共青团组织，团员参加一切合法的公开的青年群众组织；在抗日救国、民主自由的目标下，实行各青年组织的合作与联合。

11月3日 就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的“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的计划，毛泽东、周恩来电复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五日，朱德、张国焘致电^① 徐向前、陈昌浩：你们要“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必要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不得已时可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11月8日 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因胡宗南等部北进，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执行可能。电文并告以中央作战新计划。对于陈昌浩等七日向中央来电提出的渡河部队“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在军事指挥方面，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的意见，复电提出：徐

^①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中说：“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助国焘的。”

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一年完成。并称上述计划不是最后决定，而是征求意见。

11月10日 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谈，面交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陈立夫配合蒋介石在西北的军事行动，态度突变，提出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的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并要周恩来出来谈判。潘汉年严词拒绝。

11月11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甲、河西徐、陈所部现进到何处？情况如何？乙、依据敌我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

11月12日 毛泽东、周恩来和洛甫等研究决定：朱德、张国焘的总司令部可移甘肃洪德河连湾（今环县河连湾）陕甘宁省委所在地。同时，决定派周恩来亲赴河连湾，共同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

1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苏区、红军面临“围剿”、给养困难的严峻形势，认为在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中，张学良、杨虎城坚持抗日，傅作义、刘湘、桂系、阎锡山同意抗日，中共要利用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红军的军事行动应以促成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方向；可以同意南京政府提出的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的条件，但要坚持党的领导。周恩来发言指出：蒋介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一面派人同我们谈判、妥协，一面向我们进攻，即使他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始终要动摇的。蒋企图控制各种矛盾来维持他的统治。两广事件结束后，他积极派兵封锁黄河，阻止我们抗日，逼我就范。并分析逼蒋抗日目前有四种力量：国际上的；群众的；南京在野势力、各地反蒋的统治者及蒋集团内部的矛盾；红军及游击队的力量。强

调以实现逼蒋抗日来决定我们的战略计划。

11月15日 离保安。十八日到达河连湾，和彭德怀会面，协助他制订三个方面军在山城堡作战计划，并组织后方军需供应。

11月18日 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贺龙发布《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

11月18日—月底 利用一切机会，召开大会，看望红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发表讲演、谈话，对四方面军北上表示热烈欢迎；肯定红四方面军是中共领导下的英勇善战的部队；宣传团结就是力量，要把若干的小山头变成一个大山头，团结一致。阐述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说明东北军是愿意联红抗日的，是红军的友军；介绍日本入侵的情况，要大家做好抗日准备。

11月19日 到达洪德，和贺龙、关向应会面，听贺、关汇报红二方面军情况，征求他们对前线总指挥人选的意见，贺龙同意由彭德怀担任。

11月20日 经山城堡、予旺堡到宁夏同心城，出席欢迎红四方面军的大会，并讲话，当晚返回予旺堡。沿途打听受张国焘迫害的干部下落。晚，在予旺堡会见张国焘，使被关押的廖承志等人获释。

11月21日 红军在山城堡粉碎胡宗南部的进攻，消灭一个多旅，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11月24日 经过多方面的工作，和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以及红一、二、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致函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信中说：“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三个方面军首先消灭拦阻我们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并影响全国各地各党各派各军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

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坚决领导之下，在三个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胜利会师一致团结一致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1月30日 和朱德、张国焘到保安。

12月1日 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等致函蒋介石，批评他集中胡宗南等部共二百六十个团进攻苏区。表明红军为自卫计，不得已而有山城堡之战。呼吁蒋介石“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张学良尽力使全线停战，但又无法长停，蒋介石尚不愿取长期守势。“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李毅（张学良）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

12月4日 蒋介石到西安，逼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张、杨部队分调福建和安徽。

12月7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发出通电第一号，转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任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二十三人为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七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国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12月9日 张学良、杨虎城连日对蒋介石“苦谏”，遭到拒绝。本日，西安学生万余人游行，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表示在一星期内用事实来回答。

12月10日 鉴于蒋介石、陈立夫态度变化，中共中央电告潘汉年，指出蒋介石还没有抗日救亡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前提，

我们“根本不能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辱红军的态度”，坚持“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 致电张学良告以中共与蒋方谈判情况，说：红军可在抗日救亡的前提下，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红军决心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 收到张学良致中共中央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 毛泽东、周恩来来电复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鄜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兵力。表示红军决不进占寸土。另告，恩来拟到张处协商大计。

△ 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孔祥熙任行政院代院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委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孔祥熙、宋美龄连夜由上海赶回南京，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

12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肯定西安事变

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还决定中共中央暂时不发表宣言。周恩来发言，提出要推动、争取国民党的黄埔系、CC派、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巩固西北三方的联合；还要在抗日援绥的原则下与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西南桂系联合；向全国各派解释清楚，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由于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周恩来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中共要公开走上政治舞台，但仍应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要有正确的组织工作。

△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说“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事变才能胜利。表示若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并请张派飞机到肤施接周恩来去西安。

△ 中央军委将蒋被扣一事通知各军团，令各军团“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12月14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一）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设立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各编一集团军。（二）与敌决战时要各个击破之，只要打下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

△ 西安方面连日来采取措施，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主任委员。

△ 孔祥熙接受宋美龄建议，召集高级会议，决定在“讨

伐”之前先着手和平营救蒋介石。为此，端纳^①从南京飞到西安，当晚在张学良陪同下见蒋介石，劝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为了早日获释，态度由强硬变得和缓。

△ 阎锡山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对发动西安事变提出四个问题，态度暧昧。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和刘湘分别于十六日、十八日发表通电，主张政治解决西安事变。其他地方实力派采取观望态度。

△ 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西安事变“显有怪异性”，说“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

12月15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呼吁国共合作，“共赴国仇”。建议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 傅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吴德峰等共十八人启程赴西安，当晚宿安塞。次日晚到肤施城外。

△ 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如国民政府实行“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认为西安事变是“受了赤化的浸润”，威胁南京政府若只依靠欧美苏联，“将来会要招致不可收拾的破局”。

12月16日 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张、杨，任命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下设东、西两集团军，刘峙、顾祝同分任司令。因第十七路军的四十三师师长冯钦哉率部投向南京方面，中央军于

^① 端纳，澳大利亚人，曾任张学良顾问，一九三四年为蒋介石、宋美龄上宾。

十三日占领潼关，本日轰炸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

△ 经端纳斡旋，宋美龄表示愿同宋子文、顾祝同到西安会商。张学良表示欢迎。

12月17日 上午，蒋介石令何应钦十九日前停止军事行动。命令由蒋鼎文送往南京。

△ 下午，偕罗瑞卿、许建国等九人从肤施飞抵西安。途中听取专程到肤施迎接的刘鼎关于西安事变情况的汇报，对刘鼎说：这次是军事的突然行动，没有打垮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蒋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被擒的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以后被擒的拿破仑。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困难。共产党要多做工作，不要使事变酿成更大的内战，而要推动抗日，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

△ 傍晚，在金家巷一号和张学良会谈，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周恩来表明中共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障。并和张学良商定同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对张学良所询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周答说尚不知，但是中共中央已多次向共产国际发电说明情况。会谈后周连夜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提到“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

12月18日 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反映国内各派对事变的反应：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中称“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

西安；汪精卫将回国；阎锡山向张提议，将蒋送山西；韩复榘认为南京现在办法不能解决西安问题；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张此举乃逼得不得已；余汉谋、何键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红军非降非合，表示要将西北地区交给张管理，对中共也交张处理。

△ 接到周恩来的来电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国民党应实行：（一）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二）将讨伐西安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 由张文彬陪同和杨虎城会谈，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杨对此没有表示异议，但怀疑蒋介石能否抗日，并怕蒋报复。周恩来指出抗日已是大势所趋，只要西北三方联合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

△ 致函陕南红军负责人陈先瑞，令他率部出卢氏，威胁中央军左侧，配合东北军作战。

12月19日 在西京招待所接见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宋黎、谢华、徐彬如等，阐明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听取汇报，了解西安地下党组织情况。随即电告中央，西安有一个中共特支和十多个救国团体。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西安事变以来的国内外局势。会议认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或内战爆发，或结束“剿共”内战。为争取和平前途，会后发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

的指示》。通电提出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由南京方面召开和平会议，团结全国，一致抗日等建议。《指示》向党内指出：（一）我们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三）给张学良、杨虎城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发动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四）准备在“讨伐军”进攻时给以严重打击，这种防御战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 南京接到蒋介石手令后，同意宋子文以私人身份飞西安营救蒋介石，并决定停止轰炸到二十二日。

12月20日 宋子文到西安，得知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后，对和平解决有了信心。二十一日，宋飞返南京。

△ 收到毛泽东来电：“国际来电如下：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周恩来将共产国际的态度转告张学良、杨虎城。

在此期间 审定《解放日报》、广播电台的宣传纲要。指示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王炳南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八项主张。指出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并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分别和杜斌丞^①、杨明轩^②、卢广绩^③、曾扩

① 杜斌丞，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

② 杨明轩，共产党员，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的主席。

③ 卢广绩，时任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第四处处长。

情①等二三十人谈话，宣传中共和平解决方针，希望他们为此做出贡献。

△ 分别听取朱理治、汪锋等人汇报，指示他们多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工作，力争和平解决的前途。

12月21日 致电毛泽东，希望红军主力十天内集中长武、邠县（今彬县）一线，再十天集中咸阳、兴平一线。并建议中央发政治训令，宣布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其指挥下的民团为抗日同盟军，以友军相待；对陕甘省政府统治地区不变更原行政组织。随后，为保证红军顺利南下，保证苏区和红军的物资供应和运输的通畅，周恩来派彭加伦等到泾阳县云阳镇、耀县建立办事处，并建立由西安、三原、耀县、洛川、肤施通向陕北的运输线。

△ 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我们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电文分析局势后，提出达成和平协定、释放蒋介石的条件是：（一）南京政府增加几位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二）取消何应钦等的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的抗日军。（三）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周恩来根据这一指示电，同张学良、杨虎城商讨了与蒋介石和南京方面谈判的有关问题。

12月22日 致电毛泽东、洛甫、博古、朱德等：我来此四日，中心在抓紧反对和推延内战，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巩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的联合。建议中央“对蒋过去误国政策，尤其最近使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互消的计划，尽情宣布以影响全国发动”。

① 曾扩情，原黄埔军校学生，西北“剿匪”政训处处长。

△ 宋子文偕宋美龄、端纳、蒋鼎文等到西安。蒋介石授意宋美龄、宋子文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并说对商定好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保证，不作书面签字，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

12月22日—25日 和英国驻华武官斯卡特会晤，在回答问题时指出：这次事变完全是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而造成的。中共认为必须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否则内战再起，日本帝国主义必将乘机侵占全中国。现在中国人民要求的政府必须是抵抗外侮的、民主的、发展经济减轻人民生活痛苦的。中共已向国民党二中全会宣布赞成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当民主政府建立时，红色区域可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中共主张信教自由，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12月23日 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谈判。周恩来提出六项条件：（一）停战，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张、杨同意以此为基础谈判。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答应转告蒋介石。关于放蒋的条件，宋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应允回南京，到南京后再释放爱国七领袖^①。张、杨、周要求先撤兵，释放政治犯，蒋才可回南京。

△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红军过邠县后，即对外发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宣言。

^① 七领袖，指当时在上海领导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被南京政府逮捕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被人们称为“七君子”。

△ 和宋美龄谈话，阐述中共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抗日的各项政策，希望蒋介石从速抗日。

△ 博古、叶剑英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周恩来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博古主持党内工作，叶剑英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的工作。到一九三七年一月，群众团体发展到一百一十多个。

12月24日 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达成协议如下：（一）孔、宋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三）蒋允许回后释放爱国领袖。（四）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停止“剿共”，并经张学良接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六）分批释放政治犯。（七）抗战发动，中共公开。（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下午，周恩来同宋子文谈判。宋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提出暂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的会议，改组国民党，开放政权；说回去后与孙夫人商量释放政治犯的办法；并表示南京政府每月可给红军、苏区五十万元的经费。

△ 蒋介石向张学良表示同意：（一）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外，中央军决定离开西北。（二）委任孔祥熙、宋子文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要孔、宋与张学良商组政府名单。决定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三）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五）立即召开国民党会。（六）联俄联英美。周恩来与博古将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

△ 晚，会见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

条件，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判。

12月25日 宋子文要蒋介石、宋美龄今日即走，张学良同意并愿亲自伴送。周恩来与博古认为蒋在走前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和张随去。但张未告知周、博，即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 张学良陪蒋介石到洛阳，致电杨虎城，要杨照蒋意释放被扣押的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等四人。次日，杨虎城、王以哲、周恩来商议决定，本着和平解决的精神，全部释放被扣押的高级官员。月底又应蒋介石要求送还军用飞机。

12月26日 鉴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认为和平局面已形成，要求红军停止南下，周恩来和博古电告毛泽东：我军驻地待张回后商量解决，可在各原地待命。中共中央立即下令红军不过泾水，不打土豪。

12月27日 《中央日报》发表所谓蒋介石对张、杨训话，内说：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前，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说张、杨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此次“勇于改过”，是由于受蒋的“精神之感召”。

12月28日 电请中共中央研究党在白区的土地政策、西北三方合作的共同纲领、中共去南京谈判的条件等问题，并建议中央准备干部，以便可能时到川、桂、闽、赣、湘、鄂、豫、皖诸省，同当地的党组织联系。

△ 发表谈话号召黄埔同学以当年攻克惠州、汀泗桥的精神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鸭绿江，希望蒋介石、宋子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针

对蒋介石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话》，指出蒋介石是接受了六项条件才恢复自由的，今后的问题是蒋介石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诺言。

12月29日 和博古等研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认为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国内统一战线局面初步形成，抗日力量增强，亲日派遭到致命地打击，中间派开始接近左派。谈后致电中共中央，建议采取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的左派，影响与吸收中间派的方针。党的全部工作要转变，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并恢复党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阶级中的工作，使各地零散的游击队成为农民运动的策源地。

12月30日 与杨虎城商议，再派人和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联络。为做西线中央军的工作，致函胡宗南，请胡的老师胡公冕递送。

△ 同杨虎城、何柱国谈红军驻地事宜。杨、何认为目前红军主力应暂在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地域待命，不要进入太逼近西兰公路的栒邑、淳化、耀县。周恩来表示在非苏区不侵犯其原行政系统，不打土豪。事后和博古电告毛泽东。

△ 十二月二十五日后为巩固西北的团结，促成蒋介石停战抗日，会见邵力子^①、钱大钧^②等各界人士，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希望他们为此做出努力。本日，和西安银行界人士李维城谈话，李表示可做京沪同行的工作。

12月31日 张学良被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次日，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一

① 邵力子，时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② 钱大钧，时为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

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被监禁。

1937年 三十九岁

1月3日 南京政府调集三四十个师的兵力，向西安进逼。

1月4日 杨虎城、王以哲请红军主力迅速开到关中地区，全力支援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以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共同拟定三方面的联合作战方案：在东线渭南的赤水直至长安构筑七道防线。在张学良未回来之前，由杨虎城统一指挥。红军秘密集结后依情况或参加渭北决战，或从蓝田突击中央军李默庵^①部，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陕南陈先瑞部及杨虎城两个旅依托秦岭，以运动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滞李默庵纵队前进。西线红军一小部积极监视钳制胡宗南部后尾。此方案报告中共中央后，次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复同意。

1月5日 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杨虎城、于学忠^②撤职留用。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1月7日 派罗瑞卿到三原迎接红军。随后到咸阳看望红军指战员，并筹划部队的装备和弹药问题。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表明为中国从此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主张南京政府应令张学良回

① 李默庵，时任国民党军第八纵队指挥官。

② 于学忠，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

陕，率领东北军和西北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张共同救国的意见。如南京政府企图以武力解决，内战应由其完全负责。次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通电要蒋介石“言必信、行必果”。

1月9日 致电洛甫、毛泽东，提出我们应力主和平解决。同日收到回电，称“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

△ 蒋介石派王化一、吴瀚焘到西安，提出和谈的甲乙两案。甲案：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返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乙案：东北军调豫皖。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

1月10日 致函张学良：“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军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如蒋介石“乃依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保兄回西北主持大计，则和平可坚，内战可弭，一切人事组织都好商量”。

1月11日 致函蒋介石，指责其背信弃义，敦促实现诺言，要蒋完成和平、统一、撤兵，释放张学良。

1月12日 和杨虎城、王以哲研究甲、乙两案及杨虎城驻南京代表李志刚带回的蒋介石十日来信（信中再次表示张学良不能回陕），决定派人到南京、奉化见张学良及宋子文、蒋介石，要求行营主任以张学良为正，杨虎城、顾祝同为副；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东北军驻咸阳、平凉、固原、兰州、凉州、天水，第十七路军驻韩城、华县、西安、泾阳地区，红军驻陕北、陕南、凉州西。

△ 和王化一、吴瀚焘谈话，要他们回南京后，有和平希望

再来。

1月13日 和彭德怀、贺龙同杨虎城会谈。次日，商定只要中央军一发布进攻令，红军即向富平、蒲城开进，支援关中。

△ 致电毛泽东、洛甫，建议派张云逸到广西联络。

△ 中共中央机关迁到延安。

1月15日 杨虎城收到张学良十三日的来函。函称：“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周恩来同杨虎城谈话，建议：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坚决拒绝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各一部；在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次日杨、于发表通电，接受南京政府革职留任处分，取消双十二以来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要求准许张学良回陕，并要在奉化的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国大计。

1月16日 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领开三方会议。会议决定：坚持和平方针；联络川、桂、粤、晋、绥及南京抗日派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共同提出改变国策，改组政府；防区分配与营救张学良同时进行。会后和博古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电告津、沪转晋、绥、直、鲁、川、桂向三中全会提提案。并说：此间左派坚主战，态度强硬，但少具体办法，“对军事又少了解”。

1月17日 西安方面派出的李志刚、鲍文樾携谈判方案在奉化见蒋介石。提出：（一）设陕甘绥靖主任，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行营主任顾祝同驻洛阳；或者设西安行营主任，张正，杨、顾副。（二）军事善后问题，潼关、华阴由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地区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分驻。东北军驻宝鸡

到武威，第十七路军驻关中、西安，红军驻陕北、陕南、凉州。在商谈期间，中央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提出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国策，抗日、联俄、容共。蒋表示难以接受。

1月19日（或20日） 蒋介石为离间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故意冷淡东北军代表鲍文樾。鲍先回西安。晚，东北军一批青年军官向周恩来、博古等提出，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就同南京决一死战；并表示对东北军高级将领主张和平解决十分不满。周恩来分析了目前军事、政治形势，指出不能打仗，劝说他们从大局出发力争和平解决。

1月20日 李志刚回到西安，传达了蒋介石的态度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军政负责人群情激愤，杨虎城对于是打或和表现犹豫。周恩来闻讯后，和杨详谈，说服杨下决心不打仗。

1月21日 出席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军政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李志刚携杨虎城的信飞奉化，表示接受甲案，并要求：（一）中央军暂退华县，待西安方面军队移定后再行动。（二）潼宝线上，中央军不多驻兵。（三）东北军留一部在咸阳到邠州的公路上，留一部在西安。（四）第十七路军留一师在西安。（五）给不允回陕的张学良以名义。（六）在三中全会未决定国策之前，由杨虎城接济红军。二十二日，蒋介石决定由顾祝同在潼关和西安方面谈判，并电告顾：（一）东北军可留一师在咸阳到邠州段，第十七路军可留一二团在西安附近。（二）张学良问题待西北问题完全解决后另定。（三）中共部队将通过杨虎城接济。

△ 收到毛泽东、洛甫电：如确能停止战争，可保证让步。如要出现“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无论和或战，应由杨虎城、王以哲左派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

△ 和博古电告毛泽东、洛甫，今日阎锡山致电杨虎城，主

张应接受甲案，并愿代向蒋介石斡旋。杨回电提出：甘肃境内胡宗南部全部退出，请南京发六百万及预发三个月军饷，并派人来陕宣抚。

△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并坚决要求蒋同意：（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三）暂时容许一部分红军在陕南驻扎。（四）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亲笔复恩来一信。后蒋介石托宋子文答复潘汉年，同意联合抗日。

1月23日 和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商议红军作战计划，并致电毛泽东。电文指出，据徐海东、程子华谈，山阳、柞水、镇安、旬阳、安康等地均大山，人少粮缺，不宜屯大兵。提出，此地脱离两个同盟军甚远，“我们主张主力暂不南移，二方面军可先移至蒲城、富平地区，使威胁渭洛间敌人，巩固友军”。同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红军目前在原地不动，二方面军也不要到蒲城。”

1月25日 李志刚从奉化回到西安。西安方面同意蒋介石的意见，派东北军的米春霖、谢珂到潼关谈判，二十八日，双方达成东北军七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北岸的协议。二十九日或三十日，李志刚到潼关商谈，决定采取甲案。

1月27日 东北军青年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五十人向周恩来请愿，激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主张等张学良回来再撤兵，要红军支持。周恩来说服无效。深夜，南汉宸报告说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1月28日 致电潘汉年转蒋介石：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

力，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学良不能回陕见面，决不先撤兵。务请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给张恢复公职，发表名义许以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以安东北军之心。

1月29日 东北军团以上军官在渭南开会。因应德田等人坚持反对和平解决，会议决定在张学良未回来之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决一死战。

1月30日 和博古、叶剑英到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同洛甫、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东北军要红军协同作战问题。会后和博古、彭德怀、任弼时、洛甫等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张浩、凯丰等：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如南京继续进攻，我方要自卫；本党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和杨虎城等。我们现在有两个方案：参加或不参加同友军一同打，但不论打与不打，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我们在力求和平中仍不愿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使友军变为敌军。因此，今天只有同他们一同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否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红军仍同南京进行和平谈判，要求放张学良，我们可保证甲案的实现。打有两个可能前途，即迅速结束内战与延长内战，我们应力争第一前途的实现。你们的意见望答复。当日收到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回电：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向张、杨表示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当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赶回西安，把这一决定告诉杨虎城和东北军。

△ 通过何柱国向顾祝同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潼关谈判。三十日，蒋介石同意并电告顾：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

给二十万至三十万的经费。李克农到潼关后，顾又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联络处，以第十七路军为掩护。二月四日，李回到西安后，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从金家巷迁到七贤庄一号，设立红军联络处，对外称“第十七路军通讯训练班”。

2月1日 和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分别代表红军、第十七路军、东北军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应德田等人也参加，共商行动计划。会上，于、王、何仍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同意，应德田等人没有表示异议。周恩来再次阐述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强调要维护内部团结，多做思想工作，防止分裂活动。

2月2日 晨，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枪杀东北军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周恩来闻讯后，严厉批评此事，并和刘鼎等立即到王家吊唁，王的家属和东北军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中共的误解。随后，到新城和杨虎城商议。杨虎城派李志刚到潼关继续谈判。

2月3日 驻防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得知王以哲被杀，自动撤出渭南，立即开回临潼向西安警戒，誓为王以哲报仇。周恩来得知后，当即派刘澜波到渭南说明情况，劝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团结。因东北军西撤，四日中央军开进渭南。

△ 为避免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派刘鼎将孙铭九等人暂时送到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红军驻地。

△ 因西安局势紧张，和博古等商议，决定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大部人员撤到三原红军驻地。自己坚持留在西安，力挽危局。

△ 和博古将西安情况电告彭德怀、任弼时，建议“请毛下令彭、任从明四日起，各军团即向预定地域转移，十五军团由周令其经咸阳到叱干镇集结。”

2月4日 致电洛甫、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分析目前形势，指出：东北军因王以哲遇害愈加分化，张学良更难回来，东北军有东调安徽的可能。第十七路军一时不会分化。中共难以公开立足。国民党三中全会只能做到宣布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不能提出容共案。并提出党的方针是：坚持三位一体，团结到底，东北军开甘肃以避免分裂；欢迎中央军，避免对立；加强内部组织与团结。西路军的问题拟和顾祝同面商，送钱接济。

2月6日 杨虎城回到三原。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从西安向邠州撤退。周恩来电告彭德怀、任弼时、洛甫、毛泽东：一二事变后，少壮派溃乱，高福源被杀，特务团、抗先队开邠州，沈克等师长投降南京，于学忠无力统一东北军。如再批评东北军的两派，则便利南京政府各个收买与分别指挥。我们现仍努力团结东北军，树立领导中心，反对分裂。第十七路军暂难立足，我们鼓其勇气坚持。除在西安建立办事处外，派叶剑英到三原、泾阳建立办事处，并连接淳化、延安。

2月8日 南京政府一个师开入西安。九日，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进驻西安。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张冲也到西安。潘汉年同日到达。

2月9日 听取潘汉年汇报后判断蒋介石能否停止“剿共”的方针须看情势发展，目前只是准备抗战。随即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提出：如果蒋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要我方在其三中全会后派人到南京出席参政会，我拟回答，只出席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十日，洛甫、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指出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可参加政府。

△ 会见顾祝同。顾再次表示同意红军在西安设办事处，保证不迫害民众团体等，并说蒋介石原定约周恩来十日赴杭州谈判

的计划推迟，要他先同周谈。

△ 收到毛泽东、洛甫来电：请以即将发出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① 的精神作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政治立场。军队拟编十二个师，四个军，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军饷按中央军待遇，或先每月接济八十万至一百万元；如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国民党保证不逮捕中共党员，不破坏中共党组织，保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

2月11日 同张冲、顾祝同会谈。张冲表示：蒋介石前所提甲、乙两案，甲案是临时的，乙案是基本的。并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改变红军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政训人员及联络员，其他地区的游击队改为民团。周恩来要求以甲案为基础交换意见，并提出：（一）释放被捕中共党员，保证不再逮捕，不破坏中共党组织；（二）中共不再暴动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抗日纲领；（三）苏区改特区，实行民主制度，受国民政府领导，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但军官不变，政治领导不变；（四）中共代表可以苏区和红军名义参加国民大会、国防委

① 中共中央在该电中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并表示，如国民党以此为国策，中共愿提出四项保证：（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此电于二月十日发出。

员会和军委会，目前不参加政府。

2月12日 同顾祝同继续会谈，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交顾。会谈结果如下：（一）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分期释放政治犯，对中共党员、中共党组织不再逮捕、破坏，允许中共适时公开。（二）取消苏维埃制度，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和领导。其他边区部队改为地方团队。（四）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军队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五）希望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容许民主自由的主张有进一步的表示。

2月14日 会见杨虎城，劝杨加紧巩固和训练部队及地方团队，加紧团以下的工作。

△ 鉴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将派人以新闻记者身份到延安参观考察，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应根据新政策在延安、甘泉等县群众中进行解释和动员，做好接待工作。

2月15日 会见美国新闻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向她宣传中共和平统一、团结抗战的主张，“颇得其同情”。十六日，电告洛甫、毛泽东等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将至苏区访问。建议：在红军中深入宣传新政策；从速训练一批接待人员；对延安、淳化、栒邑等重要地区加以整顿，以方便美国记者参观、摄影，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

△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十四人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和联共抗日的主张。会议于二十一日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虽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但此决议案实

际上开始接受中共中央提议的国共合作的主张。

2月16日 同原黄埔学生、南京政府军将领关麟征、宋希濂等交谈，他们都表示“愿和平，准备抗战”。

2月18日 决定派张子华^① 到宁夏同马鸿逵建立联系。

2月19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我党所提四项保证已为外间所知，同情者甚多，蒋既不能封锁，亦不好再“剿共”，因此蒋对国共两党谈判采取拖延政策；对东北军、西北军实行分化政策。我党应采取的对策是：（一）团结东北军，促其全部开入甘肃境内，避免被蒋分割；（二）巩固和训练第十七路军现有部队；（三）要顾祝同迅速解决红军防地和接济粮食；（四）努力宣传新政策，欢迎各方到苏区参观，以扩大影响，同时加紧训练红军；（五）积极做黄埔系和南京各派的工作。二十一日，中央复电同意。

2月20日 安排从延安到西安的周小舟到山西购买粮食，以解决陕北的急需。二十八日，建议中共中央在山西设立坐商，购买所需的物资。

2月20日前后 连日同北平、天津的新闻记者谈话，并会见广州中山大学参观团。

2月22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表明蒋介石在接受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主张的同时“树起了根绝赤祸的旗帜”。我们应在不失立场不放弃原则的情况下接受对国民党一切可以让步的条件，以求重登全国政治舞台，参加和组织全国的抗日运动。

^① 张子华，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副局长。一九三七年七月到宁夏，同马鸿逵商谈改善红军同马鸿逵军队的关系及边界问题。

2月23日 得知东北军即将东调安徽，主要军官中发生分化的情况后，致电洛甫、毛泽东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东北军中新的中心不易树起；目前在东北军中工作的原则是保持党的秘密组织，以谋较远的发展；许多事要准备重新做起。

2月24日 就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问题，致电洛甫、毛泽东，提出：“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国民党不得派政训人员，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并称：“红军可改编为四个师，其余地方部队可改编为民团及保安队。”

2月25日 致电潘汉年，要潘恢复同邓文仪的联系。并告潘，原黄埔军校教官胡公冕已到南京做黄埔系的工作。

△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提出同国民党谈判方针的补充意见：如国民党不承认中共独立和最低限度之红军人数，则表示无法续谈。电中还指出，我们必须加快向非苏区布置党和群众的工作，加强对宁沪地区的工作和对黄埔系的上层活动。

2月26日 同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的张冲谈判。张冲介绍三中全会的经过，说明国民党容共的基础已定。周恩来对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的措词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声明的权利。还表示：中共目前无意参加政府，只要求参加国防机关。二十七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

告同张冲谈判的情况。并说：如顾祝同无法停止统治甘肃、青海的回族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红军只有自己增援①。

2月27日 同张冲继续会谈。向张提出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至少六七万，以六个师计，每师三个团，总指挥部在外。张说，蒋介石、顾祝同并非轻视红军，而是恐其壮大，红军改编后最多只能编四师四万人。周答不能接受，请张从速解决临时接济红军给养和停止进攻西路军问题。

2月 多次同在西安的黄埔学生交谈，并请中共中央派陈赓②来西安，以加强对黄埔系的工作，影响南京政府实行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

△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同国民党方面多次谈判停攻红军西路军问题。同时设法派人去做马步青、马步芳的工作。

3月1日、2日 连日同张冲谈判。张冲提出红军主力编四个师十六个团，另编两个徒手工兵师八个团，共六万人。并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③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当即将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建议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商量。

3月3日 收到洛甫、毛泽东来电：同意张冲对红军改编问题的意见。今天的中心是在谈判成功后，“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

① 红军西路军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的高台之战失利后处境险恶。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决定以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军和一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进行营救。

② 陈赓，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时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学员是红军军、师级干部）队长。

③ 蒋经国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从莫斯科抵达上海。

△ 同樊崧甫、康泽交谈。樊表示其第七十九师接防高陵、富平（原东北军防地），愿同中共“互通声气”。康对中共新政策持怀疑态度。

3月4日 继续同张冲会商。张冲转告：南京政府来电只允许中共部队改编为三个师九个团。经谈判同张冲达成如下协议：（一）将现有红军中最精壮者编为四个步兵师，计四万余人，并设某路军总指挥部；（二）将现有红军精壮者编为两个徒手工兵师，计二万余人；（三）原有红军军委直属队改编为统帅四个师的某路军总指挥部的直属队；（四）原有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警卫队；（五）原有红军学校保留，办完这一期后结束；等。周恩来请张冲催顾祝同从速解决停攻红军西路军问题。

3月6日 《大公报》、《益世报》、《北平晨报》等报刊近日陆续发表评论，讨论统一救国问题。本日，周恩来致电洛甫、毛泽东、博古等：“为争取全国统一，我们应参加这些讨论。”建议中共中央派人化名向各报投稿，文章要避免党八股的笔调。电中请求派廖承志或邓小平为自己的助手，负责开展宣传工作。

3月7日 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编制仍以四（个）师为宜”，“但如蒋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

3月8日 和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决定将一月来的谈判作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主要内容为：（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监禁中的中共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

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其自己推选，呈报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络；将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将红军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红军学校办完本期后结束；此外，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

3月9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必须警觉并加以解决的问题，说：目前的新环境与新的政策的转变，是十年来所未有的。当前，党的基础和力量，党的组织情形，党员的思想生活及其对新政策的了解程度，党内生活及教育状况，干部的质量和数量，党的领导和威信及其困难，党内的倾向以及党外的影响，都成为急待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不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新政策的实施将无从保障，党内将可能发生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分裂主义的严重危机。并指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及与工人联系的薄弱，党在长江、珠江流域领导力量几乎没有，党内生活不健全，党员多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之划分与配合等问题。请中共中央在最短期内准备讨论上述诸问题。

3月10日 会见张冲。得知顾祝同约张冲、贺衷寒对三月八日提案作了重大改动，如：将“承认改为服从，要求改请求”；“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取消“民选制度”；裁减红军定员，一师一万人，共三万人；将“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红军西路军；等。当即将修改案内容电告中共中央，提出：在小问题上可作些

让步，惟上述重大问题须中央考虑。认为这些争执基本还是民主政治和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同顾、贺谈判能够解决的。

3月11日 会见贺衷寒、张冲。收到贺交来的对三月八日提案的书面修改案。

△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不论拖延或接受修改案意见，我党均宜在政治上争取主动，率先实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争取在全国进一步的公开和影响，造成国民党重新“剿共”的困难。

3月12日、13日 连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顾、贺所改各点太不说话，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作起。可声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两星期内，周恩来回延安开会。

3月13日 会见张冲，与张约定致信顾祝同，说明修改原方案使一切有根本动摇之虞，要求将三月八日提案报蒋介石，否则只有请张冲回南京见蒋。次日，按照中央中央指示，将中共中央书记处不承认顾、贺方案，谈判须重新作起的电报转给张冲。

3月14日 和原黄埔学生李默庵、关麟征等南京政府军将领谈话。他们表示不愿内战，“情意甚殷”。

3月15日 同张冲谈判。张冲申明贺案作废，改以三月八日提案作谈判基础。周恩来说明三月八日提案只是对原已谈定的内容作一总结，现又被贺案推翻；加以进攻红军西路军问题拖延至今，使我方怀疑国民党方是否有诚意。目前只有回延安重新讨论。张冲提出改政训工作派人联络为派人参加；改红军学校办完这一期为准备结束；红军改编后，国民党派副佐人员到任。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

△ 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国内正在酝酿分裂运动，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敌人而不利于团结救国。为顾全大局，请按照

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五项谈判条件继续谈判，并要求迅速见蒋介石当面解决同顾、张不能解决的问题。次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十五项谈判条件，主要内容同三月八日提案相同，增加的内容有：要求国民党彻底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全国停止“剿”共；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修改国防会议条例等内容。

3月中旬 听取朱理治汇报东北军东调的详情。同朱理治等研究对东北军的工作方针，同意在目前情况下朱理治、刘澜波、宋黎不随东北军东调。

△ 鉴于东北军中一部分军人不愿东调而逃避平津，东北军和东北人民在河北有很大数量并有相当组织这一情况，在十三日、十八日两次致函刘少奇^① 并转中共河北省委，要他们担负起对这部分人的工作。信中提出，东北军的东调增加了亲日派分裂它的危险性，我们必须加紧东北各救国团体的统一运动，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推动东北军的团结。强调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应特别注意团结整个东北人民与军队。在东北军中党的工作要做下级官兵的工作为基础，同时加紧上层的活动。提出调宋黎、袁晓轩^② 到中共北方局参加对东北军的工作。信中还提出必须把东北军的上、下层工作分开，上层工作由上层工作委员会负责，党的工作由工委负责。

3月下旬 由于国共谈判问题已需同蒋介石直接商谈解决，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飞抵上海。先同宋美龄会晤，将

① 刘少奇，一九三六年春到天津，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② 后来改为宋黎和刘澜波，袁未去。

根据中共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宋，请她转交蒋介石。宋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周恩来在上海还同宋子文、蒋鼎文、东北抗日将领李杜等会晤。

△ 由潘汉年陪同到杭州，和蒋介石谈判，表示：中共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说明中共拥蒋的立场系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重申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五项谈判条件，并提出几点具体要求：（一）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蒋介石在谈话中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但要中共检讨过去的决定，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拥护他为领袖。还说具体问题好解决，如：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中共推荐南京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派人任副职；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四万余人，可以设总指挥部；决不派人破坏中共的部队等。要中共提出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周恩来表示以制定共同纲领为最好办法。

3月底 从杭州到上海，听取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共产党员李延禄关于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之行的汇报后，说：你们的任务是组织东北救亡团体，在党的领导下，促成蒋介石早日抗战。具体口号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共同建国；支援东北抗日联军；营救张学良。四月，李延禄向各省发出通电。六月二十日，在高崇民、杜重远、李延禄、阎宝航、刘澜波等人的发起组织下，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

在上海期间 秘密会见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同志。

3月30日 携带同蒋介石联系的密码飞回西安。当晚，同顾祝同谈判接济红军给养等事项。

4月初 回到延安。

△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及张国焘的错误问题。周恩来在会上汇报杭州谈判情况。会议认为“结果尚好”，决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提议在这个纲领基础上成立包括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的民族联盟，共同推举蒋介石为领袖。会议分析了晋、陕、冀、川、桂、沪各地情况，并决定党的策略中心是彻底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加紧从各方面进行抗战准备及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运动。会后，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4月4日 得知红军西路军约六千人在甘肃凉州被俘的消息后，致电顾祝同，要顾电令马步青将被俘人员全部送甘肃平凉转至红军四方面军归队，不许加以残害；二马不得继续追击西路军余部，允其转赴新疆。随即和毛泽东派张文彬赴平凉开展营救工作。

4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修改国民大会^①选举法与组织法。周恩来发言指出，要利用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来争取民主。并提出修改选举法的原则：容纳各党派意见；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年龄均为二十岁，不分差别，不受宣誓的限制；通过人民选举、职业团体选举、特种选举等办法来推出候选人；取消圈定；等。

^①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

4月9日 致电蒋介石：“归肤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并说会后即将南下晤蒋。

4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青年工作。周恩来发言指出，青年工作的纲领应拿到青年中讨论，多方面听取意见，使之既适合指导苏区工作，也能影响白区工作。强调青年的政治任务同党的总任务是一致的；在青年中应扩大民主生活；苏区的青年不仅要做民主的模范，同时要做学习文化的模范；青年组织的发展要重在下层；对青年中的“左”倾思想应很好说服。

4月11日 得知苏州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君子”提起公诉后，致电张冲，指出国民党此种作法“大失国人之望”，希望张“进言当局，断然改变此对内苛求政策”。十五日致电蒋介石，指出沈钧儒等七人“其心纯在救国”，“锒铛入狱已极冤”，苏州法院的作法“不特群情难平，抑大有碍于政府开放民主之旨”，要求释放。并取消对陶行知等五人^①的通缉。

4月12日 致电叶剑英，告以为沈等七人被捕及通缉陶行知等事，毛泽东已电潘汉年赴南京谈判，并准备发动援救沈钧儒、陶行知等的运动。要叶通知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准备响应。

△ 出席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并讲话。

4月13日、14日 毛泽东、周恩来连日致电叶剑英，要叶向顾祝同交涉：在红军李先念、李卓然余部到甘肃敦煌后，要顾令

^①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后，正在国外访问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陶行知受到通缉。与此案有关受到通缉的还有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会员张仲勉、陈道弘、陈卓等人。

马步青、马步芳不得为难。

4月16日 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在西安的叶剑英，可同张冲去沪见蒋经国，希望蒋经国以民主思想影响蒋介石。同时指出，“一切工作要适应环境去推动蒋，不要操之过急”。随后又去电改派李克农同张冲到上海。

4月20日 在四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开始修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本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此纲领和民族联盟问题。周恩来在发言中对纲领的细则作了详细说明，并指出中共在党的问题上坚持了独立性、国际性和阶级性三个原则，认为这些原则必须要在统一战线中得到承认。提出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以共同纲领为行动的准则；建立联合组织；在蒋承认此纲领的条件下，中共可承认他为领袖。关于联盟的组织原则：凡各党派各革命团体均可参加；联盟中保持各组织独立性，允许自由退盟，等。在联合形式上要利用上层的联合来推动下层的工作。

4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苏区党代表大会组织问题的报告大纲。

4月25日 乘汽车赴西安，在甘泉县劳山附近遭土匪伏击，随行人员中，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随从副官陈友才、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等十余人在战斗中牺牲。周恩来脱险返回延安。后来，红军歼灭了这股土匪。

4月26日 携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飞西安。草案的内容包括：对外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实施宪政，保障民权自由，发展国防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民生幸福，以彻底实现

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使中国复兴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4月26日、27日 鉴于蒋介石逼杨虎城出国，分别同杨虎城、张冲、顾祝同商谈解决办法。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致电蒋介石挽留杨虎城，并公开发文对南京政府逼杨出国，裁撤西安绥靖公署表示不满。

5月1日 在《解放》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内容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确认男女平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使国民大会建立起民主统一的政治基础，以加紧加快发动抗战。

5月5日 因在凉州被俘的部分红军西路军人员已在送往西安途中，和叶剑英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等：速派人到平凉调查并设法接回。

5月6日 同张冲谈判，坚持在确定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表宣言。

5月8日 致电洛甫、毛泽东、博古，就如何答复华北救国联合会关于召开各种力量代表会议的提议，提出意见：今天的民主问题已不仅是宣传而是实际运动，必须引导他们集中注意力到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及讨论共同纲领方面较有实效。

5月9日 收到中共中央来电：同蒋介石会谈时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的具体步骤是（一）确定共同纲领；（二）发表共同宣言；（三）发表边区政府及四个师师长以上首长名单；（四）红军实行改编，南京释放政治犯。

5月15日 同顾祝同、张冲谈判。对他们所提的视察边区问题，提出两条原则：（一）不能称视察团，应称考察团；（二）不能让康泽和中共叛徒参加。谈判中要求交还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

5月16日 收到洛甫、毛泽东、朱德等来电：同意南京政府

派考察团，考察的目的为增进团结。五月二十九日，考察团到达延安。

△ 鉴于东北军东调后，南京政府计划将它改编淘汰三分之一，周恩来致电潘汉年：目前对东北军工作方针应是团结整个东北军，反对分裂，反对裁编。

5月23日 致电中共中央：准备赴庐山见蒋介石，商议共同纲领、联盟或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停止全国“剿共”、派人到南方苏区联络、发表边区政府委员会名单、改编红军、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召开国防会议、释放“七君子”等问题。

△ 致电洛甫、毛泽东、博古，提议边区政府委员会由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高岗、郭洪涛（或马明方），以及国民党方面的张冲、杜斌丞组成；红军编为四个师，分别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师长。

5月24日 致电蒋介石，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的原则是：使此次国民大会真正民主化；使各党各派各民众职业团体及各武装部队都能有代表参加；过去的选举一律作废，选举前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并提出十项具体意见。

△ 连日与顾祝同谈判，商定红军的经费再给五万元；红军夏衣在六月中旬发放；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已到兰州的，可送西安或发衣被。周恩来并提出和南方各苏区联络事，首先派人去鄂豫皖和湘鄂赣。顾答已电蒋请示。商定由叶季壮到行营办理领款、运输事。

5月25日 致电洛甫、毛泽东、博古，提出同蒋介石谈判内容还包括外交问题，本年内第一步外交方针是：促成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协定，以中苏协定为基础，坚决反对日英勾结，要求收回冀东、察北及领事裁判权，取缔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双方的

《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等，严禁日机在华北飞行，解雇日本顾问，严禁同日本订立任何丧失主权的条约、协定和契约。电文还提出当前最中心的是要求召开各党各派联席会议和国防会议。

△ 收到洛甫、博古、毛泽东复电：现在应力争办到，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为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师长林彪，二师师长贺龙，三师师长徐向前，四师师长刘伯承，政治部制度照旧（但准备让步到设政训处），增加红军防地等。

5月 为促进南京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使国民大会成为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础的开始，致信胡适① 等各界知名人士，以取得各方舆论的支持。

△ 派张文彬、彭加伦等到兰州筹建红军办事处，进行对外联络和营救被俘与失散的红军西路军人员，特别是要查找不明下落的西路军主要领导人。七月，谢觉哉到兰州。他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过统战关系，陆续找到失散的二百多位西路军指战员，并营救出数千名被俘人员。

5月下旬末 飞上海。在上海、南京停留的数天内，同各方人士谈话，争取中共的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宣传抗日的刊物。同时还会见了中共在上海的部分秘密党员。

6月4日 抵庐山。

6月8日—15日 同蒋介石多次会谈。向蒋提交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蒋提出：先由中

① 胡适，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独立评论》周刊主编。

共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编制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三个师以上设政训处；朱德、毛泽东须离开红军；边区政府可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推荐副职；分批释放放在狱的中共党员；由中共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其领袖需离开部队；国民大会指定中共出席代表，但不能以中共名义；国防会议可容中共干部参加等。并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国共双方推出同等数目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共同纲领及国共两党一切对外宣传和行动，统由同盟会讨论执行；同盟会将来可扩大为国共合组的党；同盟会可与第三国际发生组织关系以代替与中共的关系。对其他各党派不必谈合作。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同盟会的组织原则和有关红军指挥机关与边区政府人事安排等意见，坚持设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

△ 同宋子文、宋美龄等会谈，再三陈述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不妥，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应给军事名义。并通过他们同蒋介石具体磋商。但蒋坚持红军改编后设政训处。周恩来声明回延安再行讨论。

6月16日（或17日） 回到西安。在西安期间见到徐向前，详细了解红军西路军的情况，并对徐的生活给予关心和照顾。

6月18日 回到延安。随后，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对谈判问题的讨论，并于二十五日起草关于谈判的新提案。新提案在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上，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承认蒋介石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对一些具体问题的主张是：准备七月中旬发表宣言；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月一日自行宣布改编；陕甘宁边区七月实行民主选举，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

伯渠任副长官；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官，毛泽东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到适当时机不去；不放弃国民大会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但要注意联合各民众政治团体，以促进蒋的转变与扩大统一战线。

6月22日 电告蒋介石，中共中央认为如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上边无指挥机关实无法进行改编，朱德不能离去。

△ 致电顾祝同、张冲等：朱德的去留影响极大，请向蒋进言，朱不离军队。

6月23日 会见美国学者 T·A·彼森，向他介绍国共两党谈判的情况。并谈了对当前统一战线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看法，说明中国的统一战线同欧洲或美洲的人民阵线从形式到内容都很不同，目前统一战线的建立还存在很多不利因素，但日本的侵略损害了中国各个阶级，为进行了十年军事斗争的国共两党提供了重新合作的基础。指出这种合作只能逐步地实现，要先准备抗战，然后争取民主共和国的运动。

6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各省工作和红军改编问题。周恩来提出：上海是政治舆论的中心，须特别看重，应加强上海的工作，建议中央派人指导。

△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张云逸，要张同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联络时，坦率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落后，则只有失败”。并要张设法推动广东、广西、香港方面的政治人物应邀参加蒋介石即将在庐山召集的谈话会，在谈话会上应注意宣传救亡纲领，开放爱国的言论思想自由，撤销“紧急治罪法”和“新闻检查条例”，释放政治犯等。

6月26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从延安到南京之间

的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中共中央决定，待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拟好后，周再去庐山。

6月27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作政治报告《和平、抗日与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指出：和平是基本上取得了。彻底的和平需要对外抗战对内民主。南京政府有被迫抗战的准备，但尚没有彻底抗战的决心，然而那些进步已经可以运用之以扩大抗日运动了。在和平道路上发动抗战需要民主运动来推动，没有民主抗战的发动不能广大深入，甚至抗战发动不起或者遭受挫折，脱离抗战来谈民主将更失去中心、失去领导而流为资产阶级的尾巴。民主运动的目的是在发动抗战，扩大抗战的力量。最彻底的民主共和国也只能在抗战彻底胜利中取得。

6月28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请何柱国电告甘肃省府委员兼省代主席、西安行营副主任贺耀祖，将集中兰州的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概送西安处置，切勿中途遣散”。电文并要叶向到达西安的被俘人员进行慰问和解释。

6月29日 中共中央收到南京政府电：红军改编后只能设政训处。中共中央决定：可以用政治机关名义指挥部队，但必须有等于指挥机关的组织和职能。万一争不到朱德为政治机关的主任，即自行改编。

△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闽西南、鄂豫皖及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谈判的情况，认为目前主要问题是军队问题，如果只能设政训处，建议在谈判中要把政训处的权力确定下来。

△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如西安行营允许办理去南方各省联络红军游击队的护照，为保守秘密，将去鄂豫皖联络的郑位三改为李涛，去闽西南联络的方方改为刘仲山，郑、方分别

以随员身份同行。

6月30日 因暑期来临，各地学生陆续到陕北苏区参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叶剑英：由前总政治部办一临时招待处，通过西安办事处介绍学生至云阳、淳化一带参观；指定专人同学生谈话，讨论各种问题；如有愿留下短期训练者可安排一、两周训练，择其中最好者到延安参观。

6月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国共《两党关系调整方案》，提出国民革命同盟会可负责调整两党关系，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但不能干涉两党内部事务，两党均须遵守共同纲领，但两党又均保留各自的组织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的自由权。

△ 驻河北丰台的日军不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7月1日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题为《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没有欧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传统，却承袭了中国农民革命与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接受了欧战后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影响，站在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已锻炼成为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不愧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之一员。报告分析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就的原因在于中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的党。报告还系统总结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指出在工人运动中最基本的弱点是“不认识争取领导权，以为无产阶级天然获得了领导权”，“由行会传统而成的宗派观念，形成工人运动中的分裂以至关门主义”，“革命斗争的爆发，伴着发生了‘左’倾幼稚行动，缺少经常的组织和教育工人工作”；“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在中国党领导机关中接触甚为落后”；在军队工作中“放弃树立党的基础，退避自己建立军队的企图”，“缺乏武装工农的信心和决心”。号召党

在继承优良传统，汲取革命教训的基础上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7月初 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初稿提出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总目标是：（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二）实现民权政治；（三）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愉快的生活。并且重申中共的四项保证。

7月3日 因国民政府准备重新审查沈钧儒等“七君子”案，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要潘立即通过“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满期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经“七君子”坚决斗争和各界人士的援助，七月底，国民政府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7月4日 和博古、林伯渠从延安到达西安。

7月5日 和博古、叶剑英同彭德怀、任弼时商议红军改编问题。

7月7日 和博古、林伯渠飞抵上海。

△ 夜，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郊的卢沟桥发动进攻，驻守该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所属官兵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7月10日 同中共党员夏衍谈话，要他今后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强调指出工作方式可以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还谈到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党报。

7月上旬 和博古、林伯渠探望宋庆龄，征求宋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宋表示支持。

7月13日 会见蒋鼎文、宋子文，商谈红军改编人数及指挥机关问题。

7月13日（或14日） 和博古、林伯渠到庐山。随即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14日 会见张冲。张说，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十五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说“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指出蒋介石上述要求同六月庐山谈判所谈“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7月17日 洛甫、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转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从大局出发，在谈判中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训处指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以资统帅。

△ 和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向蒋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

△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声明：“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又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蒋不允许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出席当时在庐山召开的有各方面军队要员参加的庐山谈话会。实质上仍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

7月18日 将所拟关于谈判的十二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应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

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出书面谈话表示赞同；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在所辖十八县^①，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对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由于蒋介石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使谈判陷于僵局。

△ 离庐山，赴上海。

7月20日 在上海收到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林伯渠电：日军进攻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同他谈判的方针。电文同时要求周、林暂留沪观察形势。

7月21日 和博古、林伯渠电告洛甫、毛泽东：因在庐山力争无效，已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可发表。电文指出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配备，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在上海期间 和潘汉年及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等面谈，布置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指出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要注意保存和积蓄力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

7月27日 在西安，同蒋鼎文会谈。针对蒋所说蒋介石催促

^① 十八县包括陕西境内的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栒邑；甘肃境内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宁夏境内的盐池。

红军迅速出动抗日的意见，周恩来说，这没有问题，但要对方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28日 和博古、林伯渠返抵延安。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决定：立即争取西安行营同意，红军集中三原改编，编足四万五千人，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将来可让步为军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

7月30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前方红军高级将领，对红军东进抗日后留在后方保卫苏区的第二十七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军及陕甘宁地方部队驻防问题作出安排。

7月底 鉴于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局势危急，和博古赴云阳镇，出席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并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商定红军改编中的编制、分布、干部配备等问题。

7月31日 收到叶剑英从西安来电，得知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川军将领刘湘准备赴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将召开的国防会议的消息后，同博古、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毛泽东、洛甫，提出中共亦应派人参加，争取公开合法地位。并建议由周恩来和叶剑英出席。

8月1日 收到毛泽东转来的张冲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 洛甫、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以发挥红军特长；依此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

8月2日 电复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同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四日收到张冲复电：是开

国防会议，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参加。

8月3日 收到毛泽东、洛甫来电：在南京谈判中要解决（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

△ 将同朱德商讨过的准备提交国防会议的提案内容电告毛泽东。提案内容包括国防会议组织机构案，重新确定战时编制案，确立全国抗战的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确定华北抗战计划案及红军担任一方面独立作战的任务、实施全国人民总动员及武装民众参战计划案等。

△ 就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华北地区的统战工作问题，和博古致电叶剑英并转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对华北联络局^①及河北各地联络局的工作作出安排。要求派人到平、津组织情报机关。并指出：关于平津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应联合各方坚决抗日的分子和团体，建立联合行动的组织；协助抗日的民众运动；协助军委组织和发动冀东、平、津、察东、察北的游击战争；做好全华北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

8月4日 和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认为对日抗战的方针是（一）“要求南京要有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和布置”；（二）“争取我们在抗战中参加和领导”；（三）“不反对在推动全国抗战中，须要积极的准备”。为此，我们应“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关于红军出兵

^① 华北联络局，在北方局领导下，负责情报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问题，“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补充与使用兵力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察、绥、晋三角区（争取消灭伪军与发展察、热、冀的游击战争）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不拖延改编，但要求宣言名义及全部名单同时发表”，迅速补充，发足费用，以便开动。但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主力出去仍可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

8月5日 收到洛甫、毛泽东关于红军参战问题的复电：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要遵循“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

8月6日 同朱德等到西安。

8月7日 得知一千多名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从兰州到达西安，被关押在西安行营监守所的消息后，曾派孔石泉前往了解情况。本日，同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交涉，要求予以释放。当天，有三十名西路军干部获释。八日，有二百一十余人获释，其中包括黄鹤显等三十三名营以上军事干部。此后，周恩来会见出狱人员，表示安慰和鼓励。

8月9日 和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十一日，同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分别发言。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周恩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发表的意见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8月10日 致电中共驻兰州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迅速营救被俘后编入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部九十七师新兵营

的原红四方面军八十九师师长邵力坤等五名干部。

8月12日 和朱德同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康泽提出：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条的解释，不提与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周恩来、朱德严辞批驳，并要求将中共意见报蒋介石。

8月13日 淞沪抗战爆发。

△ 和朱德、叶剑英就同国民党谈判条件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一）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二）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三）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四）催促发表正副总指挥；等。

8月14日 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8月中旬 同何应钦商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何答应中共可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十七日，致电中共中央：请嘱准备去鄂豫皖地区的郑位三和去闽西南的方方以及去其他地区的派出人员速来南京。以后，郑、方等人陆续到达长江南北各游击区，为组建新四军进行准备工作。

△ 指示夏衍协助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提出要把该报办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八月二十四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

8月1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训令指出：国共两党合作必须建立在一定原则 上，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使党与红军取得合法地位。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进行

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此后，周恩来等根据上述原则，同国民党进行反复谈判。蒋介石、何应钦最终同意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 和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并转彭德怀、任弼时、博古、林伯渠：南京已决定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部队仍以速开为有利。提议：至少应以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同日，毛泽东电复彭、任，“同意周恩来提议”。

△ 和叶剑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同志，经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当场使夏之栩、王根英和熊天荆获释。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张琴秋、彭镜秋等以后也陆续出狱，一部分回到延安，一部分被派往国统区工作。

△ 和叶剑英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十四日被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押到南京的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不久，张琴秋获释。

在南京期间 和朱德、叶剑英同国民党商谈了在南京、兰州、武汉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十三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 会见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双方商定相互派人建立联络关系。以后，中共中央派罗世文到刘湘处工作。还和朱德、叶剑英会晤冯玉祥、白崇禧、龙云^①等，商谈合作抗日等问题。

△ 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报刊。不久，邵力子签署文件，正式批准中共南京办事处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

① 龙云，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 和朱德探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右任，商谈中共准备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事，并请于为该报题写报头。于欣然同意。以后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又多次同于恳谈，并通过王炳南、屈武同于保持联系。

△ 会见中共中央派往上海工作的张爱萍等。指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设法组织流亡到上海的工人、学生、难民到郊区开展游击战争，并要在上层知识界和学生中做统战工作。

8月 在上海会见叶挺，请叶出面改编南方游击队。

8月21日 为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离南京抵西安。谈判中的未了事宜，由叶剑英留在南京继续交涉。

8月22日—24日 出席在陕西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讨论、分析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外交等情况，指出：对形势要有持久战的估计，要继续推动国民党抗战，要加强全国群众运动的发动。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主张“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并说：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必须绝对遵守，使国民党的战略不至束缚我们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十一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八月二十三日，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二十五日，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中共中央公布《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

领》。

8月24日 致电张冲、康泽并转蒋介石，说明八路军先头师（指第一一五师）已于二十二日由陕西三原出发向指定区域开进，希望蒋迅速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表示赞同此宣言的谈话。

8月25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根据与国民党及南京谈判结果，宣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一二〇师，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九月十一日，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

8月29日 抵西安，准备和博古、彭德怀一起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建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三十日，会见蒋鼎文。蒋答应即日通知各方不再称共产党、红军为“伪党”、“匪军”，以后遇到行政、民运、党务事都同林伯渠面商解决。

8月30日、31日 连日收到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周恩来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锡山，商量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事。

9月2日 从西安行营处得知国民政府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

主席以丁维汾为正、林伯渠为副，《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要在八路军集中开动之后的消息，当即致电康泽转蒋介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赞同此宣言的谈话应依庐山谈定方案即时签字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由中共方面推荐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即日颁令；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由中共推荐的任弼时为正，邓小平为副。

9月3日 晚，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和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肖克等乘火车进入山西。五日，抵太原。同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阎锡山亲信梁化之及省政府秘书长贾景德初步交谈。七日，同彭德怀、徐向前等赶往代县太和岭口行营指挥部同阎锡山等会商。随后到大同会见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指挥傅作义。同阎锡山、傅作义就八路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指挥关系、作战原则以及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等问题进行会谈。商定：（一）八路军入山西后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二）在第二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以发动民众，组织游击战争，其工作纲领由中共拟出；（三）八路军在山西境内只动员群众，不干涉县政；（四）给红军补充物品，兵站帮助运输。

9月8日 致电何应钦：八路军正开赴抗日前线，准备长期作战，请速解决粮饷和武器。同日，致电蒋介石，要求迅速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陕甘宁边区名义，以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立即出动。

9月9日 和彭德怀从晋北前线回到太原。电告朱德、任弼时并报毛泽东：关于在河北十三县发动群众的工作，阎锡山答应回同八路军合作。

9月上中旬 领导起草动委会工作纲领。工作纲领的核心内容是：（一）积极组织、训练、武装民众；（二）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三）实行民主政治；等。提出动委会应由各省政府代表、各地军队代表以及各有关民众团体代表组成。县区一级动委会应有县政府、区公所的代表，民众团体代表。村动委会中应有民众选举的过半数代表参加。

△ 多次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及中共北方局委员交谈，确定参加政权的原则：以共产党或八路军代表名义参加政府机关者，须先确定一共同纲领做标准；共产党员个人参加工作者，须在抗战中力争我们主张的实现；因私人关系在政府中工作者，须不失我们的立场等。并商定北方局的工作以争取山西为华北抗战根据地中心，同时加紧布置绥、冀、察的游击战。在河北南部、山东南部及山西应以武装民众进行战争动员为中心，而尤以汾河流域及河北南部、太行山脉为最急。

9月13日 派南汉宸到太和岭口见阎锡山，向阎指出时局的危机，建议迅速输送八路军到涞源、灵丘一带，以巩固恒山山脉；不应死守雁门关，宜实行出击，以侧击和扰击的方式作战。并向阎锡山提交动委会工作纲领。

△ 将和阎锡山谈判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洛甫，提出八路军两个师迅速集中涞源、灵丘、阜平地域，依傍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目前或将来万一处于不利情况，可依山西向南发展。建议调游击干部至绥远发展游击战争。并说拟由聂荣臻或邓小平代表八路军方面主持动委会的工作，请各民众团体代表参加，成立政府组织等。

△ 大同失陷。

9月14日 致电洛甫、毛泽东，提出八路军在第二战区驻地

即成为政权力量，因此以八路军代表参加和领导战区动委会最适宜，这样可使新政权组织逐渐替代旧行政机关。

9月中旬 布置华北联络局的工作。

△ 在太原国民师范礼堂向各抗日救亡团体成员和群众讲演，分析抗战形势，阐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学会打游击战，到敌后去发挥作用。

△ 和彭德怀等出席由文化、教育、新闻各界人士召开的欢迎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9月16日 和彭德怀到保定会见徐永昌、刘峙等河北省军政官员，商谈八路军准备进入河北境内的布防和作战问题。十九日，经石家庄回到太原。

9月20日 同阎锡山多次商议后，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中共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等职。以后动委会在晋西北、晋东北、雁北和察哈尔、绥远等地，在配合八路军、牺盟会^①动员群众，组织人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9月21日 陪同率八路军总部抵太原的朱德连夜前往太和岭口行营会见阎锡山，商谈八路军的游击地区、军队驻扎和兵力使用等问题。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拖延已久的《中共中央为

^① 恢盟会，全称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九月，是薄一波任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主持山西统一战线工作时，组织起来并担任领导的。薄一波并组织和领导本年谱后文提到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任决死队第一纵队政委，指挥所部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9月23日 返抵太原。

9月24日 致电毛泽东、洛甫：日军正以主力猛攻保定。以一部袭击平型关，另一部占左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广灵、灵丘以南平型关一带待机，宋时轮支队出晋东北游击，王震旅开阜平，贺龙率第一二〇师师部及张宗逊旅开晋西北，驰援雁门关。建议第一二九师速开正太线南北地区武装民众，组织游击战争，壮大队伍，以后逐渐向西南山地转移。中共中央采纳这一建议，令第一二九师在九月底从陕北开出，先往正太路一带，以后向太行山区转移。

9月25日 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的一部，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取得八路军出师以来的首次大捷。

9月下旬 和阎锡山、黄绍竑等商谈作战动员和山西持久抗战等问题。在作战问题上，双方约定八路军在山西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并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作运动战。关于山西持久战问题，周恩来指出必须节节抗击敌人前进，战术上尤重在侧击、伏击与发展在敌人侧后方的游击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是最好最实际的政权组织，它作为统一战线的“初步政权”能把八路军、中国共产党、群众与地方当局几方面结合起来。为督促上述计划的实现，使华北游击战争局面得以开展和持久，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暂留太原。

△ 鉴于沿平汉、津浦线进攻的日军占保定、沧州后继续南犯，国民党部队向石家庄、德州以南撤退，致电蒋介石，要求迅速武装民众，组织河北游击战争。同时派边章五、李锡九等前往

河北驻军赵寿山、孙殿英等处督促这些部队背靠太行山作游击战争准备。

△ 致电阎锡山，建议阎命令从平汉路退下来的晋军进行侧面作战，发展游击战争。同时致电黄绍竑，请黄催桂军北上增援娘子关，同八路军协同作战。

△ 派邓小平以八路军政治部和动委会名义赴五台动员同蒲路东、正太线北各县民众武装起来发展游击战争。

△ 应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兼政训处处长李世璋的请求，派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前往协助工作。

△ 会见晋军将领陈长捷等人，向他们说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旨，并强调“必须发动群众，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效果”。

9月27日 应薄一波之请，出席山西全省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报告，指出：抗战必须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必须改造旧军队，建立新军队。鼓励牺盟会担当起领导与组织山西民众抗日的责任，完成保卫山西、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大业。

9月28日 阅报获悉项英、陈毅在南昌同国民党接洽改编红军游击队的消息后，分别致电项英、陈毅、傅秋涛、叶挺等，要他们立即相互取得联系。

9月29日 会见第一战区程潜部高级参议何遂，分析河北战局，指出：支持华北抗战必须开展游击战争，并不断增加生力军。

9月底 和中共北方局讨论华北游击战争的部署。为便于发展，拟将华北划为九个战略区：绥西、绥察边、晋西北、晋南、冀察晋（以阜平、五台为中心）、直南、直中、冀东（平津在内）、山东。十月一日，致电洛甫、毛泽东并告朱德、彭德怀，报告上述讨论情况，说已派人在这些地区进行组织游击战争和影响友军的工作。提出在这些地区若因统一战线的政治关系，中共不能以八

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出现，可以通过战区动委会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的领导。并建议中共中央即派得力军政干部（师、团级）十人速来太原加强工作。

10月初 忻口战役前夕，在太原会见阎锡山和卫立煌，指出中国军队必须依靠人民，改变战略战术，即应当把主力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的战法，主动打击敌人。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消极防御的战法，在防御当中要采取积极的“反突击”。针对阎、卫提出调第一二九师到忻口参加阵地战的意见，说明今天八路军在决战问题上不是主力，但在敌后游击战中将起决定作用。现日军向太原方面进攻，我们不能把所有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应该给第一二九师独立自主的活动机会，使它能迂回于日军后方，寻找有利条件打击敌人。

10月4日 鉴于日军主力进攻崞县（今原平县），直逼忻口，和阎锡山等分析敌情，制定作战计划。周恩来提出：令晋军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以小部守崞县牵制当面之敌，大部星夜回击攻原平镇之敌并消灭之，以稳住中路；调王震旅归还贺龙师建制以加强左翼；请南京另派三师主力北上出击；立即组织、武装正太路、同蒲路的铁路员工和井陉、阳泉矿工破坏铁路、煤矿等。并将此计划报毛泽东。毛泽东复电同意。

10月5日 和卫立煌、傅作义等商谈忻口会战作战计划。提出应以忻口周围山地为固守阵地，诱敌至代县、忻口线，求得侧面出击消灭敌人。处于左右两翼地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同时向宁武南北、代县以东侧击敌人，协同友军作战，力争在忻口以北取得胜利。卫、傅等表示同意。

10月6日 和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傅作义商定，统一指挥参加忻口会战的部队，右翼晋军十个团归朱德、彭德怀指挥；

中路归卫立煌指挥；左翼归杨爱源指挥；预备军归傅作义指挥守太原。

△ 致电毛泽东、洛甫，说明将率领数人并带一电台随阎行动。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

10月7日 致电毛泽东、洛甫、博古，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于九月二十五日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并提出两点补充意见：（一）对国民大会，我们应力争民选或按规定自选，如系谈话机关则我们不参加；（二）军队及边区代表争取参加到有利于抗日的军事、民众及政治机关中去。

△ 致电朱德并转彭德怀、刘伯承，告以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等愿同八路军建立联络。

10月12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敌逼近娘子关，以太原为中心的内线作战缺少回旋余地，必须转向外线，因此游击战的配合更加重要。主张向阎锡山、卫立煌说明：（一）必须转变作战方法，力争在忻口、石岭关等地区求得小胜利；（二）保卫太原战斗必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胜利，不应以众多兵力守城或正面堵击；（三）开展游击战对保卫山西、支持华北抗战有重要作用，请阎放手武装民众，布置山西的持久战局。此外，还建议八路军应以张宗逊旅主力及刘伯承师先头团截击敌近后方，配合中路作战；如中路战况激烈，林彪师实行原订计划，求得繁峙以东胜利，以振奋全国。王震部到达后，仍暂时钳制宁武之敌。十四日，毛泽东复电同意。

10月18日 和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转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并报毛泽东：请注意支持与发展晋军中的左派力量，凡在八路军驻地及附近如有决死队、教导团驻扎，不

管他们有无中共党组织的关系，应积极争取和影响他们，同他们密切合作；有时用他们的名义帮助其发展，如此方能推动阎锡山的进步。同日，在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转八路军各师军政首长电中指出，在友军中，中共党的组织要保持极端秘密，采取垂直线的个别领导，不宜发生多方面横的关系。

△ 和阎锡山、黄绍竑具体研究在太原不守情况下的分区防卫问题。

10月19日 鉴于日军在十月攻势中集结全力猛攻山西并企图夺取上海，南京政府对持久抗战发生动摇，加上国际上的引诱，国内妥协和平空气逐渐抬头等情况，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博古、叶剑英，指出中国战局已转入新的危机，建议：（一）我党公开发宣言，反对和平妥协，要求开放党禁，开放民运，改造军队，武装民众，为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抗战到底。（二）向南京政府提出抗战紧急方案。（三）向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进一步提出保卫华北的计划。（四）致电蒋介石要求增加生力军到华北支持抗战。（五）反对各军退到黄河南岸。（六）八路军在华北积极行动直接配合友军作战并扩大发展游击战争。（七）根据我党宣言及抗战方案在全国公开批评不积极抗战的错误。（八）在全国加紧进行组织民众及统战工作等。二十二日，洛甫、毛泽东电复：“对大局分析及我党政策完全正确，我们完全同意。”

10月中下旬 同彭德怀到忻口前线指挥部会见卫立煌，商谈作战问题。随后到娘子关会见黄绍竑，对东线作战提出建议。

10月21日 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同阎锡山合作，但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的来电后，复电说明，十多天来均本此方针，严防挑拨，严拒阴谋，在党内军中既反对政策上的右倾，又注意纠正组织上和工作方式上的关门主义等“左”倾表现。

10月22日 会见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10月25日 鉴于日军已占包头，致电毛泽东、洛甫、张国焘，提出发展绥远游击战争的战略建议，指出：敌转瞬将达五原，西北门户洞开，欲保陕甘宁边区及争取西北少数民族，必须发展绥远游击战争。我们决不能因沙漠地带气候寒冷就不发展游击战争。

10月26日 娘子关失守。

△ 同阎锡山、傅作义、黄绍竑共商作战部署和太原城中居民撤退计划以及山西的持久抗战问题。

10月27日 和刘少奇致电聂荣臻、罗荣桓转中共晋察冀省委及八路军各师政治部，阐明在不同地区处理同阎锡山的关系和开展党的工作原则：（一）在敌占区，公开以共产党和八路军名义直接领导群众。（二）在八路军后方，共产党和八路军努力争取公开地位与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各地党部应有公开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播党的主张。（三）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依照党的主张领导群众。（四）八路军在游击区活动时，要以共产党代表的面目在群众中出现，不要使群众只看见八路军看不见党。（五）八路军在各地努力扩军，地方党要动员群众参军。（六）在游击区要注意筹措经费。

10月底 会见《大公报》派驻山西战场的记者孟秋江、陆诒，向他们介绍山西的战局，着重指出：我军必须变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积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阻止日军前进。并嘱咐他们到前线后同部队一起行动，做好战地报道工作。

10月 根据周恩来指示，潘梓年、章汉夫、杨放之、徐迈进、钱之光、许涤新等陆续聚集南京，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后因上海、南京相继失守，筹备工作移武汉继续进行。

11月初 会见从忻口撤回太原的卫立煌。卫感谢八路军对忻口正面作战的有力配合^①，同时对太原的形势表示忧虑。周恩来指出：胜败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只要我们继续抗战，实行全民总动员，进行民主改革，最后定能改变不利形势，在战场上取得主动。

11月2日 应邀参加阎锡山在太原召开的军事会议，研究守卫太原问题。对傅作义接受守城任务，坚持抗战的精神表示敬意。后来在撤离太原前又同傅晤谈，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在战略上不应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注意保存有生力量。

11月4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告毛泽东：东线八路军应以一个支队向山西榆次、太谷之线活动，抗击敌人，以掩护友军侧翼的运输和收容散兵。

11月5日 和彭雪枫、边章五等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太原。

△ 日本政府鉴于中国军队在华北、华东战场的失利，认为诱降时机成熟，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提出七项条件。本日，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蒋介石对德表示衷心感谢，希望日本能“恢复战前状态”。

11月6日 到山西交城县。

△ 鉴于阎锡山退到晋南企图保存余力，致电毛泽东、朱德、

^① 忻口战役期间，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一五师协同友军袭取平型关、大营镇，相机夺取浑源、应县；令一二〇师主力位于岱岳（今山阴县）以西山地，完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以第三五八旅主力配合友军夹击宁武以南之敌；令一二九师以一部进至正太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

彭德怀，提出：为稳定局势，准备同卫立煌会商，建议卫对守城的傅作义部多作鼓励和督促。还建议令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徐海东旅加入雁门关方面打敌援军。

11月8日 太原失守。

△ 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八路军各部迅速派部队收集溃兵、散枪及一切资材，以发展游击战争。

△ 就东北军中一部分抗日干部参加八路军的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毛泽东、洛甫：这批人中大多数在双十二事变中同我们有联系，得到过我们的帮助，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领导。

11月9日 抵汾阳。

△ 鉴于晋察冀军区于七日成立后，需成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周恩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聂荣臻，就政权民主化的实施步骤提出建议：先从县、区做起，成立抗日的县、区、乡政委员会，由各团体推举代表，做到民选议会。再由各县的民主政权产生省、区的民主政权。但在目前亦可依情况成立省政权委员会或临时行政委员会。区一级机构可以由驻军代表、动委会代表及中心县的牺盟会等民众团体代表组成，由行政专员任主席并呈报阎锡山批准。

11月11日 到达在太原失守后成为山西抗战政治中心的晋南重镇临汾。在临汾期间，会见英国《伦敦先驱日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谈话中说坚持华北抗战最要紧的是加强中国的军队，发展群众运动。指出：组织华北民众抗战的主要任务将落在八路军身上。并一起看了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军将领坂垣征四郎的副官的日记。

11月12日 上海沦陷。

11月13日 致电毛泽东等，说沪、宁的求和空气渐浓，晋局也危，建议：（一）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二）强调游击抗战，争取和影响友军，同我们一致行动；（三）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训练干部，以坚持抗战；（四）扩大八路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五）放手收容溃兵散枪及资材；（六）加强各军区工作；（七）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八）实行党的战区政策，并组织民众发动群众斗争；（九）加强反汉奸的斗争。十五日，毛泽东复电说：周恩来所述各条是完全对的，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

△ 同卫立煌、黄绍竑谈部队的改造、战略战术的改变、政权和民运的开放、后方的补给、黄河北岸分区指挥和南岸成立预备军区等问题后，即将情况电告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并提出：华北随着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八路军将取得领导地位。但目前我们仍以在取得南京当局和阎锡山的同意和接济的情况下布置华北游击战，较易于争取友军，扩大八路军，发展游击战争。

11月15日 鉴于归绥（今呼和浩特）失守，绥远形势混乱，敌伪有可能派骑兵近扰陕北，致电毛泽东、洛甫，建议中央加强陕北防务并派人发展绥远游击战争。

△ 致电洛甫、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日军占领华北后必以大力压迫和引诱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并收容部分军队，以便全力对付八路军。因此，目前以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为号召是完全正确的。

11月16日 和刘少奇联名致电聂荣臻，就晋察冀边区如何进行抗日政权的建设问题提出：立即颁布临时分区的组织法；向国民政府提议颁布劳动、土地等各种法令；准备公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筹备组织各群众团体；在筹备成立分区政府、军区司

令部的同时争取蒋介石、阎锡山的同意后向全国公开，以便取得接济和推广到其他分区。

△ 在临汾群众大会上发表题为《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讲演，指出：抗战局势出现“政府军队抗战颇难为继而全民抗战犹未兴起的青黄不接，国内外调停的空气相当抬头”的危机，列举当时出现的严重现象和各种具体危机，号召人民“要为消灭这一切现象与克服这一切危机而奋斗，而战斗到底”。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可能、有利条件及其前途，指出：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坚持华北战争将以游击战争为主体，华北游击战争将有胜利的前途。强调八路军留在华北作战是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战的重要因素。还提出坚持华北抗战的几项工作：（一）改造旧军，成立新军，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改善部队的生活，发挥部队独立作战能力，实行运动战、游击战，争人不争地；（二）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地方自治自给，实行抗日纲领；（三）开放民运，宣传、发动、组织、武装民众；（四）肃清汉奸，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

11月20日 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之后，部分军政机关迁到武汉办公。

11月25日 和彭德怀回到延安。

11月29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陈云^①也同机到达。

① 陈云，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受命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已先到新疆迪化。

12月2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并告杨尚昆、彭雪枫：在日军缓进，阎锡山继续留在山西的条件下，八路军仍须着重巩固统一战线，尤其注意同阎的关系，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磨擦。

△ 蒋介石再次会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表示愿以日本提出的七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同意派亲日分子为华北行政首脑；同意与日本共同反共。不久，日本再次通过德国驻华大使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谈判条件，因内容苛刻，遭到蒋拒绝。

12月6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并告杨尚昆、彭雪枫：日军正在进攻八路军，企图引诱阎锡山和国民党内的右派，分裂抗日阵线，我们无论在友军区域及敌人后方，都应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破坏敌人阴谋，要加紧内部的统战教育。

12月9日—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检查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九日，王明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解决民主和民生问题，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十一日，周恩来就抗战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发表意见，认为从山西的情况来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就准备同蒋介石、蒋鼎文和阎锡山会谈的具体问题作了说明，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中央的几个组织机构和派往各地的工作人选。会议通过《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等。会议还决定由

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①。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

12月10日 和博古就发展江浙地区游击战争问题致电任弼时转叶剑英等：必须注意同国民党方面合作，一切游击队都应取得合法地位，力求依靠山地为根据地。在我们影响下的友军部队也要尽力保持同国民党政权的良好关系，反对一切妨碍统一战线的作法。

12月13日 南京沦陷。

12月中旬 为了同国民党协商国共合作事并准备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离开延安前往武汉，途中在西安停留两天。十六日，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负责人谈话，初步协商国共两党合作及参加民运等问题。十七日，在西安各团体代表谈话会上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坚持长期抗战的三个基本条件：巩固与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加强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的国民革命军基础上加强与扩大统一的国防军。强调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来争取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

12月18日 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抵达当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的武汉。

12月21日 和王明、博古等同蒋介石会谈。周恩来就中共提

^① 根据博古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报告”，长江局工作范围包括滇、黔、川、湘、鄂、赣、皖、苏、浙、闽、粤、桂等省以及上海市、河南省和新四军。

出的一系列建议如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建立国防军事工业机关、征兵委员会、补充扩大和改造部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问题，作出具体说明。王明说明目前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合作任务、国际活动情形与共产国际某些提议。博古谈陕甘宁边区、联络参谋、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蒋介石表示：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等同你们共商一切。这次会谈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协议。参加人员中共方面为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

1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举行的联席会议。会议认为中共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领导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并，对外为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中央局；中共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长江局下设秘书处，李克农任秘书长；参谋处，叶剑英兼参谋长；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博古兼部长；宣传部、王明、凯丰先后任部长；党报委员会，王明兼主席。会议并决定将以上各项呈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关于新四军问题，会议认为南方各地区的游击队应迅速集中，全部开往抗日前线；作战地区可以浙赣铁路划界，路北为第一战区，路南为第二战区，等。江南部队在各战区的分布数目待部队集中后再定。

△ 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告林伯渠，要求派往新四军的干部速到武汉。

12月24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派人来武汉领导工人运动。

12月下旬 和董必武、项英、叶剑英、叶挺等商谈筹建新四军军部等问题。二十五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

12月26日 和王明、博古、叶剑英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国民党方面出席人为陈立夫、刘健群、张冲。会上推定周恩来、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

1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在日军加紧进攻中国南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的时候，长江局应发展广东和广西的工作，并将两广工作的中心从香港移至广州。会议决定派长江局组织部干部黄文杰赴两广巡视工作，并决定在武汉开办短期职工运动训练班，教育和培养职工运动骨干。

12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临时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傅秋涛、高敬亭、张青萍分别汇报红军长征后留在湘赣、鄂豫皖、鄂豫边地区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及党组织的情况，认为这些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斗，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12月30日 主持中共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临时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周恩来起草的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草案。

△ 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由于国民党方面将会议议题转到请求中共帮助达到使苏联出兵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上，而未能讨论周恩来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一九三八年春，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又共同协商和草就一个共同纲领草案，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始终未提出正式意见。

12月31日 在武汉大学作《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

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为此，中国青年今天努力的方向是到军队里去，到战地去，到农村去，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最后胜利。

冬 安排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到延安和山西八路军总司令部访问。

1938年 四十岁

年初 应邀出席汉口文化界座谈会。在交谈中说明八路军由于缺少重武器，还不能担负起夺回重要城市和交通线的任务，而只能负扰敌后方，牵制敌人兵力和夺取较小城市的任务。同时指出在敌占区发动游击战争不是流寇式的，而需要同附近正规部队取得密切联系；游击队要有坚强的干部，要组织民众，要时时与敌人战斗。

△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要求派“能做游击队工作”的干部来武汉，以便“迅速发展我们的军事工作”。说明“长江流域各种条件均逊华北”，若没有“一批军事干部，工作发展将陷入极大困难”。

△ 会见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说：中山陵前，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并亲自安排何秘密前往延安。后来，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 同到武汉请示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上海市委书记刘长胜谈话，指示上海地下党要善于独立工作；动员城市中的工人、学生、革命分子下乡，开辟敌后抗战局面。

1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在会上作关于战略问题和共同纲领问题的报告。会议认为目前应动

员一切力量阻滞日军占领郑州、武汉，争取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准备和组织新的抗战力量，为此应派大批干部到安徽、河南发动和武装广大民众。并建议中共中央加强西北工作和巩固西北交通。会议还认为对国民党提出的改组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各部等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应该同国民党开诚合作。

1月3日、5日 为在华北敌后抗战中发展壮大的八路军增补经费、武器事，先后见蒋介石、何应钦。

1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分析河南、湖南的政治形势，讨论党在这些地区的任务，指出河南将成为中日战争的重要地区，党的总任务是实行武装保卫；湖南已成为抗战的近后方或不久将成为前线，党的总任务是建立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党的力量。并对这两个省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1月8日 在《群众》周刊^①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文章提出争取持久抗战最后胜利的八项具体办法：（一）巩固前线；（二）建设新军备；（三）建立军事工业；（四）发展敌占区的广大游击战争；（五）进行广泛的征募兵役运动；（六）巩固后方；（七）加强国防机构；（八）运用国际有利条件。

1月9日 为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十一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华岗、潘梓年、黄文杰及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组成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华岗任书记。

^① 《群众》周刊，创刊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是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1月10日 在上海出版的《抗战政治工作纲领》一书中发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文章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文章阐述了抗战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内容、组织和方法。

1月11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国民政府军委会改组，蒋以陈诚任政治部长，要周恩来任副部长，周曾再三推辞。请中央考虑具体意见。

△ 和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日军准备以主力沿陇海路西进，以求得与沿平汉、津浦路南进之敌相配合。蒋介石认为目前作战重心应移黄河西岸，正在重新部署兵力。建议将刘伯承师及徐海东旅逐渐移至太行、太岳山脉，待日军攻郑州紧急时，我们应以一师（林彪师或刘伯承师）要求过河，参加陇海西段战斗，掩护陕东、陕南。继续向国民党要求八路军留守部队向固原、海原等地移防。鄂豫皖红军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余部仍在鄂豫皖边界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州游击运动。

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听取林恺汇报鄂豫边的工作，并就此进行讨论，决定河南省委须以这个地区为中心发展工作，鄂豫边特委须加强对由该地区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领导，并帮助做好巩固和发展工作，同时加紧发展党组织。会议还决定，第八团队的行动由长江中央局参谋处指挥，开出作战时归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指挥，林恺代表河南省委指导该地工作。

1月15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张国焘、康生、陈云、凯丰，说明长江局工作量过重，现有力量难以应付，再次要求中共中央派军事、政治干部和能独立工作的人来。

1月16日 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1月17日 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印刷厂。长江中央局立即就此事作出决议，由周恩来、叶剑英出面同武汉国民党党政军当局交涉，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月18日、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彭德怀报告前方情况及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洛阳召开的军事会议情况和罗世文关于四川工作的报告，并就此进行了讨论。二十一日，周恩来根据会议讨论结果起草长江中央局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提出对四川工作的意见：四川已成为抗战最后根据地，成为联结西南和西北的枢纽，而且很快会变为全国各党派各实力派争夺的中心。加强四川地区党的工作，使上层联络活动能尽力掩护和帮助党的影响和组织之发展，这应成为目前四川工作的中心任务。建议中共中央派得力的及川籍的干部赴川主持党的工作，同时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中选一批川籍学生回川工作；在重庆设新华日报分社并筹备印厂，准备必要时西迁；努力发展军事工作，寻找川北、川南、川西留下的红军游击队和干部并谋其发展，派人及游击队员投考军分校或参加刘湘的教导队；运用上层统一战线推动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加紧扩大中共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

在此期间 和王明、博古等同彭德怀交谈，得知蒋介石不愿八路军扩编，不肯发枪和增加经费。要彭继续同何应钦商谈。

1月21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关于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域、政府组

织等情况：国民党方面坚持管理县份限于十八县，不允许增加。周恩来等坚持要求增加西线各地直达黄河右岸。关于边区政府组织，国民党提出派丁惟汾任正职，林伯渠任副职并代理正职，下分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不允许设农工厅，并要派两人来做事。二十三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陕甘宁边区问题请设法争取下列各点：（一）增款；（二）增地；（三）给陕北部队以名义；（四）边区政府可以丁惟汾正、林伯渠副，但不须派人。

△ 鉴于蒋介石、陈诚坚持要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政治部属军事系统，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可以担任此职。说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

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鄂豫皖特委的工作，决定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基础上尽力扩大部队；加紧培养干部，健全党的组织和工作；尽可能在最近期间集中队伍加以训练后参加抗战；留一部分队伍保护后方根据地。

1月23日 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康泽、刘健群等在会上诬蔑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宣传“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次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上述情况。提议用争取八路军在敌后取得新的、较大的军事胜利和新四军迅速出动抗日前线，在长江南北创造新的军事力量等办法来给以回击。

△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宋庆龄、蔡元培、毛泽东、冯玉祥、王明等七十二人当选为名誉主席，邵力子、郭沫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一百三十九人当选为理

事。

1月下旬 会见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率领的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感谢他们援助中国革命，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奉献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1月28日 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后，于一月十四日向全国发出通电。本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发通电一事提出意见：八路军在华北驻区应遵守政治局讨论过的形式上维持原有政权形态，实际上政权在民众手中的原则。这次采取造成既成事实方式通电逼蒋、阎承认，对全国统战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

1月 受中共中央委托，和董必武、叶剑英等向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要第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 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商谈后，经卡尔帮助，获香港总督批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办事处对外称“粤华公司”，由廖承志负责，以经营茶叶生意为掩护，联系海外华侨及香港等地中共党组织。

△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到武汉。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多次会见她，向她详细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赞扬她的国际主义精神。

2月3日 为《救亡日报》题词：“巩固和扩大救亡阵线，动员起千万万的群众，赶走日本强盗出中国！”

2月6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为部长，黄琪翔、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

△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针对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拟取消国民党、共产党，另外成立新党，决定起草向国民党建议书，指出国民党要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提议建立民族革命联盟以巩固统一战线。

2月7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最近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提议在二月二十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

2月8日 为《新华日报》反侵略国际宣传周工农日特刊题词：“工农大众，是中国抗战的柱石，是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先锋。你们如果联合起来，日本侵略的魔鬼，将要在你们面前崩溃，全世界的法西斯阵线，将要在你们面前瓦解。”

2月9日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举行的孩子剧团招待会上讲话，鼓励孩子们要有“救国、革命、创造”的精神，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以后，经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孩子剧团纳入政治部第三厅编制。

2月10日 会见蒋介石、陈立夫。蒋介石表示：（一）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二）无意取消各党派或不允许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周恩来说明：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答：可以研究。陈立夫提出在两党外共同组织双方都可以参加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同日，和王明将会见的情况报中共中央，说：综观蒋的态度，（一）一个党的思想仍有，但目前并无强制执行意思；（二）对八路军态度尚好；（三）对陕甘宁边区的问题想拖延。

2月13日 鉴于日军以突破黄河、夺取武汉为新的战略中心，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为确实建立长江、黄河间的党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

皖、苏群众参加战争。为此，拟调彭雪枫由晋来豫，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十五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具体讨论上述问题。会议决定在长江、黄河间设立一个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由彭雪枫负责领导新设军区的军事工作。还决定在武汉不守时，从长江局转移一部分人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建立长江、黄河间的领导机构，并预先派人布置重庆机关。建议中共中央将南方各地党的组织改为区和分区两级。

2月14日 会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同他交谈对时局的看法，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主张，分析中国抗战必须坚持持久战的道路，以及在战争中要注意改善士兵待遇，充分利用优势地形战胜敌人等问题。还同冯商量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事，请冯支持，并建议由著名作家老舍出面主持文协工作。

2月15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联名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保障继续抗战和取得抗战最后胜利问题及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问题。

2月中旬 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之邀，向开赴抗日前线路经武汉的广西学生军作讲演。

2月17日 致信在长沙的郭沫若^①：已原则上决定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惟须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始能就职，否则统一思想、言论、行动诸多解释，殊为不

^① 政治部成立后，蒋介石安排刘健群任第三厅副厅长，遭到郭沫若反对，并拒绝出任厅长。事后，经周恩来同意，郭沫若远避长沙。

便”。信中要郭对三厅问题亦“采此立场”，并嘱其说服田汉、胡愈之来武汉工作。以后，多次同陈诚等交谈，为郭回武汉工作排除困难。

2月19日 约见冯玉祥，商谈抗战问题。周恩来在谈话中强调河南现处重要地带，应由国民党中央同河南地方合组一民众动员委员会，发动民众保卫河南。特别是河南的知识分子更应自动回河南做这一工作。

2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行动问题，指出目前原则上以巩固部队争取出发到前线为中心；以“保卫河南”作为动员群众的口号；对其他部队要事先进行统一战线和联络工作。

2月21日 为庆祝中国空军十八日击落侵袭武汉的日军飞机的胜利，追悼在空战中牺牲的烈士，武汉各界在汉口举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大会。周恩来、王明、叶剑英、邓颖超等亲临致祭，并为大会送挽联：“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提议请中共中央多派能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出来工作。

2月下旬 会见从前线抵达武汉的川军将领邓锡侯，向他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希望川军能同八路军协同作战。在武汉期间，还曾会见滇军第一八五师师长张冲，并派中共党员薛子正任张的秘书（后任参谋长），开展对滇军的工作。以后，张冲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些工作，对解放战争后期川、滇将领的起义起了重要作用。

△ 致电在重庆的阳翰笙，催他速至武汉筹组政治部第三厅。

2月24日 致信郭沫若，说明在同陈诚谈话中得知第三厅副

厅长人选问题出现转机，认为郭可以回武汉任职，但嘱“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以便依此作第三厅工作方针”。三月一日，郭沫若回到武汉，同陈诚商议达成就职的三项条件。

△ 和王明回到延安。

2月27日 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向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队长钱亦石追悼会送挽联。

2月27日—3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就抗战形势、统一战线和如何保证抗战继续胜利等问题发言，并介绍了武汉各方面的情况，提出为保证抗战胜利，党应向蒋介石建议：（一）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二）组织新的军队；（三）建立国防工业；（四）巩固后方。并指出现在统一战线运动扩大，但党组织的发展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建议中共中央加强对中国南部的领导。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并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3月上旬 和王明等回到武汉。

△ 和叶剑英会见奉命到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的白崇禧，就第五战区的对日作战方针提出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张云逸^①率部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之不敢贸然北上支援由华北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基本上接受了这个建议。

△ 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赴徐州会见李宗仁。张到徐

① 张云逸，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州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议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同日军打一仗，指出这既可提高桂系的声望和威信，又可破灭蒋介石欲假日本人之手排除异己的企图，并详细分析了日军的弱点。

3月12日 在《新华日报》第四版《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怎样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一文。文章指出：纪念中山先生最好和最真诚的办法不在于隆重的仪式，不在于空洞的悲哀，不在于盲目的膜拜，不在于冲动的情感。要学习他对国共两党合作所具有的一个伟大的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诚挚和亲密的态度。当前首要的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的伟大的中华民国。

3月中旬 和叶剑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华北战局。

△ 和叶剑英同蒋介石、何应钦谈判，蒋、何答应向八路军提供武器和技术人才。

3月19日 接曹渊烈士之子曹云屏来信，知其家境贫苦，难以升学，而“求深造之心甚切”的情况后，本日复信嘱其来汉口转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或陕北公学学习。并寄路费二十元。在武汉期间，还陆续送熊雄烈士之弟熊任远、孙炳文烈士之女孙维世等赴延安学习。

3月20日 会见荷兰进步电影工作者伊文思，商议政治部派人同他合作到前线拍摄电影事。

3月25日 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为大会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学校里学习，到前线上学习，到军营中学习，到群众中学习，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

3月27日 在三月二十三日举行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次筹备会议上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本日，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话说：全国的文艺作家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肯定作家团结的意义，希望他们创作的作品多取材于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敌人的残暴和民众的热情。会上选出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恩来、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等为名誉理事，由老舍负责协会的工作。

3月28日 同郭沫若第一次出席政治部部务会报会^①。会议听取各厅厅长汇报工作。郭沫若报告说，第三厅正在加紧筹备，决定四月一日开始办公。

3月29日—4月1日 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取消预备党员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3月 和叶剑英派军事干部到武汉大学等校举办的游击战争训练班，对青年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教育。

△ 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和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竹沟留守处，要重视根据地建设和后方工作，广泛联系一切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人士。根据上述指示，河南省委在豫南同国民党信阳县长李德纯、西华县县长楚博、扶沟县县长魏凤楼、襄县长

^① 政治部部务会报会，政治部成立后最初每周召开两次部务会报会，听取各厅汇报工作，并对各厅工作做出安排。四月中旬后改为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周恩来在武汉期间曾九次出席政治部部务会报会。

贾峰、桐柏县县长朱锦帆等建立了统战关系。后来，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月4月间 派张爱萍到浙江金华开展对黄绍竑的工作。

春 指示中共山东、河南的联络局合并为豫鲁联络局。六月，豫鲁联络局改为河南省委统战委员会后，开展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并同国民党将领邓锡侯、商震、张轸、刘汝明、刘茂恩、于学忠、冯治安、张钫等部建立了统战关系。

4月1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在筹组第三厅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博古、董必武等多次商议第三厅的宣传方针、组织机构、人员安排、党的活动方式等，对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做了大量工作。由郭沫若、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杜国庠、张志让、洪深、董维建、冯乃超、光未然等众多知名人士组成坚强阵容。并同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斗争，迫使其撤销原先要刘健群任副厅长的意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第三厅内还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特别支部，运用灵活巧妙的方式宣传中国共产党倡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挥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作用。周恩来、郭沫若等通过这个机构，在武汉推动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

4月初 为民族解放丛书撰写的《抗战政治工作纲要》一书由解放出版社出版。书中对抗战正规军队的政治工作、战时的一般政治工作、战时对俘虏的政治工作、抗战游击队的工作作了系统的阐述。

4月4日 主持政治部部务会报会。郭沫若及第三厅各处负责人汇报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的准备工作，会议对此做出妥善安排。

4月上旬 同第三厅各处负责人多次研究如何开展第二期抗

战扩大宣传周的活动。七日，由第三厅发动的武汉各届抗战宣传周开幕，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的专论，提出：在文字宣传上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在口头宣传上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在艺术宣传上要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要求大家把这次抗战宣传周的经验，推广到各城市乡村去，一直达到全中华民族的动员。宣传周的第一天，传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武汉三镇举行了十万人的火炬游行。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到武汉的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又举行了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等。以后在各种宣传活动中，广大群众都踊跃参加，形成规模空前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

4月11日 主持政治部部务会报会。郭沫若在会上报告滞留武汉的各地青年宣传队生活困难，拟请酌予救济并分派工作。会议决定由第二厅、第三厅会同办理解决上述问题。

△ 得知张国焘私自从延安经西安逃到武汉后，立即派人将张接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并和王明、博古等多次同张谈话，劝他回党工作。

4月16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书记处负责同志利用作报告和讲话的机会说明张国焘路线应由他一人负责。对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应表示亲切团结，以便为最近公开反对张国焘事做政治上的准备。同时不要因此事增加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隔阂，而应更加增强全党的团结。

△ 陪同张国焘见蒋介石。张向蒋表示自己“在外糊涂多年”。张在返回办事处途中乘机逃脱，被找回后在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的谈话中表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糟，愿暂脱离政治生涯。

4月17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根据张国焘的表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讨处理办法。经中央同意，同张国焘谈话，向张提出：改正错误回党工作或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或自动声明脱党。当晚，张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

4月18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将张国焘的表示电告中共中央，并拟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草案，建议中央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解释，应当利用开除张国焘的机会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

△ 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4月20日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党员大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教育大家在艰苦复杂的斗争面前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永远忠于党，革命到底。

4月29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就国共两党关系和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两个问题，在《新华日报》发表《答复子健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4月下旬 同《救亡日报》负责人夏衍谈办报方针，指出办报要学习邹韬奋办《生活》周刊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

4月 看望伊文思。

4月5月间 领导成立中共长江中央局下属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委员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吴克坚、王炳南组成，工作人员有王安娜、许孟雄、毕朔望等人。主要工作是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著作，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同外国友人进行联络。

5月1日 为《新华日报》“五一”纪念专刊题词：“全中国工

人阶级在抗战中来纪念‘五一’，实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全中国工人阶级应努力于民族解放以谋自身的解放，另方面应联合全世界工人阶级反抗暴日的侵略以保障世界和平。”

5月4日 为纪念五四运动给《新华日报》题词，内说：“我愿全中国学生保持并发扬这一历史传统，贯彻抗战到底，勉为文化先锋。”

5月19日 日军占领徐州。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为此武汉城市工作即使受到部分损失也不应顾惜。周恩来、叶剑英接到指示后，当即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等作了传达，要求河南省委立即贯彻执行。河南省委根据指示对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并动员一万多城市工人、学生、革命分子回乡开展工作，沿陇海、平汉线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

5月22日 和王明、吴玉章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慰问在十九日深夜驾机前往日本长崎佐世保一带散发传单凯旋而归的中国空军一队。周恩来发表讲话，赞扬他们的成绩。

△ 《解放》周刊发表毛泽东、朱德、王明、周恩来、洛甫、博古、项英、陈云致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电，内称：拥护中美兄弟党和两国人民的紧密团结！打倒日本侵略者！美国共产党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5月25日 在中共代表团招待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茶会上致词。到会的有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代表和外国友人共四百多人。

5月26日 日本近卫内阁改组。新任外相宇垣一成宣布取消一月十六日不以蒋介石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

5月26日、6月7日、6月11日 三次致信《大公报》采访主任范长江，对战地记者表示关切。此后，又曾听取战地记者的

汇报，鼓励他们据实向政府当局反映前线情况，认真总结抗战的经验与教训，并根据他们反映的问题向陈诚提出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具体建议。

5月31日 为中国旅行剧团演出《阿Q正传》题词：“坚持长期抗战，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以打倒中国的阿Q精神！”

5月 出席文协第二次理事会，发表即席讲话：为文艺界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亲密团结感到高兴，表示将设法为文协筹款，使大家能更多地创作，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含着泪说：“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

△ 同到武汉的项英研究新四军工作。并陆续介绍青年学生赴新四军工作。

6月4日 鉴于八路军在敌后迅猛发展，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朱德、彭德怀：依八路军扩大的情形来看，拟向蒋要求增编三个师，共有六个师。

6月6日 致信世界红十字会河南临汝分会医院院长王冠珊，对其子欲投考陕北公学“志切深造”表示赞赏。考虑到由汉口至陕北的铁路有被日军截断的危险，嘱其设法从豫西绕道西安，直赴栒邑陕北公学分校。

6月7日 根据叶挺的建议，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拟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等七人为委员，项为主主任，叶为副主任。九日，毛泽东、洛甫复电同意上列六人。

6月8日 同陈诚交涉，要求释放在国民党当局查封汉阳兵工厂抗敌工作团事件中被拘留的李公朴，并将情况函告沈钧儒。不

久，李公朴获释。

6月15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日军集中主力来陇海、津浦，山西平汉及津浦北段均较空虚，应抓紧有利时机扩大我军、我党的政治影响，鼓励和坚定友军抗战决心。同日，毛泽东复电：周电提议是正确的，惟具体作战须依据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

△ 鉴于徐州失守后蒋介石对保卫武汉态度犹豫，国民党内一般将领也准备保存实力，抗战出现危机，为激发群众的抗战决心，王明、周恩来、博古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具体阐述保卫武汉和有效地进行第三期抗战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需要采取的步骤和办法。文章说：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仅对第三期抗战有极大影响，而且对整个内政、外交都有相当影响，因而要发扬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来保卫大武汉。

6月16日 和王明、博古、凯丰等自四月中旬以来同中共中央书记处多次商议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名单，本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将中共参政员定为七名：毛泽东、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

6月17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谈徐州失守后中国军队的战略方针，认为战略中心应是保卫大武汉。战略总的方针是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太行山、嵩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黄山、天目山一带开展大规模山地战，以阻击日军西侵，加强长江防务。同时抽出一部正规军组成挺进队，深入敌后，发展敌后游击战，造成战略夹击形势，大量消耗敌人，争取时间建立新的军队，以便战略上实施反攻。并

报告已在《新华日报》发表关于保卫武汉的意见书。

6月19日 将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商定后起草的同国民党交涉的十条意见交蒋介石。内容包括：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释放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停止查禁抗日书刊；保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军人家属；在敌后普遍发动游击战；开放地方政权实行民主；划延安、延长、延川等二十三县为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直属行政院，林伯渠为主席；第十八集团军扩编为三军九师，新四军增编为七个支队；等。

6月28日 鉴于国民党当局为阻止日军西进，在郑州北面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使河水改道，和叶剑英致电朱德、彭德怀，建议注意黄河两岸游击运动的联系和发展。

6月 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从上海到汉口，和斯诺等筹划“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周恩来告诉艾黎：组织“工合”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推动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并尽可能多争取国际的支持。还对“工合”组织的性质和人事安排提出了建议。“工合”成立后，积极宣传中国抗战的重大意义，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朋友中募捐，并将筹集到的物资、款项转送延安，对支持中国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 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叶剑英等指示，中共河南省委派肖望东率部队从竹沟挺进豫东敌后，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

夏 和博古、叶剑英分别会见国际友好人士斯诺、艾黎、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感谢他们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武汉期间还会见过美国总领事戴维斯、《纽约时报》记者德尔丁、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美国主教鲁茨、美国作家贝尔登等。

7月5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电复项英，指出东南分局主要工作区域应放到赣北，利用一切机会加强上层统一战线活动。赣

南等处仍需注意秘密工作。

7月6日 国民参政会首次会议开幕。会前，王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吴玉章、凯丰致电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建议以中共七位参政员名义提出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说明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决不因此而失掉它在今天的作用和意义，共产党人除继续努力于促使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在将来得以建立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后，周恩来经常在汉口中央银行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爱国人士张澜以及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聚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同蒋介石谈判情况，分析政治、军事形势，争取中间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 收到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毛泽东联名致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电。电报说明中共中央保卫武汉的方针是：“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7月7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文中指出：日军速战速决的方针，经过一战再战，虽已占领了我们沿海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其聚歼我军，逼我屈服的企图，终未达到。目前乃是在矛盾的发展中继续作冒险的进攻。其战略方针，必然是集中主力，以包围武汉，切断粤汉、平汉、陇海，逼我退出一切铁路交通，以便最后威胁广州、兰州。提出：我军保卫武汉必须实行内外夹攻敌人的方针。保卫武汉的目的主要在于给敌人以极大损伤，使敌人聚歼我军的企图不能完全达到。即使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那我们增长的力量，不

仅能继续抗战，而且能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的配合中，日益接近于力量对比之质的变化，最后能转弱为强，反败为胜，进行决战”。

△ 为重庆《新民报》创刊周年纪念特刊题词：“全民团结，持久斗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7月上旬 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同郭沫若等商定，由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发起献金运动，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七月九日，同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全体人员组成“中共献金团”，到汉口江汉关献金台前参加献金，将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当月薪金全部献出。五天内，参加献金的达五十万人次，献金总额九十三万元。

△ 会见从抗战前线回到武汉的李宗仁，谈团结抗战问题。并商得李宗仁同意，在第五战区成立抗敌工作委员会。中共党员钱俊瑞以进步文化人士身份担任主任委员，胡绳等共产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参加其中工作，使第五战区的抗日力量得到发展。

7月11日 得知阎锡山以调干部受训为借口，解除牺盟会、动委会领导的游击队的武装等情况后，和刘少奇联名致电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动委会，指出：准备由周恩来给阎去电抗议。望你们通知各游击队警戒，并让便于转移的部队准备向雁北、绥远和其他地方转移。但事先须同保安司令续范亭商议并取得他的同意。

7月下旬 和林伯渠先后会见蒋介石、何应钦，讨论扩大八路军编制事。蒋、何借口二百师已满额，不愿给师的番号。二十六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说，准备向蒋提出两个方案：（一）仍请编三军六个师或三师九个旅二十七个团；（二）请委五台聂荣臻，冀热宋时轮、邓华，津浦线徐向前、陈再道，河防肖劲光以司令名义。当日，收到毛泽东复电：加编三个师如不

可能，以第二方案为适宜。收到朱德复电：三军六师计二十四个团，如蒋、何拒绝，则以报三师二十七个团为好。聂荣臻，宋时轮、邓华，徐向前三部另给纵队名义，肖劲光为河防司令。刘伯承、贺龙两师已各有九个团，林彪师已七个团，也拟编为九个团。聂区的赵尔陆、刘道生、杨成武、陈漫远四部共编九个团，太行山地方武装共有四个团。

7月 和董必武、叶剑英等会见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对谢在广西的工作作指示。

8月1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为纪念国际反侵略战争纪念日给各国共产党报纸撰写的短文《今年的八一》。

△ 出席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下属的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成立大会。在会上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要队员们坚持艺术为抗战服务的方向。不久，演剧队、宣传队根据周恩来指示先后分赴广东、江西、山西、湖北、河南、浙江、湖南、广西等战区。周恩来要求演剧队、宣传队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随队行动，深入前线，要利用合法身份开展统战工作。武汉撤退前，又将演剧队、宣传队的党组织关系交给各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请他们指定专人负责联系，使演剧队、宣传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活跃在战区和敌后。

△ 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估计江淮河汉之间的游击战争将有较大发展，建议中共中央抽调二百名军事干部到武汉。

8月3日 和王明、博古见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团结、保卫武汉等问题交换意见。蒋答应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湖北省委代表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及动员委员会。

8月6日 会见陶行知创办的少年儿童抗日宣传队——新安

旅行团负责人汪达之等，对该团来到武汉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努力工作。不久，新安旅行团被安排到新四军工作。

8月7日 出席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紧急联席会议。参加商讨武汉人口的疏散问题，并被推为下次会议的召集人。

8月20日 国民党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名义下令解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个团体——青年救国团、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二十一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表示抗议，因而被勒令停刊两日。同日，中共长江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前总、新四军，提议由中央发抗议通电，各地发拥护《新华日报》电文。后经周恩来严厉交涉，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允许《新华日报》照常出版。

8月28日 收到叶挺因在工作中同项英不和而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的电报后，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叶挺，表示挽留：项英赴延安开会，新四军工作请你实际负责。待会议结束后，我们拟去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

8月 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的武汉军官训练团讲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课。

8月29日 和王明、博古、徐特立等离开武汉返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9月2日 和叶剑英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将工作重点移向豫东，开创苏鲁豫皖抗日根据地。

9月10日前后 和王明、博古、徐特立等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及部队战士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9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

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9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的报告。报告分四部分：（一）分析抗战形势和保卫武汉问题；（二）关于国民党的统治及其政策；（三）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统一战线中的工作；（四）各方面对统一战线的破坏情况。

9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就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作报告，指出：抗战将转入第二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第二阶段要发展游击战争，使正规战同游击战适当配合。要在战争中建立新的军队。要大胆把新四军中的老干部放出去发展游击战争。说明我们必须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下，拥蒋合作，拥护三民主义，这是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调整了各地组织机构，决定设立四个中央分局：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黄文杰组织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中党的工作。

9月29日—11月6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重申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九月三十日，周恩来报告统一战线工作，详细叙述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提出有关统一战线工作的十二条原则：坚持抗战高于一切，坚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实现三民主义，认定国民党为主要合作对象，加强与各地方军队的联系，坚持民众的动员，坚持国内民主，坚持国际和平阵线，坚持

反对汉奸、托派，发展我们的力量，等。因时局危急，周恩来在报告后，即离延安赴武汉。

9月底 鉴于日军集中兵力进攻武汉，情况紧急，致电彭雪枫，要他速去豫东发展游击队。彭接电后，立即率部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后来，新四军的四师、五师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

10月1日 返抵武汉。

10月初 和凯丰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有重要意义，为避免被亲日派所乘，请王明、林伯渠、吴玉章均去出席。

10月4日 见蒋介石，送交毛泽东、王明信件，并向蒋说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抗战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谈到武汉失守后将遇到新的困难，蒋表示坚持抗战无问题。对八路军在敌后求补充发展，蒋表示赞成。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共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组织，中共党员公开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一事蒋很注意听。蒋要周将意见写出给他。八日，周恩来将意见写出交蒋介石。

10月5日 在武汉记者学会晚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必须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鼓励青年记者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新闻报道工作。

10月6日 和凯丰致电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建议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二十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并提交中共七大作最后决定。

10月7日、10日 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

10月7日—9日 《新华日报》连日以社论形式发表周恩来撰写的《论目前抗战形势》。文章根据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

和本年七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精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保卫武汉的主张，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必须经过毛泽东所说的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保卫武汉的战斗固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武汉并无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转入相持局面之过渡阶段的”。文章强调发展敌后广大的游击战争和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保卫武汉重要，坚持持久战更重要！只有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国内团结，才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地转入相持局面的基本方针。即使武汉不保，我们也还有可能继续长期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10月10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为纪念辛亥革命二十七周年撰写的代论《辛亥、北伐与抗战》。文中指出：辛亥革命的失败，北伐时国共的分裂，不能不使我们承认，当时统一战线的基础还不巩固，还不扩大，特别是北伐时国共两党的政策，还没有取得一致。今天在反对日本强盗的自卫战争面前，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不分任何种族、阶级、党派、信仰、性别，都应该联合起来。纪念辛亥革命二十七周年，全中华民族，全国各抗日党派，应该宣誓：使中国不再分裂，使统一战线永远巩固和发展下去，使中华民族永远团结起来，一直到抗战胜利，建国成功。

10月12日 鉴于日军进攻广东，华南战争开始，起草致国民党军事当局意见书，提出《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意见书全面分析战争的起因和军事特点，提出对日方针为“坚持华南抗战，以击退日寇冒险的进攻，以坚定英国对我的援助，以击破日寇的一切阴谋”。并详细列出九条具体建议。意见书受到国

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刘为章^①在该文“应立即征调至少三十个团，作为四战区作战的补充部队”，“加紧动员广大民众，特别是沿海人民及渔民，发扬广东革命精神，配合军队，实行自卫”等语旁，用粗笔勾出，注明这是华南战争的“要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还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起草了关于补充军队和发动民众的签呈。

10月14日 见蒋介石。关于中共党员公开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问题，蒋说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三青团章程可改变，中共党员可加入。并要周先找三青团诸领导人商谈。蒋还说武汉作战方针已改为消极防御，新的注意力在西南、西北，他已准备好退出武汉的宣言。

10月15日 致信沙志培^②，对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院学习的孙科的内弟陈志昆欲回国参加抗日表示热忱欢迎。说“祖国需要此种人才正切，若到本路军服务，当然欢迎。惟本路军生活艰苦，无所谓报酬，所可获得者即精神之自由畅快与能力之尽量发挥也。如陈君不能适应于漠北高原之生活习惯，弟亦可尽力介绍到政府军事机关或中央军队中服务”。次年七月，陈志昆回到祖国，投身抗日工作。

10月19日 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团体召集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在会上讲话，强调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不退让，不妥协，困难愈大，更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

① 刘为章，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作战组中将组长兼军令部第一厅厅长。

② 沙志培，即沙主培，五四时期与周恩来一起开展学生运动，曾任天津学生联合会调查科科长。一九二四年赴美国学习，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

战”。

△ 在《新华日报》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刊上题词：“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顽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10月21日 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实行紧急疏散。

10月22日 同本日到达武汉的朱德讨论了当前战局及撤退事宜。并陪朱德见蒋介石，商谈八路军的扩充编制、增加经费和派部队到华中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及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问题。

10月下旬 安排中共湖北省委的工作，指示省委成员钱瑛、王翰将省委机关先向沙市、宜昌方向转移，以后根据游击战争发展情况再考虑进入敌后。并要求省委今后主要抓游击战争。

10月24日 到新华社社为在武汉出版最后一天报纸作出安排。次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在重庆出版第一张《新华日报》。

10月25日 送走最后一批撤离的同志，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离开。

△ 汉口失守。二十六日，武昌失陷。二十七日，汉阳失陷。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组织了津浦线、平汉线的破击作战，尤以在平汉线的十多次大破击，给了正面作战的国军以很大的助力。

10月27日 经澧县抵长沙。

11月初 和叶剑英会见李克农，决定派李克农、吴奚如等筹备组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11月1日 鉴于大后方对妥协和抗战问题议论纷纷，和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在重庆准备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的中共党团，提议：（一）请党团在参政会发表宣言，声明拥护统一，坚持抗战，反对主和；（二）推动地方实力派及国民党政府中主战派，质问外交为何有主和论调；（三）实行战时财政节约政策，减低高级薪津；（四）强调战时政府至少应加强并改善政府机关以适应抗战新形势；等。

11月1日—3日 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召开的长沙军事会议。在会上发言谈游击战问题。

11月2日 和叶剑英电告项英，准备向离开新四军去香港的叶挺说明两点：（一）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二）工作关系不良，应当改善。向项英说明为统一战线的发展，以请叶挺回新四军工作为有利。

△ 和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联名致信《救国时报》，控诉日军侵略解放区的暴行，宣传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动员广大华侨支援抗战。

11月3日 日本近卫内阁发出第二次对华声明，表示愿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共建“东亚新秩序”，对国民政府采取诱降政策。

11月6日 在长沙青年会礼堂向湖南各抗日救亡团体作《抗日第二阶段我们的任务》的讲演，宣传持久战的思想，指出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深入下层和敌后，配合前线和敌后的斗争。号召青年到敌后去，到基层去。次日晚，通过电台向全省发表广播讲话。

11月8日 同郭沫若等到湖南衡山会见蒋介石，谈今后抗战军事方案。蒋原则同意，要周恩来写一具体方案。另外，蒋答允

速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11月上旬 和叶剑英出席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召集的会议，作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方针，把重点放到发动群众，抓武装斗争上。

11月10日—12日 帮助郭沫若组织第三厅的撤退。并指示夏衍撤到桂林后自筹经费，恢复《救亡日报》，建立宣传据点。

11月12日 参加第三厅人员在离开长沙前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的集会。

△ 深夜，长沙地方军警负责人误信日军已到长沙的流言，根据国民党最高当局制定的“焦土抗战”的方针，下令纵火焚烧长沙，烧毁房屋五万多栋，居民死伤两万多人。周恩来和叶剑英在睡梦中惊醒，冲出火海，撤离长沙。十三日，从湘潭县下摄司返回长沙了解火情后又到下摄司召集叶剑英、郭沫若、冯乃超、田汉、洪深等开会部署第三厅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人员向衡阳撤退。撤退途中同白崇禧讨论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并就八路军在桂林设办事处问题达成口头协议。

11月14日 根据周恩来指示，八路军衡阳办事处成立（一九三九年初改为衡阳交通站），由李克农、李涛负责。

11月15日 再到衡山。就长沙大火事件向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提出三点善后办法：（一）拨款救灾；（二）调集民工清理街道，安置灾民；（三）惩办放火首犯。

11月16日 抵衡阳。召开第三厅和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的干部会议，介绍同国民党交涉的情况，决定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赶回长沙参加善后救灾工作。当天返回长沙。

11月17日 指派洪深等第三厅人员和演剧队、抗宣队进行善后救灾工作。

11月中旬 同《救亡日报》记者叶厥孙谈抗战问题，通过对中、日两国情况的分析，指出“我们的战略是持久战、全面战”，应该坚信我们是会取得胜利的。

11月下旬 按照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成立。

11月25日—28日 在衡山。和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周恩来、叶剑英就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来任训练班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任训练班副教育长。

11月 和叶剑英电告刘少奇中原地区的情况：河南省委辖豫西南、豫西、豫东三特委；鄂豫皖边区辖鄂东、豫东、皖西三特委；豫鲁苏皖边区辖豫东、鲁西南、皖西北、苏北四特委；安徽省委拟领导皖东、皖北、淮阳三地区。彭雪枫活动区域为豫皖苏鲁边，中原局目前以靠近雪枫为宜，把中心工作放在开展豫东、皖北游击战争。

12月3日 经衡阳到达桂林。同叶剑英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作了详细布置。

12月初 和郭沫若会见白崇禧，提出《救亡日报》要在桂林复刊等问题。白表示支持。

△ 会见胡愈之等。并指示文化界的中共党员注意隐蔽，保存实力，作长期打算。

12月5日 重庆新华日报社、《群众》周刊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举行在日机轰炸新升隆轮中殉难同志的追悼会，周恩来和邓颖超送了挽联。

12月6日 同蒋介石会谈。蒋对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意见表示：（一）跨党不赞成，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二）如果此点可谈，蒋拟约毛泽东面谈；（三）如全体

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答：（一）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二）跨党，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他法。（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蒋表示：如果考虑合并事不可能，就不必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

12月8日 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筹备会并致词。

12月12日 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吴玉章致电中共中央①：今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中共代表，拒绝了中共的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办法，坚持取消共产党，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蒋说：我的责任就是要将两党合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中共代表拒绝了合并的主张。

△ 同叶剑英、张文彬致电廖承志并报毛泽东、洛甫，提出：友党内部各派系斗争缺乏原则性。对友党内各派别间的矛盾我们应以大党风度，站在团结抗战的立场说服两方消除私见，用全力对付日寇，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

12月中旬 到重庆。

12月18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为义卖献金日撰写的代论

① 电报有周恩来署名，当时周恩来尚未到重庆。

《论今后敌人的动向》。文章说：目前战局正处在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中，敌人在军事上，正准备正面的继续进攻和深入，封锁和切断我西南、西北的国外交通，在敌后正在分兵进攻我游击区域和游击部队，企图消灭我在敌后的活动；在政治上，正扩大傀儡政权的组织，加紧汉奸的活动，造谣挑拨，企图分化我国内团结，削弱我国际影响。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政治上，加紧国内团结，提高民族仇恨，扩大战斗意志，实施战时动员，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贡献于战争，以克服当前困难；军事上，更应加强正面的战斗，加紧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加快我后方新的力量的补整和训练，以争取相持局面的到来。并指出，日军速战速决的方针失败，今后进攻的特点是方向将不限于一个地区，为此，我军今后要加紧布置，到处打击敌人，以增加敌之困难，争取有利于我们的时机到来。

12月22日 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所谓调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对国民党实行分化和利用兼施方针。二十六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斥近卫声明。二十九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开投敌。

12月31日 接受张群邀请，同张群、黄炎培^①、张君劢、梁漱溟等共同讨论抗战动员问题。提出动员组织的原则是：统一领导，统一计划，联合组织，分工合作。

本年冬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在广东省惠阳、宝安、琼崖等地相继建立，分别由曾生、冯白驹等任队长。这几支人民抗日武装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领导下，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

^① 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5ZGo5oGp5p2l5bm06LCx77yIMTg5OC0xOTQ577yJ5LiK5YaMXzEyNTM0MzY5LnppcA==",  
  "filename_decoded": "\u05468\u0609\u06765\u05e74\u08c31\uff081898-1949\uff09\u4e0a\u518c_12534369.zip",  
  "filesize": 29402912,  
  "md5": "7208b3de0f8f869dcdd00aa5699e86c6",  
  "header_md5": "6cf0677e0af4334906940d7e4bc5a365",  
  "sha1": "17d94bf2cccd4662b5634b10432c394b54f1fe9d5",  
  "sha256": "85e973f0e4c488fdca6d727b7ade3694c83af653cbc8c4d33fd47d8177a59c2a",  
  "crc32": 661064506,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9359786,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438,  
  "pdg_main_pages_max": 438,  
  "total_pages": 449,  
  "total_pixels": 188860928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